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刊

区域经济评论

REGIONAL ECONOMIC REVIEW

(2024年第2期,总第68期)

双月刊

学术顾问 范恒山 程必定 洪银兴

编委会主任 金 碚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任重 王一鸣 王承哲 王玲杰 史育龙

宁越敏 任晓莉 阮金泉 安虎森 孙久文

李同新 李国平 李海舰 李曦辉 杨开忠

杨继瑞 肖金成 谷建全 张可云 张占仓

张世贤 张军扩 张其仔 陈 耀 金 碚

周金堂 赵 弘 郝寿义 贺灿飞 秦尊文

高国力 崔民选 覃成林 喻新安 魏后凯

主 编 张富禄 陈 耀

社 长 张富禄

副 社 长 刘昱洋

主管单位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区域经济评论

(双月刊)

区域经济理论

5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科化探索——从民族经济学到共同体经济学

李曦辉

18 基于边界、方式和目标维度视角下的区域协同创新研究

赵成伟 夏丹尼 张孟辉

笔谈

26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赵剑波 苏楠 刘志迎 渠慎宁 陈萍

区域协调发展

38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新型城镇化:概念辨析、现实困境和突破路径

洪晗 肖金成 陈蕊

50 “东北振兴”20年:进展、问题及对策

王菡 单菁菁 武占云

60 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

刘国斌 王嘉玲

区域格局与产业发展

68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黄阳平 黄巍

78 我国服务消费新业态发展研究

符加林 岳娜娜 黄晓红

城市经济研究

- 87 中国全球城市的评价体系构建与实现路径研究 张林 王钦 孙永权
100 中国城市群的发展测度:基于19个主要城市群 董昕 张朝辉 刘晓霖
111 聚焦同城化 加快推动首都都市圈发展的思考 欧心泉 余飞
119 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耦合协调时空演化分析
段琳琼 郝铭 赵修研 陈常优

区域开放与合作

- 130 中国各地区内外贸模式及其融入新发展格局研究 段庆林
138 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态势评估 王罗汉 王晓莉
144 RCEP全面实施对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多维影响效应研究
王建国 盛见 易雪琴

区域经济研究综述

- 156 区域协调发展与交通强国建设——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第二十六届
年会综述 李鲁 李剑芳

主管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主办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编辑出版 区域经济评论杂志社
地址 郑州市恭秀路16号
邮编 451464
电话 0371-63690786
投稿邮箱 qyjpl@163.com
网址 www.qyjpl.cn
印刷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41-1425/F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2095-5766
广告发布登记证 金市监广发变登字【2020】021号
国内订阅 全国各地邮局
国内发行 郑州市邮政局 邮发代号 36-44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国外代号 BM5690
定价 16元

REGIONAL ECONOMIC REVIEW 2024.2 *Bimonthly*

- The Exploration of Creat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to a Discipline—from National Economics to Community Economics *Li Xihui*(5)
- Research on the Region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Based on Boundary, Approach and Target Dimensions *Zhao Chengwei Xia Danni Zhang Menghui*(18)
- New Urbanization for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Conceptual Analysis, Logical Relationship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Hong Han Xiao Jincheng Chen Rui*(38)
- 20 Years of “Northeast Revitalization”: Progress,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Wang Han Shan Jingjing Wu Zhanyun*(50)
-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the Coupling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unty Economy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Liu Guobin Wang Jialing*(60)
-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nomy *Huang Yangping Huang Wei*(68)
-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Formats of Service Consumption in China *Fu Jialin Yue Nana Huang Xiaohong*(78)
-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valuation System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China’s Global Cities *Zhang Lin Wang Qin Sun Yongquan*(87)
- Meas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Based on 19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Dong Xin Zhang Chaohui Liu Xiaolin*(100)
- Focusing on the Thinking of Urban Integration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 Metropolitan Area *Ou Xinquan Yu Fei*(111)
-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alysi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Urba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Urban Land Use Efficiency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Duan Linqiong Hao Ming Zhao Xiuyan Chen Changyou*(119)
- Research on Foreign Trade Pattern and Integration into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Various Regions of China *Duan Qinglin*(130)
- Resilience Assessment of Industrial Chain and Supply Chain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Wang Luohan Wang Xiaoli*(138)
- Study on Multi-Dimensional Impact of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RCEP on Chin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ang Jianguo Sheng Jian Yi Xueqin*(144)
-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Transport Power: A Review of the 26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Society *Li Lu Li Jianfang*(156)
-

【区域经济理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科化探索*

——从民族经济学到共同体经济学

李曦辉

摘要:民族经济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在其著作中经常提到的概念,民族问题也是革命导师们关心的重要问题,只不过他们关注的民族大多属于民族国家层面。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人类从文明社会开始,就一直存在共同体认同,在生产力发育程度较低的时期,人们认同规模较小的血缘共同体;在生产力得到一定发展以后,人们开始认同规模范围相对较大的地缘共同体;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以后,人们就开始认同规模范围更大的文化共同体,也就是民族共同体;在生产力高度发达时,人类就将实现大同。民族经济学是诞生于我国本土的经济学理论,发源于20世纪20年代,正式诞生于1979年。与当时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当初主要是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经过40余年的发展,加之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民族经济学也与时俱进地进入了新范式时代,迫切需要演进成共同体经济学,起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

关键词:民族经济学;共同体经济学;学科发展;新范式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4)02—0005—13 **收稿日期:**2023—12—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及其国际比较研究”(19ZDA173)。

作者简介:李曦辉,男,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1)。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让各族人民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2023年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要优化学科设置,加强学科建设,把准研

究方向,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以民族作为经济活动和经济利益单元的理论范式已经不能适应经济社会进步的需要,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指导基于民族维度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本文研究共同体经济学,就是要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研究经济发展模式对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作用,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起着重要作用。

一、引论

研究人类社会共同体问题,就要从马克思恩格斯

的共同体理论出发,结合中国的实际,做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提出中国的理论体系。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提出,人类的认同是沿着血缘、地缘、文化和社会大同的脉络发展演进,这一进程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影响。如今,西方认同主要体现为民族国家认同,中国则主要是基于文化的共同体认同,我们认同的规模范围明显大于西方的认同。认同要受到经济活动的影响,与此相对应,民族国家为主的认同主要由民族经济学来诠释,文化共同体的认同主要由共同体经济学来诠释。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学学科化探索,也将从民族经济学演进到共同体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者认为:“从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历史脉络来看,民族问题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思考的核心问题,由于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人类解放问题紧密相连,因此,民族问题成了一条暗线始终伴随在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之中”(张晋,2013)。时至今日,民族仍然是现代人类群体分类的重要依据,从民族视角看世界也是我们观察世界的重要维度,人们的经济利益更是主要用民族概念加以分野。列宁曾经指出:“工人没有祖国”,但工人阶级又必须生存在一定的民族国家之中。“工人阶级如果不是‘在民族范围内构成起来’,如果不是‘民族的’……,就不能巩固、成长和形成”(列宁,1988)。说明无产阶级或者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也必然采取民族的形式形成与发展,否则无产阶级就不能发展壮大起来。

按照斯大林(1953)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认为,民族是私有制社会的产物,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而产生,亦将随着私有制的灭亡而消亡,民族是个历史范畴。革命导师对民族概念的理解具有代表性。恩格斯认为:“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马克思和恩格斯,1965)。这个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按照公有制原则结合起来的各个民族的民族特点,由于这种结合必然融合在一

起,从而也就自行消失,正如各种不同的等级差别和阶级差别由于废除了它们的基础——私有制——而消失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1979)。人们的群体认同将超越民族范畴,而发展到一个更加广泛的共同体。就像列宁曾经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家的现象和各民族间的任何隔离状态。不只是为了使各民族相互亲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为一体”(列宁,1990)。社会主义各民族融为一体的过程,首先起源于经济的相互交往与一体化实践,然后才是民族的趋同化,进而实现民族的彻底融合,形成一个更加广泛的民族共同体。

马克思和恩格斯(1958)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资产阶级既然榨取全世界的市场,这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伤心,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旧的民族工业部门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着。它们被新的工业部门排挤掉了,因为建立新的工业部门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部门拿来加工制造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从地球上极其遥远的地区运来的原料;它们所出产的产品,已经不仅供本国内部消费,而且供世界各地消费了。旧的需要为新的需要所代替,旧的需要是用国货就能满足的,而新的需要却要靠非常遥远的国家和气候悬殊的地带的产品才能满足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958)。“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能再同已经发展的生产力相适应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958)。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血缘关系形成的氏族共同体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了,民族的共同体成为了共同体的主要形式。恩格斯(2018)认为:“由于谋生条件的变革及其所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又产生了新的需要和利益,这些新的需要和利益不仅同旧的氏族制度格格不入,而且还千方百计在破坏它”。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民族逐渐形成并至今一直占据重要地位。“氏族组织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地区组织,因而才能和国家相适应”(马克思和恩格斯,1972)。部落联盟是“朝民族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马克思

和恩格斯,1965),“部落联盟是与民族最近似的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1982)。“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对内和对外都不得不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亲属部落的联盟,到处都成为必要的了;不久,各亲属部落的融合,从而分开的各个部落领土融合为一个民族的整个领土,也成为必要的了”(恩格斯,2018)。再发展下去,拥有统一文化的各民族就会结成民族共同体,以容纳不断发展的生产力的需要。

二、民族经济学学科来源及其述评

民族经济学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必然会使经济收益主要在民族之间分配,然后才会在更大的人类共同体之间分割。在民族经济学产生的早期,有学者认为,民族经济学产生有两个直接原因:一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定义的启发。从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心理素质产生了民族地理学、民族语言学、民族心理学,很自然地就从共同的经济生活也就产生了民族经济学(施正一,1987)。二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社会经济,不仅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当中具有特殊性,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属于一个全新的课题。研究这门科学的理论,就是民族经济学(贾晔,1992)。留法民族学家杨堃(1985)提出了学科新来源,“我所说的民族经济学,也叫做经济人类学”。沿此思路有学者认为:“鉴于民族经济学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研究民族的发展问题,同时也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经济问题,当前可重点借鉴西方的发展经济学和经济人类学(也称‘经济民族学’)”(翁乾麟,1987)。

1. 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阐释

学科建立初期中央民族大学黄万纶用政治经济学理论诠释民族经济学学科范式,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阐释这一路径研究的开拓之作。20余年以后,同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刘永佶的研究成果也是这一路径的发展之作。黄万纶(1983)认为:“‘少数民族经济’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新兴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我国少数民族(或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生产方式(主要是生产关系),兼及上层建筑。它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和揭示我国少数民族的社会生产方式及其特点、结构和规律性的科学。”“它考察的是社

会现象领域中少数民族经济这一社会经济现象和矛盾,它主要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少数民族经济’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它所揭示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依据和指导,‘少数民族经济’不仅要研究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少数民族经济中的具体表现及其作用特点,而且还要研究少数民族经济中的特有的规律性。”“‘少数民族经济’之所以是经济科学中的一个重要学科,这是由其研究对象所决定的。因为经济学科的各个学科都是从不同角度来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社会经济关系(或生产方式)及其发展规律的;而少数民族经济这一学科乃是从民族的角度来研究这些问题的,因而它属于经济科学的范围,并具有经济科学的性质。”当然,“我们研究的重点要放在生产关系上。”“我国少数民族的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就是指少数民族地区中的各种经济成分、各个经济部门、各类企业以及社会再生产各个方面的构成及其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和各民族间的经济关系。我国少数民族的这种社会经济关系,也是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该篇论文作为少数民族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维度的开拓性研究成果,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依托,提出少数民族经济学科定义、对象、指导理论等一系列学科要件,给出了学科的一种范式,具有一定的价值,但也存在可实施性不强等问题。

2006年,刘永佶在《民族经济学大纲》一书中对民族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范式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刘永佶(2007)认为:“民族经济是经济生活和经济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对它的研究,具有明确的主体性,虽然对象是相同的,但不同研究主体的利益和意识的差异,使之在研究中会得出不同的认识,其集中的观念就是主义,在主义的指导下,研究者依主体的要求形成方法,确定研究主题和内容,其中的集合点和主干概念是范畴,各范畴的内在联系,就是体系。”“我们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学这一大派系的成员来研究民族经济学的,为此我们是以各民族具有自主意识的劳动者为主体,作为他们的利益和意识的体现者来研究经济的民族性和民族经济发展与民族经济关系的。”“民族经济学简单说就是以民族经济发展和民族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

但并非对各民族的经济活动进行平面式的描述,否则有多少民族就会有多少民族经济学,研究工作几乎不可能进行。必须找到民族经济中特定的性质、关系和矛盾,而这些性质、关系和矛盾又是政治经济学及其经济科学所未曾涉及或不能系统研究的。”“民族经济学以经济的民族性为前提,以民族的经济发展与关系的矛盾为对象,就是对这一特定矛盾的专门系统研究,在明确对象的前提下,形成由主体的阶级意识集中体现的主义所指导的研究,也就是统一的对矛盾的实证与抽象、规定范畴和概念,构建体系,从而使民族经济学成为系统科学。”“民族经济学的主义,以明确和实现各民族劳动者主体地位为基点,在这个基点上,要注重各民族的平等和自由发展。”“社会主义民族经济的发展,目的在为劳动者的自由发展,也就是劳动者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创造必要条件,同时使劳动者可以更为充分地发挥素质技能,二者又是民族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根本。”有的学者在对刘永佶主编的《民族经济学大纲》进行评论时认为,“政治经济学侧重揭示各民族阶级关系的共性和一般性,而民族经济学则具体分析各民族阶级关系的个性或特殊性”(沈斌华,2007)。刘永佶对黄万纶的开创性观点进行了拓展,但没有对民族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维度研究进行拓展,而且对民族阶级关系的一般与特殊界定变得越来越不好抽象,离经济学范式似乎越来越远。

2.源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

民族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关心的重点领域。我国的少数民族,“民主改革以后,这些民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落后的、多样的社会形态成为这些民族进入社会主义的‘脱胎母体’。”“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极端落后,不仅不符合我国的民族政策,也有违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原则,更不利于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还有损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因此,从理论上探讨如何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就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紧迫任务,民族经济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沈道权,200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实践更是对民族经济学的发展提出了紧迫的要求。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认为:“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全党的工作重心将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强调只有“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1994)。此时,“发展已经成为新时期的主旋律:我国的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也同样面临着如何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因此,考察社会现象中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及其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也就成为研究者们面临的新课题。这项任务是我国的传统民族学所难以胜任的”(龙远蔚,1998)。此时民族经济学也就产生了。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反映了生产要素国际流动趋势的加速和经济文化联系的日趋增强。‘全球化’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系统综合互动的演进过程,并与‘本土化’交织叠合、共存并进,尤其是经济文化的全球化与民族性无法割裂,这就为积极应对提出了要求”(叶坦,2005)。这种新型的全球化,不仅需要民族经济的理论指导,还需要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民族经济学从产生之初就没有形成学术共同体普遍认同的定义与研究对象。学科创始人之一的施正一(1993)认为:“民族经济学的概念内涵可以从广义与狭义两个层面来界定。从广义上来说,它可以根据需要研究世界上各个民族或民族国家的经济问题。从狭义上来说,它是研究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经济问题,在我国则研究除汉族以外的各个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问题。”广义、狭义之分为学科进一步发展预留了空间,但也使研究更难聚焦,此外,既研究少数民族又研究民族地区,也让研究工作不好定位。其实,早在1956年,民族学家费孝通、林耀华(1985)就曾撰文指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是包括一切民族在内的,在中国的范围里,不但要研究少数民族,也要研究汉族。”但也有学者不这样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就是中国的民族集团或单个民族的经济问题,不是说该学科就一定是‘中国造’,但起码还不具备触及世界各民族的体系扩张能力”(李忠斌,2004)。

研究对象的范围变化不定,研究内容更是各抒己见,没有形成约定俗成的标准。施正一认为:“民族经济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民族经济问题的科学。在我国,现阶段主要是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经济

问题。它的研究范围是很广泛的,不仅要研究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现实的经济问题,而且也要研究各个民族或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史,研究各个少数民族的经济思想史,并且还要研究各个民族之间的经济关系史。民族经济学既要研究少数民族经济社会中的各种理论问题,又要研究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实际问题和政策问题,既要对这些问题进行纵向研究,又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横向研究”(施正一,1983)。研究范围十分宽泛,研究内容纷繁庞杂,试图通过广泛的罗列来框定民族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与内容,避免出现重要的遗漏。由于研究范围与内容写实而不够抽象,难以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稳定的思维逻辑,其后的研究者则是根据自己的研究特点来确定研究内容,各种研究缺乏研究内容上的一致性。有学者认为:“这门科学不是研究一般的后进民族的发展问题,也不是研究世界范围的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而是专门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特别是社会经济现代化问题”(贾晔,1992)。在民族经济学领域比较权威的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导师组集体撰文认为:“民族经济学科以中国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的经济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重大的理论问题与实际问题的。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制度、经济管理体制、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的演进、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研究民族关系、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相互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民族现代化的趋势特征、民族利益的实现方式、民族团结的经济基础。随着学科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民族经济学还将逐步开展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与世界民族经济以及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与世界华人经济的比较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导师组,1999)。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环境的变化,有的学者提出了新的研究内容。“在民族问题上,经济与文化的关联性尤为突出,研究民族经济更需要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应当结合民族文化、传统习俗、习惯心理等‘非经济因素’,重视由民族文化特征所赋予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行为偏好等,这些都积淀成为民族经济生活的基本要素——这就是笔者多年来反复重审的‘经济文化一体性’”(叶坦,2005)。这样一种可以天马行空般地界定研究内容与范围,显然是不符合成熟学科应有的范式规范的。

3. 源于经济人类学范式

在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成立初期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曾在云南大学工作30余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的老一代留法民族学家杨堃提出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的学科归属问题。他认为:“我所说的经济民族学,也叫经济人类学。因为在现代资产阶级民族学界,受到美国的影响,人类学一名称代替了民族学。但欧洲大陆各国,特别是苏联,还认为人类学仅指体质人类学,故在讲到经济民族学时,他们虽叫经济人类学,却在人类学一名称上加上引号。”“我认为我国少数民族经济学,他的学科性质是属于经济民族学的”(杨堃,1985)。这是学术界首次有人提出新诞生的民族经济学归属于经济人类学。其后,云南大学经济系毕业生、当时在云南民族学院任教、后调入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工作的陈庆德,对此学科归属问题进行了进一步阐述。他认为:“民族经济学是在经济学与人类学的融合中产生的”(陈庆德,1993),“民族经济学是人类学与经济学联姻的直接产物”(陈庆德,1994),“经济学是民族经济研究最初立足的重要场所”(陈庆德和潘春梅,2009)。之后,他的学生们进行了各自的学理性研究,目的就是要证明民族经济学发展的归宿就是经济人类学或经济民族学。

罗康隆和田广(2014)认为:“从19世纪开始,经济人类学主要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扩张提供理论依据。以‘原始人类经济’的形态存在为话题,试图检验这样一个原理:世界经济秩序必须以巩固西方工业社会为准则。”他们在论文中引述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民族经济学对于东西部地区差距、不同民族间经济差距、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加速发展战略、西部经济开发、西部人力资源开发、边境开放与边境贸易、西部生态、民族地区城镇化与乡镇经济等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了公认的理论建树,在实践中形成具有创新意识的学科理论体系(李竹青等,1998)。继而得出结论:“我们认为这两门科学在我国学术界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在研究对象和内容方面重叠部分越来越多,而研究方法也有趋同现象,因此我们认为两者的联合似乎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并由此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以民族经济学为基础,而且只有以民族经济学为基础,才能

形成中国特色的经济人类学”(罗康隆等,2014)。

郑宇和杨素(2019)认为:“立足于人类学的西方经济人类学也不可能自然而然地演化出经济民族学这一学科。从发展历程来看,虽然人类学传统上注重对边缘群体的调查研究,但其中的少数民族从来都只是边缘群体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类别而已。”“西方经济人类学因此无论在学科起源与当前发展方面,还是在研究对象与理论方法等方面,都已经展现出与本文讨论的经济民族学的迥异旨趣。”“经济民族学因而是在民族经济学、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学科归属定位模糊,西方经济人类学研究对象逐步疏离民族本体以及部分理论预设与研究方法需要反思重构的背景下,倡导从经济学、人类学等学科回归民族学本体,从而系统性、整体性地探索民族与经济相互作用的一门新学科。”这样一种学科归属的学理研究,存在明显的嫁接痕迹,在学理上并不是完全通顺的,在逻辑上也存在瑕疵。

4. 评价

从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原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族经济学范式,本应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所发展,至少也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运用到民族经济学发展之中,能够形成指导民族经济学具体实践的指导思想,并能够使民族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更好地付诸实践,促进生产力发展,取得积极的经济效果。然而,该领域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原意的阐释上,并没有沿着民族经济学路径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发展,甚至也没有指出怎样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成民族经济发展的指南,真正形成民族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范式。代表性论文强调,中国少数民族经济考察的是社会现象领域中少数民族经济这一社会经济现象和矛盾,研究少数民族社会的生产方式、特别是该社会的生产关系的科学。然而,自此领域的研究开拓以来,至今没有回答少数民族社会生产关系具有何种特征,也没有揭示清楚少数民族社会现象领域的特殊现象和矛盾规律。对于民族经济学研究主体的各民族具有自主意识的劳动者,怎样按照阶级分野的方式从事经济活动,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这种分析方法只是按照马克思关于民族问题从属于阶级问题的范式,认为阶级剥削消灭了,民族压迫也就自然消解了,这样的理论路径进行了分析,并没有给出各民族拥

有自主意识的劳动者应该采取何种行为,才能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总的看来,这一范式的学科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目前尚难以起到学科发展的引领作用。

由于学科初创时的定义宽泛,导致学科发展的多元化,没有形成一个约定俗成的标准,也就是没有一个可以作为参照系的固定范式。关于民族经济学的创立,有的学者认为是为了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少数民族发展的低水平问题而建立的,有的学者认为是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政策而建立的,还有的学者认为是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对文化多元化的要求而建立的,可能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还会有其他的学科发展动因。因此,民族经济学迫切需要确立一种抽象的学科范式,以规范研究者的行为,使学科形成稳定的研究领域与行为,促进学科发展。

学科的研究范围也存在问题,具体是研究我国国内的少数民族经济生活,还是研究我国包括汉族在内所有民族的经济生活,甚至是研究全世界包括所有民族的经济生活,一直没有形成定论,导致学科研究的离散化,并没形成稳定的学科研究领域。在学科研究的目标定位上也缺乏准确的瞄定,有学者认为应研究所有涉及民族经济生活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也有学者认为应研究民族地区的一切涉及经济管理体制的问题,还有学者认为应该研究基于民族内生属性的经济与文化适应性问题。总的来看,就是由于学科缺乏抽象的研究对象所致,学科迫切需要进行全方位的范式抽象。

以经济人类学为来源的民族经济学范式构建更为牵强。研究者起初承认民族经济学的存在,只是认为民族经济学的来源是发展经济学与经济人类学的“联姻”,强调的只是理论来源与当时大多数学者所持的观点不同而已。后来,其学生们进行发展,认为民族经济学并不存在,或者民族经济学即便存在,也是经济人类学发展的前奏,只是为了经济人类学的成长而临时存在的一个学科,认为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归宿只能是经济人类学。他们的依据之一,一是国家学位主管部门并不承认民族经济学的存在,即便承认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存在,它也只是隶属民族学的二级学科;二是民族经济学与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越来越重叠,这样的两个学科只能合并为一个学科,那就是经济人类学;三是

民族经济学依然没有得到学位主管部门的承认,经济人类学又大大疏离了民族这一主体,为了学科的发展,民族经济学应更名为经济民族学。然而,马克思曾经论述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国际交往理论,其中包含浓重的民族色彩,而今在资本主义经济还占全球主体地位的发展阶段,还要适应资本主义国际交往的需要,发展民族经济,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时的民族经济学是十分必要的,并非是可有可无的。此外,学科的发展来源于人类对某一领域理论的需要,而不是有关政府部门的界定,这也说明,国家学位主管部门需要让民族经济学更好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以民族作为经济活动和经济利益单元的理论范式已经不能适应经济社会进步的需要,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指导基于民族维度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发展实践已经给出了答案,就是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人心,中华民族的认同范围不断扩大,目前已经单纯地从对民族的认同,发展到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其经济发展指导理论也应该从民族经济学转换为共同体经济学。

三、民族经济学学科称谓及其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应关系

民族经济学学科称谓从建立之初就未曾统一过,没有固定的学科名称。1979年3月,全国经济科学八年规划会议上,中央民族学院教授提出的名称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并被会议接受,列为经济科学的第27个学科;同年9月,在中央民族学院庆祝建国3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提出民族经济学,并于次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建立民族经济学的发端性文章,民族经济学成了最通常的提法;由于民族经济研究难以离开区域的范式,于是主流经济学便把民族经济研究归入区域经济的范畴,也就有了民族地区经济的提法。称谓的不统一给民族经济学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障碍,迄今为止其发展状况仍然如21世纪之初学者所描述的那样:“20多年来,民族学与经济学合演一曲二重奏,但迄今流传未广,甚或质疑之声不断。究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或民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还未能找到得当的分

析框架和工具,因此未能有说服力地演绎科学理论的逻辑关系。对一些最基本问题的澄清仍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工作”(王文长,2005)。其实,这种学科范式与称谓的不一致,还有一个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就是生产力发展变化,必然要求学科的内涵外延与之相统一。

1. 发展早期少数民族经济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混用

在民族经济学科产生之初,施正一、黄万纶两位创始人对学科的称谓一直不同,前者一直称学科为民族经济学,后者则始终称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施正一撰写并主编了《民族经济学概论》等一系列学科教材,黄万纶主编的教材则称作《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针对这种状况,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于光远两次撰文,强调少数民族经济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有所不同,要深入研究两个概念,以强化民族经济学科的研究工作。1982年于光远就曾指出:我们应不应该使用少数民族经济这个概念呢?我考虑了一个时期,考虑的结果还是能用。大家都知道,在毛主席的书里面曾经用过“少数民族经济”这个词,我认为这是保留少数民族经济的一个理由,但并不是主要理由。理由是少数民族经济是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不一样的概念。它不是从地区的角度来研究经济而是从一个一个民族的角度来研究经济问题。因为它们是不同的概念,所以我们还要研究少数民族经济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于光远,1983)。1985年10月,在给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经济专业研究生作报告时他又重申:“今天我讲的是‘少数民族经济’的现代化,不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现代化。”“事实上这几年‘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研究的比较多,而‘少数民族经济’反而研究的比较少。”“‘少数民族经济’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是很接近、关系很密切的,但又是不相同的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的区别是:少数民族经济,指的是中国少数民族居民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分配方式、消费方式,中国少数民族居民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中国少数民族居民的社会经济生活的现状和它的发展等。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指的是这类地区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这类地区的经济发展现状与发展等”(于光远,1987)。

研究少数民族经济,就是要研究中国56个民族

中每个民族自身文化特点对经济活动过程与效果的不同影响,关注的着力点是每一个具体民族的经济生活;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关注的视角就变成了区域,其可以小于、等于、大于单一民族的居住生活区域,更大的可能是研究涉及几个、几十个民族的生活区域,这样的区域对生产力容纳程度就更大了,发展了的生产力就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间。这可能也是这一时期民族经济学名称混用的一种解释吧。

从学科创立者的角度来对名称混用进行解释,可能就不是深奥的理论逻辑,而是现实的需要。黄万纶(1983)认为:“少数民族经济这一学科要研究少数民族(或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兼及上层建筑。”“‘少数民族经济’之所以是经济科学中的一个重要学科,这是由其研究对象决定的。因为经济学各个学科是从不同角度来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社会经济关系(或生产方式)及其发展规律的;而少数民族经济这一学科乃是从民族角度来研究这些问题的,因而它是属于经济科学的范围,并且具有经济科学的性质。”笔者曾参与黄万纶、李文潮两教授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的编写工作,与黄万纶教授有所接触,但不知为什么他在学科研究对象中提及了少数民族地区,而在进一步的学科定义中并未涉及少数民族地区这一要件,而且学科的称谓一直叫做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在当时的背景下,“在主张‘单一经济学’的我国主流经济学界,仍然对民族经济学心存质疑或偏见,认为经济学的一般学科足以囊括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一切问题或方面,不用再去建立和发展民族经济学”(庄万禄等,2005),同时也与民族经济学的发展道路有关。“长期以来,民族经济学试图把民族学与经济学有机结合起来,但又把经济学理解为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具体的经济学理论,这正是始终未能解决民族学与经济学结合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邓艾等,2005)。面对这样的背景和学术环境条件,如果提出民族经济学的称谓,可能让主流经济学界难以接受,如果在定义中加入少数民族地区的因子,又会让学科发展走入已有学科的边界,难以实现自身的发展,如果采用中国少数民族经济这样专题性研究的名称,是容易被各方接受的。正是因为基于现实考虑的学科界定,也为后来学科的发展带来了困难,因为中国少数民

族经济更像专题研究的界定,而不像具有理论意味的学科名称。

2.改革开放成熟期民族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称谓并行

“民族经济与少数民族经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相比,更抽象简略,包容更广,内容更丰富”(王文长,1999)。换个角度来说,民族经济学称谓更具有学科属性,注重学科内涵和理论抽象,可以为学术共同体的研究工作提供范式参考,是学科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理论铺垫。然而,从学科建立之初,创立者提出民族经济学概念以来,学术界就一直存在民族经济学就是区域经济学的声音,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经济学是不存在的,所谓的民族经济学,就是区域经济学的一种特殊切块,就是区域经济学的一种特殊存在。“所以,出现了民族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两张皮’的现象:一方面,民族经济学界在自己的圈子内‘自娱自乐’,更多地偏安于西部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主流经济学全方位研究全国经济发展问题,使得民族经济学很难取得经济学领域的全国‘话语权’,从而没有形成合力,更深入、更具体、更透彻、更全面地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主要是民族经济学学科建设滞后所造成的”(庄万禄等,2005)。这种观点很有代表性,是困扰民族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民族经济学学科发展历程也证明了上述说法。在学科概念提出的早期,人们对民族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的分野就不甚明了。有学者认为“民族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科学,它的主要任务是运用民族学和经济学的原理、方法,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模式和规律”(翁乾麟,1987)。还有学者认为“多数同志并不认为,民族经济和民族地区经济是两个不同的研究对象,因而认为民族经济(学)和民族地区经济(学)仅是同一学科的不同名称。从近几年的研究来看,则基本上是对民族地区经济的研究,其主要内容是民族地区的各部门经济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对各民族的经济研究实际上被忽视了”(王筑生和杨慧,1984)。说明学科建立的初期,对民族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的界线就没有划得十分清晰,影响了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施正一也认为民族经济“是指多民族国家中不同民族居住的特定地区经济,在我国就是指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或民族自治地方的

经济”(施正一,2001)。这随即就引来了质疑声。“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创建30年来,近80%的成果是研究民族自治地方经济问题的。然而,在现实中,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并不等于民族地区经济,更不等于少数民族经济。再者,从在这些成果中去掉‘民族’字样后,从理论到内容,与区域经济学并无二致。出现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少数民族经济至今还没有自己的具有确切定义的、具有分析意义的核心概念以及概念体系”(包玉山,2010)。有鉴于此,中央民族大学王文长(1999)进行过深入剖析,他认为:“现实的民族经济研究事实上主要侧重于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研究”,“在学科概念上无论是采取少数民族经济,还是采取民族经济,再具体的理论研究实践过程都是首先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现实的角度切入的。”“都反映了相似的思维逻辑,民族经济研究主要表现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研究。”“此间也有一些理论常识,企图在学科概念和逻辑框架上有所突破”,“当涉及具体的现实经济分析时,所谓的‘民族经济体’又不得不找回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空间形式。这样,新视角实际仍然在谈旧问题。”

其实,学科名称之争还有另外的解释维度,就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中国经济全球化,我们如何与全球经济融为一体,引起了学界的思考。按照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路径进行思考,是不考虑文化与制度因素的,对于民族地区而言,其发展指导理论是民族经济学还是区域经济学,是没有差异的。然而,中国经济发展并非是在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完成,我们的发展更加注重文化与制度,我们更加依赖于习近平总书记后来总结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可以说,我们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下完成了现代化进程的。这一时期民族经济学的称谓混用,主要是生产力进步而我们没有及时洞察并加以变化的原因。

3.经济全球化演进与民族经济学称谓变迁

在民族经济学定义中引入少数民族经济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概念,这个学术群体主要由施正一教授及其学生组成。有关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王燕祥(1998)认为:民族经济学,目前发展阶段主要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研究。黄健英(2005)则认为:“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大部分侧重于民族地区经济问题的研究,相对而言从民族角度或对某一民

族的经济问题的研究显得比较薄弱。”“民族经济研究不可能脱离其生产生活的地域空间,而且民族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地域特征,虽然存在着民族经济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分离现象,但民族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且如何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中民族利益关系还是民族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可以看出,后两位学者对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认知各有侧重,但互相并不否定,都认为民族经济学离不开少数民族经济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

关于少数民族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关系,马丽娟(2003)进行了深入探讨。她认为:“民族经济学是研究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经济问题,在我国则是研究除汉族以外的各个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问题。”当然,“当特定的区域经济以单一的民族构成其活动主体时,区域经济与民族经济完全重合。这种表述是从地域范围表述民族经济的,而不是从民族经济的内禀性质提出民族经济的识别符号。因此,民族经济并不等于区域经济,在现实的情况下,没有一个特定的区域内只有纯粹的民族经济模式,民族经济总是和‘其他’经济并行,并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活动特征。”“民族经济的‘区域’概念是这样的:没有一种在地理上、行政上的区域是对民族经济具有识别意义的,民族经济的‘区域’不是一个平面,而是一个‘时空’。”“只有把民族经济同经济学中的区域经济区别开来,才能为民族经济提供一个合理的和合乎经济现象的领域,才能把民族经济的研究方法、视野、目的和意义引入它自己的位置。”她的研究重点关注了民族经济与区域经济这一民族经济学发展无法绕过的问题,具有积极的学术价值,但并没有给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这也是一种遗憾。

施正一认为:“从狭义上来说,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研究我国的少数民族经济问题,它包括的范围也是多方面的,可以把一个少数民族的经济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也可以把一个民族地区(包括若干个少数民族)的经济问题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还可以把所有少数民族的经济问题作为综合研究的对象”(施正一,2001)。

随着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程度的加深,反映在民族经济学称谓上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从少数民族经济,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再到区域经济,研究的范围在不断扩大,甚至学科创始人施正一要研

究若干个少数民族甚至是所有少数民族的经济。这种称谓演变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民族维度的经济研究,但单一民族或数个民族连成的民族地区经济研究,都不足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需要对结成中华民族的共同体经济进行研究,才具有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

4.评价

民族经济学研究中的民族经济是具有丰富多彩的民族特征的,并不满足西方经济学对于抽象的要求,在空间上又主要表现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空间形式,这样一种时空现状,就构成了民族经济学发展的时空困境。为了解决这一难点问题,学者们便引入了三个概念,以便互相佐证,从而使民族经济学概念更具有科学性和理论价值,但是这确实是以让渡可实施性为代价的。因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被主流经济学界认为是区域经济学的一个特殊切块,而少数民族经济由于经济总量加总困难而不能通约,从而也就影响了抽象性。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就难以走上通衢大道。

民族经济学发展必须解决其与区域经济学的区隔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那么民族经济学则不能顺利发展。这样一种结果的出现,是与民族经济学建立初期学科名称的不统一大有关系的,也与学科的研究对象不稳定关系密切,更与学科的研究范式没有形成大有干系。由于民族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大家庭中一个由中国人自己创立的经济学学科,不能满足西方经济学最核心的关于经济人抽象,因而不为主流学界所接受。于是为了满足学界同仁对经济学抽象逻辑的偏好,勉强将民族经济学装进了区域经济学的“盒子”,希望它以区域经济学的面貌示人,结果就落进了逻辑不够严谨的圈子,沿此逻辑走下去,后人无力改变民族经济学属于区域经济学的误判。要想让民族经济学实现新发展,就要像施正一(2002)说的那样:“民族经济学研究要有新思路。”

民族经济学要确定一个统一的范式,供学术共同体同仁参考,也为后来加入者提供研究范例。关于范式,托马斯·库恩(2003)认为“‘范式’一词有两种不同意义的使用方式。一方面,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指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把它们当做模型和范例,可以取

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而民族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在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发表的民族经济学论著中,很难提炼出共同认可的‘基础理论’,而且同一种‘基础理论’的核心部分也往往随时间的推移而又重大调整”(邓艾等,2005)。作为已有40余年发展历史的一个重要学科,迫切需要进行学科范式的统一。

民族经济学的出路就在于共同体经济学。中华民族是一个与西方民族完全不同的民族,西方的民族过程是一个充满压迫的过程,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剥削和强权;中华民族则不一样,我们的民族过程是和平的过程,是通过经济交往而实现文化认同,最终组成一个一体的中华民族,也叫做中华民族共同体,它是靠对于共同体的意识认同而铸牢在一起的。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起着重要作用的经济学理论,就是共同体经济学。

四、时代呼唤共同体经济学

《辞海》中对共同体的解释是:“人们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集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则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无论从哪个层面进行解析,中华民族共同体都是对中国56个民族的集结与整合,都体现为中华民族认同范围的扩大与认同程度的提高,都是中华民族由多元走向一体的重要体现。世界上有多个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其中独特的一个。就像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发表的《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特别致辞指出:“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习近平,2021)。人类文明存在着新形态,我们理解为中国形态。对于这种形态的独特性,历史学家许倬云进行过阐释,他认为:“在人类的历史上,中国这个个案,确实是相当特殊。欧洲有过希腊、罗马、教廷这几个大型的共同体,中东也有过伊斯兰的共同体,南亚有过印度共同体。但是,中国这个共同体,其延续之长久,而且一直有一个相当坚实的核心,在同一个地区继长增高,其内容却不断地改变,不断地调适;凡此,都是与上述另外几个共同体不能同日而语的。”“维系‘中国’这观念的真正力量,可能是经济。经过长期构建的市场交换网,使得各地的物资有无相通,也互相依赖”(许倬云,2015)。西方的共同体及其文

化,是与中国截然不同的。西方人“他们可能扩大他们的国家,却不能扩大他们的民族。即如英国只有三个岛,英格兰、苏格兰及爱尔兰。他们的大英帝国几乎可以控制全世界,但始终不能把自身三岛融合为一。这是什么道理呢?从他们根源上探讨,还是文化问题。我们认为西方文化可以使他们的民族向外伸展,却不能使他们的民族向内融凝。中国文化伟大之处正在这上面。在孔子以前,中国人创造了中国文化。孔子以后,中国文化则又再创造了中国人”(钱穆,2019)。可以说,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经济活动,中华民族的形成就是经济居先而后文化一体的(李曦辉,2018)。我们研究共同体经济学,就是要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研究经济发展模式对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作用。

自古以来,对生产力进步与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就是分工、规模范围效益以及创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演进,对经济发展要素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强化了分工。《国富论》的开篇就讲到:“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亚当·斯密,2010)。有学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过程中的分工深化进行过归纳总结,认为:“中华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自然使中国的民族与经济区域分为南北三个发展带和东西两大部。即秦岭——淮河以南是水田农耕民族和水田农业发展带;此线以北到秦长城以内(包括辽东、辽西)为旱地农耕民族与旱地农业发展带;秦长城以外为游牧民族与狩猎民族发展带。这三带天然划分又天然互相依赖互相补充。因此,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曾开凿过中国南北大运河那样的运河,也不曾像中国那样在古代发展农牧业及农业各区域之间的商品交换”(陈连开,1989)。可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是我国经济分工不断深化的重要推动力量。第二,强化了规模范围效益。阿尔弗雷德·钱德勒(2006)对规模和范围给出了定义:“规模经济界定为当生产或经销单一产品的单一经营单位所增加的规模减少了生产或经销的单位成本时而导致的经济;范围经济为(联合生产或经销经济)利用单一经营单位内的生产或销售过程来生产或销售多于一种产品而产生的经济。”许倬云(2015)认为:

“在空间的平面上,中国的各个部分,由若干中心地区,放射为树枝形的连线,树枝的枝柯,又因接触日益频繁,编织成一个有纲有目的网络体系,几个地区的网络体系,逐渐因为体系的扩大,终于连接重叠,成为更庞大的体系。”这种网络体系的形成,是以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为前提的,只有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发展壮大,才有经济的规模范围不断扩展。第三,强化了创新。郭武军、吕阳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文版序言中对创新进行了描述:所谓创新,就是迫使经济体系改弦易辙,朝着企业家设定的方向前进。这是利润的终极来源,利息、经济周期等现象,都只不过是这个本源现象的衍生品,利息只是企业家创新引发扰动向循环之流是渗透的结果,经济周期是经济体系对这种扰动的适应和吸收(熊彼特,2015)。由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不断壮大,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虽然修建了长城,但是其防御作用日渐弱化,在农牧互补关系形成以后,就成了一道壮丽的景观。为了沟通南方经济中心区、京畿政治核心区和北方游牧区,我们的先辈开发了京杭大运河,这是人类历史上一大创新。后来的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可能是受到了我们的启发才得以开挖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创新进程。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壮大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华民族经济发展也在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与完善。首先,分工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壮大。许倬云(2006)在论及明清经济政治关系时认为:“中国内部没有分裂为若干独立国,其缘故一则在文化凝聚力,一则在全国性经济交换网络继续扩展,不断将全国吸入一个整合的经济结构。”可以说,分工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规模范围效益支撑中国化民族共同体不断发展壮大。许倬云(2006)在论及中国经济的规模范围时提出:“以清代为例。核心区是政治大脑的京畿与经济心脏的江南,由运河一线沟通联系。边陲区是沿边各省,而中间区是内地各省。论经济水平,江南不仅有高度农业,也有市民经济的工商业。京畿则由江南哺养,京津一带也有高度经济发展。”可以看出,中国各地区之间是先有经济联系,然后才形成逐渐紧密的联系,直至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其次,创新将中华民族融为一体。中国科学院学者总结了人类文明社会以来中华民族对

人类做出的85个重要贡献,其中就有公元前三世纪李冰父子创造的都江堰水利枢纽工程。在该枢纽工程建立之前,成都平原是经常发生洪涝灾害的,为了自保,在洪涝灾害发生时,各区域经常向其他区域泄洪,导致不同地域间的关系紧张。自从枢纽工程建成后,成都平原各区域都可以从中得到好处,不同地区要紧密切协调,才能得到好的收成。久而久之,区域就结成了紧密的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由一个个这样的小的共同体凝聚而成的,创新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黑龙江时提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认为这是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型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生产力,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这种生产力核心内涵的变化,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影响。技术的革命性突破,要求突破的主体——人具有优良的创新基因,才能完成革命性的创新人物。农耕民族因为不能像游牧、商业民族那样去抢夺草场和占领殖民地开拓市场,因而只能眼睛向内去创新生产要素,其创新基因是历史形成的。在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中,就要求我国各民族紧密结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继承各自优秀的基因、特别是其中农耕民族创新基因,才能实现创造新质生产力的目标。这一过程中,中华民族也就越发结成紧密的民族共同体。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要解决配置规模范围和配置效率问题,其核心是配置规模范围问题,这必然带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不断扩大。产业转型升级,这主要是需求升级推动的,而需求升级,又是需求主体的革命性变革引致的,这些都源于中华民族不断融合造成的中华文化变迁,可以说产业转型升级需要中华民族文化的升华,其背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不断壮大和优化。

分工、规模范围、创新,都需要生产要素配置的时空范围不断扩大,只有这样才能达成目标。民族共同体是目前人类所能达到的认同范围的最大化概念,基于人的属性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目前还不具备实现人类大同的条件,还需要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落到经济学理论上,主要由区域经济学来描绘这类人类经济实践,因为民族共同体的经

济效益是区域经济学框架体系内目前可以达到的最大规模范围,是区域经济学追求目标的最优化体现。一旦超出民族共同体范围,民族文化就不能涵盖,就会导致不同经济主体间文化的矛盾,就会导致经济活动中产生摩擦,导致效率的下降,所以说这种经济活动是区域经济学目前容纳区域的极限,从这点来说,共同体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的学理基础是互相贯通的。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2014年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30.
-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3]习近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3-10-29.
- [4]张胥.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理论及当代价值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3.
- [5]列宁.列宁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 [6]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 [8]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 [10]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13]施正一.民族经济学和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
- [14]贾晔.民族经济学学科建设管见[J].广西民族研究,1992(1).
- [15]杨堃.论拉法格对民族学与经济民族学的贡献[J].思想战线,1985(1).
- [16]翁乾麟.理论与实际: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试探[J].青海社会科学,1987(6).
- [17]黄万纶.论“少数民族经济”的研究对象[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 [18]刘永佶.民族经济学的主体、对象、主义、方法、主题、内容、范畴、体系[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7(5).

- [19]沈斌华.劳动者的民族经济学:读刘永信主编的“民族经济学大纲”[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2).
- [20]沈道权.民族经济学的学科性质探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2).
- [21]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中共中央文件选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 [22]龙远蔚.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民族研究,1998(5).
- [23]叶坦.全球化、民族性与新的发展观:立足于民族经济学的学理思考[J].民族研究,2005(04).
- [24]施正一.民族经济学导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
- [25]费孝通,林耀华.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载于林耀华.民族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 [26]李忠斌.关于民族经济学学科体系构建的宏观思考[J].思想战线,2004(3).
- [27]施正一.关于发展我国民族经济学的几个问题[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 [28]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导师组.民族经济学的创建与发展[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9(2).
- [29]陈庆德.民族经济学的理论发展[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1).
- [30]陈庆德.民族经济学构建的历史使命[J].云南社会科学,1994(3).
- [31]陈庆德,潘春梅.民族经济研究的理论渊源[J].民族研究,2009(5).
- [32]罗康隆,田广.论经济人类学中国本土化实践及理论贡献[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4(3).
- [33]李竹青,那日.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
- [34]郑宇,杨素.经济民族学学科构建刍议[J].西北民族研究,2019(3).
- [35]王文长.论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J].民族研究,2005(4).
- [36]于光远.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少数民族经济[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 [37]于光远.少数民族经济的现代化[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
- [38]庄万禄,陈敏,马秀琴.关于民族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思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5).
- [39]邓艾,李辉.民族经济学研究思路的转变[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2).
- [40]王文长.关于民族经济学研究的几个问题[J].民族研究,1999(4).
- [41]王筑生,杨慧.关于民族经济的几个理论问题[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6).
- [42]施正一.民族经济学教程[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 [43]包玉山.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核心概念、概念体系及理论意义[J].民族研究,2010(5).
- [44]王燕祥.经济人类学与民族经济学[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8(3).
- [45]黄健英.民族经济学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讨论[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6).

The Exploration of Creat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to a Discipline——from National Economics to Community Economics

Li Xihui

Abstract: The issue of national economy is a concept often mentioned by classical writers such as Marx and Engels in their works. The issue of nationality is also an important issue of concern to revolutionary mentors, but most of the nationalities they pay attention to belong to the level of nation-states. Marxist theory holds that human beings have always had community identity since the beginning of civilized society. In the period of low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people identify with a smaller blood community. After a certain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ity, people began to identify with a relatively large-scale geopolitical community; afte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ity, people began to identify with a larger cultural community, that is, the national community; when productivity is highly developed, human beings will achieve great harmony. National economics is an economic theory born in China. It originated in the 1920s and was formally born in 1979. Adapting to the level of productivity at that time, it was mainly to study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After more than 40 years of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coupled with the fact that human society has entered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ethnic economics has also entered a new paradigm era with the times. It urgently needs to evolve into community economics and play a role in creat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National Economics; Community Economics; Discipline Development; New Paradigm

(责任编辑:平 萍)

【区域经济理论】

基于边界、方式和目标维度视角下的区域协同 创新研究*

赵成伟 夏丹尼 张孟辉

摘要:区域协同创新是区域创新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突出了区域各创新主体之间互动与协作的重要性。区域协同创新与区域协同发展的最终发展目标都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二者相互依存,紧密相关。以区域、协同和创新为关键词,对应从边界、方式和目标三个维度探讨区域协同创新的定义,可以进一步明晰区域协同创新的科学价值。未来,区域协同创新要从强化地域、主体间协同创新,统筹推进各层级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构建差异化区域创新体系和完善协同创新机制四个方面着手,通过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实现区域协同创新,进而为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持。

关键词:区域协同创新;区域创新体系;区域协同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4)02—0018—08 收稿日期:2023—09—21

*基金项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高质量发展视域下新疆产业升级的战略选择、机遇窗口与创新体系研究”(2023BJL046);新疆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校内培养项目“深化新疆与中亚五国的全方位国际合作现状与对策研究”(23CPY014)。

作者简介:赵成伟,男,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博士(乌鲁木齐 830046)。

夏丹尼,女,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生(乌鲁木齐 830046)。

张孟辉,男,新疆大学商学院硕士生(乌鲁木齐 830046)。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①。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东西差距仍然存在、南北方差距不断拉大,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各地的经济发展更应用域观经济的思维,以持续发展、全面协调为目标,探索推进经济现代化的道路(金碚, 2019)。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区域经济

政策逐步由普惠制向分类指导转变,在空间范围上,政策对象具有多尺度性和灵活性(邬晓霞等, 2023)。作为区域创新发展的路径和载体,区域创新体系对于促进区域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区域创新体系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推动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的形成和发展,实现区域内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促进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提升和区域协调发展。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推进,创新范式也在不断演变,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全球创新范式由线性范式(创新 1.0)、系统范式(创新 2.0)向生态系统范式(创新 3.0)转变(李万等,

2014),更加注重网络化、多主体之间的协同创新,创新行为也进一步呈现泛化性。协同创新是实现创新生态系统的关键,在全球范围内,因为全球技术创新网络、全球知识创新网络和地方创新系统的相互交织,形成立体化的“全球—地方”创新网络,各个主体之间通过更加紧密的协同合作,共同打造“创新高地”“创新尖峰”或“极点”,大力发展具有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从而突破行政区划限制,促进创新资源的跨区域共建共享。从国内来看,要构建新发展格局,也必须更多地依靠创新驱动,实现从跟踪为主转向跟踪、并跑、领跑并存,从点的突破转向整体能力的提升(吕薇等,2018),这就需要在区域层面上开展协同创新(赵成伟等,2023),通过建立起多层次、具有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促进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培育新动能,缩小创新差距,进而推动整个区域乃至国家的繁荣。因此,协同创新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二、区域协同创新研究现状

以创新作为共同的理论逻辑起点,弗里曼(Freeman C,1987)与库克(Cooke P,1992)分别提出国家创新体系(NIS)、区域创新体系(RIS)的概念,二者均是围绕知识生产、转化和产业化的创新系统。埃茨科维兹(Etzkowitz H,1994)提出了“三螺旋”理论,强调创新体系建设的重点应放在以大学为代表的知识生产机构、产业部门、政府等创新主体,进行知识的生产与转化,形成相互影响的三重螺旋关系。由此看来,国家创新体系与区域创新体系均围绕政府、大学院所、企业三大创新主体的融合协作而构成,以人才、资金、信息等创新要素为能量供给,由中介、融资、咨询、培训、平台等各类机构提供运行服务和资源配置,在政府所制定的一系列制度规则条件下运行。因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和经济特点,国家创新体系难以涵盖所有地方的特色和需求,通过建立区域创新体系,可以更好地针对地方实际情况和需求进行创新和发展,因此,区域创新体系也被认为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延伸和补充。

区域创新体系可以分为3种类型:一是基于地区资源与特色形成的创新网络,即本地根植性区域

创新网络;二是基于区域合作与协同形成的创新模式,即区域网络式创新系统;三是基于创新枢纽布局的创新体系,即区域性国家创新体系(陈晓红等,2006)。地理邻近性是影响区域间创新联系的因素之一,信息化背景下,地理距离对于创新联系的影响可能相对减弱,创新辐射越来越多地受到技术邻近性和制度邻近性等相关因素的影响。然而,相关研究表明,创新辐射需要一定的中间媒介,一般包括基于创新链、产业链的协作和与信息设施的一体化(徐雪琪等,2008),地理空间邻近性仍然重要,区域核心城市的创新扩散首先会针对距离较近的城市进行,技术邻近性、制度邻近性仅是地理邻近性的一种补充。阿什海姆(Asheim)等(比约恩等,2020)学者认为,像中国这样内部差异较大的大国,在区域层面实施创新体系政策似乎是最为合适的。

金碚(2023)认为如何使差异化的区域经济融入国民经济体系和全球经济体系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需要着重解决的难题。“十四五”时期,构建区域创新体系的目标在于以建立高水平的开放式区域协同创新体系为总体方向,同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和经济韧性。通过区域之间多层次的开放互动,促进创新要素跨越体系边界进行互联互通、协同互补,实现协同创新整体效益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等,2020)。这样的发展模式需要形成由自我激励的个体组成的网络小组,共同形成集体愿景,并通过网络交流思路、分享信息和工作状况,实现共同目标(Gloor P A,2006)。

随着区域合作深度和维度的不断拓展,跨区域的资源流动日益频繁,创新主体间的互动也越来越活跃,区域创新合作的影响和作用愈发凸显。国外现有关于区域创新体系的研究或是基于北欧和西欧国家等具有协调性市场经济的国家,或是英美等老牌自由市场经济体国家;而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创新体系的构成(韩海波等,2022)、区域创新能力的测度(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2023)、区域创新体系的演化(杨博旭等,2022)等方面,区域协同创新的相关理论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以区域协同创新为研究对象,旨在深入探讨区域协同创新的内涵、机制和影响因素,并试图回答如何构建差异化的区域协同创新机制。

三、区域协同创新与区域协同发展的辩证关系

区域协同创新与区域协同发展紧密相关。协同创新是新时代协同发展的重要手段,而协同发展是协同创新的重要目标,二者均以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为最终目标。

(一)区域协同创新是区域协同发展的时代要求

张贵等(2017)认为区域协同创新是区域协同发展的内在动力。2016年5月,《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纲要》颁布,对我国今后一个时期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进行系统谋划和全面部署,重点是以创新驱动经济先发地区的辐射带动能力和经济后发地区的转移承载能力,进一步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和人才链“四链融合”。区域协同创新作为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现实需要。

(二)区域协同创新是解决新时期区域协同发展难题的重要举措

孙久文等(2022)认为不同区域历来都存在一个发展时序问题,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先发区域与后发区域的区别。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经历了以生产力内地布局为重点的均衡发展时期、以沿海地区先富带动后富为重点的非均衡发展时期、以沿海地区带动内地发展的均衡发展时期和以高质量发展为重点的区域协调发展时期四个阶段,“落后病”“萧条病”“膨胀病”成为新时代区域协同发展亟须破解的难题。这所有问题的解决都需要通过区域协同创新“做大蛋糕”,才能最终解决区域协同发展这一“分好蛋糕”的问题。

(三)区域协同发展是实现区域协同创新的具体方向

区域协同创新与区域协同发展呈现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其中区域协同创新作为手段,区域协同发展则是区域协同创新所追求的目标。区域协同发展通过产业结构、科技投入、人才集聚、政府引导等多方面作用,提升城市的创新水平(李林威等,2022)。区域协调创新则是通过促进微观要素流动和组合(如人口、资源、技术、信息、资本等),中观结构优化(如交通、产业、城镇、生态、公共服务等布局),以及宏观制度创新(如体制、机制、政策等),推

动整个经济社会持续向着高级阶段不断演进。

(四)二者的最终目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

任保平(2023)认为,在高质量发展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主要目标的背景下,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通过区分发展过程中的无序和有序两种状态,可以描述经济社会螺旋式发展进步的一般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区域协同创新被视为一种先破后立、从有序到无序的过程。具体而言,它着眼于各子系统中制约发展的短板,采取破坏性创新的方式进行改革,通过打破系统已有格局并对其进行重组,最大限度地释放发展潜能。相比之下,区域协同发展则根据实现协同发展目标的需要,通过对各个子系统的不断调整,在创新过程中逐步趋于一体化。这样逐步形成的整个区域经济社会系统,将建立起互利共赢、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协同发展格局(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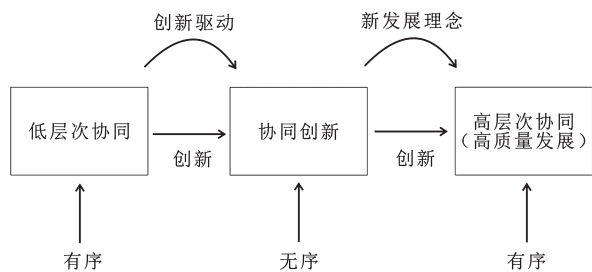


图1 区域协同创新与区域协同发展的辩证关系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四、区域协同创新的科学价值

区域协同创新是一种新型的创新模式,有利于加强区域间的合作与交流,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研究区域协同创新的内涵,有助于理解这种创新模式背后的动力机制,促进其健康有序发展。为准确把握区域协同创新的内涵,体现新时代区域协同创新的科学价值,本部分基于区域、协同和创新三个关键词,对应从边界、方式和目标三个维度,全方位剖析区域协同创新这一概念。

(一)区域——边界问题

1.区域逐渐发展成为创新的空间载体

20世纪90年代之后,创新活动呈现明显的区域化特征,基于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学者们提出了区域创新体系理论。早期大多数区域创新体系的文献都反映了西方工业化地区的特征,例如欧洲小

型国家的经验、发展迅猛且创新能力强劲区域的案例,后者如传统的意大利工业区和硅谷。随着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崛起,针对该区域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地用到了区域创新体系方法。

区域创新体系理论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英国学者 Metcalfe J S(1995)认为,技术政策通常因国家不同而有所差异,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国家内部也有所不同。随着全球分工的深入推进,区域成为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角色。与整个国家相比,区域呈现出更活跃的要素流动和网络化特征。因此,区域创新体系成为研究要素相互作用的新的研究对象(Todtling et al., 1999)。区域创新体系承担着将技术转化为经济增长的重要任务,能够优化区域内的资源配置,协调区域间的发展关系,并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它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基础,也是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在地方层面的具体实践,对于国家创新具有重要的支持作用。同时,区域创新体系也是企业创新的助推器,建立健全区域创新体系对于发展区域经济、培育特色产业和提升区域竞争力至关重要(傅利平, 2016)。

2. 区域划分的基础是行政区、经济区、产业集群等

区域划分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前提,受自然环境、经济基础、技术水平等因素影响,对区域板块的划分有所不同(张贡生, 2018)。一般而言,除非一个国家疆域特别狭小,国家一般都会根据行政管理的需要,将领土划分成有层次的区域,即为行政区,是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政治地理现象(刘君德, 1996)。经济区是指基于经济产业联系的需要,将若干不同等级的行政区组合形成不同的紧密联系的空间范围,如传统的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经济板块划分。可见,经济区是由不同等级行政区组合而成,行政区是划分不同经济区的基础。产业集群的形成超越了一般的产业边界,是产业纵向一体化发展的结果。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将原本垂直一体化的产品价值链分割为不同环节、区段,并将这些环节分散布局在不同的城市。生产分割深刻地改变了城市体系的组织方式和区域经济的联合过程,从而产生产业集聚。单个产业集聚最终会产生多个产业集群,形成集聚经济。按照行政区划、经济功能、产业集聚等不同的

划分标准,可以形成不同的区域概念,所以,区域属于工具概念层面,大到传统的四大板块,小到一个村子大小的开发区、科技园区等都可以称之为区域(张军扩, 2022)。

3. “跨省级”是区域协同创新关注的主要空间尺度

区际关系的处理是区域协同创新的难点和重点,协同的焦点主要集聚在区域竞争与合作关系的协调(崔理想, 2023)。目前,大多数关于区域协同创新的研究尚未确立一个明确的协同创新范围和区域间作用的空间界定。刘冬梅等(2021)认为,区域创新一般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理解:按照经济发达程度和技术经济关联性划分的跨省级区域;按照行政管理与地理边界划分的省级区域;按照相似经济特征、发展重点或者文化背景划分的省内区域。

从历史上看,国家层面的区域划分都是跨省级的。国家始终高度重视“全国一盘棋”的发展理念,早在1958年,我国在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和西南六大行政区的基础上设立了东北、华北、西北、华东、西南、华中和华南七大经济协作区域。“九五”期间进一步将1985年所划分的十大经济区整合为东部地区、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东南沿海地区、中部地区、西南和东南部分省区、西北地区等七大区域(刘本盛, 2009)。

就国家创新体系而言,从行政区划的范围来看,只有跨市(县)级的问题可以在省(市)级行政区内解决。而跨越省级行政区的资源配置、科技创新合作和科研人才流动等则超出了行政区划的职权范围,往往难以协调。因此,在区域创新体系构建中,最大的难点主要是跨越省级行政区的协调与合作,特别是对于像“块状区域”(如东北地区、西部地区)和横跨东西的“条状流域”(如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这样的区域,以及更广泛的跨区域合作(如东西部合作、南北方合作)等。因此,“跨省级”的区域协同创新研究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4. 新时期地理空间邻近性仍然重要

数字经济的兴起,对邻近性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区域的边界。Chesbrough H W(2003)提出了开放式创新模式,认为所有创新活动的边界都是模糊的,一个组织可以同时从内部和外部获得各类优势创新资源,实现研发成果商业

化,并在知识产权的使用中获取收益。然而相关研究表明,区域创新效率的外溢特征,随着距离增加而逐步衰减,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原毅军,2020)。Boschma R, et al.(2005)认为,地理邻近虽不是互动学习与创新发生的充分必要条件,但会通过影响相关邻近度(如认知、组织、社会、制度等)对创新发生产生影响,可能通过加强邻近度来促进互动学习。基于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视角,地理邻近有利于认知邻近的形成,即地理空间的接近不仅有利于提升沟通频率与互动效率,而且能够促进隐性知识的传递与吸收(Nonaka I,1994)。在制度邻近方面,制度环境以惯例、规则、法律、文化氛围等通过地理邻近学习与互动形成(李琳,2014),具体表现在与周边城市协同建设创新城市群、建立共同的行业标准等方式,促进创新合作。

(二)协同——方式问题

1.协同是区域创新应有之意

创新主体依靠协同创新方式,可以利用有限资源提高创新效率,规避创新过程所伴随的各类风险。当集聚经济与具体空间载体相结合的时候,便会产生区域协同创新问题。在创新呈现网络化发展的背景下,各创新主体基于发展需求,寻求资源互补,在具体的空间载体,即一定的区域内,通过政府的有效推动,实现协同创新。协同创新可以起到资源整合与共享、分工与合作、知识交流与跨界合作、分担成本与风险的作用,尤其是某些复杂任务只能通过协同合作来完成。

2.跨主体、跨区域是协同的两种主要方式

协同创新的含义包括产学研各个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也包括跨区域的合作研发。跨主体协同创新体现在基于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构建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体系。在产学研方面,协同创新是指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与共享。产业界通过与学术界和科研机构的合作,可以获得专业知识、技术支持和研发资源,提高创新能力和竞争力。而学术界和科研机构则可以通过与产业界的合作,推动科技成果的商业化。跨区域的合作研发是指不同地区之间的合作与共享,通过技术与经济的协同发展,促进区域间的互利共赢。全球化背景下,各地区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资源禀赋、技术优势 and 市场需求,通过跨区域的合作研发,可以充分利用各地的优势,加快科技创新

和新产品的研发速度。

3.政府承担重要的推动作用

新经济背景下,政府逐步呈现出开放创新、服务平台的特征,其角色从管理者转变为服务者与引导者,推进创新要素、创新主体、创新环节的衔接,激励与约束创新活动(任保平等,2023)。尽管政府本身并不直接参与协同创新,但在构建协同创新环境方面,政府有着其他创新主体无法比拟的作用。首先,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经济政策、技术政策等相关政策,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完善和优化协同创新环境。其次,政府可以配置国有创新资源,引导和促进协同创新的发展,与创新主体共同承担创新风险,推动协同创新活动的展开。最后,政府还可以制定相关的政府采购政策,为协同创新的发展创造稳定的需求保障环境,有效推动协同创新活动的进行(刘丹等,2013)。

4.建立协同创新机制是关键举措

管理学家 Igor Ansoff (1987)引入了协同的概念,并提出了“1+1>2”的表述,这一理念逐渐被学界接受,从协同角度研究区域经济问题开始形成。协同理论认为,在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的交互协同作用下,整个生态系统会产生新的结构和功能,协同效应形成并超越各个子系统简单相加的效果。因此,建立协同创新的自组织协调机制是实现区域协同创新的关键。在竞争与合作兼具的各类协同创新活动中,各利益主体通过确立共同目标,可以减少冲突和矛盾,协调各类资源与信息,从而实现有序协同创新在时空与功能上的展开。这种发展模式能够使国家、区域、企业通过创新行为获得竞争优势,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全球价值链重塑。构建区域协同创新机制是实施创新驱动的具体路径。为应对国家、区域、行业等重大的创新需求,区域经济协同机制的建立以协同创新理念为指导,旨在构建协同创新平台,促进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政府、中介机构等的深度合作,并建立战略联盟,以实现资源共享、提高技术创新效率、缩短技术商业化与市场化周期等目标。这样的区域协同创新机制不仅有利于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科技创新向更高层次发展,同时也能够增强区域协同创新的动力和影响力,进一步提高区域创新成果的集聚和辐射能力,为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三)创新——目标问题

1.创新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持续增长和协同发展
创新的第一阶段目标是为了实现创造到商业化。熊彼特认为创新是解决生产要素报酬递减和资源稀缺瓶颈问题的有效手段。随着20世纪60年代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Walt Rostow(1960)提出了“起飞”六阶段理论,把“技术创新”提高到“创新”的主导地位。Freeman(1982)将创新对象限定为重要的规范化创新,并明确指出技术创新是指将新产品、新过程、新系统和新服务首次商业化转化的过程。创新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持续增长与协同发展,即在文化、组织、制度、政策等多方面因素作用下,加强多方合作与资源整合,形成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创新合作环境,提升创新影响力与溢出效应,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2.创新源于网络合作中知识的协同

区域协同创新的重要性在于知识与学习。知识、劳动和技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而通过学习,我们可以不断吸收新知识、学习新技能。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1958年提出,知识可分为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两类。在区域经济中,知识活动与区域经济的关系主要体现在隐性知识的邻近性上,这种邻近性主要体现在地理、制度和组织等方面。隐性知识作为一种良好的黏合剂,能够有效促进协同创新体系的运行。

3.创新体系概念源于提升国家竞争力

创新体系概念是在关注国家竞争力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并将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核心(Freeman,2004)。在原有静态的、基于成本的国际贸易基础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专家组致力于开发一种更具活力的关于国际竞争力的研究方法,认为国际竞争力可以通过促进社会的学习和创新来实现,即竞争是建立在国家创新的基础之上。之后,Porter(1990)采用了这一观点,并论证了集群在推动创新,从而使企业 and 国家获得竞争优势方面的作用。Philip Cooke(1992)首次提出区域创新体系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概念逐渐被广泛接受,并被普遍认为是国家创新体系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一种有效工具(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2021)。

4.创新是一个增值的过程

在面向系统化、网络化范式的创新背景下,协

同制造和开放式创新成为协同创新的新范式。协同创新是一种跨组织的创新模式。这一模式充分利用各创新主体的专业知识、技术能力和创新能力,通过共享信息、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等方式,实现协同创新的目标。协同创新的优势在于能够集聚更多资源,促进创新要素的融合与交流,激发创新活力,提高科技创新的市场转化效率。同时,协同创新也需要建立相应的机制和平台,以支持各方之间的合作和知识共享,保护知识产权,确保创新成果的有效转化和价值实现(陈劲等,2012)。

五、未来政策走向

以创新驱动区域协同发展,是创新战略与区域战略实现融合的现实选择,能够使国家、区域、企业通过创新行为获得竞争优势,而构建区域协同创新机制是具体的实施路径。在国家层面上,目前我国的创新体系在协同创新方面存在着显著的深度和广度不足的问题,协同创新实践缺乏相应的理论指导;从区域层面来看,尽管部分地区在协同创新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区域创新发展的带动和扩散效果仍然不充分,未能形成对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大推动力。未来,将区域视为创新的空间载体,通过主体间和区域间的跨界合作与协同创新,将是提升国家竞争能力的一种有效途径,也是区域协同创新的核心内涵。

(一)强化地域、主体间协同创新

加强地域与主体之间的协同创新,能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提高创新效率和能力,推动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在主体层面上,企业是地区协同创新的主体,同时还包括其他创新主体,如高校等知识创新主体、研究机构等技术供给主体、政府等制度创新主体,以及中介机构等科技服务提供者。在创新主体的协同过程中,企业依据市场动态和技术发展需求与其他创新主体通过运用各种创新要素,进行不同形式的协同。在区域层面,创新主体通过协同交互和耦合形成网络化的创新合作关系,从而推动产业发展与创新同步推进、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这样所产生的经济社会效应将超过个体效应之和,从而突破空间限制,推动整个地区的繁荣发展。

(二)统筹推进各层级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立

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布局需要综合考虑城市创新基础环境,并根据不同层级的区域特点和历史使命进行系统规划和布局,以推动我国区域科技创新的发展。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我国创新要素最为集聚的地区,应专注于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领域,并关注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在世界科学中心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此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还应在产业链安全的技术保障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为国家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支撑和保障。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应以跨省建设为主,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相匹配,并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对接。通过促进各省份的产业技术创新发展,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可以起到整合资源、推动协同创新的作用,构建起全国范围内的创新网络和合作机制。此外,单个省份或更小地域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应在以上两个层级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到每个省份或地域在国家整体发展中扮演的独特角色,包括其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经济条件等方面的特殊性,深入了解和分析省份或地域的产业结构和优势,找准具有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重点领域(刘冬梅等,2023)。

(三)构建差异化区域创新体系

鉴于不同区域创新主体的特点和需求,构建差异化的创新体系,加强各类创新资源之间的协调,是当前最为重要的问题。根据我国具有的组织密集型特征,可以将区域创新体系分为三类,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首先是组织密集型和多元化的区域创新体系,这类创新体系所在的区域存在大量不同的公司和异质的产业结构。在这些地区,应当促进不同经济和技术领域的创新知识和配套组织之间加强合作,例如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地区。其次是组织密集型和专业化的区域创新体系,这类创新体系所在的区域仅在一个或几个行业中拥有庞大的集群。对于这些地区,应当针对其特定的产业基地,量身定制相应的知识和配套组织,同时需要注意避免出现负面锁定的情况,这种情况在东北地区比较常见。再次是组织薄弱的区域创新体系,这类创新体系所在的区域多为老少边穷等边缘地区。对于这些地区,需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提供更多创新资源和引导措施,以促进其创新能力的提升。

(四)完善协同创新机制

完善协同创新机制旨在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该机制通常涉及空间协同和创新主体协同两个方面。地理邻近性区域天生具有协同创新的优势,通过关注研发试验、成果转化、成果应用等方面,各地可发挥潜在的优势,实现科研推动—成果推广—应用需求—市场刺激之良性循环反馈。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关系本质上是企业根据市场动态和技术发展需求与其他创新主体进行不同形式的协同合作,充分利用各种创新要素,以打破主体限制并产生增值效应。考虑到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其同时也是区域协同创新的需求者和主要受益方,因此应重点加强协同。针对创新主体间的协同,常见类型包括企业间协同、企业与高校协同、企业与研究机构协同、企业与中介机构协同,以及企业政府系统协同等(赵成伟等,2023)。这些协同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有助于实现创新资源的共享和互补,进而促进技术创新与市场应用的有效对接,并推动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注释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22年第21期:4—35。

参考文献

- [1]金碚.域观范式下的中国经济现代化理论与实践[J].现代经济探讨,2019(12).
- [2]邬晓霞,安树伟.中国区域经济政策的特征、经验与展望[J].区域经济评论,2023(4).
- [3]李万,常静,王敏杰,等.创新3.0与创新生态系统[J].科学学研究,2014(12).
- [4]吕薇,马名杰,戴建军,等.转型期我国创新发展的现状、问题及政策建议[J].中国软科学,2018(3).
- [5]赵成伟,游志斌,蓝琳琳.新时期构建创新要素全国统一大市场[J].上海商学院学报,2023(1).
- [6]COOKE P.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competitive regulation in the new Europe[J]. Geoforum, 1992,23(3).
- [7]ETZKOWITZ H. Academic-industry relations: a sociological paradigm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J].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chaos theory: New directions in technology studies, 1994: 139—151.
- [8]陈晓红,解海涛.基于“四主体动态模型”的中小企业协同创新体系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6(8).
- [9]徐雪琪,程开明.创新扩散与城市体系的空间关联机理及实证[J].科研管理,2008(5).

- [10]比约恩·阿什海姆.区域创新体系概论[M].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
- [11]金碚.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态势[J].区域经济评论,2023(1).
- [12]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张其仔.“十四五”时期我国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重点任务和政策思路[J].经济管理,2020(8).
- [13]GLOOR P A. Swarm creativity: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rough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networks [J]. *Innovation management policy & practice*, 2006,8(4):407—408.
- [14]张贵,温科.协同创新、区域一体化与创新绩效:对中国三大区域数据的比较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5).
- [15]孙久文,胡俊彦.迈向现代化的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探索[J].改革,2022(9).
- [16]李林威,刘帮成.区域协同发展政策能否提升城市创新水平?——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准自然实验[J].经济问题探索,2022(10).
- [17]任保平.新发展阶段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实践路径与政策转型[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3).
- [18]METCALFE J S. Technology systems and technology policy in an evolutionary framework [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19(1):25—46.
- [19]TÖDTLING F, KAUFMANN A. Innovation systems in regions of Europe: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1999,7(6):699—717.
- [20]傅利平.从产业集群到创新集群: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集群发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
- [21]张贡生.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演进逻辑[J].经济问题,2018(3).
- [22]刘君德.中国政区地理的发展与成就[J].人文地理,1996(S1).
- [23]张军扩.中国区域政策回顾与展望[J].管理世界,2022(11).
- [24]崔理想.区域现代化进程中的数字经济赋能区域协调发展研究[J].区域经济评论,2023(4).
- [25]刘冬梅,冉美丽.国家创新体系视阈下区域创新的边界、内涵与政策启示[J].科技中国,2022(2).
- [26]刘本盛.中国经济区划问题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9(2).
- [27]CHESBROUGH H W. *Open innovation: the new imperative for creating and profiting from technology* [M].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Press, 2003.
- [28]原毅军,高康.产业协同集聚、空间知识溢出与区域创新效率[J].科学学研究,2020(11).
- [29]BOSCHMA R. Proximity and innovation: a critical assessment[J]. *Regional studies*, 2005,39(1):61—74.
- [30]NONAKA I. A dynamic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creation[J].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4,5(1):14—37.
- [31]李琳.多维邻近性与产业集群创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 [32]任保平,孙一心.数字经济背景下政府与市场制度创新的协调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23(4).
- [33]刘丹,闫长乐.协同创新网络结构与机理研究[J].管理世界,2013(12).
- [34]刘冬梅,赵成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内涵、实践与政策走向[J].中国科技论坛,2023(5).
- [35]赵成伟,张孟辉,李文雅,等.京津冀协同创新机制探讨:基于主体协同与区域协同视角[J].中国科技论坛,2023(12).

Research on the Region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Based on Boundary, Approach and Target Dimensions

Zhao Chengwei Xia Danni Zhang Menghui

Abstract: Region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RIS), which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interaction and collaboration among regional innovation subjects. The ultimate development goal of region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regional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is to achieve high-qualit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two are interdependent and closely related. Taking region, collaboration and innovation as keywords, the definition of region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s discussed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boundary, mode and goal, which can further clarify the scientific value of region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the future, region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should start from four aspects: strengthening regional and inter-subject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s at all levels, building a differentiated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RIS) and improving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mechanism. By improving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RIS), region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an be realized, thus providing strong support for the country to implement the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Key Words: Region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文 锐)

【笔谈】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强调:“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首次系统论述新质生产力,强调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传统生产力,是以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为主要内涵的生产力,更加强调把创新驱动作为生产力的关键要素,以实现自立自强的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为龙头的生产力跃升。新质生产力为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也成为全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任务。区域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基于此,本刊特邀国内知名学者就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问题各抒己见,以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理论指导。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区域协同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4)02—0026—12 收稿日期:2024-01-15

以科技创新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赵剑波

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位,已经具备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实基础和历史条件。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是科技创新,尤其是颠覆性创新,以及构建高质量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此外,还应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实基础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不仅肯定了社会生产力可以跨越式发展,而且明确了在新时代生产力实现跨

越式发展的路径。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产生的理论概念,我国已经具备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现实背景与物质基础。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经济基础。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是坚持走工业化发展道路的结果,工业化带来了经济增长、效率提升、财富积累、美好生活。中国企业在制造业、建筑业、高端服务业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实现突破,重新定义新的行业标准,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推动中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中国企业通过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实现了品质更

优、成本更低、分工更细、效率更高、规模更大、福祉更广的发展,打造出高度发达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基础。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逐渐清晰。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我国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形态,学者们已经明确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新”是表象,“质”是内核(李晓华,2023;曲永义,2023)。科技创新是生产力创新,中国企业通过科技创新,不断推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长足进步,高速铁路、特高压技术、5G通信、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载人航天工程、完整工业体系等都是生产力进步的表现,建筑的体量越来越大,工程的复杂性越来越高,产品的工艺越来越精益化,一些技术逐渐进入原始创新领域,从无穷大到无穷小,中国企业在工程建设、系统组织、产品制造等领域探索各种可能的边界,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把全球的工业化水平提升至更高层次。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会窗口。新质生产力并不是对传统生产力做局部优化与简单迭代,而是意味着科学技术的颠覆性突破、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产业体系的高质量转型,是生产力跨越式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产物。每一次工业革命,其实就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过程。当前,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方兴未艾,涉及领域空前丰富,如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的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开辟量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以及利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等。所谓发力新兴产业、开辟产业新赛道,就意味着技术轨道和演化路径发生“变轨”和跃迁(路风,2019)。综合我国高铁、核电等领域的创新实践来看,颠覆性技术具有异轨性、覆盖性、创造性和替代性。颠覆性创新要求从科学原理、问题、方法上集中攻关,在更多创新领域取得新突破。此外,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生产资料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也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途径,而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则是新质生产力的主要来源。

总之,我国经济已经具备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实基础,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能够促进产业向中高端升级,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保障产业安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二、新质生产力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系

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以科技创新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就是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历史条件,大力推动原始创新等多元创新方式,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工业化国家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新质生产力位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顶端。如果说现代化产业体系是金字塔式的,这一产业体系同时包括高中低端不同侧面的产业内容,而新质生产力则位于金字塔的顶端。中国制造“大而不强”,根本问题在于位于产业体系低端的产品同质化,但位于顶端的创新相对稀缺。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就要以新的劳动者、新的生产资料、新的产品以及新的生产方式等实现生产力水平的跨越,以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新模式的应用实现生产力质量的提升。例如,数据要素正在成为驱动经济增长、重塑价值创造路径的核心动力,数据的发掘集成和价值释放能力将直接决定相关产业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因此,新质生产力涉及领域新,技术含量高,要素配置优。

现代化产业体系应保持产业层级间的均衡。产业链只有分工差异,难有高低之说。“微笑曲线”的概念深入人心,认为附加值是判断处于产业链高低环节的主要指标,研发和营销处于产业链高端,生产制造处于产业链低端。但是,不同的产业链环节具有的市场规模不同。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规模占全球四分之一强,与充分利用比较优势牢牢抓住下游庞大产品市场这一定位有关。下游产业在国内实现高度细化的分工,增强了中国制造的根植性。新质生产力是经济创新发展的动力,但是中低端产业也是新质生产力改造的对象。一个均衡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对高端前沿技术要精准“育”,对中低端产能要坚决“去”的同时,也要借助新质生产力实现“转”,即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改造。现代产业体系不是所谓的越高端越有竞争力,而是需要良好的分工体系及产业协调性(史丹,2023)。需要充分考虑本国国情,促进制造业向高端化、绿色化升级,但是中低端产业也不能丢,要形成“立体式”的新型工业化发展结构。

新质生产力能够带动传统产业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创新驱动,能够对现有产业组

织、要素配置带来变革性突破。尤其数字技术等新技术与传统产业不断渗透融合,创造新产品、催生新产业、产生新价值,使得传统产业不断焕发出新活力。具有颠覆性的未来技术,例如自动驾驶技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未来新兴技术,具有能够颠覆现有产业或经济发展方式,成长为支撑一国经济发展支柱产业的潜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既需要颠覆性技术,也需要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进,运用新技术武装传统产业,让传统产业焕发青春。因此,一个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是建立在包括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在内的健全的现代产业体系之上。

三、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政策建议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原有生产力结构基础上进行简单的量的扩张,而是未来产业和新兴产业的不断积累,并带动传统产业结构优化和效率提升,实现社会生产力在新构成基础上的质的飞跃。

以自主创新推动未来产业发展。世界各国正积极加强对未来技术和产业的布局,以确保在当前技术和产业领先的同时,在未来新兴产业中保持领先地位,并牢牢把握未来在产业链中的绝对优势或者处于新价值链上的高端位置。当下,要实现更多科学技术的并跑领跑,既要加大基础科学研究力度,着眼于未来的重大发现,又要积聚力量着眼于当前的重大原创性科技创新。为了实现未来产业的布局和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应当加强研发投入强度,优化研发投入结构和前沿基础研究布局,以形成产业自主创新的动力。要敢于大胆引领,超前布局,实现我国技术及产业的“弯道超车”,促进经济发展转型,进而提升全产业链的控制力。因此,应持续加强前沿基础研究,打破传统的技术发展惯性思维,积极开拓具有颠覆性和非连续性的创新思维,发展新的前沿技术。建设新质生产力先导示范区,推进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化、融合化、生态化发展。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践行科技自立自强,形成一种具有强大凝聚力、引领力、创造力的先进创新文化范式。

构建结构均衡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实体经济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现实基础,新质生产力不能完全脱离实体经济而存在。虽然当前我国制造业比

重下降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必然性,数实融合也为制造业服务化发展带来新机遇,但离开制造业的数字经济永远无法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并完全替代制造业,无法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史丹,2020)。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精准发力,推动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新质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也要带动传统生产力的进步。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未来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会带动形成制造业高中低全面发展的态势,实现效率和质量全面提升。其中就包含着两层内涵,既要守住传统优势,又要向高端升级;既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又要提升传统生产力。未来,中国制造的发展一定既要向高端化、绿色化、数字化转型升级,但也要维持相当规模的中低端制造能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以新质生产力巩固我国完整产业体系优势,避免脱实向虚,要从市场、企业、宏观调控等层面综合发力、重点突破、重点推动。

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同时实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代化。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技术革命性变化带来了创新范式演进,与技术变革浪潮密切相关的管理思想、行为、组织和制度正在逐步开始变化。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人才和机制的灵活,要着力打造一支适应新质生产力的新型劳动者队伍,用好符合新质生产力要求的新型生产工具,塑造适应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让各生产要素向着适应新质生产力的方向,实现顺畅流动和高效配置。数字经济时代,企业与市场的边界、与社会的边界变得模糊,知识资本的重要性得到大幅提升,智力资本日益受到企业家重视(赵剑波,2023)。智力资本作为专用性的知识、技能和经验,难以移植到其他企业,日益成为企业的稀缺资源,成为企业创造价值的核心资源。作为追求自主性、个体化、多样化和创新精神的知识型员工群体,激励动力更多的来自使命感、参与感,以及工作的内在报酬。管理创新是生产关系的创新,体现在企业管理新模式。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让智力资本参与公司治理,平衡物质资本与知识资本在公司治理中的关系,探索由股东、高层管理人员、核心员工等参与的共同治理模式。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从技术和管理上实现创新与突

破,依靠先进的管理和技术支撑企业的快速发展、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必须把管理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企业成长的要因、理论创新的基础、发挥企业软实力的渠道、彰显中国制造文化内涵的载体,才能更加全面地看待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

促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作者简介:赵剑波,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6)。

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 加速形成 新质生产力

苏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由此可见,新质生产力形成是以科技创新为起点,培育和发展新产业为路径,推动生产力发生质态跃升的过程。回溯历史,人类生产力发展呈现非线性过程,生产力重大变革的阶梯式突变和跃升主要发生在历次产业革命时期,而随着重大科技突破对驱动产业变革的先导作用愈加突出,由科技革命引发的产业变革成为孕育和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主引擎。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正处于新质生产力孕育和形成的战略机遇期,需要在把握科技革命驱动产业变革历史规律与时代特点的基础上,探寻科学路径,精准发力。

一、科技革命驱动产业变革引致生产力 跃迁的条件

科技革命是产业变革的源头和基础动力。一方面,科技创新催生新产业,为产业体系带来“无中生有”的新增量;另一方面,科技创新催生新生产方式和新组织方式,为经济社会体系带来“有中更优”

的新模式和新业态。在此过程中,不断涌现的突破性或颠覆性科技作用于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生产力要素,通过乘数效应提升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效率,通过融合效应改变生产力要素的组合结构带来生产力质变。可以认为,新质生产力是更高能级生产要素在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上的重新组织和再组合,这个复杂过程的发生需要一定的基础和条件。

先进基础设施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支撑条件。产业变革往往伴随能源、交通、信息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出现,先进基础设施是新技术应用的载体,是新兴产业的重要内容,也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为推动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进步,美国克林顿政府实施“信息高速公路”“因特网-II”“新一代互联网”等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加速了相关技术创新和应用,使美国率先进入信息技术时代。美国高校和产业界积极响应和参与相关计划,有效地推进了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引领了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对于生产力而言,计算机和互联网等先进基础设施本身就是具有更高阶效率的新型劳动资料,同时它也极大提升了劳动者的生产能力和效率,使美国成为“新经济”时代的开创者,并创造了美国新一轮的经济繁荣。

大规模市场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空间基础。新科技应用需要以规模化市场作为依托,具有相当容量的市场为新兴产业形成提供需求空间,能够更有效刺激和加速新质生产力的释放,是新质生产力

形成的加速器。例如,第二次产业革命的部分核心技术原创于欧洲,但由于欧洲市场狭小,无法支撑规模化生产,相反,美国不但拥有较大规模市场,而且实施了高水平的保护关税,为新技术应用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因此,在新技术被引入美国后,美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凭借市场规模优势,更快地将新技术转化为成本低于欧洲的新产品,成为产业变革的领导者和新质生产力的塑造者。

创新友好型制度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生态基础。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一场离不开制度创新的系统性和综合性变革,鼓励创新的制度体系为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提供更具包容性的社会生态基础。反之,若没有及时形成与变革相适应的制度,将阻碍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例如,英国在1865年最早发明了汽车,但按照《机动车法案》规定,上路行驶的汽车至少要由三个人驾驶,其中一人必须在车前50米以外摇动红旗为车辆提供引导,而且车速不能超过马车。这些规定阻碍了汽车的推广应用,直到1895年法案才得以解除,而在此期间,德国、法国和美国的汽车产业则后来居上,作为第一次产业革命主导国的英国失去了引领汽车产业变革的机遇。

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新特点

多层面融合为新质生产力形成蓄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新质生产力形成正以指数级速度展开,主要源于多个层面的高度融合为生产力质变赋能。在科技方面,主导技术方向更多、结构更为复杂,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等同步取得多点突破,不同学科之间、技术之间交叉融合不断迸发颠覆性创新热点,为新质生产力形成提供更多动力源。在产业方面,新兴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驱动的创新打破了传统产业的边界,产业间耦合协同更加紧密,兼具制造和服务性质的新模式和新业态层出不穷,为新质生产力形成提供更丰富的路径。在组织上,具有更强创新要素与产业资源集聚力和整合力的“平台型企业”出现,重新定义了供给与需求、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为生产力要素重新组合提供更高能级载体。

全新要素引入为新质生产力形成赋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

数据作为一种全新生产资料引入生产力要素体系。相比土地、劳动、原材料和能源等传统生产资料,数据具有更强的复用性、流动性和渗透性,与其他生产力要素相互结合和相互补充,将极大挖掘和释放生产力发展潜力。

体系化推进为新质生产力形成增势。新质生产力形成不是单点突破,而是系统性变革。世界主要国家都在通过加强体系化部署,增强竞争的整体势能,以抢占科技革命先机和产业变革制高点。例如,美国推动产业政策回归,并将重构产业创新体系作为战略重点,2022年通过的《芯片和科学法案》覆盖了增加前沿科技研发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先进制造业网络、增加高素质劳动力供给、加速新技术商业化等创新链全链条。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速度更快,在国家间扩散的周期变短,科技和产业竞争与规则竞争同步,技术标准和治理等方面的规则之争成为体系化竞争的焦点,谁掌握了规则制定的主动权和主导权,谁就掌握了生产力进步的方向,进而形成塑造新质生产力的竞争优势。

三、加速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着力点

持续推动重大科技突破,点燃新质生产力孕育新引擎。更加有组织地开展科技革命驱动产业变革方向和趋势的跟踪与研判,强化对突破性技术和颠覆性创新的评估和预警,主动探寻变革拐点和破局点,为重大科技突破和产业新赛道的前瞻和及时布局提供科学支撑。聚焦人工智能、量子技术、人形机器人、卫星互联网等潜力巨大的未来产业,全链条部署重大科技项目,在相关前沿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为新质生产力形成提供持续动力。

加强高质量要素供给,创造新质生产力形成新基础。以系统观念加强科技、教育、人才一体化发展,创新科教融合、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具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劳动者,最大限度发挥其在新质生产力形成中的主体性能动作用。完善数据产权、数据标准、数据开发利用等机制,加快培育发展数据要素市场,最大限度激发数据要素潜能。超前谋划和部署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型基础设施,夯实新质生产

力发展的基础条件。

强化重点制度创新,释放新质生产力形成新潜能。推动国内市场规则、标准和制度统一,促进商品、要素和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全面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在促进新质生产力形成中的加速器作用。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创新治理体系和平台,完善创新试

错容错纠错机制,为新质生产力形成营造更加包容审慎的治理环境。进一步提高参与全球创新治理的能力,提升“中国方案”在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中的影响力,构筑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国际竞争优势。

作者简介:苏楠,女,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北京 100038)。

长三角一体化协同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刘志迎

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要求“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在长三角一体化座谈会上进一步提出“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拓展发展新空间,培育发展新动能,更好联动长江经济带、辐射全国”。综合理解新质生产力内涵及其外显形式,主要体现为“五新”即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空间和新动能。长三角区域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机遇,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率先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业创新跨区域协同催生新产业,主要路径体现在,其一,科技创新要面向长三角区域支柱性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开展跨区域协同攻关,着力解决“被卡脖子”风险,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推动既有产业质的飞跃;其二,大力推进长三角区域大学、科研院所和各类独立实验室科研成果产业化,推动实验室技术研发成果的工程化验证或中试,形成成熟技术或产品,并开展学术创业实现产业化,衍生出未来产业;其三,大力鼓励长三角区域传统优势产业中的优势企业开展公司内部创业,依托各个企业自身科技、人才和管理优势等,开展与既有业务不同的内部创业、新业务孵化或跨区域孵化,形成新业务领域,向新产业转型,派生出新质生产力。

一、长三角跨区域协同催生新产业

新质生产力载体呈现为新产业。新产业形成是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互动的结果。科技创新引发新产业产生,新产业产生引导需求变化;反之,需求中遇到的科技难题,需要科技创新力量来解决。历史上每一次科学革命都会引致技术革命,进而引发产业革命,涌现新产业,满足人类新需求。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创新具有破坏性。因此,新产业形成一定是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的结果。

长三角区域是中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深入推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和产

二、长三角跨区域协同催生新业态

新质生产力形式呈现为新业态。“业态”最早出现在商业领域,指的是商业零售形态。经历几千年演化,从相对简单的“业种”期进入高度发达的“业态”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早在1939年,美国商业统计的零售业分类中用“types of operation”来表示零售业态。夏春玉(2002)详细总结了业态理论变迁历程,关于零售业态变迁假说包括零售轮假说、真空地带假说、零售手风琴假说、辩证发展假说、零售3轮假说、零售生命周期假说等,零售业态环境理论认为零售业态变迁或革新是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的函数;冲突理论认为新业态的产生来自传统业态之间的冲突。到了互联网时代,商业业态

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学界、产业界和政府将“业态”这一词汇用到所有领域,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推进下,各产业的业态都在发生深刻变化。

长三角区域是新业态涌现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深入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催生新业态,主要路径有:其一是基于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催生商业不断产生新形态,所有的第三产业或几乎所有的服务业业态都在发生大变革,特别是AI的突破性发展,正在摧毁最近十多年消费互联网时代出现的业态,即将会有新的业态形式涌现。其二是基于工业软件、工业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三大法宝”,推进制造业向智能化迈进,催生制造业业态发生颠覆式变革,制造业服务化已经成为一种明显的新趋势。其三是基于生物科技、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等催生农业业态发生变革。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都在衍生出新的业态形式,长三角区域应该在全国各行各业的业态变革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

三、长三角跨区域协同催生新模式

新质生产力运行呈现为新模式。随着业态的变化,新的商业模式也在快速变革。通常我们所说的新模式,在市场经济里实质上是新商业模式。从价值实现的角度看,商业模式是企业实现其技术价值和商业价值的系统,是一个组织关于价值创造和实现的主要逻辑;从组织结构角度看,商业模式是描述企业如何跨组织管理并分配价值的方式;从交易结构属性角度看,商业模式是对组织交易内容、交易结构及交易治理的描述;从要素结构角度看,商业模式有三要素说、四要素说、五要素说、六要素说、七要素说、八要素说和九要素说。理论界至今为止,尚无统一说法,但这只是我们认识的视角差异或理论解读差异,不影响技术变革和商业实践发展。历史上每一次产业革命,都会带来商业模式大变革,并且商业模式也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升级迭代。

长三角区域是经济发达区域,一方面与国际交流频繁,发达国家的新型商业模式很快会被导入中国市场;另一方面长三角科技发展有先发优势且人才集中,自创商业模式比较容易形成和扩散到其他

区域。长三角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催生新模式,其一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所带来的商业模式创新,推动由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模式持续涌现;其要及时总结产业创新引致的新型商业模式变革,带领长三角区域商业模式变革,进而促进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其三是要特别注重顺应软件技术、互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社销互联网和工业互联网的快速发展,2C、2B端及2C与2B互融,面向2C端商业模式变革已经在深入演化不断更迭,而工业互联网和工业APP的发展,制造业商业模式正在发生的重大变革,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大趋势,给各行各业带来了商业模式变革的机遇。长三角区域要率先推进制造业新模式发展,带动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的制造业发展。

四、长三角跨区域协同拓展新空间

新质生产力区域呈现为新空间。新质生产力可以有效拓展经济发展的新空间。拓展新空间具体表现为拓展地理空间、发展空间和赛博空间。从地理空间看,杜能农业区位论、韦伯工业区位论、克里斯塔勒中心地论、勒施市场区位论、奥林区际贸易和生产布局论、缪尔德尔循环累积论、波特产业集聚论、克鲁格曼空间区位论、丁伯根区域一体化理论等,全面系统地探讨了地理空间经济发展问题。从发展空间看,创新拓展了经济发展新空间,内生增长理论系统地阐述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认为技术变革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技术创新是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的根本力量。从赛博空间看,软件技术改变了传统的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在生活领域,互联网、多媒体技术等已经全面颠覆了人们的生活模式;在生产领域,工业软件改变了传统的制造业设计、工艺、生产运维方式,产品随时在赛博空间迭代优化,创新持续涌现。物理空间和赛博空间并行,产生了数字孪生,从而拓展了数字经济发展新空间。

长三角区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空间集聚和带动力强劲。首先,在地理空间上,“一核五圈四带”的新质生产力已经展示出对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重点任务是既要发挥好对内部相对落后区域的带动作用,还要

通过空间溢出关系延伸带动整个长江流域的发展。其二,在发展空间上,长三角区域要整合既有的科技创新力量和优势资源,优化组合优质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进一步推进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全面提高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度。其三,在赛博空间上,加快长三角区域优势龙头企业,建设社销互联网和工业互联网,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高度重视工业软件、工业互联网和工业APP产业发展,拓展物理空间以外的赛博空间发展。以数字化技术植入产业,突破地理区域限制,形成平台经济效应,更好地发挥本土市场效应和虚拟空间效应。

五、长三角跨区域协同培育新动能

新质生产力动力呈现为新动能。物理学中的动能取决于物体的质量和速度,如果借用这一定义,把GDP等同于物体质量,GDP增长速度等同于物体运动速度,那么,经济发展的动能就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区域的GDP和其增长速度,因此,发展动能只有大小之分,没有新旧之分。迄今为止,从经济学视角来对于经济新动能的含义界定并未形成统一认识。从已有文献看学者们讨论的实质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或者新生产要素、新发展动力。因此,按照共同认可的经济学术语来解读新动能,最好将其理解为“新动力”。按照熊彼特经济发展动力学说理解,经济发展动力在于创新。他认为要素投入的增长,能够带来经济增长,但只有创新才能够实现经济发展。

从创新经济学看,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形成新动力有三种路径:其一,科技创新跨区域协同主要表现为跨行政区域、跨单位机构的公共科技资源开放共享,跨所有制市场主体的科技研发协同攻关,具体形式是联合开展基础理论的科学发现研究和新技术研发活动。科学研究活动主体主要集中在大学、科研院所和各类独立实验室以及少数龙头企

业。其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主要表现为沿着产业链展开跨行政区域、跨所有制的上下游企业协同创新,具体形式是联合开展产业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的研发活动。创新活动的主体是企业,虽然大学、科研院所和各类独立实验室也有产业新技术研发、新产品开发和新工艺研发活动,但不占主流。其三,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协同,按照国际通用术语就是“产学研协同”。从供给侧看,基础科学研究推动技术研发,进而实现新技术产业化,推进产业创新发展;从需求侧来看,产业发展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及其背后的科学问题,需要大学、科研院所和各类独立实验室等给予研发解决。基于此,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的主体,主要是产学研各类创新主体,而创新主体大多是遵循市场规则实现协同,不能协同的主要障碍在于一些制度规定不合理,严重影响了各创新主体的跨区域协同,从而使得协同效应难以形成。破除科技与产业之间的体制“藩篱”和跨区域协同的行政“藩篱”,是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效应的关键所在。

每一次产业革命都会实现生产力的一次质的飞跃,形成新质生产力。当前正值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产业革命正在发生中,必须充分认识到并把握住这一场新技术革命的特征和走向。长三角区域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和高地,只有在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先行探路,才能够更好发挥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创新链与产业链耦合的关键核心技术实现机理与突破路径研究”(22&ZD094)。

作者简介:刘志迎,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国金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安徽省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合肥230041)。

新质生产力培育的产业化支撑路径*

渠慎宁

2023年以来,全球政治经济形势错综复杂,我国经济增长压力加大,部分宏观经济数据有所回落。传统产业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明显下降,这就对加快转换经济增长动能、寻找增长新赛道新引擎的需求更加迫切。2023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央的这一判断意味着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主要载体,而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动力。新质生产力的培育需要新产业、新模式和新动能带动,尤其是需要具备颠覆性和前沿性新技术。因此,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如何选择具备颠覆性、前沿性技术的重点产业,使之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动机”,应成为接下来需要研究的重点问题。就当前的产业体系而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性质和特征与新质生产力高度相关,能够成为助推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化支撑路径。

一、新质生产力的规模壮大需要新兴产业支撑

新质生产力的培育首先需要解决成长问题,即如何在较短时间内,推动新质生产力在量上达到一定规模。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与传统产业相比,新兴产业是正处于成长期中的新生力量,其关键在“兴”,具有发展速度快、市场潜力大等特征。新兴产业通常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能产生较大的经济带动效应,有助于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经过多年发展,当前我国新兴产业已具有一定规模,是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13%,新兴产业企业总数已突破200万家。其中,新能源汽车、新一代通信技术、工

业机器人等新兴产业均有望成为新质生产力快速做大的关键载体。

新能源汽车产业产值高、增长快,是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主导产业之一。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22年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05.8万辆和688.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6.9%和93.4%,市场占有率达到25.6%,高于上年12.1个百分点。通过嵌入智能化、数字化、娱乐化等技术载体,我国新能源汽车相比传统燃油车不仅使用成本更低,而且行驶体验更佳,使其逐步成为消费者的新选择,产品竞争力不断提高。除了终端产品表现亮眼之外,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也迅速壮大,宁德时代、比亚迪等企业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动力电池制造商之一,世界主要的阴极、阳极、电解液生产商都在中国。随着全球汽车产业绿色转型步伐加快,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有望进一步释放增长潜力,壮大新质生产力。

新一代通信技术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础设施,也是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5G网络,5G关键技术取得整体性突破,构建了涵盖系统、芯片、终端、仪表等环节在内的较为完整的5G产业链,推动新一代通信技术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2022年我国5G基站总量达231.2万个,占全球比重为63.5%。以5G为代表的新一代通信技术正加速融入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各环节,成为数据资源畅通循环的关键支撑,推动着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别是在工业领域,5G促使工业互联网进入规模化发展的新阶段,当前我国“5G+工业互联网”项目数量超过8000个,已全面覆盖工业41个大类,形成一系列新场景、新模式、新业态。

工业机器人产业可以改变新质生产力的生产范式,是实现智能制造的重要生产工具。随着数字技术与机器人技术的日益融合,机器人产业迎来升级换代、跨越式发展的窗口期。协作机器人(COBOT)

等新产品的推出,改变了传统工业机器人复杂笨重、成本高昂等缺点,兼顾了轻型化、安全性、适配性等优点,帮助中小企业能够快速实现自动化改造,实现降本增效。受此推动,我国工业机器人市场快速增长。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数据,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场,2022年中国工业机器人销量为290258台,2017—2022年工业机器人销量复合年均增长率约为13%。工业机器人市场本身的巨大潜力及其对工业生产率的带动效应,使其可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一大支柱。

二、新质生产力的开拓创新需要未来产业引领

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还需解决开拓创新的问题,尤其是如何不断创造出颠覆性和前沿性技术,保障新质生产力永续“新动能”。加快发展未来产业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与新兴产业相比,未来产业当前尚处于孵化阶段,但代表着科技和产业长期发展方向,一旦在未来实现产业转化并发展成熟,将对国民经济产生巨大带动作用。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前瞻谋划未来产业,这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中第一次出现“未来产业”概念。受此推动,我国各地加紧布局未来产业,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就目前发展趋势来看,以人工智能、元宇宙、量子计算等为代表的未来产业有望成为新质生产力创新活力的重要支撑。

人工智能正逐步成长为新质生产力的通用技术,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人工智能产业不仅包括基础层面的芯片设计与算法模型,技术层面的语音识别与计算机视觉处理,还包括应用层面的智慧交通、智慧金融、智慧医疗等。尤其是2023年开始爆发的以ChatGPT为代表的语言大模型技术浪潮,推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产业快速崛起,应用场景可以覆盖传媒、电商、影视、娱乐、教育、制造业等诸多领域。以制造业领域为例,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已应用于从设计、生产、销售到售后的一整条产业链。通过借助AIGC改进产品设计、数字孪生赋能智能制造、数据挖掘实现精准营销和售后,人工智能不仅提高了制

造业生产率,也使其在智能制造领域的市场价值开始凸显。根据德勤预测,2025年人工智能在中国制造业的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41亿元人民币。

元宇宙通过创造全新的商业业态赋能新质生产力。凭借综合运用虚拟现实、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元宇宙可构建起一个既映射于又独立于现实世界的虚拟世界。现实世界中的所有业态都可以投射到元宇宙之中,商业机会能在元宇宙中再次实现,甚至其边界和市场规模比现实世界更大。2021年后,元宇宙在Meta和苹果等商业巨头的大力投入下开始“脱离虚火”,混合现实(MR)技术现已成为市面上主流头显设备的核心,并推动了空间计算这一新技术领域的崛起,苹果将于2024年推出的MR设备Vision Pro销量有望达百万级别。特别是在使用非同质化通证(NFT)技术后,元宇宙可以将虚拟世界中的各种资产数字产权化,从而创造出数字绘画、虚拟角色、虚拟房地产等数字商品,大大扩大了其商业化潜力。

量子计算可以给新质生产力中数据要素的处理速度带来质的飞跃。量子计算技术近年来取得巨大进步,已从2016年的5比特计算量跃升至2023年的千比特规模,并开始在分子制药、高能物理等领域进行实际应用。对于一些传统行业,尤其是生物制药、化工能源、数字安全等算力要求较大的行业而言,其在研发环节面临的计算压力正不断加大。现有算力所消耗的时间和投入成本越大,就越能凸显量子计算未来的战略价值。量子计算通过利用量子叠加和纠缠等物理特性,控制量子态的演化实现计算时间的大幅缩短,天然擅长模拟分子性状、破译算法密码等工作。根据IDC预测,2022年全球量子计算技术(包括硬件、软件和服务解决方案)市场规模为11亿美元,2027年将增长至76亿美元左右。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研究”研究成果,并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产业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才“培远计划”资助。

作者简介:渠慎宁,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新兴产业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经济发展与经济风险研究中心秘书长(北京 100006)。

加快产业链创新 发展新质生产力

陈萍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强调,要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再次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是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实践基础、时代特征和目标任务,针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出的重大命题,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成为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取向。产业是经济之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党的二十大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业的变革是生产力变革的具体表现形式,在微观上体现为产业链升级。新质生产力是着眼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打破思维、产业的边界,在产业链中材料、工艺、设备的革新中形成与发展,同时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在技术上的迭代和突破,实现整个产业链的升级。

一、产业链创新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机制

改革开放后的30年,基于全球价值链贸易格局,中国发展依托的是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参与国际分工,长期位于全球产业链最底端。随着中国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可利用的土地要素在减少,传统生产要素加入全球价值链的红利已经透支,基于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受到其他国家的围堵,相对于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逐步减小。尤其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步入深度调整与结构再平衡状态,部分产业链分工抵达“天花板”,产业链上的输出国开始推动产业“回归”,全球产业链明显收缩。同时,在新一代通信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影响下出现了复杂技术产品、服务业等新型全球化分工形态,推动全球产

业链升级和拓展。长期来看,全球产业链将趋于本地化、区域化,同时很多产业将进行重构。产业的重构更多地体现在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创新上。从微观来看,产业链创新能力就是企业将新知识转化为新产品、新工艺、新服务的能力。这一突破需要聚焦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鼓励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与跨国企业、国际产学研组织开展多样化合作,由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来突破。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手段和方式的明显进步,是先进生产力替代传统生产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发展模式加速形成的过程,代表着生产力水平质的跃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是指人类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具有数量和质量的双重属性。其中,数量的属性决定生产力水平,表现为生产发展的现实程度,质量的属性决定生产力的品质,表现为生产的物质技术。随着科技创新的广度、深度和融合度的加深,生产力发展水平与质量不断提高,新质生产力就是在既有利用和改造自然的传统属性基础上,又在“新”和“质”两个层面实现了突破。所谓“新”,是指相对于传统生产力而言,它涉及的领域新,比如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和电子信息等领域,同时发展理念也新。所谓“质”,是指其技术含量高,比如强调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强调把创新驱动作为关键要素。总的来说,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的生产力,是摆脱了传统增长路径、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是数字时代更具融合性、更体现新内涵的生产力。这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多次提及的全要素生产率,其核心方向极为相似,指向科技创新。

产业链创新的环节由企业、政府、高校和研究机构、市民构成的创新基本结构来决定。内部动力结构是企业自身,外部动力结构是政府、高校和研究机构,他们构成三大创新主体,产业链创新的实质就是三大创新主体获取资源、利用资源与资源溢出的过程,是创新的一种新范式。产业链创新动力

源自企业内部。面对竞争对手的压力,企业要从包含新质生产力属性的“新产品”“新工艺”上取得突破,以生产出有竞争力的产品。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既要通过一系列的激励措施,优化内部资源配置,还要营造开放创新的氛围,吸纳外部的创新资源,弥补内部资源难以满足自身创新需要的不足,于是市场竞争引致的作用力促使各创新主体大量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以及高素质劳动者、现代金融等具有新质生产力属性的要素,与产业链紧密结合,从而催生出新技术、新产品,甚至新产业、新业态。新质生产力的引入促进了产业链的创新,产业链的创新又反过来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跃升。新质生产力与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未来产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它的形成过程与现代化产业链的构建紧密关联、同频共振、相互促进。

二、加快产业链创新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路径

第一,打造产业链上的区域创新联合体,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需要载体支撑,以产业链为基础,坚持创新资源内部培育和外部引进相结合,创建区域创新联合体,让创新联合体带头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创新联合体是以创新平台机构为纽带,一端连接人才等高端创新要素,另一端连接产业发展需求,形成空间载体格局、创新要素配置、产业上下游共生的协同体系。创新联合体发展所需要的人才要素、资源要素均是高端要素,这些要素围绕产业发展确定科研项目,以项目为载体,鼓励跨区域合作承担重大科技项目,进行省域合作、部省合作等各类产业核心技术协同攻关,这些要素的相互结合,是新质生产力的基础要素。通过创新联合体的协同创新,解决产业链和创新链的痛点和难点,实现产业界为主体的技术成果需求方集群式发展,和高端创新人才、创新机构为主体的优势创新链培育,同时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

第二,通过产业链发展引进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的高端人才。面向产业链发展需求,大力引进高端研发机构,在具有科技创新基础的地区,组建产业技术应用研究机构,同时对接高校院所,深入实

施聚才计划,大力引进能够引领相关产业发展的高层次人才团队,集聚顶尖专家和高端团队,培育创新型企业家,提升协同创新能力,引进发展新质生产力所需要的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此外,用活用好各类人才,加快形成有利于人才成长和发展的培养机制、激励机制、竞争机制等,让人才这个第一资源充分涌流。

第三,通过构建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代表的新型产业链,领航新质生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是科技与产业结合形成的产物。要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壮大,政策上更大力度支持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新能源、智能汽车、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适度超前谋划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未来产业的发展布局,树立正确导向,构建面向未来的现代产业体系和全产业链,紧盯产业链细分领域和上下游相关环节,梳理产业强链补链的关键环节、目标客户,有效打通产业链堵点、连接产业链断点。着力打通各产业间、产业集群间的内在联系,形成多种产业相互嵌套、互为支撑、有机融合的链条体系,实现各产业比较优势的相互叠加与系统集成。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未来产业孕育兴起和不断壮大的过程。新质生产力所蕴含的科技创新特征扎根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发展之中,并以新产业的壮大升级实现生产力跃升。

第四,以数字经济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实现新质生产力的跃升。数据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关键要素,其巨大的价值和潜力已成为共识,传统要素的数字化以及在数字空间里产生的“新土地”“新劳动力”“新资本”“新技术”要素,带来了生产方式的变革、商业模式的变革、管理模式的变革、思维模式的变革,改变了旧业态,创造了新业态。未来,要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实现新质生产力的跃升。

作者简介:陈萍,女,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郑州 451464)。

(责任编辑:文 锐)

【区域协调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新型城镇化：概念 辨析、现实困境和突破路径*

洪晗 肖金成 陈蕊

摘要: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必然之举。新型城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逻辑关系,工业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动力之源、农业现代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基础和支撑、信息化是城镇化的实现途径与重要手段。与此同时,新型城镇化在推进过程中面临着人口规模巨大、区域间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群体间收入水平差异较大、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相对落后、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短板等现实困境。要想更好发挥新型城镇化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推动作用,在突破路径上需要进一步促进城市群与县域城镇化发展,深度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同步建设美丽城市与美丽乡村,完善县域城镇化的体制机制,加快城市现代化转型。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中国式现代化;逻辑关系

中图分类号:F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4)02—0038—12 收稿日期:2023—12—29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数字经济驱动北京提升辐射带动作用研究”(22JJC023)。

作者简介:洪晗,女,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后(北京 100034)。

肖金成,男,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176)。

陈蕊,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博士后(北京 100005)。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镇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2%增长至2022年的65.22%,城市和城镇常住人口由1.72亿人增长至9.21亿人,快速推进的城镇化不仅成为中国经济的有效支撑,同时也成为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与此同时,2022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7.70%,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17.52个百分点。我国城镇化已经进入下半场,提升城镇化质量成为新发展阶段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以提高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为我国城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学术界关于城镇化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特别是在新型城镇化战略正式提出后,更是掀起了一波研究热潮。一是着重阐述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有学者认为,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以追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核心理念,目的在于满足城市居民包括进城的农业转移人口各类生产生活需要,提升居民生活质量(钟万玲,2022),实现“人一产业一城市”的融合发展(谢锐等,2018)。二是强调新型城镇化的作用。新型城镇化不仅可以发挥人口与经济的集聚效应,通过完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还可以有效缓解“大城市病”(杨卫忠,2018;李强等,2017)。同时,新型城镇化

可有效促进共同富裕,是新发展阶段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沈实等,2023)。三是探究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路径。新型城镇化是一个涵盖政治、经济、社会的复杂的综合系统,需要协调好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辛宝英,2020;辜胜阻等,2009;李强等,2012)。与此同时,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黄群慧,2022)。一些学者从微观视角出发,针对人口流出城市(陆铭等,2023)、欠发达地区(刘赫等,2022)、东中西部地区(蒋正云等,2021;杨佩卿,2020)、各省市(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等,2021;尹君锋等,2023)等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进行了诸多探索。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是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现有研究对新型城镇化展开了深入的分析,产生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但鲜有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关系的研究。理清新型城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逻辑关系,对于精准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基于此,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首先梳理新型城镇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与历史沿革,探讨中国式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内涵,然后深入剖析新型城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逻辑关系,接着对新型城镇化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行探讨,本文最后研究了以新型城镇化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突破路径。

一、中国式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概念辨析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自1979年邓小平同志首次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到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深入阐述;从1978年改革开放序幕拉开,到2013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发布,我国现代化与城镇化总是一脉相承。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如何正确理解“城镇化”与“现代化”、“新型城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对于把握现代化发展规律和实践探索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

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坐标中推进新型城镇化,

首先要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和内涵,即“是什么”的问题。现代化起始于西方,主要是指现代以来一种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现象。根据经典现代化理论(加布里埃尔 A. 阿尔蒙德,2012)、后现代化理论(丹尼尔·贝尔,2018;Inglehart R, 1999)、第二次现代化理论(何传启,2003)等,第一次现代化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第二次现代化则是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变。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后来者,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才开始现代化的探索,1954年一届人大首次提出“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的任务,1963年周恩来同志提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简称‘四个现代化’。”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被首次正式提出。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四化”,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既是对过去“四个现代化”的继承,也是与时俱进根据新时代发展要求所作的调整,是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向前发展的主要抓手,也是当前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涵。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高度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系统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提供了理论指引。

从内涵上看,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三重属性(虞崇胜,2023)。第一是现代性。在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出一些新的社会特征,其与传统社会特征普遍相背离,所以被称为现代性,包含了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全面升级。新中国成立后,从提出“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到“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文化的现代化”^①,从只强调经济现代化到实现全面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虽然曲折,但基本方向是日渐明确的,精准地把握了现代性的基本属性。第二是中国性。西方国家现代化大多经历了200多年的时间跨度,是先实现工业化,再依次实现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串联式”发展过程。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时间只相当于西方国家的1/2到2/3左右,发展时间高度压缩,意味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始终保持高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增

速,要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叠加发展乃至同步发展。因此,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国情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浓重的中国色彩。第三是世界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为全球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改变了世界发展趋势和历史演变格局,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多样性。中国式现代化为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参考与借鉴。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表明,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与社会制度之间既不存在绝对的条件关系,也不存在绝对的因果关系。

(二)新型城镇化的概念追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城镇化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已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但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对于城镇化的概念尚没有形成统一认识,存在错把城镇化的外延当成内涵、语义不清等现象。例如,有人认为城镇化就是大搞城市和城镇建设,也就是“造城运动”,也有人认为城镇化就是把农村变成城市,把农民变成市民,于是就有了“农村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农民市民化”等说法,凡此种种,都是混淆了城镇化的本质,曲解了城镇化的核心要义。

在中国古代,“城”是指“有巨大的城墙环绕着”的、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主要功能是防御外敌,城内聚集了一定的人口,但并无产品和商品。“市”是从事交易的场所,最早的“市”在“城”的外面,后来随着“城”的发展,“市”开始进入城内,但也只是在指定范围内活动,“城”与“市”是两个分割的概念(洪晗等,2021)。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城”与“市”开始逐渐合并,发展为现代化城市,既继承了行政中心的功能,也是一个地区的经济中心。城市居民是居住在城市、以从事非农产业为主的居民。西方国家没有“城市”和“城镇”之分,不论大小,凡是农村以外的地方都是城市,而中国在城市之外还有众多小城镇。所谓城镇化,就是随着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始进入城市或城镇从事非农生产,农业人口变成事实上的非农业人口,简单来说,就是“农民进城”。城镇化水平用城镇化率来表示,也就是城市和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占比越高代表城镇化水平越高,也就是

说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表明城市和城镇人口的增加,而不是城市范围的扩大、城市建设速度的加快。

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概念强调“以人为核心”,这并不是对过去城镇化内涵的否定,而是一种扬弃,是基于城镇化概念基础上的升华,这种升华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公平性,即不管是外来人口还是本地居民都享有平等的社会身份、均等的社会公共服务、同等的向上流通机会等。二是均衡性。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是为了实现城乡均衡、区域均衡,从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部分地区的城镇化转向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实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镇化。三是包容性。新型城镇化允许和鼓励差异性的城镇化发展策略,不再拿一把尺子衡量所有的城市。四是持续性。即放弃高耗能、高污染、高投入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向高效益、低污染、低消耗、低投入的集约型发展方向转变。

西方国家的城镇化起步较早,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现代化转型使大部分发达经济体由传统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按照诺瑟姆对城镇化发展阶段的划分,第一次现代化对应诺瑟姆曲线中城镇化发展的初期和加速发展阶段;20世纪中叶后,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趋使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开始了第二次现代化转型,对应诺瑟姆曲线的城镇化后期发展阶段。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城镇化是从改革开放后开始的,目前正处于第一次现代化进程叠加第二次现代化转型的关键节点上(见图1),既要借鉴西方国家在第一次现代化转型中城镇化建设的先进经验,又要面对第二次现代化转型的新形势,可以说是世界城镇化历史中的全新类型。

二、新型城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关系

“新四化”,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提出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完美总结,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所在。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之间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新四化”同步发展,既充分体现了新发展理念的要求,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一)工业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动力之源

纵观国内外城镇化发展历史,城镇化主要受“推力”和“拉力”两股力量共同作用、互相促进,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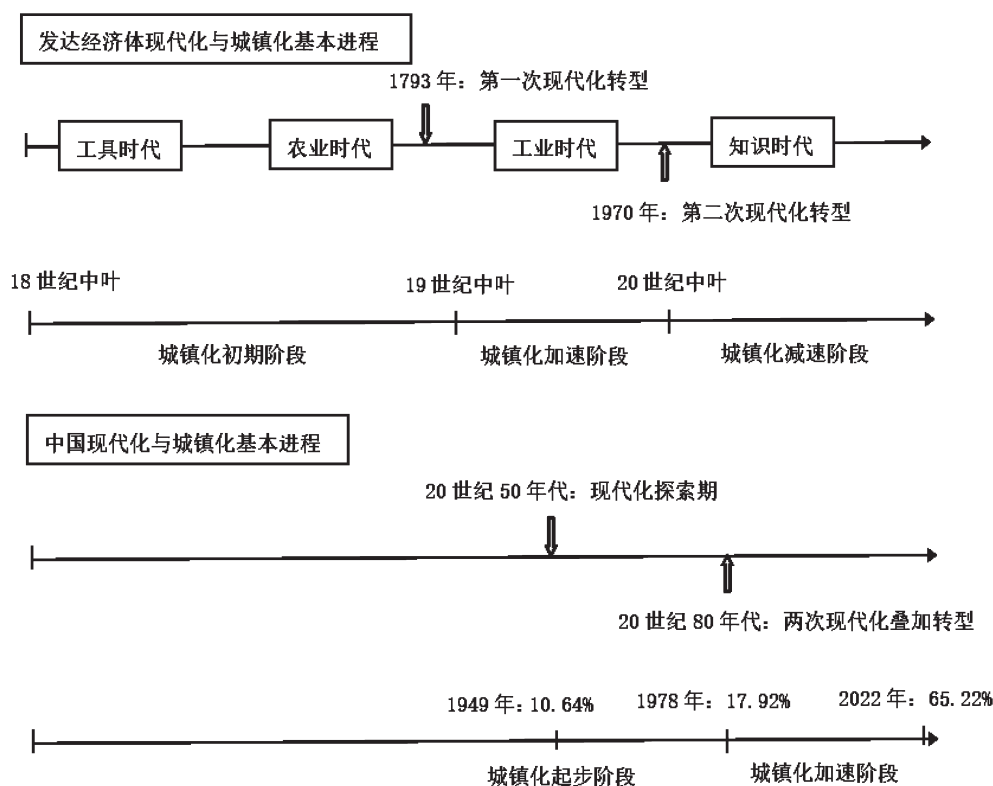


图1 现代化进程中发达经济体城镇化和中国城镇化历史轴线对比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其中工业化是城镇化目标实现的主要动力，也就是实现城镇化的“拉力”。城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表明，城镇化起源于近代的工业革命，工业化使城市从以政治管理和军事防卫为主要功能，转变为以工业生产和贸易交换为主的经济中心，职能的转变使得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加快了城镇化进程。1851年，英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经超过50%，随后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也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下相继开启了城镇化进程。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原始积累方式后，提出“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它们象闪电般迅速地成长起来)来代替从前自然成长起来的城市……它使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②，认为工业的出现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也就是说，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动力之源，城镇化也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当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实现城乡融合、消灭城乡分离也离不开工业化的支撑，“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均衡的分布是消灭城乡分离的条件”^③，“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消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同样也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公

共卫生事业的需要”^④。可见，新型城镇化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工业化的动力支撑。

(二) 农业现代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基础和支撑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总人口约11亿人，而城镇化率只有26%左右，农业生产还相当落后，全国人民靠“8亿农民刨黄土，8亿农民搞饭吃”，每年还要进口粮食才能满足供给。在这样的生产效率下，一个农村劳动力生产的粮食只能养活3—4个人。同期美国的农村人口占比仅为25%左右，一个农村劳动力生产的粮食能养活约70个人，每年生产的粮食50%出口，同期日本的农村人口占比也仅为23%左右，还出现了很多“星期天农民”，除小麦需要进口外，大米、鸡蛋、奶酪等农产品除供本国居民食用外还有富余。而这种差距归根到底在于当时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不高。农产品需求缺口大和农业生产技术的落后，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受困于土地，无法进入城市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农民进城务工经商还要自理口粮，严重影响城镇化进程。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水利条件的改善，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种子等的广泛使用，农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产生了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农

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他们不再满足于传统农耕生活,开始大规模地向城市和城镇转移,以期获得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质量。马克思指出,“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⑤,“如果撇开对外贸易,那末很明显,从事加工工业等等而完全脱离农业的工人(斯图亚特称之为‘自由人手’)的数目,取决于农业劳动者所生产的超过自己消费的农产品的数量”^⑥。马克思认为,只有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升并能够产出剩余产品时,才有可能在农业和工业之间实现分工,农村人口才有可能进入城市或城镇。因此可以说,农业现代化是城镇化目标实现的基础和支撑,也就是城镇化的“推力”。

(三)信息化是城镇化的实现途径与重要手段

新型城镇化需要加快信息化与城镇化的融合,信息技术的产生使得技术密集型产业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提高城市资金、土地、劳动力、技术等要素的高效利用,优化经济要素的空间配置,提升城市的发展品质和竞争力,对于产业发展、提供就业机会、提高居民生活幸福感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受困于当时的时代背景,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针对信息化做出专门阐述,但是非常关注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⑦,认为科学技术水平提高了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为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提供了重要保障与支撑,并且认为,在未来的社会生产与生活中,科学技术水平将起到决定性作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 and 广泛地加以发展、运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⑧。与此同时,信息化使得先进技术由城市传入农村,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业现代化水平,农民可以分享现代化发展成果,提升收入水平。因此,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都离不开信息化的带动,同时又反过来推动信息化进程。

三、新型城镇化面临的现实困境

2022年末,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

平,城镇化在快速推进过程中也积累了一些问题,需要理性看待,进一步探索解决。

(一)人口多,尤其是农村人口多

人口规模巨大是我国基本国情,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总人口已超过14亿人,以占全球7.2%的国土面积承载了约18%的人口。2022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已经突破65%,按照城镇化水平75%—80%的峰值来计算,还有10%—15%的提升空间,这也就意味着,未来还有2亿农民要转移到城市或城镇,最终我国将拥有10亿多城镇人口,成为世界上拥有城镇人口最多的国家。因此,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不仅意味着空前的资源环境压力,对城市管理也是巨大考验。从区域层面看,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农村富余劳动力往往选择跨省流动,由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在跨省流动人口中,东部地区吸纳了9181万人,占比达73.54%;中部、西部地区分别吸纳955万人、1880万人,占比仅为7.65%和15.06%。从城市层面看,出于利益导向的原因,相较于中小城市,流动人口往往将目标选择在收入水平、就业机会、发展前景、教育、医疗等方面拥有更多优势的大城市。由此导致一些大城市规模快速扩张、承担过多功能,出现高房价、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欧美日国家主要城市也经历过“大城市病”,如伦敦曾被谓之“雾都”、东京出现过“水俣病”、洛杉矶出现过“光化学烟雾”等,不仅加剧了城市负担,制约了城市发展,也影响居民的身心健康。而一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落后,产业支撑不足,就业岗位较少,吸引力不大,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中国的规模和跨度巨大的城镇化进程,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前所未有的,如何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流动,构建合理的城镇空间格局,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课题。

(二)区域间发展水平差距较大

中国国土面积辽阔、海岸线长,不同地区在自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习俗等方面都有较大差异。2022年,北京的人均GDP为190091元,上海为179401元,而甘肃只有44986元,贵州为52348元,青海为60776元(见表1)。从城镇化水平来看,东中西部三大地带差距较大,2022年,全国平均城镇化水平为65.22%,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为71.88%,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为

表1 2022年中国31个省(区、市)工业化与城镇化水平

三大地带	地区	人均GDP(元)	城镇化水平(%)	第二产业占GDP比重(%)
东部地区	北京	190091	87.6	15.87
	上海	179401	89.3	25.66
	江苏	144475	74.4	45.48
	福建	126845	70.11	47.22
	浙江	118830	73.4	42.70
	天津	118801	85.11	37.02
	广东	101796	74.79	40.93
	山东	85973	64.54	40.05
	辽宁	68515	73	40.57
	河北	56888	61.65	40.24
	海南	66845	61.49	19.23
中部地区	黑龙江	50883	66.2	29.24
	湖北	92170	64.67	39.53
	安徽	73687	60.15	41.27
	湖南	73498	60.31	39.41
	江西	71009	62.07	44.77
	吉林	55033	63.73	35.41
	河南	62071	57.07	41.51
	山西	73686	63.96	53.98
西部地区	陕西	82885	64.02	48.62
	内蒙古	96496	68.6	48.54
	重庆	90688	70.96	40.15
	广西	52215	55.65	33.99
	宁夏	69925	66.34	48.31
	新疆	68526	57.89	40.98
	四川	67785	58.35	37.28
	云南	61736	51.72	36.16
	青海	60776	61.43	43.92
	西藏	58269	37.36	37.73
	贵州	52348	54.81	35.27
	甘肃	44986	54.19	35.22

资料来源:2023年《中国统计年鉴》。

61.25%,而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只有58.81%。东部地区工业化起步较早,目前已经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城镇体系较为成熟和完善,而西部地区则处于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城镇体系还很不健全,不仅中小城市发展较慢,连大城市都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有研究表明,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这种分化还会进一步强化。

(三)群体间收入水平差异较大

现阶段,我国城市和农村在居民收入和消费、要素投入、公共服务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从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来看,202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为49283元,农村居民为20133元,城镇居民为农村居民的2.45倍。由此使得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远低于城镇居民。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为16632元,城镇居民为30391元,城镇居民为农村居民的1.83倍(见图2)。从城乡要素投入来看,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我国形成了以现代工业为主的城镇经济和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农村经济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城市经济以分工明确的机器大生产为主要特征,工业与服务业总产出随着要素投入的增加而持续增长,而农村经济大多以家庭为单位承包土地,农业生产呈现

小规模分散经营格局。农业大规模机械化水平低,农村人力要素聚集难,就业人数减少,再加上农业产业项目风险大、周期长等原因,农村对资金技术的吸引力有限。从公共服务上看,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了公共服务上的巨大鸿沟,产生了

“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目前我国有将近3亿农业转移人口因身份问题未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待遇,工资报酬不能按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长,社会保障缺失,子女教育受限,难以融入城市,导致我国城镇化不彻底、不完全和城镇化质量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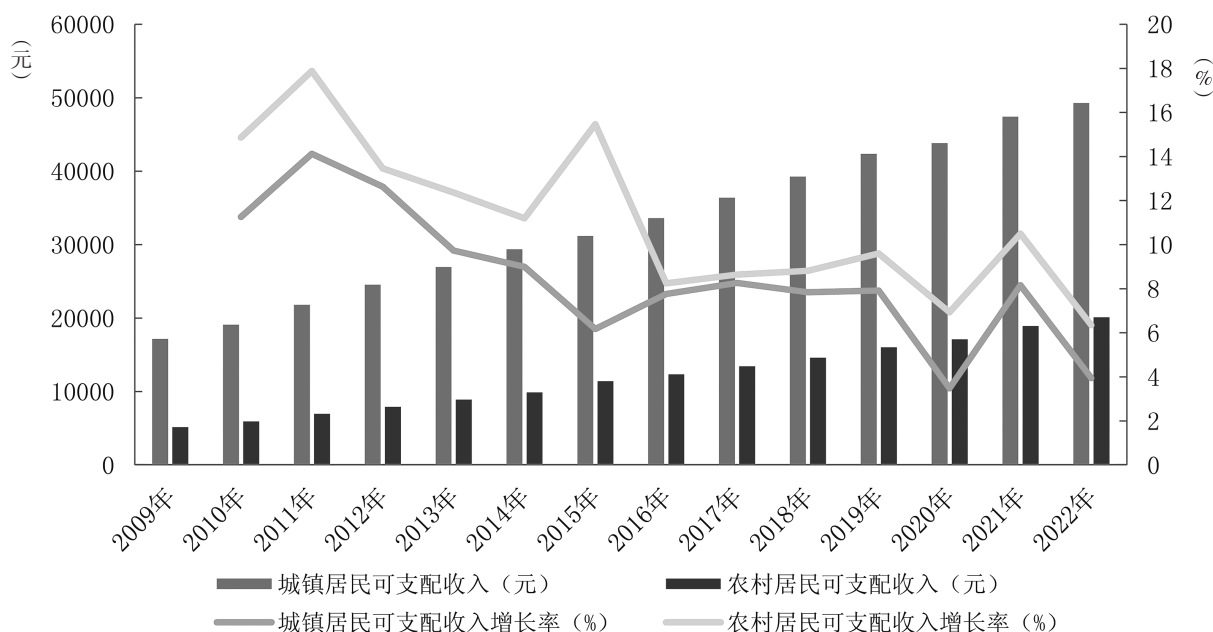


图2 2009—2022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2023年《中国统计年鉴》。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收入基尼系数为0.317,2008年达到峰值0.491,此后见顶回落,维持在0.46—0.47,2022年为0.47,中国收入差距在世界处于中等偏高水平,基尼系数高于0.4这一警戒线。缩小收入差距,促进财富的公平分配,依然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根据2023年《中国统计年鉴》,将全国家庭人均收入水平按照五等份进行统计,2022年包含20%低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601元;中间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303元;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0116元,高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收入组高出81515元,是低收入组的10.48倍(见图3)。从2015年以来,高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倍差有所缩小,但绝对差值一直呈上升趋势(肖金成等,2022)。

此外,不同行业的收入水平也有较大差距。2022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14029元,分行业来看,平均工资水平最高的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220418元)。此

外,收入水平排名前三的还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163486元)、金融业(174341元),最低的为住宿和餐饮业(53995元),农、林、牧、渔业(58976元)以及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65478元)。2018年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为10.97倍,2022年下降至10.48倍;2015年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差为49322.3元,2022年这一差值为81515.2元。虽然倍差有所缩小,但绝对差值依然呈扩大趋势,各行业之间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相对落后

在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面对物欲化、个体化、享乐化为特征的消极价值文化的冲击,如何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都绝非易事。大力推进人民精神层面的建设,是我国城镇化在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依然存在诸多挑战。最主要的问题在于,目前文化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而公共文化服务居民的“最后一公里”却一直没有被完全打通,农村居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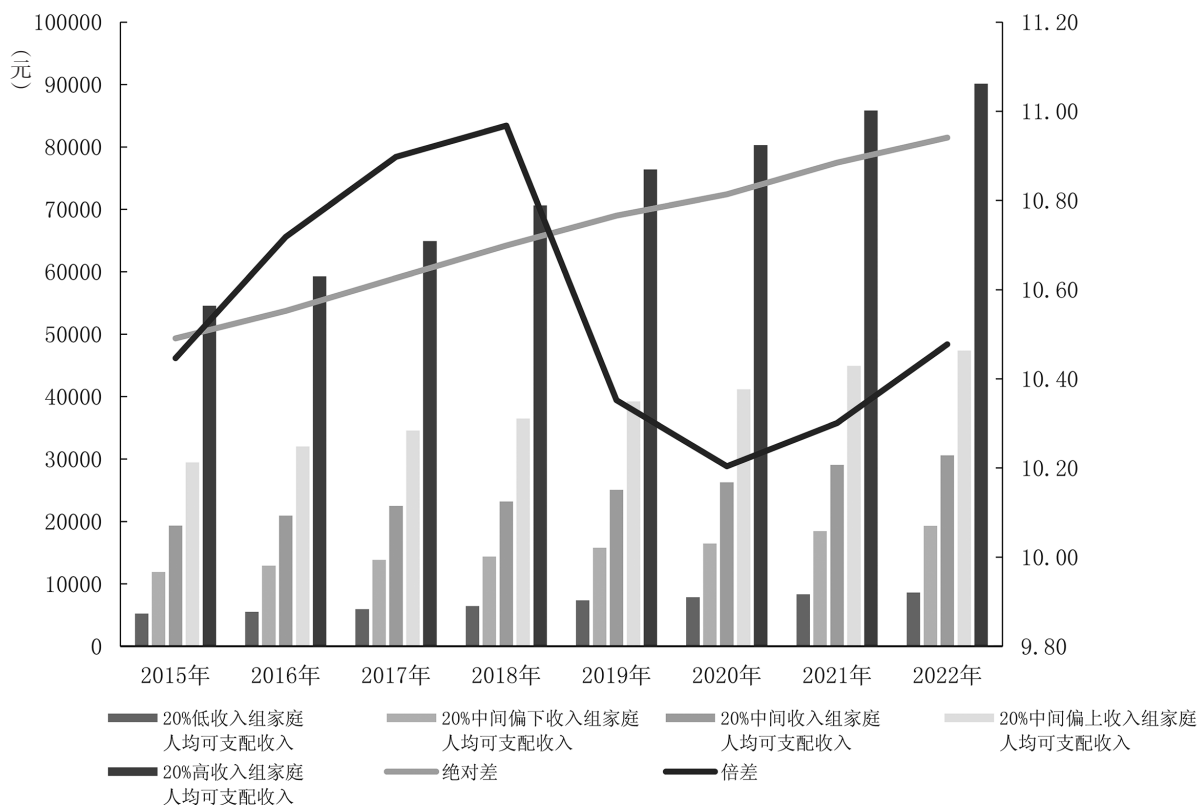


图3 2015—2022年全国按五等份分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2023年《中国统计年鉴》。

无法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精神文化熏陶。另外,现有的乡村文化设施利用率相对不高,乡村文化设施成了摆设。并不是农民对精神文化没有需求,这些年农家书屋、农村大舞台、村史馆、活动中心等文化设施在农村逐渐多起来,建设力度很大,但部分文化设施建设不接地气,文化服务不完全合乎农民口味,乡村文化设施普遍缺乏管理,缺少专门值守讲解、组织活动的人员,大门常常一锁了事。同时,乡村文化设施建设多是一次性投入,难以持续更新内容、维护设施,导致城市与农村居民之间公共文化资源差距较大。

(五)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短板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人口数量迅猛增长,成为生态环境的最大压力。迫于生存压力,人们毁林开荒,围湖造田,20世纪80年代,又乱采滥挖,超载过牧,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还导致土地资源的枯竭和生态系统的破坏。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加上落后的生产方式,对草原、林地等过度开发和利用,加剧了生态环境破坏。一些农村地区采用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过度使用化肥、农药和抗生素等,导致土壤质量下降、农田退化

和农产品残留物污染。此外,农村养殖业增加了养殖废弃物的排放和水体污染。在长江上游地区,人们为了扩大耕地面积,不断开垦,对生态环境破坏较为严重。20世纪80年代,一些专家呼吁如果不加强长江上游的生态环境保护,长江将会变成第二条黄河。同时,城市建设过程中的环境污染也一直是困扰现代人的重要问题,一是城市人居环境有待改善,城市建设与规划过程中过度关注经济效率,在交通道路、公共设施、绿化建设等方面的投入远远不够,严重影响了城市作为人类居住地主要功能的发挥。虽然近年来各地政府对城市生活设施加大了投入,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二是产业结构不够合理。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功能的日趋增多以及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日益提高,第三产业也得到了迅猛发展,并逐渐取代第二产业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而我国在城市产业结构方面存在明显不足,缺乏根据各城市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合理发展规划,过分注重第二产业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不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步提高,我国城市的产业结构也在不断调整,第三产业

的比重在逐步提高。

四、以新型城镇化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突破路径

针对上述制约因素,要想进一步以新型城镇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就要有序推进城市群发展,全面推进县域城镇化,深度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同步建设美丽城市与美丽乡村,加快城市现代化转型。

(一)有序推进城市群发展,打造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主体

城市群能够促进要素顺畅流通,实现城市合理分工,有效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经过40多年的发展,我国城市群以不到20%的土地面积,吸纳了约60%的人口,创造了70%以上的经济总量,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和重要支柱、国家新型城镇化的空间主体。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有序推进城市群发展。第一,针对不同发育程度的城市群分类施策,对于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育较为成熟的城市群,要加大对外开放水平,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力争打造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对于山东半岛、成渝、长江中游等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城市群,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快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城市间交流合作,带动城市群内其他城市发展;对于江淮、天山北坡、长株潭、北部湾等尚在培育中的城市群,要进一步提升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以当地资源禀赋为基础,发展特色优势产业,避免贪大求快、脱离实际。第二,加强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中心城市以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将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疏解出去;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可承接劳动密集型或成本敏感型产业。随着交通网络的建设,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可以逐渐摆脱区位优势,继而发挥成本优势,更加便于承接大城市产业转移,随着就业机会、经济规模的扩大以及基础设施的完善,中小城市和小城市的城市规模也会随之扩大,缩小与大城市的发展差距,在区域内实现协调发展。第三,要辩证看待城市群要素集聚的正负集聚效应,既要适度集聚要素,带动城市群发挥正集

聚效应;又要避免要素过度集聚导致城市病所带来的负集聚效应。

(二)全面推进县域城镇化,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载体

县域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重点和实践主体,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有着不可取代的重要战略地位。2021年,我国1866个县及县级市城区常住人口约有2.5亿人,占全国城镇常住人口的近30%,留在农村的人口大约还有5亿人,县城和小城镇的人口容纳潜力尚未得到充分释放。县域城镇化是克服巨大人口规模压力、发挥人口规模优势的关键举措,但并不是所有县城都适合大干快上,要尊重县城发展规律,既要防止盲目进行高密度高强度开发,又要防止摊大饼式无序蔓延。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坚持“一县一策”,分类引导县城发展方向。具体而言,县城的发展可分为三条路径:第一类是距离大城市100千米以外、主要只能依托自身优势发展的县城,要重视产业布局的前瞻性和专精性,注重做大优势产业,以发展接续替代产业为主要方向,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吸纳周边地区的人口,并服务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最终发展成为区域性中心城市。第二类县城位于大城市100千米范围内,其发展方向是作为大城市的二级城市或者副中心城市,即卫星城,由于自身腹地为大城市所涵盖,应与附近大城市错位发展,逐步调整为功能型城市。第三类是人口流失的县城,这类县城或是以农业为主,或是位于生态功能区,或是资源枯竭,很难发展成为一定规模的城市,应杜绝县城的盲目扩张,将资源集中到一两个特色产业的发展上,逐步实现经济发展的平稳过渡。

(三)深度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助力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

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存在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建设用地粗放低效、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等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效地改善了这些问题,但是也要认识到城镇化问题的复杂性和反复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进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全面推进乡

乡村振兴。”2022年3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目的就是要提高城乡发展质量,进一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这既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深度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首先,从发展理念上来说,必须跳出“就城市谈城市”“就乡村看乡村”的发展固化模式。城市与乡村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城乡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必须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其次,要打通城乡产业发展桥梁,推动农业人口获取更多就业机会。主动承接城市产业转移,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就业支撑,通过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带动农村产业提质增效。同时,应在农村大力支持现代农业发展,发展现代设施农业,加快农业信息化建设,用数字经济赋能现代农业,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技术基础。最后,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保障农业转移人口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通过城市与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四)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全力促进人的现代化转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社会不仅需要物质财富的积累,更要不断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提高社会文明程度,而精神文明的建设很大程度上需要城市文化引领。加强城市文化引领能力,促进人的现代化转型,一方面,要做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一要做好城市历史、人文各类物理形态与各类空间的保护与传承,落实政府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主体责任,提高领导干部的保护意识,考虑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政府年终考核评价体系。二要依托城市历史人文底蕴,结合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手段,推动历史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彰显城市人文色彩,打造独具特色的城市名片。另一方面,要全力促进人的现代化转型。人是现代化的主体,是现代化活动的实际承担者,要完成现代化,必须依赖高素质的人来完成。一要加强

对居民的科学文化教育,利用互联网等先进传播技术,开展科学知识普及活动,引导居民尊重科学文化,破除封建保守思想,建立起科学、文明、健康的新生活方式。二要加强

(五)着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同步建设美丽城市与美丽乡村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与城镇化具有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的关系,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无法实现真正的中国式现代化。加强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一要推动城市规划与生态规划相融合,在规划时着眼于远期发展与生态潜在功能的开发,统筹城市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合理划分城市功能区,协调与城市周边区域的发展和生态环境一体化管控。二要

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一要促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配套制度的建立,落实环境资源保护的主体责任,改革完善生态环境信访工作机制,统筹处理好农村自然资源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处置权、收益权等多种权益的分离与统一。二要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通过补偿激励村民采取环境友好型的生产生活方式,建立完善社会资本投入的市场化机制,引导生态受益者对生态保护者进行补偿。探索多样化补偿方式,重视产业扶持、技术援助、人才支持等补偿手段,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三要推动农业“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发展,一方面对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产业结构、流通和消费方式进行生态化改造,制定明确严格的废弃物排放标准,严禁国内外高污染产业向农村转移。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生态产业,进一步推进生态农业产业园和生态农业产业强乡、强镇建设,打造区域公用

品牌。重点推进生态农产品加工、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产业发展,拓展“生态+产业”“生态+文化”“生态+数字”模式。

(六)科学规划城市空间建设,加快城市现代化转型

城市治理是城市发展和增进人民群众福祉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要注重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和城市发展道路,对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首先,国土空间规划应充分考虑土地无序扩张问题,改变过去过度依赖土地增量带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同时,空间规划应注重居民对公共服务、生活品质等的诉求,考虑到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的协调。还要注重当今世界相互依存、瞬息万变、错综复杂的发展格局,规划中要加强对社会风险和突发事件的预判。

其次,通过智慧和韧性城市建设,加快城市现代化转型。智慧和韧性城市是城市发展的两个方面,韧性是目标,智慧是手段。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要求实现物质资源、信息资源和智力资源等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一要加快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布局5G、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新基建,加强城市大数据平台建设和功能整合。二要深化城市数据融合应用,将先进技术手段深度融入政务服务和城市应用服务中,全面推进政务服务、公共服务数字化和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对城市运行和管理的各项需求做出智能的响应。三要严格规范数据安全和隐私问题,把握好城市信息整合与居民信息安全泄露的安全界限。新型韧性城市建设要求融合智慧城市建设中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调度系统,强化城市应对突发重大事件的全周期韧性能力:一要利用数字化技术提高风险动态感知与监测预警,充分借助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对城市生命体进行实时监测研判预警,第一时间感知风险动态、提出有效应对策略。二要重点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加大对城市供水、排水、电力、燃气及石油管线等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的投资力度,提高城市硬件的灾难抵御力,提高城市安全保障能力。

注释

- 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页。
-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页。
- ⑤《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85页。
-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页。
-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17页。
-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72页。

参考文献

- [1]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https://www.gov.cn/xinwen/2023-02/28/content_5743623.htm.
- [2]习近平. 坚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引领 促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N]. 人民日报,2016-02-24.
- [3]钟万玲. 新型城镇化、多元化就业与扩大消费的关系[J]. 商业经济研究,2022(5).
- [4]谢锐,陈严,韩峰,等. 新型城镇化对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及时空效应[J]. 管理评论,2018(1).
- [5]杨卫忠. 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镇化的战略思考[J]. 农业经济问题,2018(1).
- [6]李强,陈振华,张莹. 就近城镇化模式研究[J]. 广东社会科学,2017(4).
- [7]沈实,杨宏. 新型城镇化助推了共同富裕吗?[J]. 经济经纬,2023(4).
- [8]辛宝英. 城乡融合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实现路径与推进策略[J]. 山东社会科学,2020(5).
- [9]辜胜阻,易善策,李华.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1).
- [10]李强,陈宇琳,刘精明. 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2012(7).
- [11]黄群慧. 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J]. 金融理论探索,2022(1).
- [12]陆铭,李鹏飞. 区位与分工:论统一大市场建设下的县城城镇化[J]. 农业经济问题,2023(1).
- [13]刘赫,洪业应. 欠发达地区“倒U型”城乡收入差距的新型城镇化路径:基于贵州省的经验分析[J].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22(6).
- [14]蒋正云,胡艳. 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机制及优化路径[J]. 自然资源学报,2021(3).
- [15]杨佩卿. 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与动力机制的相关性分析[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
- [16]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王建国. 河南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时代意义和实践路径[J]. 中州学刊,2021(12).

- [17]尹君锋,石培基,黄万状,等.甘肃省县域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J].自然资源学报,2023(8).
- [18]加布里埃尔 A 阿尔蒙德.发展中地区的政治[M].任晓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 [19]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高铨,王宏周,魏章玲,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
- [20]INGLEHART R.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J].Cultural economic & political change in societies,1999,76(3):941—942.
- [21]何传启.现代化概念的三维定义[J].管理评论,2003(3).
- [22]文世芳.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EB/OL].邓小平纪念馆网,2018-12-26,http://cpc.people.com.cn/n1/2018/1226/c69113-30489603.html.
- [2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4]虞崇胜.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属性:现代性、中国性、世界性[J].探索,2023(4).
-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26]洪哈,肖金成,郭楠.城市规模分布与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J].开放导报,2021(4).
- [27]肖金成,洪哈.共同富裕的概念辨析、面临挑战及路径探索[J].企业经济,2022(4).
- [28]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26.
- [29]肖金成.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J].区域经济评论,2014(5).
- [30]李杰伟,陆铭.城市人多添堵?——人口与通勤的实证研究和中美比较[J].世界经济文汇,2018(6).
- [31]郑怡林,陆铭.大城市更不环保吗?——基于规模效应与同群效应的分析[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

New Urbanization for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Conceptual Analysis, Logical Relationship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Hong Han Xiao Jincheng Chen Rui

Abstract: Urbanization is the only way to modernization, and the new type of urba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and inevitable mov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is the source of power for new urbanization,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s the foundation and support for new urbaniz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is the way and important means for urban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mo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faces practical challenges such as huge population size, significant regional development gap, significant income gap between groups, relatively backward rural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shortcomings i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better play the role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in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county urbanization in practice, deep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build beautiful cities and beautiful villages simultaneously, improve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of county urbanization, and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New-Type Urbanization;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Logical Relationships

(责任编辑:柳 阳)

【区域协调发展】

“东北振兴”20年：进展、问题及对策*

王菡 单菁菁 武占云

摘要：东北地区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自2003年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来，东北地区经济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国家粮食“压舱石”地位更加牢固、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民生建设迈上新台阶，但在经济结构、发展质量、开放合作、体制机制等方面仍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深层次困难和挑战。面向新时代新征程，东北地区应以继续深化全面改革重塑全面振兴新动能、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构筑全面振兴新优势、以深层次对外开放打造全面振兴新支点、以高水平农业现代化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以高质量区域经济布局构建全面振兴动力源，以高品质民生建设夯实全面振兴根基，加快形成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振兴的新局面。

关键词：东北地区；振兴战略；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4)02—0050—10 **收稿日期：**2023-12-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人与自然耦合系统的黄河流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研究”(21AZD04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生态文明时代国土空间发展理论与应用研究”(22FJLB025)。

作者简介：王菡，女，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博士后(北京 100710)。

单菁菁，女，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10)；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未来城市实验室博士生导师，通信作者(北京 102488)。

武占云，女，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710)。

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工农业生产基地，是向北开放的重要门户，在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方面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东北地区发展，于2003年、2016年相继印发《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文件，持续推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2021年出台《东北全面振兴“十四五”实施方案》，要求从维护“五大安全”战略高度，立足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强调要“努力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

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

东北振兴也是区域经济和区域协调发展领域的重点议题，近年来学者们围绕东北振兴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首先，东北振兴政策的效果评价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东北振兴政策总体上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了人们生活水平(魏后凯，2008；陈耀，2017)；也有研究认为创新和产业升级等振兴政策有效推动了一大批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重大项目顺利实施，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资源型城市转型试点逐步推广，国有企业改革改制工作顺利推进(金凤君等，2010)；传统第二产业优势显著提升，第三产业增加值快速增长，产业规模和结构变化明显(王士君等，2022)。其次，东北地区发

展面临问题与原因方面,部分研究认为轻重工业结构失衡、“产业错位”是导致东北地区经济困境的重要原因(林毅夫等,2017);对资源型产业、重工业的结构性路径依赖和对国有经济、单位制的体制性路径依赖,阻碍了东北地区经济的结构转型和市场化转型(李培林,2022)。最后,关于东北振兴的发展思路,有研究认为要注重化解过剩产能、依靠体制再造建立可持续的长效机制、加快产业全面转型升级的步伐(魏后凯,2017);亦有研究提出应注重产业空间结构调整和产业布局优化、推动国有资本向战略性安全保障服务领域的集中以及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与推动东北亚区域一体化等举措(迟福林等,2023)。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多数研究侧重于政策效果、产业转型或发展思路等细分领域,尚缺乏对东北振兴20年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的系统研究,也缺乏结合新时代国家赋予东北地区的新使命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新挑战,提出全面系统的实施路径和对策建议。鉴于此,本文在研究总结东北振兴战略实施20年取得成效的基础上,系统剖析东北地区全面振兴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基于新时代新征程国家赋予东北地区的重要使命和战略要求,研究提出深入推进东北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振兴的思路与建议。

一、东北振兴20年取得的进展与成效

东北地区是我国工业化起步较早、发展较快的地区,为建立新中国独立的工业经济体系、推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被誉为“共和国长子”和新中国的“工业奠基

地”。与此同时,由于计划经济历史积淀较深、市场化程度相对偏低、“资源依赖型”传统工业转型缓慢等原因,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东北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不断扩大。为及时扭转这种局面,我国于2003年开始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并通过20年的持续推进,使东北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和成效。

1. 经济综合实力稳步提升

首先,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东北三省地区生产总值由2003年的1.17万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4.05万亿元、2022年的5.79万亿元,其中辽宁、黑龙江、吉林的地区生产总值分别由2003年的0.59万亿元、0.36万亿元、0.21万亿元增加到2022年的2.90万亿元、1.59万亿元、1.31万亿元(见图1),经济规模均突破万亿元。其次,生产效率显著提升。东北三省的人均GDP由2003年的1.09万元增加到2013年的3.78万元、2022年的6.01万元,其中辽宁、黑龙江、吉林的人均GDP分别由2003年的1.40万元、0.95万元、0.79万元增加到2022年的6.90万元、5.13万元、5.57万元,人均经济产出持续提升。最后,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打造出国产首艘航母、“华龙一号”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等一批大国重器,辽宁最新一代节能环保型集装箱船已进行航前调试、“吉林一号”卫星星座建设正加紧推进、黑龙江传统产业数字化升级全力推进,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集群全面加速。2023年上半年,辽宁支柱产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较去年同期提高17个百分点;吉林、黑龙江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分别达到22.6%、9.5%^①,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黑龙江、吉林、辽宁生产总值分别实现同比增长4.7%、7.7%、5.6%,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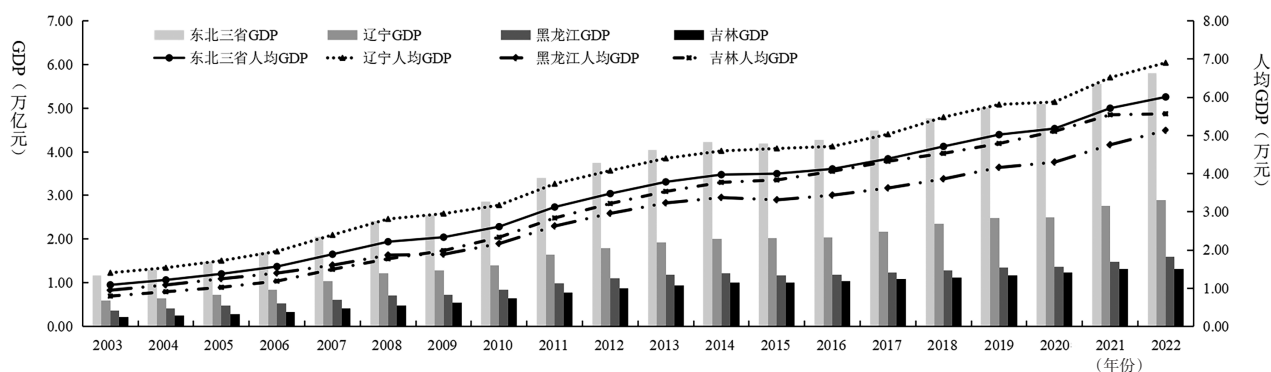


图1 2003—2022年东北三省GDP与人均GDP趋势图

资料来源:根据2003—2023年《中国统计年鉴》、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

于或接近全国水平(5.5%)^②,经济运行企稳回升,整体预期持续向好。

2.国家粮食“压舱石”地位更加牢固

首先,对国家粮食安全的贡献更加突出。东北地区作为国家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自2013年以来粮食产量一直占全国的1/5以上,商品粮总量约占全国的1/4,粮食调出量约占全国的1/3,其中黑龙江粮食产量连续12年稳居全国第一。2003—2022年,东北三省粮食产量年均增速为4.45%,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96个百分点,高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平均水平,已成为我国粮食商品量、调出量最大区域。其次,粮食地均和人均产量快速

增长。东北三省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从2003年的4216千克/公顷增长至2022年的5963千克/公顷,仅次于东部地区,高于全国、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见图2);人均粮食产量从2003年的584千克/人增长至2022年的1486千克/人,分别是全国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3.06倍、5.21倍、2.67倍和3.18倍(见图3)。最后,农业现代化建设加快推进。2021年黑龙江、吉林、辽宁农业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分别为98%、92%和83%,明显高于全国72.03%的平均水平^③,与2003年相比,分别增长了36个、67个、40个百分点。

3.改革开放取得重要进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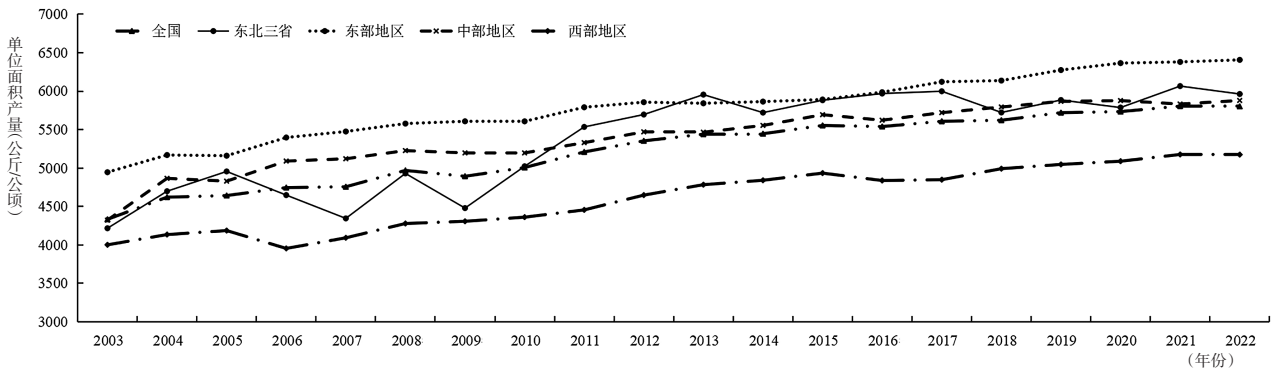


图2 2003—2022年全国地区及四大区域粮食单位播种面积产量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2004—2023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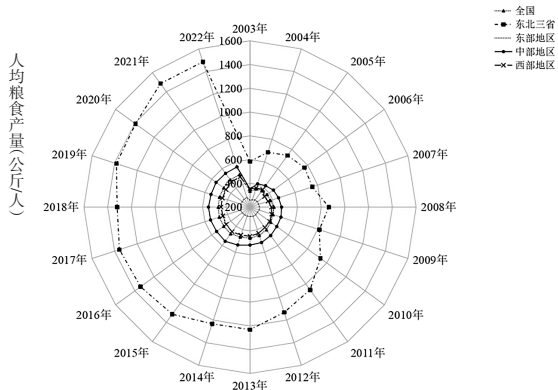


图3 2003—2022年全国及四大区域人均粮食产量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2004—2023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计算。

东北地区作为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门户,近年来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持续深化改革开放。首先,国资国企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2022年,东北地区中央企业及子企业实现利润3136.9亿元,同比增长7.2%,三省一区省级监管企业实现利润135亿元,同比增长17.3%。其次,民营经济撑起东北振兴“半壁江山”。截至2022年,东北三省民营经济增加值

占GDP比重均已超过50%,民营经济体量持续提升。其中,黑龙江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在2017年达到53.3%,吉林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自2011年开始超过50%,辽宁则在2010年就已超过了60%^④。最后,对外开放取得重要进展。2003—2022年,东北三省贸易进出口总额由3146.85亿元增加到12117.44亿元^⑤,实现翻两番;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对外交流合作保持良好态势,中国—东北亚博览会等重大活动影响力日益增长;辽宁、黑龙江两个自由贸易试验区,长春、大连、哈尔滨三个国家级新区以及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中德(沈阳)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等高能级开放平台持续发力,与东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4.民生建设迈上新台阶

首先,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从2005年开始,东北三省相继开展了大规模的棚户区改造工程,中央财政也持续加大对东北地区棚户区改造的支持力度,使城乡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同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3年的6991元

增加至2022年的39291元,年均提高9.5%;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3年的4888元增加至2022年的32897元^⑥,年均提高10.6%。其次,城乡差距日趋缩小。东北振兴实施20年来,东北三省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持续下降,由2003年的2.60下降为2022年的2.07,明显低于东部地区(2.31)、中部地区(2.23)、西部地区(2.54)和全国平均水平(2.45),成为四大区域中城乡关系最为协调的地区(见图4)。最后,社会保障覆盖面不

断扩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全面开展。截至2022年,东北三省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到4463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到2877万人^⑦,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

5.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东北地区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近年来持续加强森林、湿地、草原等重要生态功能区保护,扎实推进蓝天碧水净土污染防治攻坚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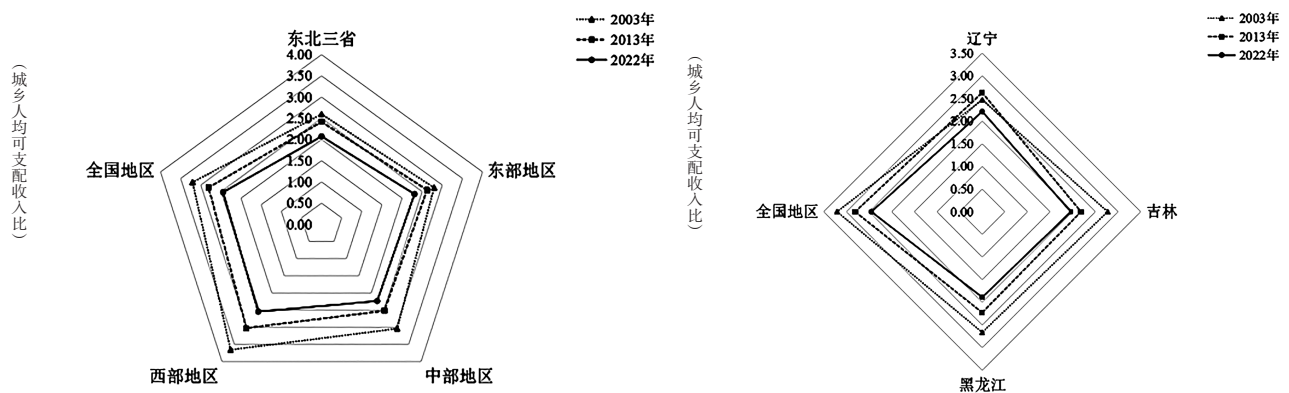


图4 2003—2022年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2004—2023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计算。

山水林田湖草治理取得显著成效,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首先,空气环境质量持续向好。2022年,黑吉辽城市优良天数比例分别达到95.9%、93.4%、90.0%,优于全国平均水平(86.5%)^⑧,其中黑龙江、吉林已连续七年城市优良天数比例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次,水环境质量显著提升。辽河流域、松花江流域水质明显改善,国控监测断面I—III水质占比分别由2003年的29.70%、7.70%增加到2022年的84.50%、70.50%;劣V类分别由2003年的40.50%、17.90%下降到2022年的0.200%,其中辽河流域水质改善尤为明显,2022年水质总体上优于黄河流域、海河流域、松花江流域(见图5)。近岸海域海水优良水质海域面积比例从2003年的70%以上增加至2023年的80%以上,明显优于天津、上海、浙江近岸海域海水水质。最后,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成为全国首批五个国家公园之一,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完善。

二、东北全面振兴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赋予东北地区承担更加重要的任务和使命,然

而,东北地区仍面临经济结构不优、发展质量不高、体制机制不灵活、高水平开放不足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深层次困难和挑战,东北地区全面振兴依然任重而道远。

1.经济恢复尚不稳固,经济结构仍有待优化

一是从发展速度看,自2003年以来,除个别年份外,东北地区的GDP增速长期在四大区域中处于末位(见图6)。二是从经济结构看,产业结构调整 and 转型升级滞后(李培林,2022)。2022年,东北三省的三次产业比为13.6:36.3:50.1,与全国相比(7.3:39.9:52.8),第一产业占比高出6.3个百分点,但农产品总体处于初级加工阶段,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的问题较为突出;第二产业占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6个百分点,其中黑龙江第二产业占比比全国低10.7个百分点,冶金、石化等传统产业占比高,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不足,工业对经济发展的拉动能力偏弱;第三产业占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7个百分点,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三是从企业营收看,东北地区企业发展尚不容乐观,以工业基础最好的辽宁为例,2023年1—6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下降1.4%,营业收入利润率低于全国1.60个百分点;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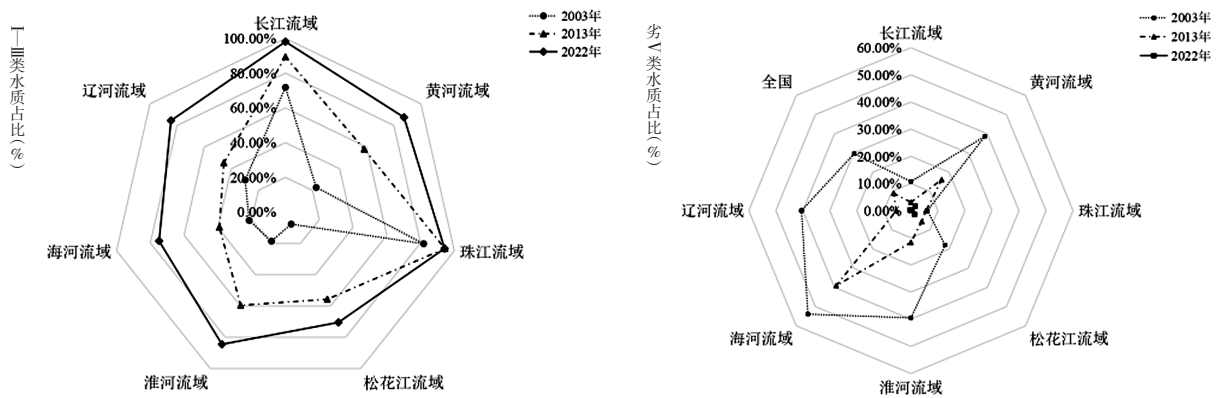


图5 2003年、2013年、2022年七大流域国控监测断面I—III类水质占比和劣V类水质占比

数据来源:根据2004年、2014年、2023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整理。



图6 2003—2022年四大区域GDP增速

资料来源:根据2003—2022年各省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GDP同比增速计算。

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41.3%,增速低于全国24.5个百分点^⑨。

2. 发展速度企稳回升,但发展质量仍需提高

一是创新动能依然不足。东北振兴战略实施20年来,东北三省R&D经费投入强度虽然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上升幅度较小,甚至在部分年份有所减少。2003年,辽宁R&D经费投入强度(1.38%)明显高于江苏(1.21%)、浙江(0.77%)、广东(1.13%),吉林、黑龙江的R&D经费投入强度与江苏、浙江、广东相比仅有小幅差距(见图7)。然而,2022年东北三省R&D经费投入强度仅增长到1.37%、1.43%和2.14%,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54%),更远低于江苏(3.12%)、浙江(3.11%)、广东(3.42%)等发达地区。东北三省万人专利授权数同样增长缓慢,分别从2003年的0.73件、0.63件和1.34件增长到2022年的11.79件、12.58件、18.45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0.62件)和远低于江苏(65.77件)、浙江(67.51件)、广东(66.15件)等发达地区^⑩;创新人才缺乏、创新体制不健全、创新配套不完善、创新成果转化能力不足等问题依然较为突出,“产学研用介”

创新链条存在诸多短板和阻碍。二是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总体不高。利用产业区位熵分析,东北地区具有产业竞争力的行业主要分布在石化、冶金、汽车等传统重工业领域,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普遍缺乏竞争力。即使是工业基础最雄厚的辽宁,制造业生产设备数字化率也仅为43%,低于全国5.5个百分点。一些新兴重点产业(如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等)的关键链条本地配套率低,同时“芯片”等卡脖子问题仍未完全解决。三是绿色转型发展任务艰巨。从能源结构看,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0年东北三省火力发电约占86.8%,远高于全国68.03%的平均水平,且短期内难以找到高品质、低价格的清洁能源进行替代;从能源供需看,东北地区能源对外依存度高,夏冬两季经常出现电力供应紧张,生产与生活用电资源配置矛盾凸显;从能源效率看,石化、冶金等高耗能工业占比高、体量大、高碳路径锁定强,双碳目标下绿色转型发展压力较大。

3. 国企改革仍需攻坚克难,市场活力相对不足

一是国企改革仍存在难点问题。近年来,东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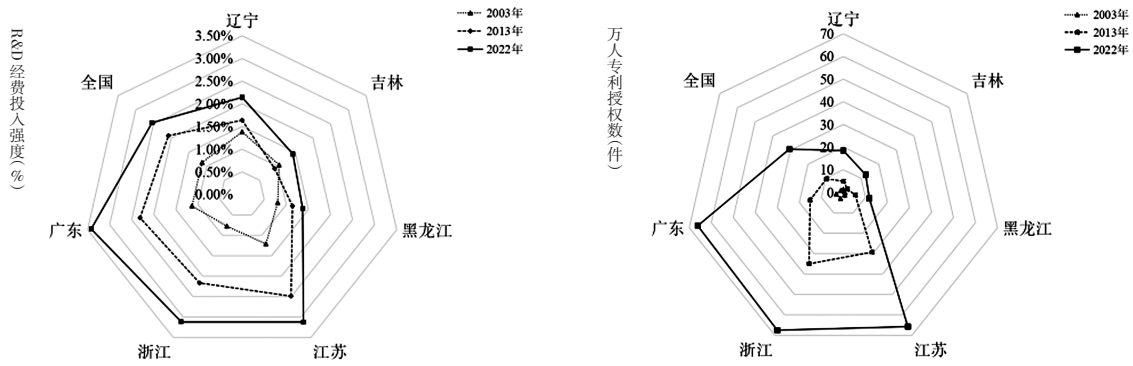


图7 2003年、2013年、2022年R&D经费投入强度和万人专利授权数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地区解决了国企改革中的一大批痛点难点和历史遗留问题(王士君等,2022),但在治理和管理方面仍存在改革不到位等一系列问题(魏后凯,2017)。大部分企业已完成股份制改造,但产权单一、国有股东持股比例普遍较高,民营股东参与国企混改动力不足;大部分国企高管任职尚未实现市场化,以东北61家A股上市国企为例,管理层中有从政背景的高达30家,占比48.39%^①。二是民营经济发展依然滞后。根据历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2013—2022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东北地区企业数量总体呈现下降趋势,2022年仅有五家企业入围民营企业500强(占比1%),吉林、黑龙江两省仅各有一家,远低于东部地区(396家,占比79.2%)、中部地区(58家,占比11.6%)和西部地区(41家,占比8.2%)(见图8)。2021年东北三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民营企业数量占比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9.16个、7.86个、10.49个百分点,黑龙江、辽宁私人控股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也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2.3个和16个百分点^②。三是营商环境仍需优

化。东北地区作为老工业基地,历史包袱较重、体制机制固化、新旧动能转换不畅等问题较为突出,虽然近年来改革取得一定成效,但相关研究显示,2022年吉林、辽宁、黑龙江三地的投资品牌影响力分别位列全国30个省域(未含西藏)的第25、第26和第30位,营商环境亟待进一步优化提升。

4. 部分地区人口流失严重,协调发展任重道远

一是从区域层面看,2010—2020年,东北地区常住人口减少1099.8万人,减少约1/10,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2010年的8.22%下降至2020年的6.99%。二是从省域层面看,东北三省中黑龙江、吉林人口流失更为严重,2010—2020年常住人口分别减少了16.9%和12.3%,而辽宁常住人口减少了2.6%(见图9)。三是从城市比较看,2010—2020年沈阳、大连、长春人口分别增加了92.16万人、76.04万人和139.25万人,而东北地区其他所有地市均为人口净流出(见图10),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进一步加剧中小城市收缩和农村空心化现象。总体而言,无论是在区域层面还是省域层面,东北地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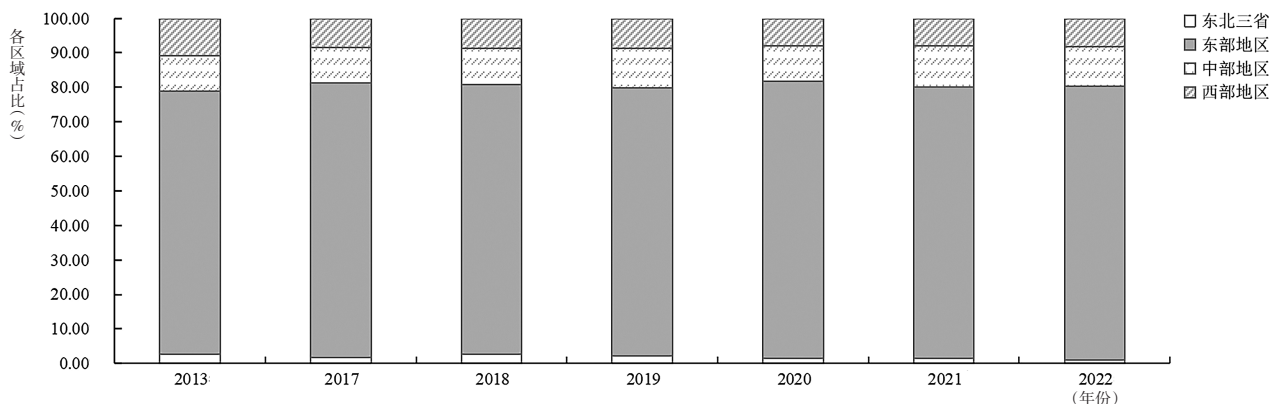


图8 2013—2022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区域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2013—2023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整理。

发展不平衡问题均较为突出,人口大量外流导致地区老龄化严重、人力资本匮乏,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下降,产业发展和公共服务的投入不足,进而直接影响经济发展和民生建设,并形成恶性循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任重道远。

5.地缘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开放能级仍有待提升

东北地处东北亚中心地带,与俄罗斯、朝鲜、蒙古接壤,与日本、韩国相邻,拥有较多的港口、铁路、公路、航空口岸,具有沿海沿边的独特区位优势,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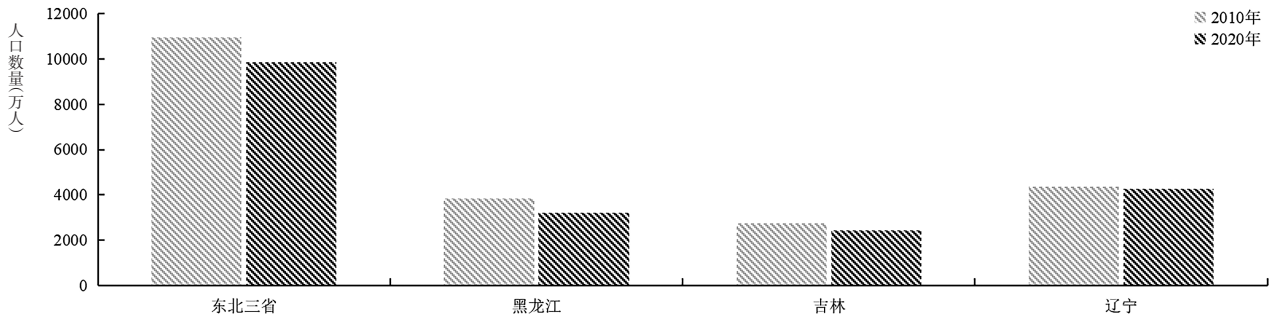


图9 2010年、2020年全国地区及东北三省人口数据

数据来源:根据全国、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的第六、七次人口普查年鉴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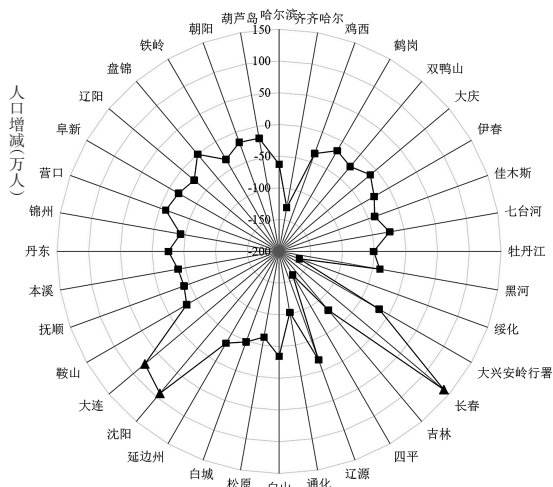


图10 东北各地区2020年比2010年人口增减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全国、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的第六次、第七次人口普查年鉴整理。

区位优势尚未得到充分利用,开放水平和能级仍有待提升。一是外贸进出口规模明显偏低。2003—2022年,东北三省外贸进出口占全国外贸进出口总额比重呈缓慢下降趋势,总体低于4.50%,2022年东北三省进出口总额仅占全国的2.88%;横向比较来看,东北地区外贸进出口总额比长三角地区低14.00%,比粤港澳大湾区低18.00%,2022年东北三省进出口规模仅相当于长三角地区的8.32%、粤港澳大湾区的15.27%(见图11)。二是经济外向度不高。2003—2022年,东北三省经济外向度整体呈先缓慢上升后平缓下降趋势,经济外向度水平整体偏低,且与长三角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外向度仍存在明显差距。2022年,东北三省进出口总

额占GDP的比重为20.91%,明显低于长三角(58.12%)和粤港澳大湾区(75.8%)的经济外向度水平(见图12)。

三、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面向新时代新使命,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实现新突破,需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把经济脱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体制机制再造有机结合起来,加快推动东北地区形成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振兴的新局面。

1.继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重塑东北全面振兴新动能

一是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以推动科技创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市场化经营机制改革等为着力点,开展新一轮国企改革提升行动,优化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更好发挥国有经济的战略支撑作用;加大力度创新央地合作模式,促进央地融合发展,更好带动东北经济发展。完善民营经济发展政策体系,实施民营经济市场主体培育计划,鼓励和吸引民营企业参与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项目建设,加大民营企业平等使用资源要素的保障力度,推动民营转型升级和提升发展质量;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由“混资本”向“转机制”的转变,并加大逆向混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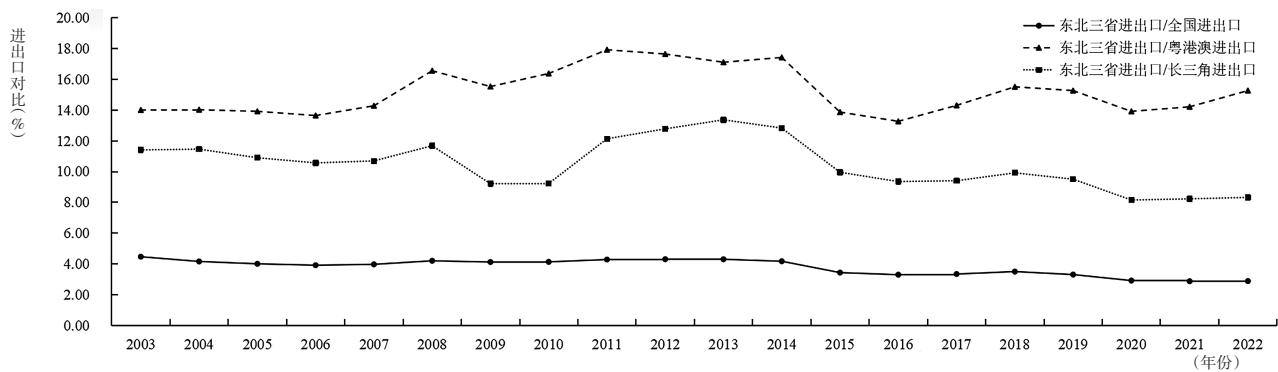


图 11 2003—2022年东北三省与全国、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地区的外贸进出口对比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2003—2023年各省份统计年鉴、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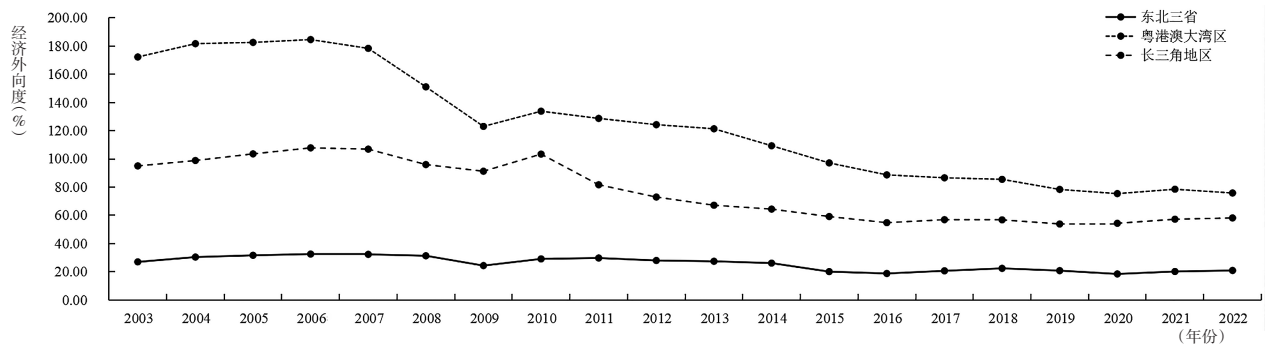


图 12 2003—2022年东北三省、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外向度水平

数据来源:根据2003—2023年各省份统计年鉴、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

所有制改革力度,建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常态化协作机制、激励约束机制以及尽职免责机制等。二是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把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高标准营商环境作为东北振兴的治本之策,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营造诚信法治环境、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提高要素配置效率、降低经营成本、优化政务服务等,全面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三是大力吸引人才回流。把优化人才发展生态放在优先位置,破除人才“引育用留”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研究出台支持东北地区吸引人才和用好人才的专门政策,实施更加开放灵活的人才引进机制,夯实全面振兴的人才基础。充分发挥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各类用人主体作用,培养引进高素质人才和创新团队。加大对省属高校的政策扶植力度,鼓励和支持省属高校结合自身特色组建人才团队、引进高端人才、留住现有人才。

2.以新质生产力引领产业转型,构筑东北全面振兴新优势

一是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利用新技术新模式改造提升装备制造、汽车、石化等传统优势产业,提升重大技术装备以及核心技术与关键零部件研发制造水平;积极培育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生

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新装备、冰雪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大力培育发展新质企业、新质产业链,支持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等地打造国内领先的新兴产业集群,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二是加快推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严格实施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合理控制化石能源消费、提高化石能源清洁利用水平,大力开发利用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清洁能源,全面推行工业清洁生产;大力发展以核电、风电、光伏发电、氢能为主的新能源装备制造业以及新型储能产业,支持建设“绿电”产业示范区、绿色制造示范基地,打造清洁能源装备产业链。三是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推动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服务业和农业深度融合;全面推进黑龙江、吉林国家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示范项目,加快推进沈阳建设、大连争创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四是强化科技创新引领。积极对接国家基础研究十年计划,依托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等优势科研力量,发挥各类创新主体作用,加强基础性、原创性、引领性研究;进一步改革科技创新生态体系,更高水平解放和整合科技创新资源,积极创建全国

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等科创平台,打造国际科技创新活力中心,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3.全方位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东北全面振兴新支点

一是提升东北亚国际合作水平。充分利用东北三省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地位,紧抓新地缘政治格局下中俄贸易全面深化的战略机遇,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加强与东北亚国家在服务贸易等新兴领域合作,奋力推进东北亚合作走深走实;高质量实施RCEP,持续深化与欧洲、东盟等区域的经贸合作,构筑立足东北亚、联通俄罗斯、拓展东南亚、辐射欧美非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二是打造面向东北亚的高能级开放平台。对标高标准国际规则,提升黑龙江和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外开放能级,推进长春、大连、哈尔滨国家级新区开发开放,加快中德(沈阳)、中韩(长春)、中日(大连)合作示范区等重点功能平台建设,推进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扩大夏季达沃斯论坛、中国—东北亚博览会等平台的影响力和辐射力,积极探索经贸合作新模式,推动符拉迪沃斯托克建设成为中俄深度合作的支点城市。三是高水平建设东北陆海新通道。以海港、陆港、空港和信息港为关键节点,全面拓展“空陆海网”开放通道,加快建设重要陆路通道、河海航道、能源管道等基础设施,着力推动面向东北亚的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促进交通、物流、商贸、产业深度融合和扩大开放,积极争取将东北陆海新通道上升为国家战略。四是推进对口合作和南北互动。围绕产业对接等领域,继续加大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在开放合作、南北互动中培育发展新动能。

4.高质量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

一是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基本农田“非粮化”,加强黑土地保护和地力恢复,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强化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黑土地保护等重大工程,高标准推进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二是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以“粮头食尾”“农头工

尾”为抓手,坚持用地与养地相结合,着力提升粮食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环节一体化发展水平,打造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三链协同”的粮食产业体系,培育生产结构更为合理、品质保障更加有力的农业生产体系,同时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力发展高品质、高附加值农产品,积极培育绿色生态农产品品牌,打造中华“绿色粮仓”“绿色菜园”“绿色厨房”;在确保粮食有效供给的前提下,基于食物结构日益多元化趋势,全方位开发食物资源和食物品种,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打造践行大食物观先行地。三是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着力推动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农业科技领域基础研究支持机制;深入推进现代种业提升工程,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提高良种自主可控能力和供应保障能力;推进农业产业链的智慧化升级,强化数字技术和生物技术赋能,扩大信息技术、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在设施农业等方面的应用,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

5.全面优化区域经济发展布局,构建东北全面振兴动力源

一是推进城市群、都市圈一体化布局。以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为主轴,做好空间规划顶层设计,明确城市的功能定位和产业发展方向,统筹推进城市群和都市圈基础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加强“哈长沈大”四市对接协作,加快推进沈阳、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增强哈长、辽中南城市群综合承载力,高水平建设辽宁沿海经济带,加快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二是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哈长沈大”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and 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增强中心城市服务能级,打造引领东北高质量振兴的动力源;持续提升中小城市和县域经济发展活力,统筹推进收缩型城市瘦身强体,强化分类引导,在城市群内、中心城市周边发展培育主导产业实力较强且能够有效承接城市功能转移的县级市,将农业、文旅、生态等具有独特资源禀赋的小城镇列为特色小镇培育试点;加强沿边口岸城镇建设,加强沿边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边境城镇功能,实现兴边富民稳边固边。三是加强跨区域协同合作。积极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战略,围绕产业优势互补,加强通道对接、产业对接、平台对接和市场对接;充分发挥东北振兴省部联席落实推进工作机制,深化东北三

省一区多领域深层次合作。

6.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夯实东北全面振兴根基

一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切实推进城市更新和美丽乡村建设,加快解决城乡基础设施老旧问题,加快推进重点区域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切实推进和解决重点领域民生问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逐步缩小收入差距;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提升社会保障信息化水平,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制度,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重点提升县域医疗服务能力和养老服务水平,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二是着力提升生态福祉。建立健全三省一区生态环境协同保护和监管体系,持续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打造“两山”实践东北样板,推动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互动双赢。三是加强重点领域风险防范,深化灾害性天气期间安全风险管控和各类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立足于东北三省地理相连、气候相近、经济融合度较高等现实特征,强化跨层级、跨队伍、跨区域应急预案修编,联合制定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推动东北三省应急响应、应急处置、应急管理体制机制的高度协同,切实提升东北三省安全韧性水平,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注释

①参见《东北三省装备制造业较快增长的背后》, <https://export.shobserver.com/baijiahao/html/636638.html>, 2023年7

月27日。②根据各省市统计局官网、国家统计局官网整理。③根据《2004年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年鉴》《2021年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统计公报》《2021年黑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④根据东北三省对外公布数据汇总整理。⑤根据2004—2023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⑥因2013年之前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缺失,采用各地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替代。⑦根据东北三省公布的《2022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统计公报》整理。⑧根据2022年东北三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以及《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整理。⑨数据来源:东北三省统计局以及国家统计局。⑩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⑪王世权:《破解东北国企混改障碍的战略选择》,《国资报告》第50期。⑫根据2022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参考文献

- [1]魏后凯.东北振兴政策的效果评价及调整思路[J].社会科学辑刊,2008(1).
- [2]陈耀.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要思考的几个关键问题[J].经济纵横,2017(1).
- [3]金凤君,陈明星.“东北振兴”以来东北地区区域政策评价研究[J].经济地理,2010(8).
- [4]王士君,顾萌,常晓东.东北振兴政策体系解构及区域经济响应研究[J].地理学报,2022(10).
- [5]林毅夫,付才辉.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吉林振兴发展研究:《吉林报告》分析思路、工具方法与政策方案[J].社会科学辑刊,2017(6).
- [6]李培林.理解与应对:我国新发展阶段的南北差距[J].社会发展研究,2022(1).
- [7]魏后凯.东北经济的新困境及重振战略思路[J].社会科学辑刊,2017(1).
- [8]迟福林,马禹.统筹发展与安全:推动东北地区全面振兴的战略任务[J].区域经济评论,2023(1).

20 Years of “Northeast Revitalization”: Progress,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Wang Han Shan Jingjing Wu Zhanyun

Abstract: The Northeast region hold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position in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ortheast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for the old industrial bases in the Northeast region in 2003, the comprehensive economic strength of the Northeast region had steadily improved, the status of the national grain “ballast stone” had been further consolidate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had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people’s livelihood construction had reached a new level. However, the Northeast region still faced some deep-seated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that urgently need to be solved in terms of economic structure, development quality, open cooperation, and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Facing a new era and new journey, the Northeast region should continue to deepen comprehensive reform and reshape new driving forces for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build new advantages for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reate new fulcrums for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through deep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build a “ballast stone” for national food security through high-level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build a driving force for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through high-quality regional economic layout, and solidify the foundation of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through high-quality livelihood construction, quickly form a new situ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le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Northeast Region;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江夏)

【区域协调发展】

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

刘国斌 王嘉玲

摘要: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能够加快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有力推手。基于理论分析提出研究假说,进而通过指标体系构建、熵值法、回归模型构建等方法,进一步分析2013—2022年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有积极效应,主要表现在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有经济促进效应、社会辐射效应和生态促进效应;(2)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影响效应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影响效应要大于其他地区。

关键词:乡村振兴;县域经济;耦合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影响效应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4)02—0060—08 **收稿日期:**2023-10-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县城的突出作用与发展机制研究”(14BJL122);吉林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数智化赋能吉林省乡村振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20230601018FG)。

作者简介:刘国斌,男,吉林大学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长春 130012)。

王嘉玲,女,吉林大学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硕士生(长春 130012)。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指明了方向,也为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发展擘画了蓝图。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发展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加快城乡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乡村振兴主要瞄准广大乡村地区,重在解决乡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县域经济发展主要瞄准县级行政区划地理单元,重在加快县域城镇化、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县域经济特色发展、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县域经济包含了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则进一步推进县域经济发展,二者能够在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实现耦合发展,进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学界进行了相关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关乡村振兴的研究。已有对乡村振兴的研究主要聚焦内涵、作用、水平评价、难点、实现路径等方面。从乡村振兴的内涵来看,张琦等(2022)、曹力和石以涛(2021)等学者普遍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维度

进行了解释,认为乡村振兴是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要求,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等为目标的重要战略。从乡村振兴的作用来看,张晖(2020)、文丰安(2022)等认为,乡村振兴能够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解决城乡不平衡不充分矛盾、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共同富裕等,其作用不言而喻。从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来看,既有对乡村振兴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如刘战伟(2023)、张明斗和周川(2023)等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维度进行构建,也有对乡村振兴水平测度方法的探讨,如徐雪和王永瑜(2022)、毛锦凰(2021)等学者利用熵值法、TOPSIS等方法进行测度评价。从乡村振兴的难点来看,刘铮和魏传成(2021)、董玮和秦国伟(2020)认为,要素供给短板、基层组织功能弱化、传统动力制约等是阻碍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难点所在。从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来看,燕连福和毛丽霞(2023)、张琦和庄甲坤(2023)、曾福生和卓乐(2018)等学者从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等层面提出了可行路径。二是有关县域经济的研究。已有对县域经济的研究主要聚焦内涵、指标体系构建、发展策略等方面。从县域经济内涵来看,闫坤和鲍曙光(2018)、宋菲菲和宋亚平(2020)等学者认为,县域经济是由县级政府主导,市场机制引导的以城乡乡村等为经济腹地的、功能较为完备的、具有地方特色的、以推进县域经济发展为目标的区域经济类型。从县域经济指标体系构建来看,史贞(2014)、王蕾(2021)等学者从县域经济水平、县域经济活力、县域人民生活等维度构建相关指标,为本文指标体系构建提供了参考。从县域经济发展策略来看,方迎风(2022)、廖冶寅和狄方耀(2022)等学者认为,政策支持、特色产业、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等是推进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策略。三是有关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关系的研究。已有对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关系的研究,斯丽娟和曹昊煜(2022)、段进军和玄泽源(2021)等学者认为,乡村振兴能够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县域经济发展也能辐射带动乡村振兴,二者紧密相关,具有耦合关系,这为本文研究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四是有关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已有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主要侧重其内涵研究。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来看,陈理(2023)、章玉贵和赵文成(2023)、裴长盛和曲建武(2023)等学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其蕴含的内涵十分丰富。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目前学界对乡村振兴、县域经济发展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也存在一定不足,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影响效应作为重要的研究命题,学界并没有深入探讨,且尚未回答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产生何种效应。基于现有研究成果,本文以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影响效应为研究对象,通过理论机制分析,探讨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理论逻辑关系并提出研究假说,进而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验证研究假说,厘清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带来哪些影响效应。与以往研究相比,我们主要做了如下工作:第一,将乡村振兴、县域经济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避免了以往对乡村振兴、县域经济及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研究单一性的局限;第二,探讨了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影响效应情况,是对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及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研究具有积极意义和贡献。

二、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既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也能够促进共同富裕和社会发展,实现生态绿色发展。二者耦合发展能够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产生积极的经济促进效应、社会辐射效应和生态促进效应。通过理论分析提出相关研究假设,为后文分析奠定理论基础。

(一)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经济促进效应

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能够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从其理论内涵来看,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的重点在于经

济方面的耦合,通过乡村产业发展与县域产业的相互耦合协调,进一步实现城乡产业耦合发展,进而打通县城与乡村经济发展的通道,促进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序流动,为城乡各自经济充分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同时,通过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有助于扩大内需、加快城乡产业提质增效进程、构建城乡高质量产品供给体系,进一步改变城乡经济发展方式,提升城乡经济发展活力,构建城乡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城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建设,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以往研究忽视了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经济促进效应,欠缺系统分析,本文将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进一步对其经济促进效应展开分析。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1。

假设1: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有经济促进效应。

(二)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社会辐射效应

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能够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发展,进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其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有社会辐射效应。从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的内涵我们可以看到,二者能够在社会层面实现耦合,进而促进城乡共同富裕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一方面,通过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城乡居民就业空间得到扩大,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不断加快,推进了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另一方面,通过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差距不断缩小,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加快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进程,进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持。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能够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有积极的社会辐射效应,但以往研究忽视了这方面的实证分析。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2,并在后文中进一步分析。

假设2: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有社会辐射效应。

(三)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生态促进效应

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能够加快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进程,进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步伐。从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的内涵来看,乡村振兴强调了生态宜居的目标要求,旨在构建乡村宜居宜业的生态空间,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目标;县域经济也重视绿色发展,通过县域经济绿色发展,优化县域经济生态环境、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活力、促进县域经济绿色转型。二者能够在生态文明建设层面实现耦合发展。通过生态耦合,进一步促进城乡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进而加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可见,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有生态促进效应,但以往研究大多从理论层面进行论述和分析,欠缺实证度量。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3,并在后文进行实证检验分析。

假设3: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有生态促进效应。

三、研究方法 with 数据来源

基于前文分析,我们进一步构建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整体论文研究方法系统论述,为后文实证分析提供方法依据和数据支撑。

(一)指标体系构建

从前文理论分析来看,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主要表现在经济、社会、生态层面的耦合。本文在遵循代表性、数据可获得性、科学性等指标构建原则基础上,结合已有研究资料,从经济耦合、社会耦合、生态耦合三个维度构建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与现有评价指标体系相比,突出了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的属性特征,更加切合本文研究需要。

(二)研究方法

1.熵值法

熵值法是判断某一指标离散程度的方法,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大,对系统评价的影响程度越大。因此可通过熵值法为多指标综合评价确定权重。本文利用熵值法来计算指标权重并求解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的水平得分。计算原理如下:

第一,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表1 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符号	指标说明	指标属性
经济耦合(A1)	城乡经济产值之比	B1	城市经济产值/乡村经济产值	+
	城乡财政收入之比	B2	城市财政收入/乡村财政收入	+
	城乡科技投入之比	B3	城市科技投入/乡村科技投入	+
社会耦合(A2)	城乡居民收入之比	B4	城镇居民收入/乡村居民收入	+
	城乡公共服务之比	B5	城市每万人医疗卫生床位数/农村每万人医疗卫生床位数	+
	城乡就业之比	B6	城镇居民就业人数/乡村居民就业人数	+
生态耦合(A3)	城乡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之比	B7	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乡村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城乡废水排放量之比	B8	城市废水排放量/乡村废水排放量	+
	城乡人均道路面积之比	B9	城市人均道路面积/乡村人均道路面积	+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text{正向指标: } X'_{ij} = \frac{X_{ij} - \min X_j}{\max X_j - \min X_j} \quad (1)$$

$$\text{负向指标: } X'_{ij} = \frac{\max X_j - X_{ij}}{\max X_j - \min X_j} \quad (2)$$

第二,计算*i*年份*j*项指标值的比重。

$$Y_{ij} = \frac{X'_{ij}}{\sum_{i=1}^m X'_{ij}} \quad (3)$$

第三,计算第*j*项指标信息熵值。

$$e_j = -k \sum_{i=1}^m (Y_{ij} \times \ln Y_{ij}), \text{其中, } k = 1/\ln m \quad (4)$$

第四,计算信息熵冗余度。

$$d_j = 1 - e_j \quad (5)$$

第五,计算指标权重。

$$w_j = d_j / \sum_{j=1}^n d_j \quad (6)$$

第六,利用标准化的数据与权重相乘得到综合得分。

$$Z_i = \sum_{j=1}^p w_j X'_{ij} \quad (7)$$

式(7)中:*i* = 1, 2, ..., *m*; *j* = 1, 2, ..., *n*; *i*表示年份, *j*表示指标序号; *W_j*表示指标权重,权重越大,对

指标评价影响越大; *Z_i*表示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水平得分, *Z_i*值越大,说明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水平越高。

2.模型构建

为进一步分析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影响效应情况,结合本文研究需要及前人研究方法,我们构建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影响效应回归模型,具体模型如下:

$$\ln CSM = \beta_0 + \beta_1 \ln A1 + \beta_2 \ln A2 + \beta_3 \ln A3 + \beta_4 \ln A4 + \beta_5 \ln A5 + u \quad (8)$$

表2反映了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影响效应的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其中:被解释变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指数(CSM),反映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情况,借鉴已有学者研究成果,利用社会服务现代化、经济发展现代化、技术创新现代化、文化建设现代化、绿色发展现代化、政治治理现代化相关指标进行指数合成;解释变量为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的经济耦合水平、社会耦合水平、生态耦合水平,反映乡村振兴与

表2 变量定义与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变量名	数据依据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中国式现代化指数(CSM)	合成指数	0.425	0.724
解释变量	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的经济耦合水平(A1)	测度所得	0.555	0.602
	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的社会耦合水平(A2)	测度所得	0.471	0.585
	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的生态耦合水平(A3)	测度所得	0.355	0.518
控制变量	政府支持(A4)	政府财政支出额	0.448	0.425
	社会支持(A5)	企业研发投入	0.321	0.339

资料来源:参考国家统计局、政府工作报告、各省份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整理。

县域经济耦合发展情况,主要利用前文测度结果来衡量;控制变量为政府支持和社会支持,分别用政府财政支出额和企业研发投入来衡量。

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涵盖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以及混合回归模型,所以,回归分析前要通过检验分析来选择合适的回归模型。

首先,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并进行F检验,F检验统计量的P值为0.6315,不能拒绝原假设,所以不存在个体效应,混合效应模型要优于固定效应模型。

其次,经过 Breusch-Pagan 检验发现P值大于0.05,不能拒绝“不存在个体随机效应”的原假设,考虑混合效应模型。

最后,通过 Hausman Test 来判别是否建立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结果表明,应该使用混合回归模型。

3.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探讨2013—2022年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影响效应分析,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政府工作报告、各省份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等渠道,通过获取的原始数据进一步测度计算,得出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水平得分及中国式现代化指数等。

四、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影响效应分析

在前文理论分析和研究方法的论述基础上,以下就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影响效应展开回归分析,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检验前文假设。

(一)基准回归分析

本部分进行基准回归结果分析,以检验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影响效应情况。表3为基准回归结果,列(1)反映的是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的经济耦合水平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影响效应情况,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二者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验证了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有经济促进效应的假说。列(2)反映的是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的社会耦合水平对中国式现代

化发展的影响效应情况,回归系数为0.236,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的社会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能够辐射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这验证了前文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有社会辐射效应的假说。列(3)反映的是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的生态耦合水平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影响效应情况,从结果来看,回归结果为正且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二者生态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有正向作用,能够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这也是对前文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有生态促进效应假说的验证。综上,我们可以认为,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能够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有经济促进效应、社会辐射效应和生态促进效应。

表3 基准回归

变量	(1)	(2)	(3)
lnA1	0.282***		
lnA2		0.236***	
lnA3			0.202***
_cons	8.525***	6.225***	7.321***
N	930	930	930
R ²	0.7265	0.7314	0.6635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所得。

注:*** $p < 0.01$, ** $p < 0.05$, * $p < 0.1$ 。

(二)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前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替换变量法、补充变量法、调整样本周期的方法进行回归结果分析,重点探讨回归结果是否稳健。表4为稳健性检验结果。其中:列(1)为替换变量后的回归结果,也即:将城乡经济产值之比替换为城市工业经济产值与乡村农业经济产值之比后重新测度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的经济耦合水平,然后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与原基准回归结果在符号和显著性上保持一致,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列(2)为补充变量后的回归结果,补充了控制变量政府支持(A4)和社会支持(A5)后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在符号及显著性上保持一致,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列(3)为调整样本周期后的回归结果,通过延长5年样本周期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调整样本周期后的回归结果正负号和显著性保持

表4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lnA1	0.282***	0.288***	0.277***
lnA2	0.224***	0.235***	0.226***
lnA3	0.195***	0.201***	0.202***
lnA4	0.223***	0.225***	0.221***
lnA5	0.217***	0.238***	0.219***
_cons	5.535***	6.321***	5.884***
N	930	1550	1395
R ²	0.7745	0.7515	0.6884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所得。

注:*** $p < 0.01$, ** $p < 0.05$, * $p < 0.1$ 。

不变。综上,我们可以认为,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三)异质性分析

为分析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影响效应的差异性,我们按照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划分标准进行回归分析,进一步探讨不同地区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影响效应的异质性。从表5结果不难发现,东部地区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影响效应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异质性,这与各地区经济发展基础、政策支持力度、区位优势等紧密相关。

表5 异质性分析

变量	(1) 东部地区	(2) 中部地区	(3) 西部地区	(4) 东北地区
lnA1	0.302***	0.251***	0.215***	0.225***
lnA2	0.257***	0.224***	0.202***	0.212***
lnA3	0.272***	0.242***	0.221***	0.228***
_cons	6.215***	5.713***	4.325***	5.224***
N	300	180	360	90
R ²	0.7458	0.7185	0.6884	0.7245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所得。

注:*** $p < 0.01$, ** $p < 0.05$, * $p < 0.1$ 。

五、结论与建议

基于全文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旨在更好地促进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

(一)结论

第一,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有积极效应,主要表现在:乡村振兴

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有经济促进效应;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有社会辐射效应;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有生态促进效应。尽管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有积极的经济促进效应、社会辐射效应、生态促进效应,但也存在不足。首先,从经济促进效应来看,回归结果上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表现出正向的经济促进效应;但从实际发展情况来看,由于城市经济发展远远快于乡村经济发展,城市对乡村地区的经济集聚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城乡经济差值的绝对差距是逐渐扩大的,这实际上是不利于城乡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也变相地影响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其次,从社会辐射效应来看,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辐射效应在结果上表现出正向促进效应,说明了其有助于城乡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助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但是,仍有一部分地区城乡公共服务差距非常之大,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亟待提升,这可能会影响二者社会耦合发展,从而影响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最后,从生态促进效应来看,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有生态促进效应,中国式现代化是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城乡生态耦合协调理应发挥作用,但从实际发展来看,城市发展速度快于乡村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可能相对来说城市更高,乡村地区由于开发程度和建设程度滞后,资源环境保护较好,这种情况可能导致城乡生态耦合协调水平失衡,不利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第二,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影响效应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影响效应要大于其他地区。从经济促进效应来看,东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乡村振兴水平要普遍高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的水平会高于其他地区,从而使得东部地区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水平高于其他地区,这有着必然的逻辑联系。从社会辐射效应来看,东部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高于其他地区,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相对较高,而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的城乡公共服务差距较大,不

利于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进而影响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从生态促进效应来看,由于经济发展进程的推进以及绿色生态发展理念的持续引领,东部地区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的生态促进效应会越来越高,而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由于县域经济发展滞后,其与乡村振兴在生态层面的耦合发展水平也相对滞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影响。

(二)建议

为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加快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以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在经济层面的耦合发展为重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重点要加强城乡产业融合发展,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打通城乡经济耦合发展的通道,进而构建城乡现代化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优化和提升城乡产业价值链和供应链,进一步促进城乡充分发展、高质量发展,扩大内需,加快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满足广大城乡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有效需求,充分释放城乡经济发展活力,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第二,加强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社会层面的耦合发展,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一方面,要积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进一步解决城乡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矛盾,通过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在社会层面的耦合发展,提高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发挥城乡企业、社会组织的作用,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和空间,满足城乡居民的就业需求,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进一步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发展进程,进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第三,推进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生态层面的耦合发展,打造城乡宜居宜业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一方面,要加强城乡综合环境整治,降低面源污染,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另一方面,要积极转变城乡经济发展模式,以绿色发展、生态发展的理念指引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构建城乡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环境,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据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第四,各地区应有重点、有目标地分类推进,进而通过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东部地区应提升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在经济、社会、生态层面的耦合发展水平,尤其是在经济耦合层面应继续做大做强县域经济,提升乡村振兴质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缩小县域经济与乡村振兴在经济层面的相对差距,进一步推进东部地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部地区要加快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做好基础公共服务工作,优化城乡公共服务和配套设施服务,进一步推进中部地区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进程,加快其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西部地区应提升县域经济与乡村振兴在生态层面的耦合发展水平,更好地缩小城乡差距,助推其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实现高水平耦合,进而加快西部地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步伐。东北地区要提高乡村振兴质量,更好地发挥其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资源禀赋优势,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进而加快东北地区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步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参考文献

- [1]张琦,庄甲坤,李顺强,等.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内在关系与战略要点[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
- [2]曹立,石以涛.乡村文化振兴内涵及其价值探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
- [3]张晖.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经济学阐释[J].求索,2020(1).
- [4]文丰安.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的新型城乡关系构建:意义、困境及纾解[J].理论学刊,2022(3).
- [5]刘战伟.乡村振兴水平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及空间收敛性研究[J].统计与决策,2023(12).
- [6]张明斗,周川.新发展格局下乡村振兴水平的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3).
- [7]徐雪,王永瑜.中国乡村振兴水平测度、区域差异分解及动态演进[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5).
- [8]毛锦凰.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方法的改进及其实证研究[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
- [9]刘铮,魏传成.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难点及对策[J].经济纵横,2021(10).
- [10]董玮,秦国伟.困境与破局:乡村振兴的动力转换与实现路径[J].中州学刊,2020(11).
- [11]燕连福,毛丽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主要任务、现实挑

- 战与实践路径[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
- [12]张琦,庄甲坤.高质量乡村振兴的内涵阐释与路径探索[J].贵州社会科学,2023(5).
- [13]曾福生,卓乐.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选择[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8(5).
- [14]闫坤,鲍曙光.经济新常态下振兴县域经济的新思考[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2).
- [15]宋菲菲,宋亚平.县域经济的内涵、特征和高质量发展:以湖北为例[J].湖北社会科学,2020(2).
- [16]史贞.中国县域经济综合指标评价研究:以山西省为例[J].学术论坛,2014(1).
- [17]王蕾,丁延武,郭晓鸣.我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构建[J].软科学,2021(1).
- [18]方迎风.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异质性与动力机制分析[J].河南社会科学,2022(9).
- [19]廖冶寅,狄方耀.实证分析视角下西藏边境县域经济发展探讨[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
- [20]斯丽娟,曹昊煜.县域经济推动高质量乡村振兴:历史演进、双重逻辑与实现路径[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
- [21]段进军,玄泽源.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江苏省县域经济韧性与乡村振兴耦合关系分析[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3).
- [22]陈理.深刻理解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核心要义、实践要求[J].党的文献,2023(3).
- [23]徐艳玲,徐林芳.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演进、鲜明特征与经验启示[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3).
- [24]章玉贵,赵文成.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内涵、逻辑演进与范式创新[J].上海经济研究,2023(5).
- [25]裴长盛,曲建武.中国式现代化的统计测度及推进路径[J].工业技术经济,2023(6).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the Coupling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unty Economy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Liu Guobin Wang Jialing

Abstract: The coupled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unty economy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t can accelera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huge population, the modern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of all peopl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man and nature,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which is a powerful driv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eoretical analysis, the research hypothesis is put forward, and then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index system, entropy method, regression model construction and other methods, the impact of the coupling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unty economy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from 2013 to 2022 is further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coupled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unty economy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an economic promotion effect, a social radiation effect and an ecological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2) The impac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unty economy coupling developmen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as obviou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The impac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unty economy coupling developmen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 the eastern region is greater than that in other regions.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County Economy; Coupling Development;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mpact Effect

(责任编辑:柳 阳)

【区域格局与产业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发展的影响研究*

黄阳平 黄巍

摘要: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已经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引擎作用,但是目前关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效率的影响机制的研究文献较少。选取2003—2021年中国28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和具体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推动了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且在考虑稳健性和内生性问题下依然成立。(2)从具体作用机制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和生态建设三条路径来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且三者都起到正向的部分中介作用。(3)从区域异质性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从高到低依次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对西部地区促进作用不显著。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城市效率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4)02—0068—10 收稿日期:2023—12—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城市规模和产业集聚协同演进的中国城市效率提升路径研究”(21AJL009)。

作者简介:黄阳平,男,集美大学财经学院、集美大学产业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经济学博士(厦门 361021)。

黄巍,女,集美大学财经学院硕士生(厦门 361021)。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变化和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城市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成为举国上下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国在经

历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国家综合实力大幅跃升的同时,出现了不容忽视的经济结构不均衡、增长动力不足、经济效率低下、环境污染严重等经济发展的质量和结构问题。首先,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然趋势,但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在产业结构中的矛盾突出,高耗能和高污染重工业产能过剩,制造业大而不强,现代服务业发展不充分,产业结构低端锁定制约着经济结构的优化;其次,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但是当前创新能力不足以及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能力欠缺制约着经济新旧动能的转化;再次,绿色发展是中国发展的重大战略,但是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给生态环境保护带来较大压力;最后,人民作为发

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收入和基本公共服务分配不均影响人民的幸福安康(赵剑波等,2019;任保平,2022)。因此,城市作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其发展模式亟待由要素驱动、规模驱动转为创新驱动,通过效率变革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城市效率是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反映。

随着社会分工日趋细化深化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生产性服务业从制造业和农业分离进而赋能实体经济,其发展直接关系产业结构、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生产性服务业不仅可以通过自己的发展带动经济增长(曹聪丽等,2019),而且其空间集聚产生的劳动力蓄水池效应、中间投入品效应和知识技术溢出效应等外部经济效应对城市的技术创新(李勇辉等,2021)、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韩峰等,2020)、产业结构升级(张治栋等,2021)、绿色发展(余奕杉等,2021)、经济效率(袁冬梅等,2021)等方面产生积极效应,对实现城市经济高质量意义重大。因此,作为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衔接点,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能够很好地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和资源优化配置(文丰安,2018),加快生产性服务业良性集聚将是有效提升城市效率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综合以往的相关研究成果,尽管学术界关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城市效率和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结论并不统一,但是学者们普遍认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积极作用。

首先,关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效率的影响效果方面,学者们大概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促进作用,另一种是非线性关系。持促进观点的学者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其他产业相比,蕴含着更多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Grubel H G, et al., 1989),产生规模效应、人才集聚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Wood P, 2006; Aslesen H W, et al., 2007),进而推动社会生产效率提高,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张涛等(2019)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促进人口、劳动力和人才的区域集聚,降低价值链上下游企业的交易成本、运营成本和中间投入成本,提升生产效率和产业附加价值,有利于推动集聚城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持非线性关系观点的学者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共同作用下对城市效率产生影响。就现阶段的城市产业发展

而言,绝大多数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其效率的影响处于上升阶段,应着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张明斗(2021)和李体欣(2022)都同意这种影响关系,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效率的正向影响关系存在门槛,当其集聚水平超过门槛值时离心力将超过向心力。进一步地,袁冬梅等(2021)在分析不同行业层次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时发现,目前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效率的作用还是向心力占主导,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则未能很好地发挥其优势,主要原因是产城发展不匹配以及市场失灵引起。韩增林等(2018)从供给规模视角指出,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推动技术进步,进而提升城市效率,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虽然初期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来提升城市效率,但是后期只能发挥规模优势而有损于技术进步和城市效率,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应和城市发展阶段和需求匹配,充分发挥其向心力。张浩然(2015)认为市场需求较大的大规模城市能够更好地发挥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积极作用,集聚效应更加显著,对城市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在以低端制造为主且缺少足够集聚规模的小城市,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更好地形成与本地资源和需求相匹配的生产服务体系。

其次,学者们具体探讨了不同的集聚模式、城市规模、产业层次等因素给两者关系带来的异质性影响效果。张素庸等(2019)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能够通过产业内的规模经济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促进城市效率提升,后者则是通过增强产业间的知识溢出效应、为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和多样化服务,从而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张贺等(2022)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能够产生MAR外部性与PROTER外部性,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能够产生JBABOS外部性,MAR外部性通过阻碍技术进步抑制经济效率提升而PROTER外部性和JBABOS外部性通过提升技术效率促进经济效率提升。余奕杉等(2021)实证检验发现不同规模和行政级别的城市适合不同行业层级和集聚模式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大规模和高级别城市更能够发挥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多样化集聚优势,而在小规模和低级的城市更能够发挥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专业化优势。

最后,部分学者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影响城市效率的作用渠道。李涛等(2022)认为市场环境、知识存量和工业生产率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城市效率提升的作用渠道。李体欣(2022)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改善资本错配和劳动错配的作用渠道促进了城市效率。张萃(2016)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提升城市生产率。

现有文献大多集中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效率的作用和影响方面,对于集聚影响城市效率的机制和区域异质性研究较少,本文的贡献在于,一是在相关文献和理论的基础上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效率的影响机制,将其作用渠道归纳为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生态建设;二是综合评价城市效率,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及GML指数测算城市效率,更好地衡量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三是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效率的直接影响效应、影响机制和区域异质性影响关系;四是对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出发,对如何更好地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效率的促进效益,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开拓动力源,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指在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注重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与传统粗放式经济增长相比,经济发展质量在经济结构方面更加侧重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强调要素资源在产业间的合理协调配置;在经济增长动能方面更加侧重于创新能力的提高,强调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能力的提升;在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更加侧重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强调改善环境污染、减少资源浪费;在经济增长成果方面更加侧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强调技术进步、资源配置和规模效率的综合反映,是经济体创新能力、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综合体现。结合相关文献和理论,本文重点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效率的影响机制,以及从经济结构优化、新动能培育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探讨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生态建设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城市效率的作用渠道。

(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产业结构与城市效率

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意味着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一方面有利于淘汰落后产能、推动技术改造、优化管理体系及提升产品质量;另一方面有利于实现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通过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和品牌创造等方式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和新业态,以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需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通过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升城市效率,进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通过以下几点来体现:一是专业化分工效应。作为在生产过程中提供中间投入的产业,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可以提升服务产品数量规模和种类的多样化程度,为相关生产部门提供一体化服务和保障,提升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使企业关注于自身的核心业务,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Markusen, 1989),进而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二是产业前后向关联效应。生产性服务业具有极强的产业关联性,其集聚发展可以强化上下游产业间的经济关联。一方面,能够迅速扩散和渗透上下游产业,加强不同生产环节的协调运转,降低信息不对称,全面提升生产部门的效率和质量(Humphrey, 2002),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另一方面,生产部门的成本节约和效率提升以及部门间的知识交流有利于实现产业间协作创新,打破原有的知识形态,实现突破性的技术创新并催生新业态的形成(余奕杉等, 2021),推动新兴产业发展。三是产业附加值提升效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加剧了行业内部的价格竞争和差异化竞争,通过种类多样、价格降低和质量提升的中间服务产品推动低技术含量行业向高技术含量行业转变,推动农业和制造业现代化建设(袁冬梅等, 2021),推动产业价值链提升,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因此,本文提出假说H1:产业结构升级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城市效率的作用渠道。

(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技术创新与城市效率

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先进的科学技术、雄厚的资本实力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等为代表的高端要素伴随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而集聚于城市。蕴含高端要素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来提升城市效率,进而实现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通过以下几点来体现:一是规模经济效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为帮助企业更好地实现标准化和

专业化生产,更好地应对市场变化和客户需求,提供高端要素的支持,将节约的资源用于生产技术的开发应用和产业链的提升。二是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生产性服务业基于自身知识密集型优势和较强的产业关联性,带动同类企业和上下游相关企业的集聚,推动产业内部和产业间的交流和学习,促进知识和技术的创新,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提升城市技术创新水平(曾庆均等,2019)。

因此,本文提出假说H2:技术创新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城市效率的作用渠道。

(三)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生态建设与城市效率

生态建设意味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是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可以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并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凭借高附加值特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通过推动生态建设提升城市效率、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通过以下几点来体现:一是优化资源配置效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有效加强城市的人才和信息资源的共享,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降低人才、资本和技术等资源的配置扭曲程度,降低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从而推动城市经济绿色发展。二是技术进步效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加剧了关联产业的竞争程度,区域内企业间的创新技术成果得以交流共享,改善生产方式,降低环境污染,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城市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水平。

因此,本文提出假说H3:生态建设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城市效率的作用渠道。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从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生态建设三条路径探索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提升机制。

三、研究设计

基于上述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进行相应的研究设计,为更好地验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提升相关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的客观性和可验证性,本部分将进行相应的研究设计,包括计量模型设计、变量选取、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说明。

(一)计量模型设计

本文的核心变量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Agg)和

城市效率(Hqp),为验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否促进了城市效率,采用面板双向固定模型,设定如下基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Hqp_{it} = \alpha_0 + \alpha_1 Agg_{it} + \alpha_c X_{it} + \mu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式(1)中, Hqp_{it} 为城市*i*在*t*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衡量了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Agg_{it} 为城市*i*在*t*时期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向量 X_{it} 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 μ_i 表示城市*i*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固定效应, δ_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ε_{it} 表示随机扰动项。

基于上文的理论分析,为进一步验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否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实现技术创新以及改善生态建设来促进城市效率,除了式(1)所体现的直接效应,进一步验证两者的间接影响效应。在式(1)中的系数 α_1 显著的前提下,分别构建设定 Agg_{it} 对中介变量 M_{it} 的线性回归方程以及 Agg_{it} 和 M_{it} 对 Hqp_{it} 的回归方程。

$$M_{it} = \beta_0 + \beta_1 Agg_{it} + \beta_c X_{it} + \mu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Hqp_{it} = \gamma_0 + \gamma_1 M_{it} + \gamma_2 Agg_{it} + \gamma_c X_{it} + \mu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二)变量选取与说明

基于上文模型的设计,对变量进行选取和说明。

1.被解释变量:城市效率

为满足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评价要求,解决投入和产出的松弛性问题和跨期可比较问题,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结合全局参比的GML指数,使用Max DEA7 Ultra软件测算中国城市效率指数。城市要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在进行城市效率测度时还应该考虑绿色发展问题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基于此,本部分在传统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方法基础上,在指标上综合考虑环境污染问题和民生福祉问题。城市效率的测度主要包括投入和产出两方面,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投入指标包括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其中,资本投入采用城市资本存量,以2002年为基期,利用永续盘存法估计,折旧率为9.6%,基期初始资本存量以基期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除以10%估算。产出部分包括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指标。期望产出包括城市实际GDP和居民生活水平。其中,城市实际GDP以2002年为基期,用城市所在省份的GDP指数测算得来的GDP平减指数,对城市名义GDP消除价格影响;居民生活水平包含备受人民关注的教育和医疗水平,分别以教育支出和医院床位数来衡量。非期望产出指

城市环境污染,以“三废”排放量进行衡量。

表1 城市效率指标体系

指标类型		评价指标	具体内容	单位	
投入指标		资本投入	资本存量	亿元	
		劳动投入	年末从业人员	万人	
产出指标		期望产出	GDP	城市实际GDP	亿元
			居民生活水平	教育支出	万元
				医院床位数	张
		非期望产出	环境污染	工业废水排放量	万吨
				工业烟粉尘排放量	吨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吨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2.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为更好地衡量生产性服务业在城市的集聚情况,结合《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选取批发、零售和贸易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六个行业,运用区位熵来计算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如公式(5)所示。其中, E_{is} 表示城市*i*生产性服务业*s*的从业人员, E_i 表示城市*i*的总就业人数。

$$Agg_i = \frac{(E_{is} / \sum_{i=1}^n E_{is})}{(E_i / \sum_{i=1}^n E_i)} \quad (5)$$

3. 中介变量

基于上文的理论分析,选取如下中介变量。(1)产业结构升级分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Iss*):采取城市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产业结构合理化(*Isr*):采取由三次产业间从业人员数和产值比例测度的泰尔指数,由于是负向指标,在回归时取反数处理。技术创新:采用基于《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2017》计算的城市层面创新指数。生态建设:以二氧化硫去除率、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运用熵值法算得。

4. 控制变量

选取如下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Eco*)用人均实际GDP表示;外商直接投资(*Fdi*)用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与GDP占比表示;城市人口密度(*Pop*)用每平方千米建成区面积的城市常住人口表示;金融发展水平(*Fin*)用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与GDP占比表示;政府干预度(*Gov*)用政府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占比表示。

(三)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实证分析以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

对象,所有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3—2021年)、EPS、国泰安和各省市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用线性插值法补充。同时,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城市数据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剔除了行政区划调整和缺失严重的毕节、铜仁、菏泽、三沙、吐鲁番、哈密、三沙、日喀则、昌都、林芝、山南、那曲、拉萨、海东等地区的数据。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基于上文的研究设计,结合实证回归结果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城市效率和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探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两者关系的直接效应、作用渠道和区域异质性,结果如下。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2汇报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效率的基准回归结果。第(1)列是不加入控制变量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效率的实证结果,初步验证了二者的积极关系。第(2)至(6)列在第(1)列的基础上依次加入前文提及的控制变量。控制变量方面,*Eco*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有利于城市效率的提升,能够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Fdi*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对外投资可能会使国内经济过度依赖外商投资,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不利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Pop*的估计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城市人口密度的提高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升。*Fin*的估计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城市效率的提升。*Gov*的估计系数为正但是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政府财政干预度对城市效率的提升作用有限,主要还是依靠市场看不见的手。

(二) 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

为了验证估计结果的可靠性,考虑可能出现的变量估计偏误、样本选择偏误和反向因果等稳健性和内生性问题,现替换被解释变量、剔除直辖市,采用2SLS工具变量模型估算。首先,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测算方法,用包容性TFP替换,非期望产出以城乡收入差距代替。表3第(1)列的估计结果显示*Agg*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其次,考虑直辖市的样本差异,剔除直辖市对模型进行估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i>Hqd</i>	<i>Hqd</i>	<i>Hqd</i>	<i>Hqd</i>	<i>Hqd</i>	<i>Hqd</i>
<i>Agg</i>	0.9224*** (0.0492)	0.4154*** (0.0407)	0.3991*** (0.0414)	0.3995*** (0.0413)	0.3983*** (0.0412)	0.3983*** (0.0413)
<i>Eco</i>		0.1388*** (0.0088)	0.1412*** (0.0090)	0.1409*** (0.0090)	0.1406*** (0.0090)	0.1406*** (0.0090)
<i>Fdi</i>			-0.2466*** (0.0482)	-0.2443*** (0.0474)	-0.2330*** (0.0462)	-0.2346*** (0.0461)
<i>Pop</i>				0.2685* (0.1387)	0.2642* (0.1375)	0.2581* (0.1356)
<i>Fin</i>					0.4787** (0.1901)	0.4673** (0.1917)
<i>Gov</i>						0.1082 (0.0669)
_cons	1.0331*** (0.0043)	-0.2733** (0.0848)	-0.2879** (0.0870)	-0.2905*** (0.0869)	-0.2977*** (0.0870)	-0.2999*** (0.0873)
<i>Year FE</i>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i>City FE</i>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i>N</i>	5358	5358	5229	5226	5226	5226
<i>Adj R²</i>	0.839	0.879	0.886	0.887	0.888	0.888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注:括号内为估计系数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

计。第(2)列的估计结果显示, *Agg* 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最后,采用2SLS工具变量模型估算,以城市地形起伏度和对应年份的乘积 *Z* 作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工具变量。一方面,城市地形起伏度越复杂,越不利于生产性服务业的集

聚;另一方面,其作为一个地理特征变量,并不会直接影响城市经济效率。第(3)列的结果显示 *Z* 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验证了地形起伏度与集聚水平负相关的猜想。第(4)列的结果显示 *Agg* 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因此,在进行稳健性验证和内生性考量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效率的促进效应这个结果依旧成立。

表3 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

	(1)	(2)	(3)	(4)
	包容性TFP 指数	<i>Hqd</i>	<i>Agg</i>	<i>Hqd</i>
<i>Agg</i>	0.1709*** (0.0244)	0.4062*** (0.0419)		0.1789*** (0.0331)
<i>Z</i>			-0.0028*** (0.0003)	
_cons	-0.5519*** (0.0423)	-0.2907*** (0.0868)	2.6397*** (0.4157)	-1.0633*** (0.0341)
Controls	是	是	是	是
<i>Year FE</i>	是	是	是	是
<i>City FE</i>	是	是	是	是
<i>N</i>	5226	5150	5226	5226
<i>Adj R²</i>	0.789	0.892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注:括号内为估计系数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

(三) 机制检验

从产业结构这条作用渠道来看,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显示出了不一样的估计结果。表4第(1)列的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效率的总效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第(2)列将产业结构高级化(*Iss*)作为被解释变量,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第(3)列在第(1)列的基础上将产业结构高级化纳入模型,考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否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来促进城市效率,结果显示 *Agg* 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但是减弱程度很小。综合第(1)、第(2)和第(3)列的结果说明产业结构高级化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城市效率的作用渠道,并且起到了部分中介

表4 产业结构升级

	(1)	(2)	(3)	(4)	(5)
	<i>Hqd</i>	<i>Iss</i>	<i>Hqd</i>	<i>Isr</i>	<i>Hqd</i>
<i>Agg</i>	0.3983*** (0.0413)	0.4244** (0.1704)	0.3739*** (0.0388)	0.3007*** (0.0440)	0.2424*** (0.0300)
<i>Iss</i>			0.0575*** (0.0050)		
<i>Isr</i>					0.5184*** (0.0268)
_cons	-0.2999*** (0.0873)	-1.9174*** (0.1795)	-0.1896** (0.0862)	-0.9532*** (0.0722)	0.1942** (0.0727)
Controls	是	是	是	是	是
Year FE	是	是	是	是	是
City FE	是	是	是	是	是
<i>N</i>	5226	5226	5226	5226	5226
<i>Adj R</i> ²	0.888	0.412	0.897	0.766	0.934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注:括号内为估计系数的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

效应,但是作用很微弱。

表4第(4)列将产业结构合理化(*Isr*)作为被解释变量,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第(5)列在第(1)列的基础上将产业结构合理化纳入模型,考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否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来提升城市效率,结果显示*Agg*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估计系数值相对第(1)列的系数有明显减少,*Isr*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综合第(1)、第(4)和第(5)列的结果,说明产业结构合理化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城市效率的作用渠道,并且起到正向的部分中介作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进而促进城市效率提升。究其原因,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前提,脱离合理化的高度化只能是一种“虚高度化”(孙学涛等,2018),当前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充分,第三产业整体TFP不高,并且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发展进程差距较大,产业结构高级化相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在两者之间的作用相对较弱。

由此,H1假说被验证,产业结构升级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城市效率的作用渠道,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都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城市效率的作用渠道。

从技术创新这条作用渠道来看,表5第(2)列将

技术创新(*Cre*)作为被解释变量,结果显示*Agg*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显著促进了城市技术创新水平。第(3)列在第(1)列的基础上加入中介变量*Cre*,结果显示*Agg*和*Cre*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都显著为正,并且*Agg*的估计系数有大幅的减弱。综合第(1)、第(2)和第(3)列的结果,说明技术创新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城市效率的作用渠道并且在两者间起到明显的正向中介作用。

表5 技术创新

	(1)	(2)	(3)
	<i>Hqd</i>	<i>Cre</i>	<i>Hqd</i>
<i>Agg</i>	0.3983*** (0.0413)	0.3581*** (0.0394)	0.0745*** (0.0164)
<i>Cre</i>			0.9042*** (0.0189)
_cons	-0.2999*** (0.0873)	-1.0188*** (0.0743)	0.6213*** (0.0376)
Controls	是	是	是
Year FE	是	是	是
City FE	是	是	是
<i>N</i>	5226	5226	5226
<i>Adj R</i> ²	0.888	0.860	0.973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注:括号内为估计系数的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

由此,H2假说被验证,技术创新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城市效率的作用渠道。

从生态建设这条作用渠道来看,表6第(2)列将生态建设(*Gre*)作为被解释变量,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生态建设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显著改善了城市生态环境。第(3)列在第(1)列的基础上将生态建设作为中介变量纳入模型,结果显示*Agg*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但是估计系数的下降幅度较小。说明生态建设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城市效率的作用渠道,并且表现为部分中介效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改善了生态环境进而提升城市效率,但是这渠道的作用相对较弱。可能的原因在于,生态建设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相对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对于城市效率的提升作用有限。

由此,H3假说被验证,生态建设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城市效率的作用渠道。

表6 生态建设

	(1)	(2)	(3)
	<i>Hqd</i>	<i>Gre</i>	<i>Hqd</i>
<i>Agg</i>	0.3983*** (0.0413)	0.1042*** (0.0305)	0.3778*** (0.0399)
<i>Gre</i>			0.1970*** (0.0297)
_cons	-0.2999*** (0.0873)	-0.3000*** (0.0478)	-0.2408** (0.0835)
Controls	是	是	是
Year FE	是	是	是
City FE	是	是	是
<i>N</i>	5226	5226	5226
Adj <i>R</i> ²	0.888	0.683	0.893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注:括号内为估计系数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

(四)区域异质性分析

考虑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进程、资源禀赋情况的差异性,根据中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四大板块构建相应的区域虚拟变量,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区域虚拟变量的交互项设立为核心解释变量,分析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效率影响的区域异质性。根据表7的回归结果,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的生产性

服务业集聚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但是大小不一样,说明在三个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均促进了城市效率提升,但是促进作用的大小不一。其中,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效率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中部地区,最后是东北地区。但是,在西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说明在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效率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首先,东部地区凭借优良的地理位置、政策优势和产业底蕴,其在人力储备、技术条件和基础设施等方面都领先于中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于当地产业结构退二进三、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其次,中部地区凭借中部崛起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国家对中部地区产业发展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支持,有效推动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效率提升作用的发挥;再次,东北地区作为国家重要的老工业基地,面临的经济转型升级压力较大,产业结构低端锁定问题严重,但是国家和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振兴政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显著促进了

表7 区域异质性

	(1)	(2)	(3)	(4)
	<i>Hqd</i>	<i>Hqd</i>	<i>Hqd</i>	<i>Hqd</i>
<i>c.east#c.</i> <i>Agg</i>	0.5195*** (0.0552)			
<i>c.mid#c.</i> <i>Agg</i>		0.3369*** (0.0603)		
<i>c.northeast#c.</i> <i>Agg</i>			0.2843*** (0.0809)	
<i>c.west#c.</i> <i>Agg</i>				-0.0221 (0.0839)
_cons	-0.4012*** (0.0850)	-0.4122*** (0.0879)	-0.4359*** (0.0879)	-0.4452*** (0.0845)
Controls	是	是	是	是
Year FE	是	是	是	是
City FE	是	是	是	是
Controls	是	是	是	是
<i>N</i>	5226	5226	5226	5226
Adj <i>R</i> ²	0.887	0.885	0.884	0.884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注:括号内为估计系数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

城市效率;最后,国家对于西部地区虽然也出台了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战略,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于其他地区,其人力素质和技术水平也相对落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效率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五、结论与建议

基于中国 282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面板双向固定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和具体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总体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效率起促进作用,推动了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且在考虑稳健性和内生性问题下依然成立。(2)从具体作用机制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通过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生态建设这三条路径来提升城市效率进而实现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且三者都起到正向的部分中介作用。(3)从区域异质性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从高到低依次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对西部地区促进作用不显著。

基于以上结论,为更好地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效率的促进作用,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有关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方面,研究结果显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都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城市效率推动城市经济的作用渠道,都起到了正向的中介作用,但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作用相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相对较弱。因此,高质量发展应以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为当前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合理发展中国生产性服务业。比起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更能够成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城市效率的作用渠道,城市产业发展应该避免盲目追求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发展,在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基础上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坚持市场导向原则,引导和支持企业进行合理的产业升级,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进而推动城市经济结构优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二,有关经济动能转变和技术创新方面,研究结果显示技术创新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城市效率和推动城市经济的作用渠道,并且技术创新在其中发挥作用很大。因此,创新促改革,应着力

解决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充分问题。为更好地实现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需求,生产性服务业应当基于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进程实行中低端向高端转变,实现与人才集聚的良好互动,通过深化教育与培训来提高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同时加强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合作。

第三,有关经济健康可持续和绿色发展方面,研究结果显示,生态建设是两者关系的作用渠道,但是发挥的作用很小。虽然生态建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没有技术创新大,但也发挥了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作用。应注重绿色发展,推动环保产业的发展,鼓励企业采取绿色生产方式,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通过政府、企业和公众共同努力来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共生。

第四,有关于异质性影响方面,研究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著性依次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但是在西部地区促进作用不显著。因此,应因地制宜制定产业调整政策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当基于本地的资源禀赋条件、人力资本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工业化进程等经济发展条件,合理安排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政策,使之能够充分释放发展红利。

参考文献

- [1]赵剑波,史丹,邓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11).
- [2]任保平.从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到经济高质量发展[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2(6).
- [3]曹聪丽,陈宪.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式、结构调整与城市经济增长: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J].管理评论,2019(1).
- [4]李勇辉,沈波澜,胡舜,等.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空间效应与城市技术创新:基于长江经济带 108 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地理,2021(11).
- [5]韩峰,阳立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如何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一个集聚经济与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的综合框架[J].管理世界,2020(2).
- [6]张治栋,黄钱利.产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和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J].当代经济管理,2021(2).
- [7]余奕杉,卫平,高兴民.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中国 283 个城市为例[J].当代经济管理,2021(4).

- [8]袁冬梅,李恒辉.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提高了中国城市经济效率吗?——基于产业层次和城市规模差异视角的检验[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
- [9]文丰安.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空间溢出与质量型经济增长:基于中国285个城市的实证研究[J].产业经济研究,2018(6).
- [10]GRUBEL H G, WALKER M. Service industry growth: Causes and effects[M]. Fraser institute, 1989.
- [11]WOOD P. Urban development and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Too many unanswered questions? [J]. Growth and change, 2006, 37(3): 335—361.
- [12]ASLESEN H W, ISAKSEN A. Knowledge 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and urba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J].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2007(3): 321—338.
- [13]张涛,司秋利,冯冬发.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空间溢出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J].求是学刊,2022(2).
- [14]张明斗,李维露,吴庆帮.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J].财经问题研究,2021(9).
- [15]李体欣,倪志兴,许瑞琦.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门槛效应[J].南方金融,2022(5).
- [16]韩增林,杨文毅,郭建科.供给侧视角下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8(2).
- [17]张贺,许宁.产业集聚专业化、多样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外部性视角[J].经济问题,2022(5).
- [18]张素庸,汪传旭,任阳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J].软科学,2019(11).
- [19]李涛,李国平,薛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J].科学学研究,2022(11).
- [20]张萃.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中国城市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基于城市等级体系视角的分析[J].城市问题,2016(6).
- [21]MARKUSEN J R. Trade in producer services and in other specialized intermediate inputs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9, 79(1): 85—95.
- [22]HUMPHREY J, SCHMITZ H. How does inser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ffect upgrading in in-dustrial clusters? [J]. Regional studies, 2002, 36(9): 1017—1027.
- [23]余奕杉,高兴民.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J].企业经济,2021(8).
- [24]曾庆均,王纯,张晴云.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区域创新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J].软科学,2019(1).
- [25]孙学涛,王振华,张广胜.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的结构红利及其空间溢出效应[J].经济评论,2018(3).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nomy

Huang Yangping Huang Wei

Abstract: As a key part of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producer service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ngine of the process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However, the currently research literature on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agglomeration of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ies on urban efficiency is lacking. This paper selects the panel data of 282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21, and effectively tests the influence effect and specific action mechanism of the agglomer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nom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On the whole, the agglomer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has promote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nomy, and it is still established despite considering the problems of robustness and endogene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ecific action mechanism, producer service agglomeration can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nomy through the three path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all of them play a positive intermediary ro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heterogeneity, the agglomer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can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northeast regions, but the role in promoting the western region is not significant.

Key Words: Agglomer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nomy; Urban Efficiency

(责任编辑:彦 伦)

【区域格局与产业发展】

我国服务消费新业态发展研究*

符加林 岳娜娜 黄晓红

摘要:新发展格局加速形成背景下,急需以新业态促进新消费,释放市场活力,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当前我国服务消费新业态呈现新趋势新特征,消费群体日益多元化,产业融合成为业态创新的重要驱动力,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渐成主导。但总体上看,服务消费新业态的高质量发展仍面临着消费能力分层明显、资源分配不均衡、供需结构适配度不高、市场有效供给不足等问题。未来,应以更好地满足用户服务消费需求为目标,顺应发展趋势,缩小地区间服务消费差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新消费扩容提质,建立健全监管体系,为新业态提供更加优渥的发展环境。

关键词:服务消费;新业态;新型消费

中图分类号:F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4)02—0078—09 **收稿日期:**2023—12—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货币政策对异质性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对策研究”(21CJL006);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河南培育发展服务消费新业态研究”(2023BJJ096);河南省软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政府声誉机制下公众政策遵从与突发公共事件治理效能研究”(222400410004);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重大项目“数字经济背景下河南培育发展新消费业态研究”(2023—YYZD—28)。

作者简介:符加林,男,郑州轻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郑州 450001)。

岳娜娜,女,郑州轻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生(郑州 450001)。

黄晓红,女,郑州轻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郑州 450001)。

随着居民消费不断升级,消费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持续增强,经济发展呈现出服务化的趋势。面对外部环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上升以及经济下行等困难与挑战,我国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2022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要求培育壮大新消费业态和模式,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2022年12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扩大国内需求,培育壮大新型消费,明确提出“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

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经济回归常态以来,国内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恢复态势良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前三季度我国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同比增长14.2%,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6.1%。从消费需求变化和国际经验来看,服务消费在我国具有巨大潜能,是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主要方向,是扩内需、稳增长的重要力量。发展服务消费新业态不仅是把握时代机遇、激发新消费需求、稳住经济发展基本盘的现实需要,也是促进产消双向升级、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动作为。

一、研究回顾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推动消费从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大，培育壮大新型消费”。根据国际经验及国内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趋势来看，服务消费在居民消费中的占比将持续保持上升趋势且增长速度较快，是拥有巨大潜能的消费。随着服务消费新业态对服务消费增长拉动作用的不断增强，学界对于服务消费新业态的研究也愈加丰富。总体来看，主要集中在服务消费及新业态的内涵、影响因素及制度创新等方面。

1. 服务消费的内涵与影响因素

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服务消费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持和拉动作用日益显著。学者们基于不同视角对服务消费进行了一系列探讨，其中，内涵与影响因素是两个重要的方面。

第一，服务消费的内涵。曹力群和庞丽华(2000)较早提出服务消费包括生活服务和文化服务等与生活消费有关的消费。耿莉萍(2006)认为服务消费是指能够满足人们健康、快乐等有助于提高精神生活质量的消费。江静(2014)将消费性服务支出总结和归纳为食品加工服务费、衣着加工服务费、居住服务、家庭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文化娱乐与教育服务与其他服务等。许永兵等(2014)则进一步将服务消费划分为狭义服务消费和广义服务消费，前者为生活性服务消费，广义服务消费则包括生产性服务消费和生活性服务消费。辛本禄和刘燕琪(2021)认为服务消费代表着消费结构升级方向，有助于优化产业结构、化解供需矛盾、提升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张颖熙和徐紫嫣(2021)基于新经济视角，总结了我国服务消费呈现的新特征和新趋势，主要表现为便捷化、品质化、个性化、社交化和价值化。

第二，服务消费的影响因素。沈向友(1999)通过构建旅游服务消费的实证模型，分析了服务质量、顾客满意度等对服务消费的影响。汪纯孝等(2001)提出，服务质量、消费价值和顾客满意度对顾客行为意向具有直接影响。韩小芸等(2004)进一步探讨了服务消费中顾客消费情感对满意度的影响。Roscoe Hightower等(2002)以体育赛事为

例，研究服务环境如何影响消费者的服务消费倾向。程大中(2010)认为提高服务效率和效果有利于增加服务产出和供给，提高教育和健康服务消费、增强预期收益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江静(2014)采用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城镇居民服务消费具有刚性特征，前期的服务消费支出和当期支出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个人可支配收入和价格指数对服务消费具有显著影响。钟粤俊等(2020)基于人口空间分布视角，研究发现人口密度对居民服务消费有正向影响。姚战琪(2022)对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有利于缩减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2. 服务业新业态

一般认为，业态是对产业具体经营形态的概括，其内容主要包括产品或服务、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等。国内新业态研究起步较晚，既有研究大多涉及新业态的内涵特征、相关制度创新以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随着信息产业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学者们相继对“互联网+金融”、微商、共享经济、新零售等新业态的发展路径进行探索分析。张磊和刘长庚(2017)认为，新业态发展主要集中在服务业领域或呈现出服务化的特点，服务业新业态本质上是一种供给创新，是指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而产生，运用新的技术或经营理念把服务业生产经营所涉及的多元化资源进行集聚整合，而衍生形成的产品或服务、经营方式和经营组织形式等的新形态。何苗等(2022)结合数字经济时代背景，将我国新业态产生机制概括为两点，分别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其类型主要包括产业融合创新型、产业分化发展型和产业网络化发展型。王君萍等(2022)认为服务业的业态创新特征主要包括一二产业服务化、专业化内生长、内部融合和集聚化等。赵鹞等(2022)通过构建内生经济模型，以金融科技为例，分析研究新业态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机制。林挺(2023)则从数字产业生产要素聚集程度、产业化规模和价值化水平三个方面测度了信息产业新业态对数字经济空间格局的影响。

3. 研究述评

综上，国内外学者已围绕服务消费和业态创新展开了一系列探讨。但基于我国情境的服务消费新业态发展趋势分析、未来发展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以及对策研究仍需进一步探索,尤其是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以供给创新促进服务消费新业态发展,是激发消费潜能、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首要之义。鉴于此,本文聚焦于服务消费新业态趋势特征,通过梳理我国服务消费新业态发展现状,分析其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阻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激发消费潜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益参考。

二、服务消费新业态重点领域分析

基于已有研究和现实考量,本文认为服务消费新业态是指服务消费行业在科技发展与社会需求变化的共同驱动下,通过运用新的技术和经营理念,打破传统边界并将资源进行重聚融合,从而衍生出的新经营方式、组织形式和产品与服务。为进一步分析服务消费新业态的内部结构与趋势特征,本文依据《生活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主要以家政、健康、养老、文旅和娱乐、零售、出行、住宿餐饮、教育培训等八类作为服务消费新业态的重点领域,对其表征形式与重要特征进行阐述。

1. 家政服务消费新业态

在城镇化进程加快、家庭结构小型化、人口老龄化以及生育政策支持共同驱动下,家政服务市场需求急剧增加,新业态与新模式层出不穷。从服务类型来看,新型家政服务主要包含技能型服务和管理型服务,如育婴师、收纳师、高级管家、财务经理等;从就业人员来看,家政服务新业态显现出年轻化与专业化趋势;从技术水平来看,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为家政服务行业带来新机遇。在智能家居设备的加持下,家政服务行业正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过渡,服务智能化、品质化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

2. 健康服务消费新业态

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居民健康保健意识持续上升。健康服务消费由生存型转向“生存+投资”型,消费者需求从传统的疾病治疗发展为疾病预防、治疗、健康养生等;消费群体日渐壮大且趋于年轻化;消费方式逐渐过渡为线上线下融合一体化。伴随着数字技术的革新与发展,产业融合创新趋势加快,健康服务行业规模日益扩大且呈现出多元

化、品质化特征,相继出现了健康旅游、健康养老、家庭保健、云健身、社区体育服务、心理服务等新业态。

3. 养老服务消费新业态

当前,我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快速加深、养老服务供需错位及高成本与低支付水平间矛盾等难题。养老服务行业的创新发展既是我国人口国情的根本需要,也是现实的迫切需求。得益于现代信息技术与行业创新水平的持续提升,养老行业与“互联网+”、医疗、保健、旅游、家政等领域日渐融合。医养结合、社区养老、居家养老、智慧养老、全域养老等新业态为老年人带来了更为多元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也为养老服务行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4. 文娱旅游服务消费新业态

面对消费市场日益细腻的体验化需求,文娱旅游行业融合速度加快,催生了大量以文化、旅游、场景、技术等为核心要素,以沉浸式、体验式和互动式为特征的文娱旅游服务消费新业态。以文旅业态为例,密室逃脱、剧本杀、自然探险类的探奇体验式旅游新业态备受消费者青睐;VR、AR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有效驱动文旅数字化与虚拟场景融合,形成了虚拟旅游、在线博物馆、数字文物藏品等新兴产品和服务;文旅夜游则打破固有模式,通过将景区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与全息投影技术结合,为消费者提供沉浸式的体验服务。此外,还有大量新业态发展态势良好,如以短视频、社交媒体和网络直播为代表的数字媒体产业,以AR眼镜、VR头显、VR一体机等产品为代表的虚拟现实产业,以及在线教育、网络文学等。

5. 零售服务消费新业态

作为服务消费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零售行业正经历着技术创新与业态结构调整的深刻变革。一方面,居民消费习惯与消费偏好发生变化,其需求不再只是生活必需品,更多的是在购物过程中的体验与享受。另一方面,网络零售业的成熟发展成为这场变革的鲜明特征,消费者有效数据成为企业间竞争的关键要素,网络零售与实体零售的关系由竞争转向引导。因此,线上线下一站式业态是零售服务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凸显极致的购物体验与现实消费则成为实体业态寻求发展的重要出路。随着服务体系的日益完善,无接触式配送、网络购

物、社区电商、智慧零售等业态快速发展,实体零售与餐饮、娱乐、文化等领域进行融合创新,打造出集休闲娱乐与便民服务于一体的新业态和“便利店+N”的组合模式,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便利的高品质服务。

6. 出行服务消费新业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互联网+”模式推动下,出行服务消费业态持续创新,相继出现了共享单车、共享汽车、拼车服务、车辆共享等。在有效催生大量就业岗位、带动相关领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通过利用大数据挖掘技术分析用户出行习惯与需求,极大地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效率,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7. 住宿餐饮服务消费新业态

作为传统服务行业的主力军,住宿和餐饮一直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住宿行业来看,市场需求日渐转向高品质化。中低端民宿、传统酒店、长期租赁等传统住宿服务市场资源流失,而拥有独特建筑风格和文化底蕴的中高端新民宿、基于第三方平台的共享住宿、在线短租、房车酒店等新业态则备受青睐。从餐饮服务行业来看,O2O餐饮服务新业态固化背景下消费需求日益多元化。部分用户展现出对绿色健康和信息可溯源餐饮服务的消费偏好;也有用户表现出对便捷快速的预制菜的青睐;而大部分年轻消费群体则热衷于网络种草;精致餐饮、猫咖、清吧、地摊餐饮等业态则凭借氛围感,更好地满足了消费者沉浸式体验需求。

8. 教育培训服务消费新业态

教育培训活动蕴含着社会发展需求,其业态创新主要是通过教育方式升级和整合优质教育资源,以提供高质量、个性化的教育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革新不断进步,人才需求日益多样化,教育培训行业衍生出大批新业态并呈现出个性化、职业化和数字化特征。首先,从消费群体来看。教育培训行业的服务人群扩散至不同年龄阶段与行业领域,出现职业教育培育、员工教育培训、家长学习等为主要内容的新兴业态。其次,从技术水平来看。“互联网+”促使社会形态发生革新,伴随着线上教育平台的快速崛起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应用,在线课程、VR/AR教育等新业态不仅为用户带来了互动性更高的课程服务,也为实现个性化、定制化教育

提供可能。最后,从其衍生业态来看。宏观经济发展对高水平人才需求增大,考研、考公以及考证人群急速扩增,公共资源供应不足导致需求向外扩散,租赁自习室、培训机构等服务业态快速发展。

三、服务消费新业态的趋势特征

服务消费新业态作为服务消费行业,通过运用新技术和新理念,突破传统边界与其他行业进行资源融合重聚形成的新营业形态,在消费群体、驱动力、主导趋势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特征。

1. 服务消费群体日益多元化

从代表性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中等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更强,是服务消费规模扩大和结构升级的主导力量。就我国消费市场而言,伴随着数字化消费3.0版本的快速增长,线上线下融合一体化程度加深,服务消费业态丰富度超越以往,消费主体多元化特征更为显著。其中,以95后、00后为代表的Z世代和新中产成为新型消费领域的核心消费力量,这些年轻人成长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年代,消费观念超前,偏爱于个性化、便捷化、高品质、智能化的服务消费;以小镇青年为代表的下沉市场消费群体闲暇时间充足,生活压力较小,是电影、手游、短视频等在线娱乐消费的主力军;以90后为代表的年轻父母更加注重家庭教育和生活质量,有效催生并带动了育幼服务、家政服务和亲子旅游等服务消费新业态。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占全国人口数量的19.8%,养老服务消费规模巨大。随着老年消费群体知识和物质水平的不断增高,健康医疗、老年旅游等业态发展态势良好。截至2022年12月,国内50岁及以上网民群体占比提升至30%,银发消费群体逐渐成为服务消费新业态的新生力量。

2. 产业融合成为业态创新的重要驱动力

服务消费新业态往往涉及多个领域的互动与协作,产业间融合创新、行业跨界融合已成为业态创新发展的重要趋势。总体来看,产业融合催生的服务消费新业态主要包括以下类型:其一,服务业内部融合。如文化、旅游、物流、养老等传统服务行业通过打破边界,不断推陈出新,融合产生文旅、康养旅游等服务新业态。其二,数字经济与服务消费

领域的融合新业态。服务业数字化驱动进程加快,餐饮外卖、生鲜电商、“前置仓+零售”、在线医疗、远程办公等新业态层出不穷,经济回归常态后,部分业态固化并成为常规业态。其三,产业间跨界融合。主要体现在一二产业服务化和服务生产化,产业边界日益模糊,产业价值链得以延伸。如旅游服务行业进行花果蔬菜种植,与农业跨界融合创新形成农业旅游业态。产业间的融合创新持续催生大量新业态,在有效拓展消费空间的同时,更好地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渐成主导

虽然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直接冲击,恩格尔系数出现小幅波动,但总体上看,居民消费由功能型转向享受型的趋势并未改变。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标准化服务,消费偏好倾向于个性化、定制化和体验化。例如,为了满足顾客情感化需求,以宠物为主题的咖啡店、线下剧本杀、美容健身场所等兴起。同时,受收入水平和消费观念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选择逐渐由“价格驱动”转向“价格与品质双向驱动”,模仿性消费锐减并呈现出理性化、可持续性、健康化等趋势特征。以共享经济为例,共享汽车、网约车、共享民宿等业态深入贯彻可持续性发展理念,基于互联网和数据平台将大量闲置、碎片化的资源进行整合与再配置,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资源使用成本,有效开拓了新的消费空间,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动能。

总的来说,服务消费新业态的趋势特征体现在数字化和智能化、跨界融合、个性化和定制化、可持续发展、情感和体验化、社交化和共享化等方面。以上特征与时代变化和消费需求变化吻合,为服务消费行业的未来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四、我国服务消费新业态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服务消费新业态突破了传统的行业边界,具有数字化、共享化、体验化等特征,是一种新的经营方式、组织形式和服务形态。然而,由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存在一定差距,资源分配还有待进一步规划,相关体制机制也不够完善,我国服务消费新业态的发展仍面临一些制约。

1.服务消费分层明显,资源分配不均

我国服务消费分层现象较为明显。其一,服务

消费呈现城乡“二元化”。从需求端来看,居民收入水平是服务消费扩容提质的重要保障。2016—202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3616元增长到49283元,增长46.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2363元增长到20133元,增长62.8%;虽然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明显快于城镇,但如图1所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服务性消费支出始终高于农村居民,城乡居民服务消费能力仍存在显著差距。从供给端来看,城乡服务消费供给同样存在分层现象。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及医疗保健支出作为代表性服务消费进行分析,可以发现,2016—2022年,城镇代表性服务消费支出始终明显高于农村,且农村代表性服务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更高;其中,城镇代表性服务消费支出占服务性消费总支出比重由74%下降到69%,农村代表性服务消费占比仅由90%下降至87%,两者差距不减反增(见图2),说明代表性服务消费并不是造成城乡服务消费差距的主要原因。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必然带来服务需求的爆发式增长,传统的代表性服务消费难以满足多元化需求,收入水平更高的城镇将会迎来更加多样化的服务消费供给;相反,即使农村市场呈现出新的需求特征,但受到收入增长乏力、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等因素制约,消费增长与消费结构优化升级进程也难免受阻,最终导致城乡服务消费供给呈现“二元化”结构。

其二,区域资源分配不均,服务消费水平参差不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不同时期通过投资倾斜、资源配置和生产布局等举措有效遏制了区域差距的扩大。然而,在发达城市对居住就业的持续吸引作用下,优质资源仍不可避免地流向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资源分配失衡问题始终存在。现如今,一、二线城市已步入高品质服务消费阶段,三、四线城市消费者大多偏向于品牌服务消费,五、六线及以下城市则止步于大众服务消费阶段。如图3所示,2022年我国分地区人均消费支出水平差距较为明显,以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广东等发达省(市)为代表的华北、华东及华南地区消费能力表现出明显优势,代表性服务消费支出也显著高于其他地区。

2.供需结构适配度不高,市场难以实现有效供给

我国服务供需适配度不高,主要表现为高端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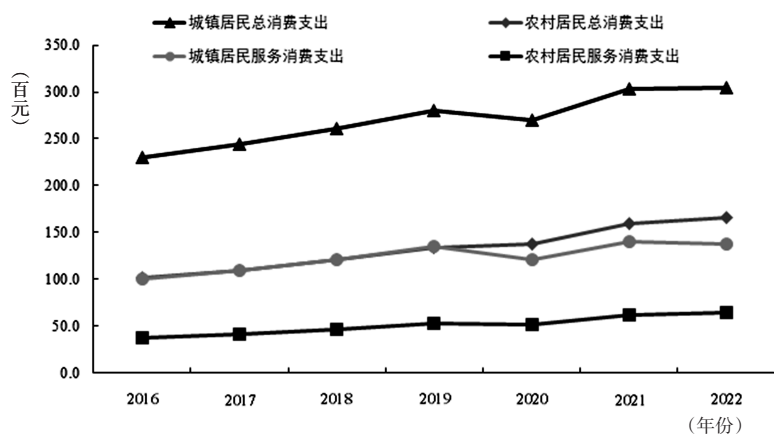


图1 2016—2022年城乡居民总消费支出与服务性消费支出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3》整理计算后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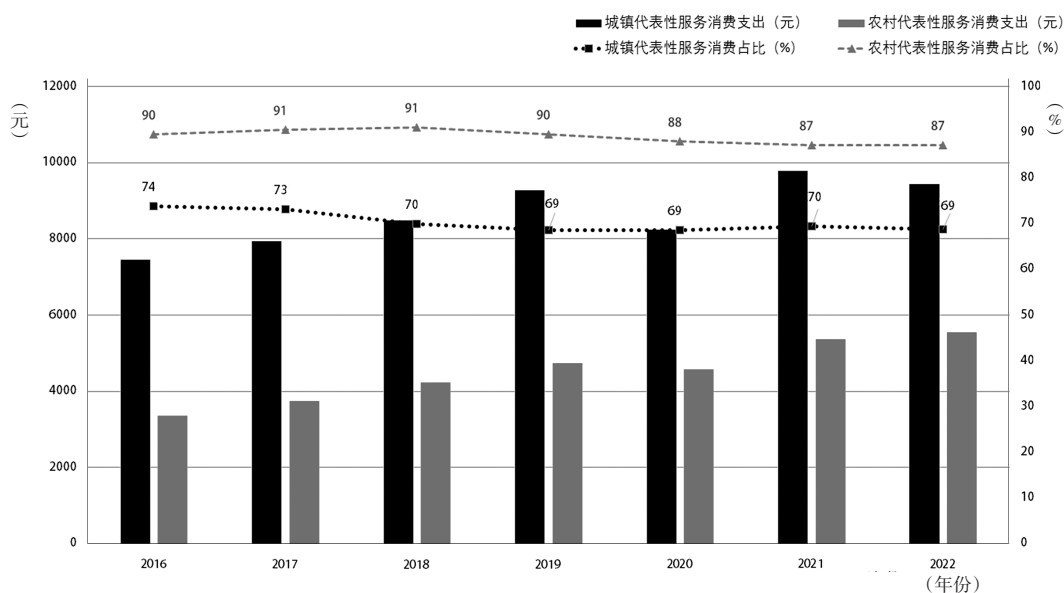


图2 2016—2022年城乡代表性服务消费支出及占比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3》整理计算后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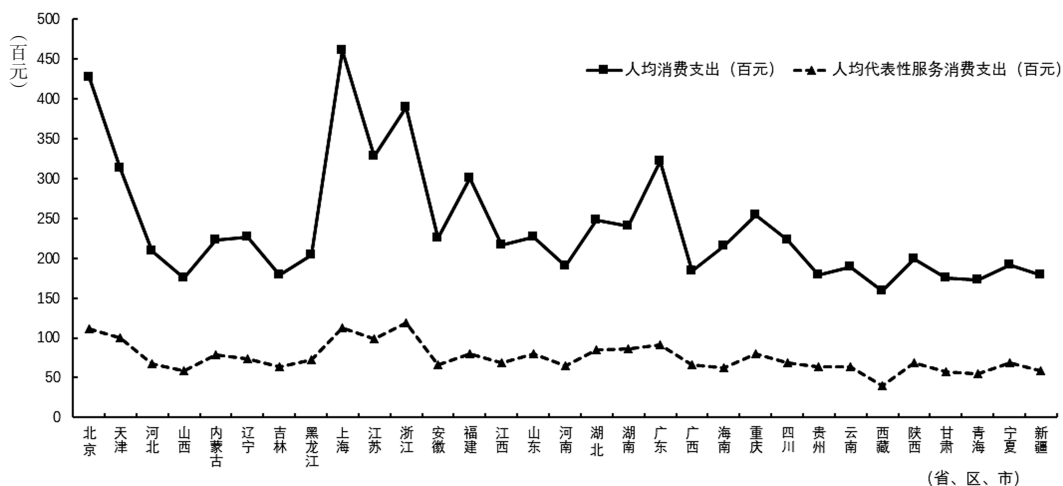


图3 2022年中国分地区人均消费及代表性服务消费支出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3》整理计算后绘制。

给不足和低端供给过剩。一方面,新兴产业规模偏小,总体信息化水平不高,数据共享平台建设仍有待完善。以农村电商为例,部分乡镇网站功能滞后,网站更新速度较慢,信息不对称现象明显;受制于技术与设备配套水平,供给端难以实现商品数据信息的全面记录与共享;“三山一滩”等偏远乡村地区在冷链物流和“最后一公里”配送等方面明显存在不足。此外,由于资源配置不均,部分地区家政、医疗卫生、健康等服务行业缺口较大,中高端服务供给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另一方面,产品与服务缺乏创新,传统服务业态供给过剩。以旅游行业为例,我国地域辽阔,拥有众多优质的旅游资源,但部分地区设计规划缺乏新意,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导致产品与服务存在粗放式和同质化发展倾向,难以形成品牌特色效应,既难以吸引来游客,也难以“留住”游客。

3. 法律监管体系不全,消费环境仍需优化

服务消费新业态的创新发展主要依托于平台经济与共享经济,随着数字技术与居民日常生活融合程度的不断加深,新业态与新模式蓬勃发展,并成为拉动服务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然而,伴随着数字技术在服务消费领域的广泛应用,数据安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也日益突出。造成以上局面的原因,一是法律监管体系不全。产业融合成为服务消费业态创新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新业态大多涉及住宿、出行、移动支付、居民公共服务等领域,边界日益模糊,需要更好地统筹各行业领域之间的关系,亟须加强法律监管体系建设,为居民服务消费权益保障提供权威的法律法规支撑。但目前来看,相较于新业态的更迭速度,法律法规建设进程相对滞后,行业准入标准与产品认证标准制定不够健全,监管职责定位不够明确。二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完善。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到10.79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6.4%。服务消费新业态大多由数字经济催生,在线消费、共享消费成为服务消费的重要趋势。以共享消费为例,共享经济已从最初的交通出行领域向其他领域拓展,如住宿、知识技能、二手交易等,网约车、在线预订等用户规模实现较快增长。但由于部分行业市场准入门槛较低、涉及领域较广、失信成本低、惩戒力度小,导致信息不透明、隐私泄露以及交易争议等责任纠纷现象突出。总体而言,服务消费新业态大多

建立于双方信任基础之上,涉及大量用户信息和交易数据,然而,多数新业态发展时间较短,在市场交易中缺乏完善的社会信用统计体系与评价体系。

五、促进我国服务消费新业态发展的措施

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促进服务消费新业态发展,激发具有潜能的消费是扩大国内有效需求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经济回升向好的必然要求。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和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要求,应积极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多措并举促进服务消费新业态发展。

1. 缩小服务消费层级差异,激发服务消费潜能

提升居民服务消费水平,缩小服务消费层级差异。一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增强服务消费能力。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是释放消费潜能的首要前提,要着力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健全就业创业机制,因地制宜提供就业指导服务,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主体。以乡村电商为例,品牌建设力度较弱、经营方式规范性不足是阻碍其发展的重要原因,对此,相关部门在提高农村劳动者职业能力的同时,应着重改善乡村就业条件,促进人才、技术等要素的双向流动,加强城乡经济交互融合。二是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收入分配机制。社会保障制度与居民消费密切相关,应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稳定居民预期,减少居民对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要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合理调整税收政策,适当发放财政补贴,以增强居民消费意愿。三是促进消费观念的转变。加大宣传力度,倡导绿色、环保、健康、安全的消费理念,提高居民教育和培训水平,加强其消费的风险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在增强居民消费信心的前提下,引导居民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提高居民消费意愿,推动服务消费发展。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激发服务消费潜能。一方面,要推动城乡融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合理增加对农村地区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均衡发展;优化公共服务配置,加大农村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投入;促进农村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农村特色产业和乡村旅游等,提升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加强城市边缘地区与农村地区的交通

联系,实现城乡空间的有机衔接,促进城乡经济交互和共同发展。另一方面,推进服务消费市场下沉,激发居民消费潜能。加大对农村地区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推动农村消费升级和产业转型升级,丰富农村服务供给,实现供需两端的协同发力,激发有潜能的消费。

2.提高供给质量,促进新消费提质扩容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着市场潜力巨大但有效需求不足的尴尬局面。要积极加强服务创新供给,以完善的产品体系促进消费扩容提质。首先,基于整体化视角,扎根区域特色文化和资源优势,加强顶层设计与规划,积极延伸新服务与新场景,打造特色品牌。其次,实现由粗制化向精准化服务的转变。新消费群体更加注重个性化与定制化服务,应大力普及服务消费业态的智能技术设备应用,加强数据收集与管理、平台建设等,从而加速实现服务消费新业态的动态化管理。最后,实现从被动化转向主动化。数字时代背景下,服务消费更加侧重于主动挖掘市场潜在需求,国内数字化整体水平仍有待提高,在加强培育和引进相关人才基础上,应充分运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针对不同群体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对其进行“用户画像”,并为之提供差异化的增值服务。

3.强化监管体系建设,优化新业态发展软环境

监管制度体系是市场主体发展壮大的重要前提,也是增强居民消费意愿的重要保障。推动服务消费新业态发展,需强化监管体系建设,优化服务消费环境。其一,加强服务消费领域的法律法规建设,明确服务消费主体的权益和责任,确保法律法规的适用性和针对性;建立具有针对性的监管机构和健全的监管机制,加强信息化建设,运用科技手段提升监管效率和监管质量;建立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建立高效的消费纠纷解决机制;加强相关部门间的协同合作,建立多部门联动的工作机制,共同推进监管工作的互通共享,形成监管合力,优化服务消费环境,保障消费者权益。其二,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完善信用评估与记录制度,落实相应的法律责任;完善信用信息采集和管理机制,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通过建立信用信息公示平台、信用查询机构等加大信用信息公开透明度;针对企业、个人、机构等主体,分别建立客观、科学、公正的信用评估机制;加强对个人

和企业的社会信用宣传教育,积极培养信用意识、普及法律法规知识,引导公民和企业自觉树立和维护良好信用,为服务消费新业态营造更加诚信友好的发展软环境。

参考文献

- [1]张伟,吴晶琦.数字文化产业新业态及发展趋势[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1).
- [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创造,2022(11).
- [3]新华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J].求贤,2023(12).
- [4]李勇坚.数字化推动服务消费:理论逻辑、实践方式与政策建议[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22).
- [5]毛中根.服务消费发展:现状、比较及建议[J].人民论坛,2023(18).
- [6]曹力群,庞丽华.改革以来农户生活消费的变动特征及近期的发展趋势[J].中国农村经济,2000(11).
- [7]耿莉萍.我国居民服务消费的特点和居民服务业发展问题研究[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 [8]江静.中国城镇居民消费性服务支出的影响因素分析[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
- [9]许永兵,王美杰,纪英洁.城镇居民服务消费问题的实证研究:以河北省为例[J].经济与管理,2014(4).
- [10]辛本禄,刘燕琪.服务价值网中二元创新对高质量服务供给的影响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21(7).
- [11]张颖熙,徐紫嫣.新经济下中国服务消费升级:特征与机制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21(6).
- [12]沈向友.旅行社服务质量与游客满意感影响因素分析[J].旅游学刊,1999(5).
- [13]汪纯孝,温碧燕,姜彩芬.服务质量、消费价值、旅客满意感与行为意向[J].南开管理评论,2001(6).
- [14]韩小芸,温碧燕,伍小奕.顾客消费情感对顾客满意感的影响[J].南开管理评论,2004(4).
- [15] HIGHTOWER R, BRADY M K, BAKER T L. Investigating the role of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in hedonic service consumption: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sporting events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02(9).
- [16]程大中.中国服务业与经济增长:一般均衡模型及其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2010(10).
- [17]钟粤俊,陆铭,奚锡灿.集聚与服务发展:基于人口空间分布的视角[J].管理世界,2020(11).
- [18]姚战琪.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
- [19]俞华.我国微商新业态发展现状、趋势与对策[J].中国流

- 通经济,2016(12).
- [20]史锦梅.新零售:零售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业态:基于需求满足论的视角[J].当代经济管理,2018(4).
- [21]何师元.“互联网+金融”新业态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关联度[J].改革,2015(7).
- [22]陈健,龚晓莺.共享经济发展的困境与突破[J].江西社会科学,2017(3).
- [23]张磊,刘长庚.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服务业新业态与消费升级[J].经济学家,2017(11).
- [24]何苗,任保平.数字经济时代我国新业态的形成机理与发展路径[J].经济体制改革,2022(5).
- [25]王君萍,刘莎,张艺婷.服务业业态创新与农村居民消费升级:驱动机理与实证检验[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2(6).
- [26]赵鹞,王艳芳.金融科技新业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J].金融论坛,2022(5).
- [27]林挺.培育信息产业新业态对数字经济空间格局的影响研究[J].当代财经,2023(5).
- [28]统计局.统计局关于印发《生活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的通知[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9(24).
- [29]黄文宾.我国体育服务消费转型升级的机遇、挑战与路径[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
- [30]王蕴.扩大内需战略下消费恢复和高质量增长的路径选择[J].区域经济评论,2023(3).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Formats of Service Consumption in China

Fu Jialin Yue Nana Huang Xiaohong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t is crucial to promote new consumption through innovative business formats, unleash market potential, and provide impetu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urrently, service consumption in China is exhibiting new trends and characteristics. Consumer group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diverse, industrial integration is driving innovation in business formats, and consumption patterns are shifting towards developmental and enjoyment-based experiences.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formats of service consumption still faces several challenges, including obvious stratification of consumption capacity, un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a mismatch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and inadequate effective supply in the market. In the future, our aim should be to better meet the service consumption needs of users, follow the development trend, narrow the differences in service consumption between regions, deepen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promote the expansion and quality of new consumption. We should establish a sound regulatory system and provide a more favorable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formats of business.

Key Words: Service Consumption; New Business Formats; New Type of Consumption

(责任编辑:柳 阳)

【城市经济研究】

中国全球城市的评价体系构建与实现路径研究*

张林 王钦 孙永权

摘要:全球城市作为中国综合国力提升的示范平台,也是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窗口,具有引领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提升国家综合影响力等重要作用。中国全球城市规模化扩张迅速,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但仍存在发展方式粗放、集约化程度不足、缺乏城市内涵特色等问题。与世界同类城市相比,发展质量仍存在一定差距,合理学习国外先进城市发展经验,能够为中国全球城市的建设与发展提供必要的参考。未来,应当遵循新发展理念,客观评价中国全球城市的发展实际,坚持以人为本,在科技创新引领,提升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权重,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全方位、多领域参与国际全球城市交流与合作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建设多维一体的国际化大都市,以期助力国家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全球城市;国际影响;综合评价;实现路径;城市等级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4)02—0087—13 **收稿日期:**2023-12-1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约束条件下旅客出行方式转换行为分析及模拟仿真”(20YJC790007)。

作者简介:张林,男,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研究员(西安 710007)。

王钦,男,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研究员(西安 710007)。

孙永权,男,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研究员(西安 710007)。

一、引言

城市作为社会进步与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显性标志。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加快发展,大量的全球城市不断涌现,为国际事务的交流与合作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提供了重要支撑平台。作为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国际学者普遍认为全球城市一方面是一个国家内部城市纵向发展演化的顶端,是全国城市网络体系的核心节点;另一方面也是国家与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事务的交流枢纽和管理中心,兼具国内核心竞争力和国际重大影响力的双重属性。例如,纽约、伦敦、东京等全球城市既是所在国家的综合枢纽节点,也是世界政

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新的地理中心”,为所在国家发展和国际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战略基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快速提升,取得了巨大成就,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具有显著的世界影响力,快速增长的人口、经济、交通等红利催生了大量的全球城市。全球城市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对外交流的主要窗口,不仅是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沿阵地,也是广大区域协调发展的引领、示范基地。目前,中国许多不同层级的中心城市明确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或全球城市,其中,2017年《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提出上海2050年全面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2019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提出深圳到21世纪中叶建成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越的全球标杆城市,2018年《西安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实施方案》提出建设活力足、体制新、带动强的国际化大都市。2022年10月,习近平主席向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致贺信,明确提出推动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对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有鉴于此,全球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必然成为中国参与全球化和实现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对中国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示范作用。

二、文献综述

当前,全球城市对国际事务和国家发展均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因此,全球城市的产生、发展及作用价值吸引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通过相关文献的分析,主要分为以下三类。

1.全球城市的内涵影响研究

全球城市是国际事务的支配和服务中心,准确把握全球城市的内涵及价值功能,有利于引领、带动广大辐射区域的发展。围绕这一主题,国内外很多学者提出了不同见解。例如,全球城市通过不断提升所在国家在全球化中的地位,把“地方”推向全球化竞争的舞台促使国际秩序尺度不断重构(Brenner, 2008)。全球城市处于全球经济发展水平的顶端,其发展取决于融入全球经济的性质和程度,以及城市通过金融和生产、生活服务、文化或技术中心所产生的影响(Forrest, et al., 2004)。唐子来等(2015)认为全球城市的产生与国家总体发展进程密切相关,受到国家体制改革进程的决定性影响。许鑫等(2017)发现中国全球城市构建的路径可归结为以制度环境重构为先导、以区位引力强化为动力、以空间正义维护为保障。苏宁等(2018)对全球城市吸引力、竞争力、创造力的构成、作用与相互关系进行分析,阐述了新趋势下全球城市的作用与变化方向。格雷格·克拉克(2018)明确提出全球城市的发展需要政府、企业来推动创新,通过创新提升城市的综合实力,更好地应对未来发展过程中的挑战。姜炎鹏等(2021)重点探讨了全球城市的起源与概念、成长机理与类型划分,认为全球城市是控制和影响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枢纽型城市。

2.全球城市的现状发展研究

全球城市的个性化发展轨迹是铸造国际核心

影响力的基本前提,部分学者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全球城市的发展实际开展多层次研究,旨在归纳出全球城市的发展脉络。杨辰等(2015)以巴黎为例,认为依托城市自身优势,在文化产业、科技创新和旅游业等方面制定了积极的发展战略,有利于强化巴黎在全球城市网络中的独特地位。庄少勤(2016)根据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进行创新探索,认为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是上海迈向卓越全球城市的必由之路。刘涛等(2017)依托国际大都市区空间发展规律,认为北京应当拓展都市区空间治理范围,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王兰等(2015)分析了纽约在多个全球城市发展重要维度的表现和趋势,认为通过多个层面的战略、规划和政策相互协作塑造了纽约世界城市的关键地位。崔翀等(2022)将全球城市进一步细化为全球海洋城市,以深圳为例,分析其海洋发展在世界格局和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中的角色和使命,提出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战略目标、功能定位、发展策略和实施保障。

3.全球城市的对比分析研究

随着全球城市的规模化发展与扩张,很多学者围绕多个全球城市进行比较分析,归纳可供其他城市借鉴的经验。周振华(2019)提出了由全球城市网络连通性指数、要素流量指数和成长性指数等构成的全球城市发展指数,全面测度多个全球城市的动态发展情况。唐承辉等(2022)以大湾区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指出全球城市的交流与合作是区域协同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吴晓琪(2023)梳理全球城市综合实力评价研究的最新发展趋势,针对13个全球城市的综合实力进行评价,认为评价体系的构建是指导中国全球城市弥合发展短板的必要措施。胡彬(2023)针对不同国度的多个全球城市的发展脉络进行对比研究,探讨全球城市与地方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概括总结出全球城市建设中文化创新的实现路径。康江江(2023)认为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是推动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经济发展的润滑剂,也进一步激化了国际间竞争,进而深刻影响了全球城市一区域的未来发展格局。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全球城市是指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处于战略中心节点,且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具有多重功能、汇聚丰富资源要素、发挥

核心影响力的关键性国际化大都市,作为全球网络体系核心节点,全球城市是统筹国家发展与全球治理的多维中枢平台。

目前,大量实证研究主要围绕单一或多个不同国度的全球城市进行对比分析及实证研究,或者基于全球城市内涵、发展轨迹开展相关理论研究,导致研究结果过于宏观或微观,指导意义不足,且现有文献研究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过于片面,难以体现时代发展需求;而在研究方法上,多数研究采用量化测算分析,缺乏回归检验论证,导致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的借鉴意义显著不足。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第一,研究对象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本文在全国范围内选取符合国际评价标准的35个不同层级的全球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涵盖中国不同地理区域,研究结果能够全面准确地阐明全国不同层级全球城市的发展脉络与现实状况,对中国广大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第二,指标体系与发展需求联系紧密。本文以城市基本内涵为起点,融入新发展理念,梳理出城市到全球城市的发展轨迹,归纳涉及全球城市发展的不同维度的资源要素,构建综合全面与现实发展需求相契合的综合评价体系,能够精准阐明全球城市的发展路径。第三,研究方法科学准确,符合实际。针对中国全球城市发展的关键性指标进行聚类分析,阐明全球城市的现实发展需求;在此基础上,测算中国全球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围绕多重研究维度,根据回归检验结果进行模型稳健性检验,梳理出国内外城市间的发展差距,进而总结中国全球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三、研究对象和研究数据的选取

本文借鉴相关研究成果,根据全球城市的当前特点与发展脉络,结合中国城市的现实发展,选取样本城市,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分析中国全球城市的演化机理。

1.研究对象和数据来源

本文根据全球最著名的城市评级机构 GaWC (全球化及世界城市研究网络)2020 年对全球城市进行的等级分类,考虑数据的可得性、连续性问题,从中选取 35 个中国代表性城市作为研究样本,相关城市均属于中国不同类型中心城市,2022 年中国全球城市仅占中国城市总量的 5.1%,但 GDP 总量占全国的比重超过 50%,辖区人口数量约占全国人口总量的 30%,且分布在中国不同的地理空间,体现了中国不同区域的综合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地域代表性和研究价值,结合全球城市的界定标准和样本城市的发展现状进行归纳(见表1);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 2012—2022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世界城市名册》《国际城市发展报告》《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年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及相关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其余个别缺失数据通过移动平均法和插值法补齐。

2.研究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根据全球城市的国际界定标准、特征要素以及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分析,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设定研究准则,基于样本城市的发展实际,围绕发展效率、国际影

表1 中国全球城市等级划分归纳表

城市等级	样本城市	定级依据
Alpha+	北京、上海	城市与全球经济高度融合
Alpha-	广州、深圳	城市与全球经济紧密关联
Beta+	成都	高度开放、全球创新发展突出
Beta	重庆、杭州、南京、天津	国际门户枢纽、国际知名度显著
Beta-	武汉、沈阳、西安、长沙、大连、济南、厦门、郑州	全球贸易重要节点、区域首位度稳定
Gamma+	青岛、苏州、昆明	区域性国际中心
Gamma	海口、合肥	国际化程度快速提升
Gamma-	福州、太原、哈尔滨	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和全球竞争力
High Sufficiency	宁波	具备全球城市基本特征、高度自给自足
Sufficiency	乌鲁木齐、贵阳、南宁、长春、兰州、石家庄、南昌、无锡、呼和浩特	具备全球城市部分特征、自给自足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GaWC《世界城市名册 2020》整理。

响、生态宜居、文娱卫体、科技创新等5个维度突出显示研究目标,进而构建全球城市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共整理出49个具体指标(见表2)。其中,协调主要体现为样本城市的发展均衡性,在体现城市发展现状的同时,综合反映了城市间的发展差异,多角度回答了城市发展存在的短板不足;绿色主要体现为生态保护和环境宜居,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健康宜居的生活是塑造城市良好形象的必要条件;开放是城市发挥外部影响力的重要窗口,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可以为城市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共享体现为城市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有效反映了城市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是以人为本核心价值观的体现;创新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利于城市不断取得新的竞争优势。

综上所述,本文结合现有研究成果,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国内全球城市发展模式高度趋同,但呈现分级差异态势,国际影响力逐级递减,其中,东部地区城市辐射外溢现象显著,国际化进程不断加速,引领全国对外开放,与之相比,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多数城市极化趋势广泛存在,资源要素高度集聚现象普遍,但对外开放水平不足,国际化进程明显滞后,严重制约城市综合发展。

假设2:当前中国全球城市规模化发展迅速,但粗放型发展方式仍普遍存在,依托人口、资源及其他生产要素等的投入促进发展现象显著,集约化程度不足,缺乏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与世界同类城市相比,仍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

3.中国全球城市的演化机理

城市是人类不断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具有固定区位的空间载体,其具体内涵表现为人口、土地、经济、生产、生活等多重资源活动共同作用的综合有机体,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与体现。全球城市的本质是全球化的主要活动空间呈现,是全球化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领域的交汇点。随着科技与通信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地理空间的限制,全世界空前的彼此连接。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推动了全球一体化,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资源配置,导致各国都出现一种集聚趋势——资本、信息、技术、劳动力等重要资源

表2 全球城市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准则层	目标层	具体指标
协调	发展效率	城市建成区占地面积,城市GDP,人均GDP,城市人口总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心城区人口数量,城镇登记失业率,城市道路密度,城市地铁线路数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地方财政收支比,金融业增加值,城市产业结构占比,城市固定资产投资
绿色	生态宜居	城市绿地面积,园林绿地密度,建成区绿地覆盖率,水资源总量,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率,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城市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开放	国际影响	进出口贸易总额,外国人入境人数,城市出境人数,外汇收入,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跨国企业数量,国际金融机构数量,使领馆、签证中心数量,举办国际展会数量,国际航线数量,国际机场全年货邮吞吐量
共享	文娱卫体	公共图书馆数量,博物馆数量,全年举办国际文化娱乐活动数量,国际医疗机构数量,万人拥有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卫生人员数量,演艺场馆、体育场馆数量
创新	科技创新	教育、科学技术支出占GDP比重,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高校和科研机构数量,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量,高校科技论文数量,万人发明专利授权数,高新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技术市场成交合同数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都向大城市汇集,一些大城市规模不断膨胀、功能日益增多,成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从而促进了全球城市的诞生。全球城市一方面是国内纵向城市网络体系的顶端,是全球横向城市网络体系的核心节点;另一方面也是国家及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事务的交流枢纽和管理中心。

全球城市作为新时代国际竞争的重要平台。其演化机理为: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跨国公司的大量涌现,国际劳动分工由垂直型分工向混合型分工转变,世界各国的经济形态发生了极大改变,城市及区域的发展模式由原来的中心—腹地转变为空间流动网络体系,城市发展的市场空间逐渐扩展至世界范围,处于世界城市网络核心与节点的中心城市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经济一体化为主导的一体化区域成为国家或地区参与全球合作与竞争的基本单元,如纽约、巴黎、新加坡等全球城市。特别是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城市体系的基本构成单元已不再是国家,而是越过了国家界限的全球城市,国家的权力重心逐渐下移至城市,国家之间的竞争直接体现为全球城市的竞争。

全球城市属于引领开放、融入全球网络的核心载体。全球化加速了世界城市网络重构,各国中心城市因其强大的影响力和资源配置能力成为全球城市网络中的关键节点。融入世界城市网络、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名城,是跨区域、具有全球视野、与相关国家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的重要平台,是汇聚丰富的资源要素、具有显著特色、文化底蕴浓厚、国际美誉度较高的城市,是依托其世界属性和独特魅力逐步演化形成承载国际使命的全球城市。

全球城市成为引领国家与世界高效发展的中坚力量,其社会价值在于:随着全球城市网络日渐成型,以及“互联网+”催生下“分享经济、平台经济、体验经济”等新经济的出现,世界人流、物流、信息流不断加速运转,国际城市之间的经济网络开始主宰全球经济命脉。全球城市处于全球城市体系的最顶层,是国家综合发展的核心、是经济社会活动的组织中枢和集聚扩散中心,在国际贸易、信息交流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建设与发展不仅关乎城市地位的巩固和提升、直接影响所在国家的发展,而且关系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全球城市已不限于经济、政治、文化等传统议题,生活娱乐、绿色生态、卫生康养等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社会功能成为全球城市形成与发展的必要元素,位列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领域。

中国全球城市是指在中国城市规模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汇聚了丰富的资源要素,并在国家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相互交织、耦合协同作用的影响下,逐步转化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功能特征的国际化城市。中国全球城市是中国不同类型城市的高级化发展形态,是城市内涵不断延伸发展、塑造产生的国际化中心节点,其演化形态是一个逐层递进、涵盖升级的过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区域中心城市是指在具备城市内涵功能的基础上快速发展,对所处区域乃至地理大区具有核心影响力,在国民经济社会活动中处于重要战略节点、综合主导多重功能、汇聚丰富资源要素,且在经济、科教、创新等领域具有一定程度国际影响力的特大型城市;国家中心城市是指国民经济活动和资源要素配置的中枢节点,完全涵盖区域中心城市的全部功能,具备引领、辐射和集散等国家职能,通过发挥辐射

带动效应,对所在区域乃至全国范围的综合发展发挥引领作用,且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能够有效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的超大型城市;全球城市作为中心城市的高级化发展阶段,是指完全涵盖和超越了国家中心城市的职能,在经贸、文教、科创、生态、康养、娱乐等领域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能够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有效引领、助力国际事务交流与合作的特大、超大型城市的复合集成系统,其演化机理见图1。

四、研究方法及其构建模型

本文根据中国全球城市发展效率评价指标的原始信息,采用改进的熵权法确定权重,避免在开展综合评价的过程中出现极值、负值或零值,有效对相关城市发展效率进行集聚水平测度。具体评价步骤如下:第一,原始数据标准化

$$x'_{ij} = \frac{U_{ij} - \min(U_{ij})}{\max(U_{ij}) - \min(U_{ij})} + A, U_{ij} \text{ 为评价指标原始值, } A$$

为坐标平移量,本文取 $A=1 \times 10^{-5}$;第二,计算 x'_{ij} 的 $p_j = \frac{x'_{ij}}{\sum_{i=1}^m x'_{ij}}$, m 为样本城市个数;第三,计算第 j 个指标的熵值 $e_j: e_j = -(\ln m)^{-1} \sum_{i=1}^m p_{ij} \cdot \ln p_{ij}$;第四,计算各指标权重 $w_j: w_j = \frac{1 - e_j}{k - \sum_{j=1}^k e_j}$, k 为指标个数;第五,计算样本城市

发展效率综合评分:

$$z_i = \sum_{j=1}^k x_{ij} \cdot w_j \quad (1)$$

其中, z_i 为第 i 个城市的发展效率综合评分, $\ln z_i$ 设定为核心解释变量。

借鉴袁晓玲等的研究方法,本文采用极值法处理原始数据,并且用极值法进行无量纲处理,可以使被测对象差异最大。用 $x_{ij}(t_k)$ 和 $x_{ij}^*(t_k)$ 分别表示样本城市 i 的第 j 个指标在 t_k 时刻的数值和标准化后的数值,如下为优势指标与滞后指标的极值法处理公式。

优势指标:

$$\{x_{ij}^*(t_k)\} = \frac{x_j^{\max} - x_{ij}(t_k)}{x_j^{\max} - x_j^{\min}} \quad (i=1,2,3,\dots,n; j=1,2,3,\dots,m) \quad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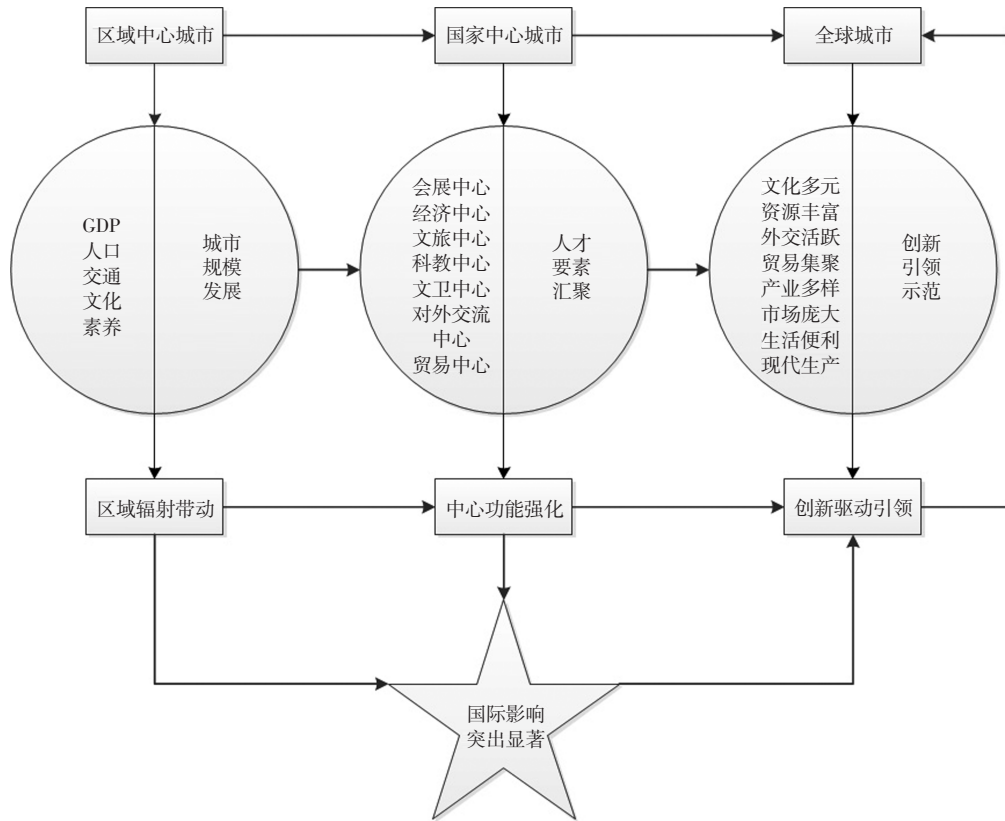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全球城市演化机理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滞后指标：

$$\{x_{ij}^*(t_k)\} = \frac{x_{ij}(t_k) - x_j^{\min}}{x_j^{\max} - x_j^{\min}} \quad (i=1,2,3,\dots,n; j=1,2,3,\dots,m) \quad (3)$$

其中， x_j^{\max} 为样本区间内所有城市第j个指标中的最大值， x_j^{\min} 为样本区间内所有城市第j个指标中的最小值。

构造实对称矩阵H和 H_k ：

$$H_k = A_k^T A_k \quad (k=1,2,\dots,N) \quad (4)$$

$$H = \sum_{k=1}^N H_k \quad (k=1,2,\dots,N) \quad (5)$$

式(4)中， $A_k = \begin{pmatrix} x_{11}(t_k) & \dots & x_{1m}(t_k) \\ x_{21}(t_k) & \dots & x_{2m}(t_k) \\ \vdots & & \vdots \\ x_{n1}(t_k) & \dots & x_{nm}(t_k) \end{pmatrix} \quad (k=1,2,\dots,N)$

测算城市发展质量 $udq_i(t_k)$ ：

$$udq_i(t_k) = 100 \sum_{j=1}^m \omega_j x_{ij}^*(t_k) \quad (k=1,2,\dots,N; i=1,2,\dots;n) \quad (6)$$

式(6)中，确定组合权向量 ω_j ， $udq_i(t_k)$ 为被测算城市i在 t_k 时期的发展质量。

五、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相关年份统计年鉴数据，构建研究模型，通过代表性指标聚类层次分析，实证研究中国全球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并对研究结果进行线性回归检验与空间异质性分析，为全球城市的建设与发展提供参考。

1.全球城市代表性指标聚类层次分析

本文选取样本城市的区划面积、GDP和人口数量作为代表性指标进行聚类层次分析。其中，区划面积可以直接反映城市的发展规模，因为规模化发展是衡量全球城市的重要指标；人口数量是城市发展的决定性要素，也是城市影响力的重要体现；GDP可以充分体现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突出显示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根据表3指标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全球城市的区划面积存在显著差异，一方面，北京、杭州等一线城市区划面积均超过15000平方千米，反映出城市规模化发展水平，与之相比，长春、哈尔滨等城市区划面积均超过20000平方千米，远大于传统一

线城市,但城市综合发展水平却呈现滞后状态;同时,上海、深圳等经济中心城市占地面积均未超过7000平方千米,但城市综合影响力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说明城市占地面积无法充分反映城市实际发展水平。此外,根据研究数据显示,样本城市的经济发展与城市人口数量密切相关,即城市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有力地支撑了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例如,传统一线城市深圳GDP超过30000亿元,城市人口总数已超过1700万人。近年来,新一线城市西安的人口数量迅速增长,强劲活跃的资源要素流动成功促使城市GDP突破万亿元大关。但是,中国东北地区及部分内陆城市人口流失严重,致使经济增长缓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的发展。

通过表3分析得出结论,当前,中国全球城市发展主要凭借强大的人口红利及其带动的经济增长,城市区划面积处于从属地位,只有在城市人口高速增长和经济快速发展推动下的规模化发展,才能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全球城市。但随着中国人口增长的放缓,经济发展由量转质,传统粗放型发展方式已不合时宜。以海口为例,作为中国最大经济特区的省会,近年来,凭借国家政策红利、优越的地理区位及区域首位度等优势,成功被列入全球城市名录,但与国际同类城市相比,尽管城市区划面积、人口数量及经济发展均存在规模优势,但人均GDP、每平方千米人口数量及城市土地综合利用率均存在一定差距,显示出城市综合发展水平有限,发展质量不高。

表3 全球城市代表性指标聚类分析表

区划面积(平方千米)	城市排名	GDP(亿元)	城市排名	人口数量(万人)	城市排名
第一类(区划面积>15000)	北京、杭州、长春、哈尔滨、重庆、呼和浩特、南宁、昆明	GDP>28000	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	人口数量>2000	北京、上海、重庆、成都
第二类(15000>区划面积>10000)	成都、天津、西安、福州、济南、青岛、兰州、合肥、乌鲁木齐、长沙、大连、沈阳、石家庄	28000>GDP>15000	成都、杭州、武汉、苏州、南京、天津、宁波	2000>人口数量>1200	广州、深圳、苏州、杭州、武汉、天津、郑州、西安
第三类(10000>区划面积>7000)	苏州、宁波、南昌、武汉、广州、贵阳、郑州	15000>GDP>10000	郑州、西安、青岛、济南、无锡、福州、长沙、合肥	1200>人口数量>800	南京、宁波、福州、济南、青岛、石家庄、沈阳、长春、哈尔滨、长沙、南宁、昆明
第四类(7000>区划面积>5000)	上海、南京、太原	10000>GDP>5000	厦门、石家庄、昆明、长春、哈尔滨、大连、沈阳、南昌、南宁、太原	800>人口数量>500	无锡、厦门、大连、贵阳、合肥、太原、南昌
第四类(5000>区划面积)	无锡、厦门、海口、深圳	5000>GDP	贵阳、兰州、呼和浩特、乌鲁木齐、海口	500>人口数量	兰州、呼和浩特、乌鲁木齐、海口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2. 样本城市综合发展水平测算

本文运用公式(6),测算2012—2021年中国35个全球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计算结果见表4。

根据表4测算结果显示,尽管中国全球城市总体发展水平稳定提升,但城市间发展趋势存在显著差别。在研究期内,综合发展水平较高的国际一线城市,其发展历程呈现波浪式前进,规模化扩张,辐射效应突出,但在外部国际环境严峻的影响下,城市发展会出现暂时小幅倒退。与之相比,国际三线城市及自足城市对外开放幅度不足,国际环境影响有限,城市发展水平逐步改善,但发展质量仍有较大改善空间,呈现高度极化态势。根据测算结果可将35个全球城市分为四个梯队:第一梯队为中国传统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研究期内,上述

城市得益于基础设施的日趋完善、产业结构的逐渐优化、科创水平显著提升等发展优势,在新发展理念多项指标中位居全国前列,但随着城市人口激增及承载压力过大,为绿色宜居、公平协调等城市责任提出了严峻挑战。第二梯队为成都、杭州、南京、武汉、天津、重庆、西安等新一线城市,这些城市追赶效应显著,城市规模化发展迅速,对外开放水平持续提升,但受传统区域布局影响,资源共享理念实现不足,绿色、创新发展有待深化,城市间发展水平存在一定不足。第三梯队主要包括福州、苏州、厦门、济南、青岛、宁波、大连等区域中心城市,这些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城市规模显著提升,但资源要素集聚有限,尽管在一定领域内影响巨大,但城市综合发展水平仍处于高度极化趋势,国内引领作用

表4 2012—2021年中国35个全球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测算结果

城市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北京	0.782	0.785	0.787	0.791	0.786	0.793	0.785	0.787	0.791	0.794
上海	0.772	0.786	0.785	0.796	0.803	0.806	0.798	0.795	0.817	0.802
广州	0.652	0.661	0.675	0.681	0.679	0.673	0.685	0.709	0.725	0.722
深圳	0.645	0.652	0.658	0.663	0.669	0.672	0.665	0.662	0.671	0.673
重庆	0.525	0.531	0.535	0.542	0.549	0.553	0.587	0.582	0.576	0.572
武汉	0.516	0.529	0.533	0.535	0.531	0.549	0.563	0.585	0.592	0.586
南京	0.503	0.506	0.512	0.509	0.518	0.526	0.531	0.529	0.533	0.535
天津	0.493	0.502	0.507	0.503	0.515	0.528	0.531	0.528	0.525	0.527
成都	0.578	0.581	0.585	0.589	0.586	0.582	0.591	0.587	0.585	0.589
杭州	0.519	0.523	0.515	0.530	0.539	0.536	0.542	0.551	0.547	0.545
西安	0.485	0.482	0.479	0.475	0.481	0.483	0.492	0.479	0.476	0.458
长沙	0.441	0.436	0.429	0.425	0.436	0.451	0.459	0.465	0.471	0.473
苏州	0.427	0.425	0.427	0.429	0.445	0.453	0.457	0.461	0.465	0.463
厦门	0.387	0.389	0.392	0.396	0.402	0.409	0.405	0.412	0.406	0.405
大连	0.378	0.384	0.389	0.382	0.375	0.386	0.395	0.392	0.396	0.398
青岛	0.398	0.403	0.407	0.411	0.415	0.418	0.421	0.425	0.428	0.431
郑州	0.412	0.415	0.421	0.427	0.436	0.442	0.439	0.436	0.432	0.417
济南	0.409	0.411	0.415	0.428	0.425	0.431	0.426	0.429	0.421	0.415
福州	0.409	0.412	0.410	0.415	0.417	0.423	0.435	0.431	0.423	0.419
宁波	0.405	0.423	0.429	0.431	0.435	0.439	0.442	0.436	0.419	0.412
沈阳	0.364	0.369	0.372	0.376	0.379	0.389	0.386	0.382	0.392	0.397
无锡	0.343	0.346	0.349	0.354	0.358	0.362	0.367	0.371	0.375	0.379
海口	0.339	0.342	0.345	0.349	0.351	0.355	0.358	0.361	0.364	0.367
合肥	0.362	0.367	0.373	0.371	0.375	0.381	0.385	0.383	0.386	0.391
长春	0.359	0.362	0.367	0.371	0.373	0.375	0.379	0.376	0.381	0.385
昆明	0.356	0.359	0.362	0.366	0.372	0.376	0.381	0.385	0.389	0.389
哈尔滨	0.353	0.355	0.358	0.361	0.364	0.367	0.370	0.374	0.379	0.382
石家庄	0.351	0.357	0.361	0.365	0.369	0.373	0.376	0.381	0.385	0.387
南宁	0.349	0.353	0.356	0.361	0.365	0.371	0.374	0.379	0.382	0.385
南昌	0.345	0.348	0.351	0.354	0.357	0.361	0.365	0.369	0.372	0.375
太原	0.336	0.339	0.336	0.342	0.345	0.351	0.349	0.342	0.346	0.351
贵阳	0.342	0.344	0.349	0.351	0.356	0.359	0.363	0.367	0.370	0.373
兰州	0.328	0.331	0.335	0.339	0.342	0.349	0.345	0.339	0.342	0.345
乌鲁木齐	0.319	0.323	0.326	0.329	0.331	0.335	0.339	0.342	0.346	0.349
呼和浩特	0.311	0.313	0.316	0.318	0.321	0.324	0.328	0.332	0.335	0.338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不足,国际影响力有限。第四梯队为沈阳、长春、海口、南宁、贵阳、太原、兰州、乌鲁木齐等传统省会城市,上述城市尽管部分指标改善显著,存在一定发展优势,但受人口流失严重、经济发展滞后、基础设施薄弱、对外开放不足等因素影响,城市综合发展水平仍有待改善。

3.样本城市线性回归检验

本文运用软件Stata15.1 /SE完成回归检验结果(见表5)。设定准则层代表研究维度与目标层代表

研究指标,针对模型中变量存在量纲差异,采用双对数模型,消除其影响以及可能存在的异方差。

根据表5回归检验结果显示,中国全球城市的形成过程中普遍致力于促进经济发展、提升开放幅度及科技创新能力,因此,协调、开放和创新成为推动全球城市建设的主导要素;绿色和共享作为全球城市建设成果的重要象征,属于衡量城市发展水平的次生要素,其显著的滞后性导致在全球城市发展过程中关注较少。当前,中国全球城市随着能级不

表5 全球城市研究准则与研究目标回归检验结果

变量	Res (协调)	Res (绿色)	Res (开放)	Res (共享)	Res (创新)
lnDEC	0.2395*** (0.006)	0.2672*** (0.007)	0.0539*** (0.007)	0.0472*** (0.006)	0.0516*** (0.007)
lnELD		-0.0782*** (0.015)	-0.1259*** (0.012)	-0.0576*** (0.012)	-0.0551*** (0.012)
lnINF			0.1527*** (0.015)	0.1639*** (0.125)	0.1512*** (0.019)
lnEHS				-0.0028 (0.007)	-0.0035*** (0.007)
lnNTD					0.0057 (0.005)
Constant	0.3529*** (302.453)	0.3612*** (262.197)	0.1751*** (285.071)	0.1896*** (109.215)	0.3758*** (96.216)
OBS	370	370	370	370	370
R ²	0.5239	0.5765	0.6582	0.6729	0.6793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注:***、**和*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回归括号中为*t*值。

同,国际影响力呈现逐级递减趋势。在协调维度,对应的目标层为发展效率,主要体现为经济发展。在研究期间,得益于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样本城市的GDP均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日趋完善与规模化扩张创造了有利条件。在绿色维度,对应的目标层为生态宜居,主要体现为生态环保。在中国多数城市的快速发展历程中,往往忽视了绿色生态、环保宜居的城市功能,导致城市污染严重、环境恶化,以牺牲环境谋求发展的模式屡见不鲜,随着新发展理念深入普及,环保宜居将成为城市提升国际影响力、谋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在开放维度,主要体现为城市的国际影响。随着中国对外开放范围与幅度的不断扩大,学习外国城市发展的成功经验,扩大国际交流与影响,已成为全球城市的重要象征,但中国城市间外部交流与合作水平差距极大,以大连与青岛为例,2021年,大连实际利用外资为16.8亿美元,青岛为61.7亿美元,尽管两者同为中国东部地区城市和世界三类城市,但外部影响力差距较大。共享作为中国以人为本理念的重要表现,主要聚焦于文化、卫生、娱乐、体育等城市生活方面,是衡量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目前,中国全球城市围绕共享维度呈现两极分化态势,传统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超前领先,其他城市则综合表现不佳,市民满意度与幸福感偏低。创新作为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外部吸引力的重要推手,高度集聚于中国传统

一线城市及少数东部地区城市,而中西部地区城市主要投入在协调、共享维度,对外开放幅度有限,人才、科技等创新发展要素流失严重,导致科技创新水平严重滞后,城市高质量发展受限明显。

根据表4、表5的测算结果,国内全球城市发展模式高度趋同,但呈现分级差异态势,国际影响力逐级递减,其中,东部地区城市辐射外溢现象显著,国际化进程不断加速,提升了全国对外开放水平,与之相比,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多数城市极化趋势广泛存在,资源要素高度集聚现象普遍,但对外开放水平不足,国际化进程明显滞后,严重制约城市综合发展。综上所述,假设1成立。

4.全球城市空间异质性分析

本文基于新发展理念对中国全球城市的影响效应,考虑样本城市与国外城市存在较大差异,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式(7))进行空间异质性分析。

$$\begin{aligned} \ln tfe_{it} = & A + pW \ln gdp_{it} + \beta_1 ehb_{it} + \beta_2 otd_{it} + \beta_3 cwl_{it} + \\ & \beta_4 std_{it} + \theta_1 Wehb_{it} + \theta_2 Wotd_{it} + \theta_3 wcwl_{it} + \\ & \theta_4 std_{it} + \varepsilon_{it} \end{aligned} \quad (7)$$

式(7)中, $\ln tfe_{it}$ 表示城市国际影响力,为被解释变量, $\ln gdp_{it}$ 表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为核心解释变量, ehb 、 otd 、 cwl 、 std 分别表示生态宜居环境、对外开放层级、生活福利条件、科技创新水平, p 为空间滞后回归系数, β 为自变量回归系数, θ 为空间误差项回归系数, W 为空间权重矩阵,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

根据表6基于新发展理念对多国全球城市国际

表6 各国全球城市国际影响力的多维度比较

维度/国家	美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日本	中国	印度	巴西
协调	0.079	0.057	0.062	0.075	0.072	0.055	0.042	0.049
绿色	0.058	0.072	0.063	0.052	0.045	0.039	0.031	0.042
开放	0.075	0.081	0.077	0.089	0.063	0.056	0.058	0.061
共享	0.062	0.067	0.059	0.072	0.069	0.052	0.036	0.042
创新	0.095	0.066	0.078	0.074	0.081	0.069	0.049	0.057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影响力的多维度比较,通过将样本城市与其他国家全球城市对比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全球城市在协调、绿色维度方面大幅落后于欧美同类城市,略高于发展中国家同类城市。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发展水平是全球城市形成的基础,也是城市综合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关键象征,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随着国际环境与中国基本国情的改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日趋尖锐,经济发展红利更加注重的是城市的规模化扩张,对于综合发展质量关注较少,从而导致城市辖区发展水平迥异,发展均衡严重受限。在绿色维度方面,作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国全球城市滞后原因一方面在于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差异;另一方面,由于多年来重视经济、忽视环保,造成生态环境破坏,为全球城市的形成与发展造成掣肘。同时,在开放、共享及创新维度方面,中国全球城市与欧美全球城市差距较小,这主要归功于中国持续多年的对外开放,随着开放水平与开放领域的不断扩大,经济要素的合理流动,显著缩短了城市间发展差距。此外,随着以人为本理念的不断深入,中国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改善,共建共享已成为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在创新维度方面,得益于科教兴国战略的大力实施,中国科创水平持续提升,全球城市作为国家的科创核心节点,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溢出效应明显,加速推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过渡,助力中国全球城市的国际影响力提升。因此,与世界同类城市相比,除深圳外,中国多数全球城市发展水平均显著落后于欧美同类城市,仍与发展中国家同类城市发展水平相当,这说明当前中国全球城市发展仍依托于基础要素大幅投入和庞大的人口红利,粗放型发展方式显著,集约化发展程度不足,直接导致城市规模盲目扩张、资源要素空置浪费、产业结构优化不足等劣势突出,综合发展水平显著落后于欧美同类城市。研究结果显示,假设2成立。

六、实现路径

本文根据 GaWC 对全球城市进行的等级分类,选取其中的中国全球城市作为样本城市,并融入新发展理念,构建全球城市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运用聚类分析法、线性回归分析、空间异质性分析等研究方法,分析中国全球城市的发展现状、国际影响及不足。结合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如下实现路径。

第一,对标对表国际全球城市标准,全方位追赶和超越国际先进城市。以国家建立健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契机,在客观评价中国全球城市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先进城市发展经验,适时将全球城市规划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中,制定城市中长期发展规划,明确城市提能升级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作为发展目标,聚焦外资、外贸等重点领域,促进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结合地理区位优势和国家优惠扶持政策,凝聚内生发展动力,重点依托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等高能级对外交流平台,借助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欧盟中国商会、美国中国总商会等渠道,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汇聚,完善配套政策措施,进一步优化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提升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权重,全方位、多领域参与国际全球城市竞争与合作,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新型研发机构、知名科学家团队入驻,积极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合理优化产业结构,推动落地城区服务业—郊区工业—周边农业的现代城市产业发展理念,合理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努力提升城市经济稳定增长。着力做好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这

篇大文章,全面加大城市外部形象宣传力度,让“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奔赴,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更加顺畅,助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力争最大限度地追赶和超越国外先进城市。

第二,遵循新发展理念,推进全球城市综合发展。首先,根据中国全球城市的不同等级,结合样本城市发展实际,精准评估城市发展特色和优势条件,摒弃大小俱全的错误发展思路,避免浪费资源要素。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交通设施,打造综合立体交通运输体系,加快推进国际航线的开通与运营,争取外国使领馆进驻,提升全球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其次,科学评估城市的承载能力,确保属地人口与城市规模相协调,避免辖区人口过度增减对城市发展带来剧烈冲击。充分利用区域金融资源的高度集聚优势,提升经济韧性,增强城市抵御风险、调整恢复及创新发展的能力,稳定城市经济健康有序增长,进而保障城市财政收入及合理支出。坚持商贸、旅游等对外交流重点领域,运用现代科技推动相关产业优化升级,提升涉外服务水平。再次,走集约化发展道路,强化共享理念,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行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促进城市发展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以提升人民生活福祉作为最高目标,积极改善城市生存环境。人均居住及绿地面积、公园面积的增加,环保车辆的推广与应用,迅速降低了污染气体的排放总量,有效提高了城市的宜居水平。挖掘空间新资源以土地利用方式创新转型,探索城市资源节约型可持续发展途径。打造国际重要的贸易、交通和金融中心,发挥枢纽功能价值。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坚持内外双循环模式,强力促进城市对外贸易水平提升,持续扩大全球城市的国际影响力,加强区域间交流与合作彰显国家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价值。最后,立足中国当前的基本矛盾,聚焦文娱卫体领域,以提升市民游客的满意感和便捷度为主旨,在弘扬城市文化特色的同时,积极开展国际间文化交流,重点解决娱乐少、就医难、服务差等问题,提升城市凝聚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提升城市生活生产服务水平,扩大城市国际吸引力,塑造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创新等多维一体的国际化大都市。

第三,聚焦创新价值,强化政府引导,提升全球城市的国际影响力。在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时代,创

新已成为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根本动力,未来全球城市的控制力和影响力的提高仍需以创新作为主导力量。中国全球城市间应突破传统地域界限,立足城市间发展差异,积极开展广域交流与合作,吸取成功发展经验,摒弃传统的规模化发展模式,借鉴国外发达城市的集约化发展经验,缩短城市间发展差距,推动城市创新,谋求高质量发展。同时,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将全球城市的塑造提升为国家战略,以打造成为全球城市的网络节点、重要枢纽为发展目标,以高精尖人才、现代科技创新为动力源,强化全球城市对国际资源的协调和控制能力,从而提升全球城市的繁荣度、链通度和协调度,有效提升其发展水平。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创新引领,未来全球城市建设主要围绕创新要素集聚与整合开发建设两个层面展开,人才、科技等创新要素是全球城市建设的核心要素,牵引资源、信息、金融、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配套服务,为全球城市建设提供动力支撑。大力推动产教融合、产学研一体化进程,充分发挥国际人才价值。聚焦现代科技功能,打造城市创新活力优势平台,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提升城市创新能力,打造创新竞争优势。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积极构建开放创新生态,以全球视野谋划创新,积极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提升中国全球城市的国际影响力,打造储能增长极,进而提升中国整体发展水平。

七、研究结论

本文根据全球城市建设理念,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选取中国35个具有代表性且经GaWC认定的样本城市2012—2021年的面板数据,运用聚类分析法、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多维度比较检验等研究方法进行实证分析,主要研究结果对中国全球城市建设、引领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遵循新发展理念成为塑造中国全球城市的必由之路

全球城市的塑造与建设是一个跨学科热点问题,以往研究中多聚焦于城市规模化发展,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演变,传统的城市规模化扩张已逐步转变为高质量综合发展。中国全球城市的塑造和

形成过程中普遍致力于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物本逻辑,但随着中国基本国情的改变,要求作为国家重要增长极的中心城市要继续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并着力从以往单纯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因此,协调、开放和创新成为推动全球城市建设的关键维度。绿色和共享作为全球城市建设成果的重要象征,属于衡量城市发展水平的突出体现,新发展理念成为中国全球城市形成与发展的基本内涵。

2.中国全球城市的差异化分布格局显著突出

由于对外开放、地理区位、经济水平等发展条件迥异,中国全球城市呈现分级差异态势,国际影响力逐级递减,尽管中国全球城市发展质量总体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得益于新发展理念的共性遵循,但城市间存在个性层面的独特问题导致持续提升乏力,这主要是由创新质量增速急剧放缓、协调质量增速始终有限导致的;同时,城市发展质量呈现明显的“东强西弱”空间分布格局,具体表现为东部地区城市全面示范引领,辐射外溢现象显著,与之相比,中西部地区城市追赶效应突出,极化现象广泛突出。

3.与国外同类发达城市相比,中国全球城市的发展质量仍有较大的优化空间

运用线性回归和空间异质性分析,针对国际影响力进行细化分解,研究发现尽管中国全球城市在不同维度均呈现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但与欧美国国家同类城市相比,多数城市规模化扩张现象普遍突出,城市发展质量不高,粗放型发展模式广泛存在,集约化程度有限,客观反映出中国全球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4.全球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属于阶段性成果与长期性目标的复合集成体

全球城市作为一个动态有机体,存在固有的客观发展规律,其建设与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包括形成、发展、转型、成熟、稳定等阶段。当前,受制于中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客观现实,中国全球城市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如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城市均已处于综合发展阶段,而郑州、武汉和西安等大部分城市则处于转型阶段。因此,不同发展阶段的样本城市既要围绕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发挥城市综合影响力这一中心任务,又要紧扣自身所处阶段的核心特征与重点任务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但在

全球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其相对侧重程度却呈现显著不同。

当前关于全球城市评价体系及实现路径的研究,始终缺乏科学量化的测度方法,因此难以精准阐明其对全球化及综合国力的影响。本文根据新发展理念提出了科学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全面阐明建设全球城市的重要意义。目前,本文研究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是全球城市的量化测度方法有待进一步深化。当前测度方式仍然过于宏观,虽然偏差度较小,但难以深入精准诠释中国全球城市的作用机制和影响因素。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结合中国发展实际,重点聚焦全球城市的共性发展规律和个性发展形态,在把握一般性的要求下,紧扣城市发展阶段的特殊性来开展研究,为中国全球城市的塑造、形成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 [1]DEREK D, WANG. Performance assessment of major global cities by dea and malmquist index analysis [J]. Computers, environment and urban systems, 2019 (77) : 101365.
- [2]BRENNER N. Globalisation as reterritorialisation: The re-scaling of urban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08(3) : 431—451.
- [3]FORREST R, LA G A, YIP N M. Hong Kong as a global city? Social distance and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J]. Urban studies, 2004(1) : 207—227.
- [4]张骁虎.全球城市发展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J].国际观察, 2020(4).
- [5]唐子来,李黎.迈向全球城市的战略思考 [J].国际城市规划, 2015(4).
- [6]许鑫,汪阳.中国全球城市构建的三维逻辑:制度环境、区位优势与空间正义 [J].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7(9).
- [7]苏宁,屠启宇.全球城市吸引力、竞争力、创造力的内涵与互动特点 [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5).
- [8]格雷格·克拉克.全球城市简史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 [9]姜炎鹏,陈囿桦,马仁峰.全球城市的研究脉络、理论论争与前沿领域 [J].人文地理, 2021(5).
- [10]杨辰,周俭,弗朗索瓦斯·兰德.巴黎全球城市战略中的文化维度 [J].国际城市规划, 2020(4).
- [11]庄少勤.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的创新探索 [J].上海城市规划, 2016(4).
- [12]刘涛,周强,刘作丽,等.国际大都市区空间发展规律与空

- 间治理:兼论对北京的启示[J].城市发展研究,2019(11).
- [13]王兰,刘刚,邱松,等.纽约的全球城市发展战略与规划[J].国际城市规划,2015(4).
- [14]崔翀,古海波,宋聚生,等.“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内涵、目标和发展策略研究:以深圳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22(1).
- [15]周振华.全球城市的理论涵义及实践性[J].上海经济研究,2020(4).
- [16]唐承辉,张衔春.全球城市区域合作网络结构演变: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J].经济地理,2022(2).
- [17]吴晓琪.全球城市综合实力评价体系构建与测评[J].经济纵横,2023(3).
- [18]胡彬.文化的创新价值、全球城市建设与区域高质量发展[J].区域经济评论,2023(2).
- [19]康江江.《重塑:全球化时代的城市、区域和网络》评介[J].世界地理研究,2023(2).
- [20]朱颖,张佳睿.全球城市的经济地位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16(1).
- [21]刘铭秋.全球城市的空间扩张与地方逻辑[J].重庆社会科学,2020(7).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valuation System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China's Global Cities

Zhang Lin Wang Qin Sun Yongquan

Abstract: As a demonstration platform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and an important window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global citi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lead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enhancing the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of the country. The scale expansion of China's global cities is rapid, and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i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ut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development mode extensive, insufficient degree of intensification, and lack of urban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Compared with similar cities in the world, there is still a certain gap in the quality of development. Reasonable learning from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foreign advanced cities can provide necessary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global cities. In the future, there should follow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objectively evaluate the reality of China's global urban development, adhere to the people-oriented approach,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crease the weight of knowledge-intensive service trade, continue to expand the opening up, and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global urban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an all-round and multi-field manner, so as to build a multi-dimensional and integrated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in order to help the country'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 Global City; International Impact;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mplementation Path; City Grade

(责任编辑:张子)

中国城市群的发展测度：基于19个主要城市群*

董昕 张朝辉 刘晓霖

摘要：中国城市群研究主要基于地理学的局部视角，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性考量不足，对中国城市群整体发展规律的把握也有所欠缺。基于对中国19个主要城市群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分析，从要素集聚度、发展活跃度与可持续性三方面总结中国城市群的整体发展状况，并利用熵权TOPSIS、Dagum基尼系数对各城市群的综合发展状况进行评价与分解。从总体上看，主要城市群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绝对主体地位，但经济带动作用有所下降；从城市群之间的差异看，主要城市群的发展差异始终凸显，优化提升类城市群的发展水平远高于发展壮大类与培育发展类城市群，发展壮大类与培育发展类城市群间的差距相对较小；从城市群内部的差异看，主要城市群内部的发展水平差异很大，且城市群内中心城市的极化作用有所增强。

关键词：城市群；要素集聚；经济发展；可持续；差异分解

中图分类号：F061.5；C9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4)02—0100—11 收稿日期：2023—10—31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重大项目“生态文明视角下可持续城市更新的地方实践调研”（2024GQZD009）；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基础研究项目资助（23ZKJC083）。

作者简介：董昕，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研究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生态城市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北京 100710）。

张朝辉，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研究助理（北京 102488）。

刘晓霖，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硕士生（北京 102488）。

一、引言

关于城市群的研究由来已久，1957年法国地理学家Gottmann在分析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时首次使用“大都市带”（megalopolis）一词来描述从波士顿到华盛顿一带的区域，其含义为“由多个城市及郊区构成的城市连绵区”（Gottmann, 1957），这也被普遍认为是现代城市群研究的早期代表性文献之一。国内关于城市群的研究则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于洪俊等（1983）首次将“巨大的城市带”概念引入中国，其后周一星（1995）从城市间作用关系和区域一体化的角度提出“都市连绵区”

（metropolitan interlocking region），姚士谋等（1998）将“城市群”（urban agglomeration）总结为“不同等级特征的城市依托自然、人口、生产、土地等条件，以个别大城市为地区经济发展核心，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群区”（Chan, et al., 1999）。

随着中国各大城市群不断发育成熟，各类发展问题不断凸显，有关中国城市群的研究也出现较大幅度增长。“十三五”期间，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突出变化之一就是城市群的研究热度明显提升（董昕等，2021）。当前，中国正处在新型城镇化转型发展的新阶段，全球化势头减弱、发展转型与产业升级、

城市群空间与发展模式调整、生态环境压力凸显等新时期发展问题也为城市群的现实发展与学术研究带来了新挑战(Marull, et al., 2013; Harrison, et al., 2015; Wheeler, 2009)。空间协调、提质增效、绿色生态等诸多新旧发展要求不断叠加组合,城市群的协调高质量发展也由此成了横亘在中国城市群研究面前急需破解的难题(方创琳, 2021; 魏后凯等, 2020)。

至今,诸多文献已从地理学视角、经济学视角、人口学视角以及规划与环境等视角对城市群开展了丰富的研究。对中国已有城市群相关文献的总结分析发现,城市群研究总体上表现出两大特征:一是以地理学视角分析为主,地理学视角的城市群研究文献明显多于经济学等其他学科;二是对城市群发展的全局性分析不足,主要是对个别城市群分析,对中国城市群的整体发展现状与发展规律的把握有所欠缺。基于此,本文拟通过全国19个主要城市群的经济社会时间序列数据,从要素集聚度、发展活跃度、可持续性等方面分析,以判断城市群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及其演变特征,并对中国城市群的综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拆解其指标贡献与区域差异,以期为中国城市群发展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二、中国城市群发展的政策背景与范围构成

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等重点城市群发展规划获得批复,这标志着中国地域发展政策进入了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发展阶段。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8号)提出加快城市群建设,优化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推动形成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关中平原等城市群。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

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以促进城市群发展为抓手,优化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等城市群,发展壮大山东半岛、粤闽浙沿海、中原、关中平原、北部湾等城市群,培育发展哈长、辽中南、山西中部、黔中、滇中、呼包鄂榆、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等城市群”,共提及19个城市群。因此,本文以这19个城市群作为中国的主要城市群(以下简称“主要城市群”)进行分析(见表1)。

三、中国主要城市群发展水平的总体演变

中国城市群从要素集聚度、发展活跃度与可持续性三个方面进行了多维的发展演变,其中要素集聚度多向变化,发展活跃度及可持续性进一步提升。

1.要素集聚度:主要城市群人口集聚度进一步提高,但建设用地面积占比基本未变,资金集聚度有所下降

从人口规模来看,主要城市群人口增速快于全国,人口要素集聚度进一步提高;但城市群之间差异明显,珠三角和长三角人口增速较快,而东北地区城市群则部分收缩。1998—2020年,中国主要城市群的人口增速高于全国人口增速,占全国人口的比重稳步提升(见图1)。1998年,主要城市群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2.4%,2020年,主要城市群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提升至78.8%,城市群的人口要素集聚度进一步提高。其中,人口增速较快的是珠三角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1998—2020年珠三角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分别提高了3.5个百分点和2.2个百分点;而人口增速较慢甚至负增长的城市群位于东北地区,1998—2020年辽中南城市群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没有增加,哈长城市群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则下降了0.2个百分点。

从土地要素来看,主要城市群的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占全国的比重稳定在70%左右,并未随人口占比的提升而增加,优化提升类的五大城市群占比减少。主要城市群的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占全国的比

表1 中国主要城市群的范围构成

发展类型	序号	城市群	包含的地级及以上城市数	包含的地级及以上城市
优化提升	1	京津冀	13	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保定、张家口、承德、廊坊、秦皇岛、沧州、衡水、邯郸、邢台
	2	长三角	26	上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
	3	珠三角	9	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4	成渝	16	重庆、成都、自贡、泸州、德阳、绵阳、遂宁、内江、乐山、南充、眉山、宜宾、广安、达州、雅安、资阳
	5	长江中游	28	武汉、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襄阳、宜昌、荆州、荆门、长沙、株洲、湘潭、岳阳、益阳、常德、衡阳、娄底、南昌、九江、景德镇、鹰潭、新余、宜春、萍乡、上饶、抚州、吉安
发展壮大	6	山东半岛	16	济南、青岛、烟台、潍坊、临沂、菏泽、淄博、泰安、聊城、德州、滨州、东营、威海、日照、济宁、枣庄
	7	粤闽浙沿海	10	汕头、潮州、揭阳、福州、厦门、泉州、莆田、宁德、漳州、温州
	8	中原	24	郑州、开封、洛阳、平顶山、新乡、焦作、许昌、漯河、鹤壁、商丘、周口、晋城、亳州、安阳、濮阳、三门峡、南阳、信阳、驻马店、长治、宿州、阜阳、淮北、蚌埠
	9	关中平原	11	西安、宝鸡、咸阳、铜川、渭南、商洛、运城、临汾、天水、平凉、庆阳
	10	北部湾	11	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玉林、崇左、湛江、茂名、阳江、海口、儋州
培育发展	11	哈长	10	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绥化、牡丹江、长春、吉林、四平、辽源、松原
	12	辽中南	9	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营口、辽阳、铁岭、盘锦
	13	山西中部	5	太原、晋中、忻州、阳泉、吕梁
	14	黔中	4	贵阳、遵义、安顺、毕节
	15	滇中	3	昆明、曲靖、玉溪
	16	呼包鄂榆	4	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榆林
	17	兰州—西宁	5	兰州、白银、定西、西宁、海东
	18	宁夏沿黄	4	银川、石嘴山、吴忠、中卫
	19	天山北坡	3	乌鲁木齐、吐鲁番、克拉玛依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注：城市群包含的地级及以上城市由中央或省级批复的城市群规划、“十四五规划”、其他文件确定，如无文件明确规定，则综合以往规划、城市发展情况和文献确定；鉴于数据的可获性，含部分区县的城市取整个城市数据；综合距离、人口流向、行政区划等因素，将中原城市群中与其他城市群规划相重叠的河北邯郸、邢台在京津冀城市群中统计，山东聊城、菏泽在山东半岛城市群中统计，山西运城在关中平原城市群中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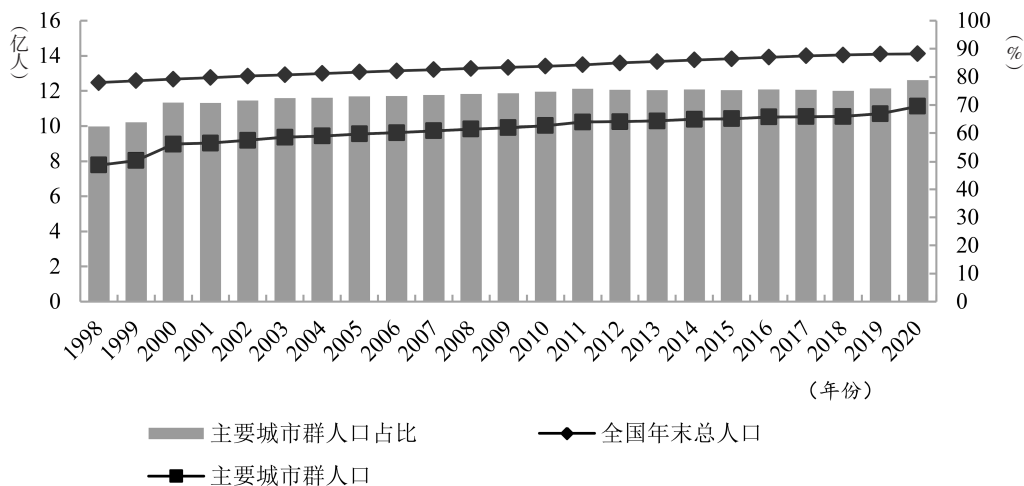


图1 1998—2020年全国与主要城市群人口规模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例稳定在70%左右,并未随人口数量占比的提升而增加。主要城市群的人口数量占比与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占比的差额,由2012年的4.9个百分点扩大至2020年的8.5个百分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主要城市群的土地利用效率进一步提高,也体现了主要城市群的人地关系进一步紧张。就不同类型的城市群来看,培育发展类城市群的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占比基本未发生变化,发展壮大类城市群的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占比有所提高,优化提升类城市群的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占比有所降低(见图2)。而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五大城市群在内的优化提升类城市群正是人口数量占比最高、增速最快的城市群。

从资金状况来看,主要城市群资金集聚度总体上呈现出下降趋势,但资金集聚度仍高于人口、土地的集聚度。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是反映一个城市或地区资金状况的代表性指标,主要城市群的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全国的比重由2003年的86.5%降至2020年的84.5%。主要城市群资金集聚度明显高于人口、土地的集聚度,就可同时获取的数据来看,2012年主要城市群的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全国的比重为87.4%;2020年,主要城市群的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全国的比重为84.5%。可见,主要城市群的资金集聚度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于人口集聚度与土地集聚度(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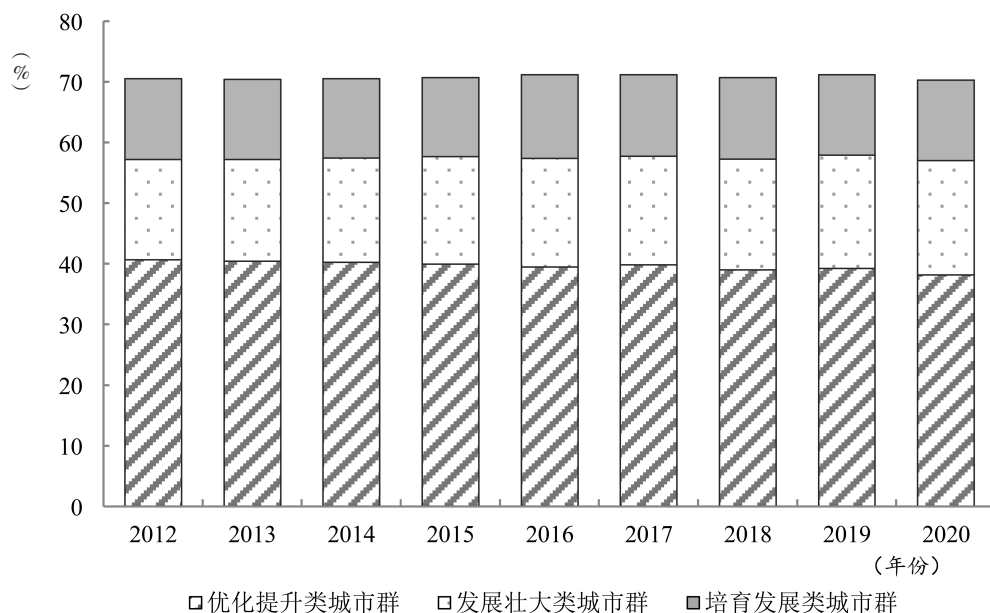


图2 2012—2020年主要城市群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占全国的比重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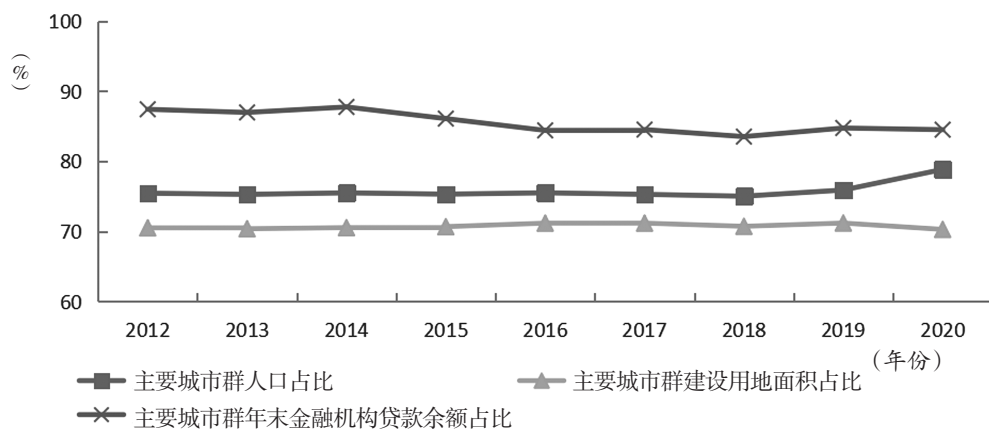


图3 2012—2020年主要城市群城市人口规模、土地要素、资金贷款余额占全国的比重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2.发展活跃度:主要城市群的GDP总量占有绝对主体地位,科技创新和交通流量占比都进一步提升,但近年来GDP占比有所回落

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主要城市群的GDP总量一直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绝对主体地位,但近年来占比有所回落。主要城市群的GDP总和一直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绝对主体地位(见图4)。1999年主要城市群GDP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开始超过80%,从2002年起19个主要城市群的GDP总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保持着85%以上。其中,优化提升类城市群的GDP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3年起稳定在50%以上,发展壮大类城市群的GDP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20%以上,培育发展类城市群的GDP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10%左右。

从创新水平来看,主要城市群的科技创新规模进一步提升。专利的申请授权数量是度量科技创新规模最直观的指标之一。经统计,主要城市群所有类别专利授权数量由2010年的64.7万件增至2020年的323.9万件,占全国所有类型专利授权数的比重于2011年突破80%,至2020年已超89%;发明专利授权数由2010年的6.7万件增至2020年的41.7万件,占全国发明专利授权数的比重由2010年的49.4%增至2020年的78.7%;此外,仅2017—2020年,主要城市群的所有类型专利授权数量就翻了一

倍余,发明专利授权数也较2017年增长了36%(见图5)。

从交通规模来看,主要城市群的交通流量与占比进一步增加。交通流量体现着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反映城市群发展活力的指标之一。其中,公路客运量和公路货运量是交通流量中的重要变量。从交通流量来看,主要城市群的公路客运量占全国公路客运量的比重,由1998年的68.0%上升至2020年的88.5%;主要城市群的公路货运量占全国公路客运量的比重,由1998年的68.2%上升至2020年的78.1%^①。

3.可持续性:主要城市群的环境经济强度总体上明显下降,发展的可持续性有所提升

对城市群发展可持续性的测度,主要从污染物排放数据来衡量。由于污染物排放的数据连续性较差,可获取的城市群污染物排放的连续代表变量是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工业废水排放量,主要城市群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从2011年到2020年下降了约90%,占全国总量的比重也由2011年的76.7%下降到2020年的67.5%;主要城市群的工业废水排放量从2011年到2019年总体降幅超过40%。此外,就2020年数据来看,主要城市群的工业颗粒物排放量、工业氮氧化物排放量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49.1%和68.4%。而2003—2020年,19个主要城市群的GDP合计占全国GDP总量的比重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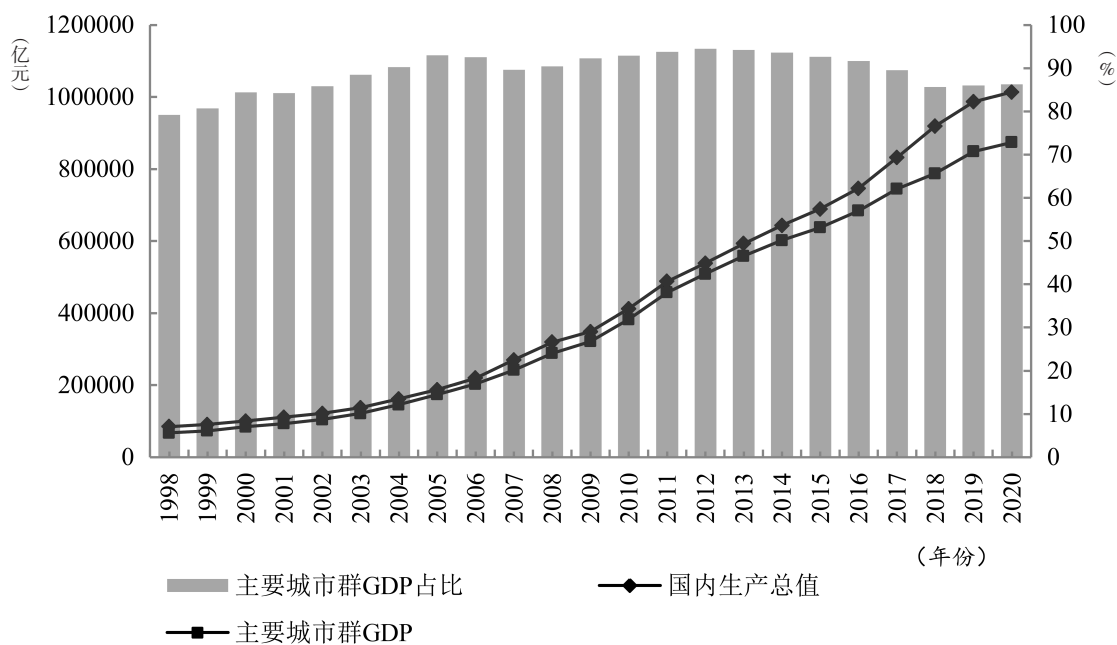


图4 1998—2020年全国与主要城市群经济发展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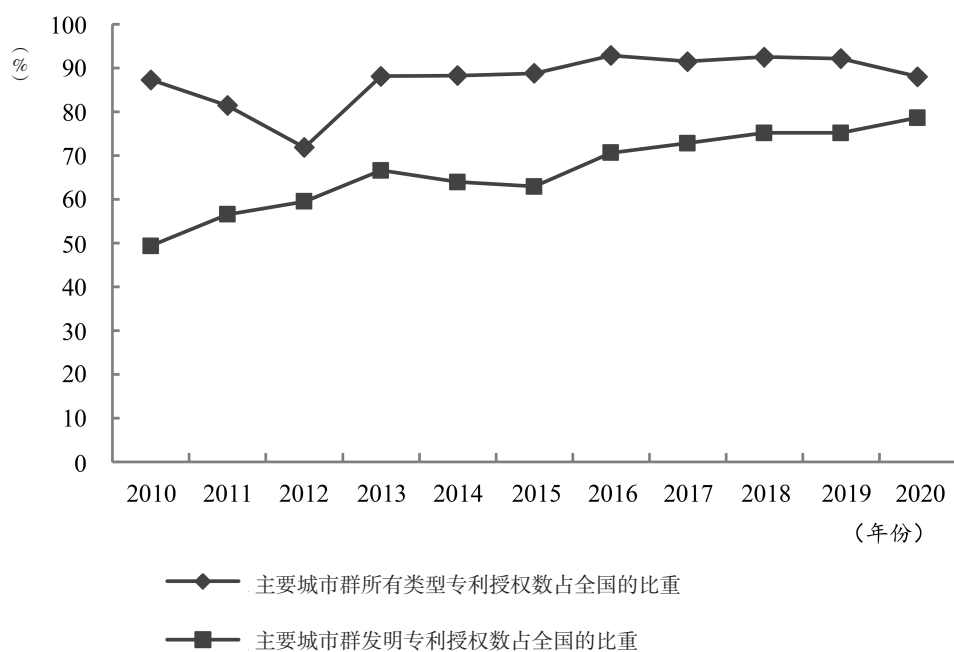


图5 2010—2020年主要城市群城市专利申请授权数的全国占比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直在85%以上^②。可见,中国主要城市群的环境经济强度总体上明显下降,发展的可持续性有所提升。

四、中国城市群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与差异分析

在分析中国主要城市群发展水平总体演变趋势的基础上,下面将对单个城市群的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并对其差异进行分析。

1. 各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的测度

在前文针对中国主要城市群“要素集聚度、发展活跃度与可持续性”三维度总体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选取了12个指标并采用熵权TOPSIS法(欧进锋等,2020)对中国主要城市群的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见表2)。其中,“城市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张军等,2004),计算式为:

$$K_{i,t} = K_{i,t-1}(1 - \delta_{i,t}) + I_{i,t}$$

$K_{i,t}$ 表示*i*城市在*t*年份的资本存量, $\delta_{i,t}$ 表示*i*城

表2 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单位	作用方向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要素集聚度	劳动力	城市就业人员总量	万人	+	72.81	102.09	5.11	986.87
	土地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平方公里	+	177.92	260.33	0.30	2915.56
	资本	城市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	亿元	+	3358.38	6328.96	91.20	63727.02
		城市资本存量	亿元	+	6688.06	7299.13	462.44	59390.54
发展活跃度	产出	城市生产总值	亿元	+	3135.02	3733.83	186.94	32886.82
	创新	城市所有类别专利授权数量	件	+	6969.82	14399.32	17.00	166104.00
	交通	公路客运量	万人	+	9183.82	15901.06	50.00	195597.00
		公路货运量	万吨	+	14020.78	15248.57	499.00	292426.00
可持续性	能源	能源经济强度	吨/万元	-	0.07	0.06	0.01	0.82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吨	-	44029.18	50036.15	75.00	531340.00
	环境	工业废水排放量	吨	-	7206.53	8365.51	133.00	96501.00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理率	%	+	82.08	20.99	0.20	100.00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市在 t 年份的资本折旧率, 折旧率为 9.6%, $I_{i,t}$ 表示 i 城市在 t 年份的资本流量; “城市所有类别专利授权数量”是按地级市尺度对当年产业专利数据进行匹配加总所得, 专利授权量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在线专利检索系统”; 能源消耗参考综合能耗的一般计算规则(Liu 等, 2018), 将各项能源消耗转换为标准煤量, 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社会用电、供热总量的能源转换因子分别为 1.33 千克标准煤/立方米、1.71 千克标准煤/千克、0.12 千克标准煤/千瓦时和 0.03 千克标准煤/兆焦耳; 其余诸指标均来源于各年度《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统计公报, 部分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法填补。

考虑到数据连贯性与完整性, 本文测算范围为 2011—2019 年中国 19 大城市群共 205 个城市, 涉及价格的变量均按平减指数调整为以 2011 年为基准的实际值。

总体上看, 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布局落实, 中国城市群总体发展水平始终处于不断提升的状态。从各城市群的比较来看, 主要城市群中长三角城市群的综合发展水平最高, 且大幅领先于其他城市群; 珠三角城市群与京津冀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次之; 长江中游、成渝、山东半岛城市群间的综合发展水平总体差异较小(见表3)。属于优化提升类的五大城市群发展优势始终凸显、发展水平提升始终稳定。同时, 山东半岛、中原地区、粤闽浙沿海城市群崛起势头强劲, 而东北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等诸城市群的综合发展水平相对不足。从不同类型的城市群来看, 近年来优化提升、发展壮大与培育发展三大类城市群的发展均呈现“稳中有升”的趋势。其中, 优化提升类城市群发展水平远高于发展壮大类与培育发展类城市群, 而发展壮大类与培育发展类城市群间的差距则相对较小(见图6)。

2. 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的差异及分解

中国不同主要城市群间

表3 2011—2019年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年均得分排名

排名	城市群	发展得分	城市	发展得分
1	长三角	0.6911	北京市	0.5192
2	珠三角	0.3533	上海市	0.4105
3	京津冀	0.3049	深圳市	0.3787
4	长江中游	0.2461	重庆市	0.3377
5	成渝	0.2396	苏州市	0.3276
6	山东半岛	0.2261	广州市	0.3190
7	中原	0.1948	成都市	0.2728
8	粤闽浙沿海	0.1464	杭州市	0.2570
9	辽中南	0.0923	天津市	0.2552
10	哈长	0.0796	宁波市	0.2211
11	关中平原	0.0794	东莞市	0.1941
12	天山北坡	0.0792	南京市	0.1937
13	黔中	0.0680	武汉市	0.1742
14	宁夏沿黄	0.0666	无锡市	0.1713
15	呼包鄂榆	0.0557	佛山市	0.1560
16	北部湾	0.0550	西安市	0.1552
17	滇中	0.0319	温州市	0.1388
18	山西中部	0.0312	青岛市	0.1372
19	兰州—西宁	0.0199	贵阳市	0.1281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

存在较为明显的发展差异。基于此, 本文采用 Dagum 基尼系数进一步对中国城市群发展的具体差异水平进行分解。Dagum 基尼系数被广泛应用于测度经济社会指标的差异水平, 且与传统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测算区域差异的指标假定不存在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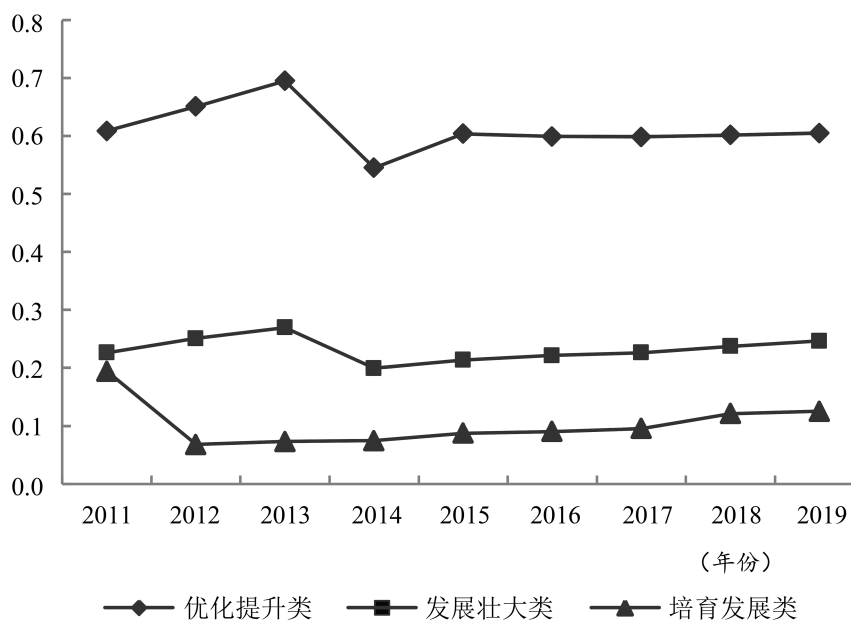


图6 2011—2019年中国三大主要城市群类型的综合发展得分

资料来源: 作者自绘。

本交叠不同,Dagum基尼系数能够将样本的整体差异分解为组内差异、组间净差异和组间超变密度三部分,从而可以更加清晰地判断差异来源及差异贡献(张卓群等,2022)。

第一,城市群之间的差异:差异主要来源为城市群间差距,且受城市群划分影响较大。主要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差异的主要来源为城市群间差距(见图7)。具体来看,城市群间净差异贡献值在样本初期为0.302,至样本末期达0.334,年均增幅为1.12%;其对于整体差异的贡献率也从样本初期的51.15%波动上升到样本末期的57.16%,样本期间的平均贡献率达56.01%,这表明中国不同城市群间始终存在较大的发育差距。此外,城市群间超变密度贡献值与贡献率始终较高。研究期内,超变密度贡献值范围在0.188—0.253之间,年均贡献率为37.31%。由于超变密度反映的是各分样本组之间的交叠部分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其比重较高则意味着城市群划分分组对差异分解产生了较大影响。由于城市群规划交叉与地方城市间发展关系的交叠等因素,若单纯以城市群划分作为差异分析的主体,则势必会忽视较大一部分不由城市群划分所决定的城市间差异。这也表明本文采取Dagum基尼系数能够整合城市群内外的发展差异关系,从而实现对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差异贡献的完整识别。

第二,城市群内部的差异:城市群发展水平的

内部差异很大,且有继续扩大的趋势。主要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得分的城市群内部差异贡献始终保持稳定,虽然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相对较小,但各城市群内部的绝对差异水平却始终较高(见表4)。一方面,内部差异的基尼系数在整体上未出现明显变化,差异贡献值期初与期末间的变化幅度仅为0.02,且其对于整体差异的年平均贡献率也仅为6.68%;另一方面,就内部差异的绝对水平而言,全部城市样本的Dagum基尼系数年均值超过0.5,且近年来出现了持续上升的趋势,这说明中国主要城市群发展水平的内部差异很大,且有继续扩大的趋势。成渝、京津冀、关中平原这三大城市群的内部差异还要高于全城市样本的平均水平;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也始终处于较高差异水平区间,虽然其差异水平于研究期内出现了波动下降,但变动幅度较小且出现升降反复;山东半岛城市群虽然是综合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群中内部差异水平最低的城市群,但近年来也出现了内部差异持续扩大的趋势。总体而言,19大城市群中有九个城市群的内部基尼系数年均值处在0.4—0.5的高差异水平区间内,另有六大城市群的内部基尼系数年均值处于0.3—0.4的较高差异水平区间内。有11个城市群的内部差异呈现持续扩大或波动扩大的趋势。此外,高发展水平与高差异水平在中国主要城市群中并存,而低发展水平城市群的内部差异水平也相对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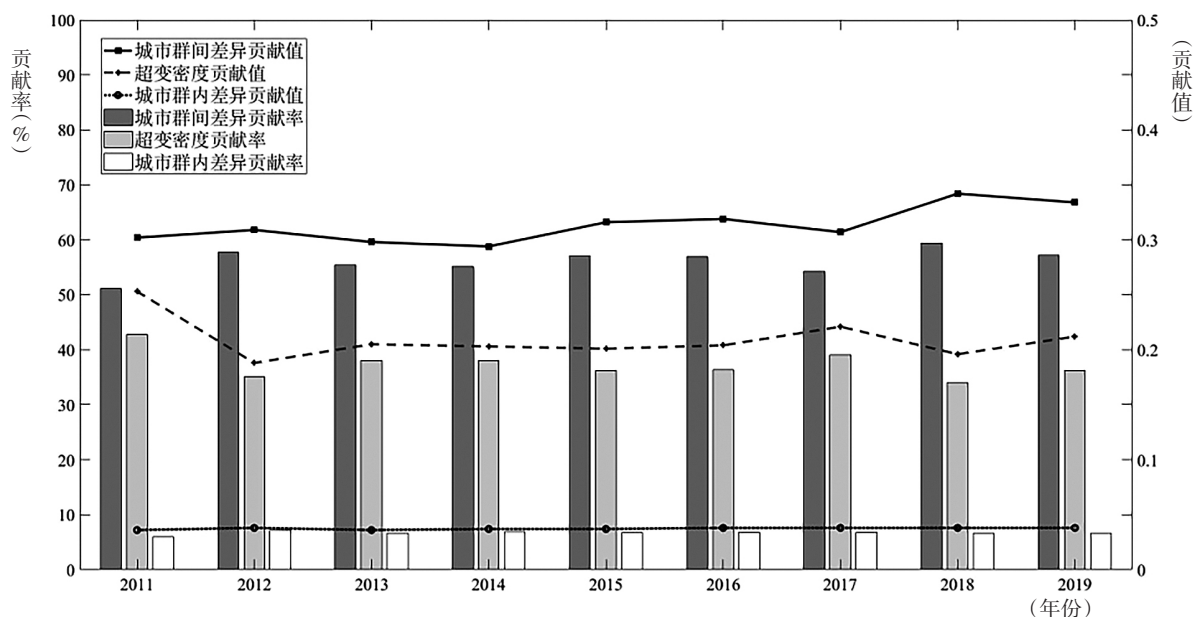


图7 2011—2019年主要城市群发展水平差异的贡献来源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表4 2011—2019年中国主要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的内部差异(基尼系数)变化

差异排序	城市群	年均值	变动趋势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1	成渝	0.626	下降	0.676	0.620	0.615	0.603	0.619	0.628	0.624	0.639	0.608
2	京津冀	0.611	上升	0.595	0.592	0.586	0.619	0.624	0.624	0.620	0.619	0.618
3	关中平原	0.574	下降	0.724	0.487	0.518	0.509	0.545	0.585	0.694	0.552	0.555
4	全部城市	0.560	先降后升	0.591	0.536	0.539	0.533	0.553	0.560	0.567	0.576	0.584
5	长三角	0.471	下降	0.494	0.493	0.454	0.450	0.453	0.471	0.485	0.476	0.463
6	北部湾	0.448	下降	0.685	0.430	0.471	0.408	0.411	0.412	0.409	0.406	0.402
7	珠三角	0.442	下降	0.446	0.450	0.406	0.449	0.455	0.453	0.448	0.447	0.425
8	辽中南	0.442	上升	0.430	0.423	0.431	0.429	0.440	0.444	0.450	0.458	0.472
9	哈长	0.438	上升	0.388	0.395	0.441	0.436	0.441	0.460	0.453	0.458	0.472
10	长江中游	0.427	上升	0.394	0.396	0.398	0.403	0.412	0.420	0.432	0.433	0.556
11	山西中部	0.420	上升	0.398	0.402	0.400	0.414	0.424	0.431	0.429	0.434	0.445
12	滇中	0.414	先降后升	0.534	0.423	0.412	0.429	0.433	0.306	0.310	0.436	0.445
13	粤闽浙沿海	0.412	上升	0.388	0.390	0.403	0.401	0.405	0.420	0.399	0.413	0.488
14	宁夏沿黄	0.370	下降	0.387	0.380	0.375	0.363	0.367	0.351	0.367	0.386	0.357
15	天山北坡	0.356	下降	0.364	0.352	0.354	0.348	0.355	0.351	0.349	0.348	0.382
16	兰州—西宁	0.346	上升	0.250	0.266	0.251	0.309	0.401	0.388	0.408	0.412	0.431
17	中原	0.325	上升	0.303	0.299	0.307	0.309	0.319	0.317	0.354	0.354	0.366
18	山东半岛	0.322	上升	0.288	0.298	0.315	0.318	0.326	0.326	0.332	0.347	0.352
19	黔中	0.318	先升后降	0.300	0.336	0.363	0.323	0.315	0.308	0.298	0.292	0.327
20	呼包鄂榆	0.082	下降	0.084	0.088	0.094	0.098	0.089	0.076	0.070	0.070	0.065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中国主要城市群的综合发展水平于近年来呈现“稳中有升”的大趋势,主要城市群间的发展差异始终凸显,高发展水平与高差异水平特征并存。未来要采取有力举措,充分发挥城市群对经济、社会、环境的带动作用,加强城市群之间的协同及城市群内部中心城市对城市群的引领带动作用。

1. 结论

本文通过结合各类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从要素集聚度、发展活跃度与可持续性三方面出发,对中国城市群整体发展状况的总体演变进行分析。进一步地,利用熵权TOPSIS、Dagum基尼系数对各主要城市群的综合发展水平及差异进行评价与分解。相关结论如下:

从城市群总体上看,主要城市群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绝对主体地位,但经济带动作用有所下降。要素集聚度方面,主要城市群人口集聚度进一步提高,但建设用地面积占比基本未变,资金集聚

度有所下降;发展活跃度方面,主要城市群的GDP总量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绝对主体地位,科技创新规模和交通流量占比都进一步提升,但近年来GDP占比有所回落;可持续性方面,主要城市群的环境经济强度总体上明显下降,发展的可持续性有所提升。

从城市群之间的差异来看,主要城市群的发展差异始终凸显,不同城市群间始终存在较大的发育差距;优化提升类城市群发展水平远高于发展壮大类与培育发展类城市群,而发展壮大类与培育发展类城市群间的差距则相对较小。城市群间差异是各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差异的主要贡献源,城市群划分分组对差异分解产生了较大影响。

从城市群内部的差异来看,主要城市群发展水平的内部差异很大,且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城市群内中心城市的极化作用有所增强。城市群内部差异的绝对水平始终较高,高发展水平与高差异水平并存,但低发展水平城市群的内部差异水平也相对较低。

2. 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在城市群整体发展、各城

城市群之间、城市群内部的视角,分别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充分发挥城市群在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发展的带动作用。主要城市群人口集聚度进一步提高,GDP总量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绝对主体地位,需要以城市群作为重点,激发城乡经济活力,带动整体国民经济发展。根据城市群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发展潜力,优化城市群的空间布局,形成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同时,注重城市群内部的城乡统筹发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主要城市群的科技创新规模和交通流量占比都进一步提升,但近年来GDP占比有所回落,应发挥城市群内中心城市集聚创新的功能优势,打造城市群内创新高地,加强专利授权等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使之成为推动城市群发展的真正生产力。以创新驱动发展,促进产业升级,加快形成多中心的城市群创新格局,提升城市群区域总体科技创新水平,推动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虽然,主要城市群的环境经济强度总体上明显下降,发展的可持续性有所提升,但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尚存在距离,应注重城市群的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推广绿色技术、绿色生产方式和绿色消费方式,促进城市群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提升城市群的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带动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客观认识城市群之间的发展差异,加强城市群之间的协同。中国城市群的发展还远未成熟,城市群之间的差异也将客观存在。以区域协调发展为导向,根据不同城市群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制定城市群的发展规划,同时注重发挥城市群之间的协同效应。针对优化提升类、发展壮大类与培育发展类城市群,应该采取差异化的发展策略,以实现分类发展和整体提升的目标。优化提升类城市群的发展基础较好、发展水平较高,可以在政策制定实施、基础设施建设、要素自由流动等方面探索城市群之间的协同机制,为发展壮大类与培育发展类的城市群提供示范,引领城市群的发展。深入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国家战略,通过进一步优化空间布局、加强产业协同、推动科技创新等措施,提升其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使之成为世界一流

城市群。发展壮大类与培育发展类城市群之间差距较小,不必刻意强调两类城市群的差异,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发展壮大类与培育发展类城市群的建设步伐,借鉴与学习优化提升类城市群在发展中的有效经验与可复制政策措施。发展壮大类与培育发展类的城市群,都需要补足基本公共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短板,挖掘发展潜力,增强发展动能,发挥城市群各自的优势,从而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

最后,进一步加强城市群内部中心城市对城市群的引领带动作用。城市群内中心城市的极化作用有所增强,城市群内部发展水平的差异有继续扩大的趋势,说明中心城市的集聚效应明显。明确中心城市在城市群中的定位和功能,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和规划,保障中心城市发展,坚强区域发展核心。加强城市群内政府间的协调合作,打破行政壁垒,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要素在城市群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为中心城市发挥带动作用创造基础条件。依托中心城市的都市圈建设,利用区域要素集聚优势,通过构建城市群内部城际间的交流合作网络,推进人才、资金、技术及其他各种要素在城市群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增强城市群内部城市间的合作联系,形成产业集群和产业链,进而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格局。同时,以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地级市作为重要节点城市,节点城市可以成为连接中心城市和其他城市的桥梁,促进各种资源和要素的流通,更好地推动中心城市扩散效应的发挥,提升城市群整体发展水平的作用。对于城市群内非中心城市,首先应找准城市在城市群发展中的优势所在,明确城市定位,尤其是明确产业发展重心,利用城市群内核心城市的溢出效应,与中心城市形成产业链上的“对接”,推动产业分工和协作,打造互补型产业结构布局,促进城市群内部的协同发展,实现发展共赢。

注释

①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作者计算。②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0年中国生态环境统计年报》。

参考文献

[1] CHAN R C, SHIMOU Y. Urbanization and sustainable

- metropolitan development in China: patterns, problems and prospects[J]. *GeoJournal*, 1999, 49(3): 269—277.
- [2] GOTTMANN J. Megalopolis or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northeastern seaboard[J]. *Economic geography*, 1957, 33(3): 189—200.
- [3] HARRISON J, HOYLER M. Megaregions: foundations, frailties, futures[M].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5.
- [4] LIU B, TIAN C, LI Y, et al. Research on the effects of urbanization on carbon emissions efficiency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8, 197: 1374—1381.
- [5] MARULL J, GALLETTO V, DOMENE E, et al. Emerging megaregions: a new spatial scale to explore urban sustainability[J]. *Land use policy*, 2013, 34: 353—366.
- [6] WHEELER S. Regions, megaregions, and sustainability[J]. *Regional studies*, 2009, 43(6): 863—876.
- [7] 于洪俊, 宁越敏. 城市地理概论[M]. 合肥: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3.
- [8] 周一星. 城市地理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 [9] 姚士谋, 陈爽, 陈振光. 关于城市群基本概念的新认识[J]. *现代城市研究*, 1998(6).
- [10] 董昕, 杨开忠. 中国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十三五”回顾与“十四五”展望[J]. *城市发展研究*, 2021(8).
- [11] 方创琳. 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城市群与都市圈建设[J]. *经济地理*, 2021(4).
- [12] 魏后凯, 李玟, 年猛. “十四五”时期中国城镇化战略与政策[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0(4).
- [13] 欧进锋, 许抄军, 刘雨琪. 基于“五大发展理念”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 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J]. *经济地理*, 2020(6).
- [14] 张军, 吴桂英, 张吉鹏. 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 1952—2000[J]. *经济研究*, 2004(10).
- [15] 张卓群, 张涛, 冯冬发. 中国碳排放强度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及收敛性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2(4).

Meas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Based on 19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Dong Xin Zhang Chaohui Liu Xiaolin

Abstract: The study of Chinese urban agglomerations is mainly based on the local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 with insufficient consideration of the overal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 lack of grasp of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law of Chinese urban agglomeration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dicators of 19 major city clusters in China, we summariz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status of Chinese city clusters in terms of factor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activity and sustainability, and evaluate and decompos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status of each city cluster by using the entropy-weighted TOPSIS method and the Dagum Gini coefficient. On the whole, major city clusters occupy an absolute main posi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the economic driving role has declined; from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ity clusters, the development difference of major city clusters is always highlighted, the optimization and enhancement category of city clusters has an absolute advantage in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and the ga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and growth category and the 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category of city clusters is relatively small; from the difference within the city clusters,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city clusters is very different, and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city clusters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city cluster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differences within the city clusters, the development level within the major city clusters varies greatly, and the polarization of the central cities within the city clusters has increased.

Key Words: Urban Agglomeration; Agglomeration of Factors; Economic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Variance Decomposition

(责任编辑:江 夏)

【城市经济研究】

聚焦同城化 加快推动首都都市圈发展的思考

欧心泉 余飞

摘要:顺应城镇化发展演变规律,推动同城化发展是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的内在要求,有利于拓展北京发展空间和促进内部功能重整,提升周边交界地区发展水平,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近年来,环京周边地区与北京的经济社会联系持续增强,重点区域合作不断深化,同城化发展具有较好基础,但与长三角等同城化发展成熟的地区相比,其同城化水平还有很大差距,存在交通通勤能力较弱、产业协同能力有限、要素流通不畅和公共服务不均衡等问题,可以从强化设施联通、增进服务共通、促进产业协同、深化制度创新等方面入手,加快推动首都都市圈同城化发展。

关键词:首都都市圈;同城化;通勤圈;环京周边地区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4)02—0111—08 **收稿日期:**2023-11-14

作者简介:欧心泉,男,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高级工程师(北京 100045)。

余飞,女,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规划师(北京 100045)。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带动周边地区联动发展的都市圈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重要空间形式。2022年,国家发布的《“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提出,要以促进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镇)同城化发展为导向,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培育发展都市圈。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处理好同周边地区的关系,带动周边交界地区高质量发展。围绕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在统筹推动通勤圈、功能圈、产业圈发展的基础上,北京需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以促进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城市(镇)同城化发展为重点方向,带动周边地区协同发展,大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都市圈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是由日本学者木

内信藏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日本按人口数量把都市圈分为大都市圈和地方都市圈。20世纪80年代,都市圈概念引入国内,学术界和地方政府开始关注。张京祥等(2001)认为都市圈是由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组成,具有一体化趋势的城市圈层型结构。高汝熹等(2006)认为都市圈是核心城市与外围区域在要素上高度联系的经济体。邹军(2005)认为都市圈是以一个或多个中心城市为核心,吸引及辐射周边城市和地区的区域,是城市地域空间形态演化的高级形式。综合学者们的研究,现阶段中国都市圈主要指都市圈的周边城市组团至中心城市城区的“门到门”通勤时间平均在1小时,以县级行政区为单元,并跨越地级以上城市,是交通通勤圈、产业协作圈、生活服务圈的统一体。

同城化是中国于2006年首次提出的,即深圳市人民政府在《深圳2030城市发展策略》中提到深圳要与香港形成同城化态势。而随着广佛、长株潭、郑汴、厦漳泉等相继出台同城化政策,学术界开始

关注同城化的研究。邢铭(2007)认为同城化是指两个或更多个城市由于地理位置的邻近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紧密联系,展现出空间的接近性、功能的连通性、交通的便捷性和强烈的认同感。通过这些城市间的经济要素共同配置,在产业定位、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开发和政府管理方面形成高度的协调和统一机制,从而使市民能够减少对地域的依赖,共同分享城市化带来的发展成果。王德(2009)认为同城化的基本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同城化是区域中毗邻城市到了一定发展阶段的路径选择;同城化对距离有门槛要求;同城化发展的城市是区域发展的增长极,同城化城市均为中心城市或次级中心城市;城市间经济要有差异性。综合学者们的看法,同城化是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区域中相邻城市经济、社会、生活一体化的共同结果,其主要内涵是要实现城市间要素流通无阻碍、产业协同发展、公共服务均衡共享。

北京进入城镇化发展后半期,面临着严峻的人口拥挤、交通拥堵、生态环境恶化、公共资源紧张等“大城市病”问题,严重影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工作就是要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首都都市圈有助于各类要素在更大的区域实现有效配置,而同城化发展是都市圈效益实现“1+1>2”的必要路径。首先,同城化是培育现代化都市圈的必然选择。从城镇化发展的演变规律来看,都市圈是超大、特大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口和产业不断外溢、城市活动由核心向外围扩展形成的城镇化空间形态。借鉴国内外已有发展经验,当人口规模巨大的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居住、生产、物流、商业等功能会从原有的城区延伸转移到周边地区,逐步形成都市圈。在中心城市到都市圈的演进过程中,居于核心的中心城市城区与郊区、周边毗邻城市(镇)的功能由高度集中向适度分散方向演变,空间结构从蔓延式发展向组团式发展转换,不同组团间联系趋紧,合作向深层次拓展。为更好地支撑这种结构性变化,需要推动中心城市与联系紧密的周边地区同城化发展,更好地破解行政区域与经济区域之间的矛盾和摩擦,消除要素流通壁垒,减少资源消耗,深化统一市场,提升一体化发展水平和效能,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其次,同城化是拓展发展空间和促进内部功能重整的需要。北京作为首都,也是一座人口、经济高度集中

的超大城市,在过去发展过程中汇聚了众多功能,资源环境承载力不足、“大城市病”等城市发展问题突出,甚至引发了一系列经济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加快推动同城化发展,能够充分打开北京向外高水平拓展的空间,极大地提高周边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的支撑保障能力,降低各类要素流动阻力,为更大范围优化资源配置创造条件。同时,牵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加快向周边地区转移功能,推动人口、产业外迁,也有利于在内部释放新空间,促进核心区功能重整,推动传统产业替代升级和“腾笼换鸟”,为北京高质量发展和更好担负起首都职责提供更有力的支撑。最后,同城化能够有效增强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从京津冀协同发展来看,同城化能够有效提升北京周边交界地区的发展水平,提升区域整体实力。对比长三角、珠三角等国内区域协调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北京“一城独大”与周边中小城市过于“瘦弱”形成鲜明对比。“中心—外围”发展水平的断崖式落差导致北京大量优质资源难以外溢,其作为区域增长核心的辐射带动和高端引领作用也难以充分发挥。推动同城化发展能够有效打破这种格局,通过带动周边交界地区高质量发展,优化空间布局和经济结构,创新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增强合作广度和深度,打造区域发展高地,形成推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突破口,进而带动周边地区发展,使首都都市圈真正成为连接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和北京发展的核心链条,成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支撑。

二、首都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的现状

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的重点空间是中心城市的周边交界地区。环京周边地区紧贴北京,也是首都都市圈建设最具活力的区域。从首都都市圈整体发展格局来看,围绕北京的“三圈”(通勤圈、功能圈、产业圈)已经初步形成,即具有紧密通勤联系的环京周边地区圈层,具有较强产业功能互补性的京津雄圈层,覆盖保定、唐山、张家口、承德、沧州等外围主要节点城市的产业配套圈层。

1. 交通通勤已初步形成同城化效应

京津冀地区1小时交通圈基本形成。北京与廊坊、保定等县(市)开通了38条公交线路,北三县至

北京国贸地区通勤定制快巴试点开通,京秦、京哈、首都地区环线高速投入使用,跨区域客运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副中心交通体系不断完善,开通城市副中心线、通密线等4条市郊铁路;北京到雄安交通圈加速构建,京礼高速公路、延崇智慧高速、京张高铁、市郊铁路S2线均已投入运营。随着通州和北三县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其高质量发展的进程已经迈入新的层次。通州和北三县边界交通网络的连贯性和便利度正在逐步提升,现已有10个连接点实现了互联互通,其中包括5座跨越潮白河的大桥,而作为主要通道之一的厂通路公路部分也完成了超过一半的工作量,同时潮白河上的两个重要节点——北京端和河北端也在2022年底动工,京张高铁建成通车,京礼高速建成,北京到天津、石家庄、唐山等主要城市间均能实现1小时左右直达。

通勤圈主要以北京中心城六区为核心,以通勤活动为牵引,覆盖通州、大兴、房山等区与北三县、廊坊城区、固安、武清、涿州等毗邻城市(镇),是现阶段首都都市圈建设的重点。建设通勤圈的关键是深化密切合作,促进环京周边地区深度融合,形成同城化效应。经过多年发展,环京周边地区与北京的经济社会联系持续增强,跨行政区边界的通勤人员规模不断增长、群体类型趋于丰富,日常交往更加频繁。2022年,环京地区商务往来人员总量超过92万人,环京17个市(县、区)来京工作人口规模在25万—45万人周期性波动,日常稳定在40万人左右,峰值规模可达46.7万人,住在河北三河、大厂、香河到北京国贸CBD、望京上班成为很多人的生活、工作常态。此外,廊坊城区与亦庄,固安与大兴、丰台等通勤联系也较强。通燕—京哈、京沪、京港澳、京津、京平、京通、京开、京台、武兴路—6号线等9条跨界交通走廊在早晚上下班高峰期承载了大量的通勤需求。

2. 环京周边地区的重点区域合作不断深化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产业对接协作水平进一步提升,由转移承接向产业链合作转变。新能源及智能化网络车辆产业线如电动车制造商的生产基地、制药业中的创新药物研发中心等都在积极推动区域间的合作并建立起高效的合作关系。目前,已经成功吸引了来自北京的400多个项目入驻位于河北唐山的示范园区,并且已经有超过9000多家公司从北京迁移至河北或在此建立分公

司,并在未来几年里预计会带来更多的投资机会,从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产业转移承接逐步成型,2019—2022年意向投资额达1080亿元,累计签约160多个项目。区域营商环境逐步优化,京津冀三地签订政务服务、商事制度以及营商环境一体化发展的相关合作事项等5个重点领域的协议。在京津冀自由贸易试验区范围内,有179项政府服务实现了统一标准,有231项服务可以在京津冀的政务网站办理。此外,北京主动推动适合的企业和产业到北三县发展,并在2022年成功组织了北京通州与北三县的项目推广会议,共签署37项协议,预估总投资280亿元。从2019年开始,已签订超过160多项合同,预计总投资1000亿元以上。

3. 公共服务合作加快,服务能力不断增强

教育、医疗卫生等优质基础设施在北三县相继落地。为推动雄安新区公共服务质量及整体承载能力的提高,北京采取“交钥匙”的方式来支援其基础教育设施、综合医院的建立,并由北海幼儿园、史家小学、北京四中等知名学校以及宣武医院负责管理教学和医疗事务,目前已正式投入使用。另外,来自北京的超过40所中小学和5所医疗保健单位也与雄安新区开展了协同合作。共有17家市级国有企业在雄安新区设立了100多个投资项目,涵盖基础设施、城市运行、环境保护等行业。北京潞河中学、北京实验学校也与三河地区展开联合办学活动;中日友好医院、友谊医院等中央直属、市级公立医院也在积极与北三县的医疗机构保持紧密联系,共同致力于提升该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

京津冀推出政务服务区域通办,公共服务能力不断提升。通州推出政务服务“云窗口”,围绕政务事项延伸至北三县。大兴区和廊坊城区、固安围绕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打造国家发展新的动力源,综合保税区进入实质化运营阶段,注册企业超百家。随着产业资源的导入和大量就业机会的创造,环京周边地区对部分居住在北京中心城区的人群甚至形成反向就业吸引,奠定了都市圈核心与外围紧密连接的新型构架。

三、首都都市圈同城化水平

对于首都都市圈同城化水平的探讨,本文通过构建首都都市圈同城化评价体系和首都都市圈同

城市化水平评价两个部分来进行。

1. 构建首都都市圈同城化评价体系

将都市圈同城化重要的总量指标与同城化发展较为成熟的长三角地区作横向对比,并针对同城化的内涵和特点,对市场一体化、产业协同、交通通勤、公共服务四个领域进行评价。市场一体化反映都市圈中城市和城市间政策的一体化程度,是同城化得以实现的上层建筑。产业协同反映城市间市

场经济的协调与差异程度,是后续都市圈中各个城市的产业分工方向和产业链结构的选择,是同城化得以实现的决定因素。交通通勤包括交通设施的联通性和通勤能力的评估,反映出城市与城市之间的通达性,是同城化得以实现的基础。公共服务反映都市圈中文化、教育等重要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共享程度,是同城化发展的关键因素。以此为基础选取各个目标的评价指标进行分析(见表1)。

表1 首都都市圈同城化指标表

评价目标	评价指标	北京	天津	河北
市场一体化	人均GDP(万元)	19	11.8	5.6
	城镇化率(%)	86.2	85	61
产业协同	产业结构	0.3:18:81.7	1.4:37.3:61.3	10:41:49
	集成电路产业链占比(%)	89.42	10.47	0.12
交通通勤	跨区通勤率(%)	3.5		
	平均通勤时间(时)	1.5—2		
	城际铁路联通率(%)	29		
公共服务	一般公共预算人均支出比	2.64	1.81	1
	万人拥有三甲医院数量(个)	0.04	0.03	0.003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表2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同城化重要指标表

地区	GDP占全国的比重(%)	轨道线路长度占全国的比重(%)	工业产值占全国的比重(%)	人口净流入(万人)
京津冀	8.5	12.01	7.5	1044
长三角	24.1	30.73	23.6	3012
珠三角	8.8	16.6	13.9	2815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2. 首都都市圈同城化水平评价

在市场一体化同城化程度方面,区域间人均GDP存在明显差异,2021年北京人均GDP为19万元,天津人均GDP为11.8万元,河北人均GDP为5.6万元,北京和河北的差异达到3.4倍,区域内部经济差距过大,不利于京津冀区域市场一体化。就城镇化率来看,2021年北京城镇化率为86.2%,天津城镇化率为85%,河北城镇化率为61%,北京和天津已经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进入到城镇化发展阶段的后半段,而河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反映出首都都市圈人口城镇化发展失衡,这种失衡直接导致了市场一体化的差异,也间接影响了都市圈同城化进程。

在产业协同同城化程度方面,2022年北京产业结构为0.3:18:81.7,天津产业结构为1.4:37.3:61.3,河北产业结构为10:41:49,区域间产业结构差异较大,代表京津冀处在不同的工业化阶段,但也为产业合作提供了良好条件。就集成电路产业链占比

来看,2022年北京产业规模占比为89.42%,天津产业规模占比为10.47%,河北产业规模占比仅为0.12%,反映出首都都市圈产业有一定的协作基础,但产业链规模占比差值巨大,也说明区域之间产业协同能力还存在差异性。

在交通通勤同城化程度方面,城际铁路联通率为29%,跨区通勤率占整体通勤率的3.5%,平均通勤时间1.5—2小时,反映出首都都市圈跨区的通勤需求较高,大量居住在环京区域的人有进京工作的需求,而区域轨道交通的联通率不高,导致通勤时长较长,受人们的生理和心理等多方面因素影响,通勤时长是存在上限的。研究表明,通勤时间超过60分钟的人,患抑郁症风险相比通勤较短时间的人高33%,同时,国际上多个都市圈的调查数据也验证了都市圈通勤时间的相对稳定性,通勤平均时间一般不超过1小时,就首都都市圈交通通勤的同城化而言处于偏低水平。

在公共服务同城化程度方面,2021年北京、天津和河北一般公共预算人均支出比分别为2.64:1.81:1,区域之间对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呈倍数差距。从万人拥有三甲医院数量来看,2021年北京每万人拥有0.04个三甲医院,天津每万人拥有0.03个三甲医院,而河北每万人拥有三甲医院数量仅为北京的7.5%、天津的10%,医疗资源的差距也直接反映出京津冀区域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巨大,将对首都都市圈同城化的推进产生一定阻力。

通过对比和评价可以发现,首都都市圈与长三角、珠三角在经济总量、轨道线长度占比、工业产值以及对人口的吸引力方面有着较大差距,整体来看,长三角同城化程度最高,京津冀与珠三角接近,但仍在三大经济体中处于较低水平。究其原因是在区域的同城化效应还未真正显现,区域内部各方面发展不够平衡,城市间存在较大差异。北京一家独大,在同城化发展的多方面和天津、河北存在不对等、不协调的状况。

四、首都都市圈同城化问题

首都都市圈同城化存在交通通勤能力较弱、产业协同能力有限、要素流通有障碍和公共服务分布不均等问题。

1. 交通设施联系不足,通勤能力较弱

从轨道联通度来看,首都都市圈的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建设较薄弱。截至2022年底,京津冀开通运营的轨道线路长度1235千米,占全国线网总长度的12.01%,但远远小于长三角地区的30.73%,且京津冀地区规划了14条城际铁路,其中有4条建成通车,轨道交通连通率仅29%;北京市域范围内轨道交通里程为1200千米,市郊铁路有4条,约360千米,其占全市轨道交通里程总长的33%,且目前仅有这4条市郊铁路投入运营。

就通勤能力来看,首都都市圈还存在交通转换不便、通勤成本偏高的问题。如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综合运输大通道基本形成,但是由于进京检查站的设置,公路路网的交通形成了“便而不捷、通而不畅”的局面,使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效应打了折扣。通勤时间普遍较长,北京周边毗邻地区进京的平均通勤距离约43.0千米,通常耗时为1.5—2小时,北三县是进京通勤规模最庞大的地区,其平均

通勤距离约36.3千米,平均通勤耗时为1小时48分钟;通勤成本较高,目前北京南站到天津站150千米,通过城际高铁只需耗时30分钟,但单程的通勤成本需要58元,作为日常通勤往返一次即需要100元以上,远远超出城市中的通勤成本,这也是都市圈中同城化通勤的阻力之一。

2. 产业结构差异大,协同能力有限

就京津冀的产业结构来看,2021年河北第三产业占比不足50%,目前仍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天津第三产业占比为61%,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后期阶段,而北京第三产业占比为82%,处于后工业化的发展阶段。由于京津冀三地产业结构处在不同维度,且三地产业梯度落差较大,其中北京主要集中在高附加值的研究开发和市场推广领域,拥有丰富的科技资源和人才、资金,而天津和河北的主要产业类型则是较为基础性的制造业服务部分,这使得天津、河北无法满足从北京迁移的企业的配套需要,降低了他们能吸纳北京转移企业的可能性,影响区域的产业协同合作。同时,这种现象也会加剧各城市间的经济发展失衡。在承接北京转移企业方面,河北承接了较多的低层次和对环境有污染的企业,如批发零售和传统制造等领域的企业,间接限制了河北高端产业的发展,加大了区域间产业的差距。

区域内产业能力差距大,集群难以发展。以集成电路产业链为例,北京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大,2023年上半年北京集成电路产量96.73亿块,占比89.42%;天津集成电路产量11.32亿块,占比10.46%;河北集成电路产量1289万块,占比0.12%。在京津冀地区,集成电路的主导部分主要包括芯片设计与生产以及相关产品和设备的生产,北京和河北的集成电路产业侧重于芯片设计,而天津则侧重于芯片生产及其相关产品和设备的生产。然而,该地区的上游半导体材料和设备,中游的半导体封装测试,以及下游的消费电子等相关行业相对较弱,这导致了各城市间的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难以实现有效整合和协作,也阻碍了其持续创新和形成规模化的可能性。

3. 市场还未统一,要素流通有障碍

首都城市圈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要素市场,城市化程度和人均GDP之间存在明显差距。因此,制造业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在该地区的

流动并不顺利。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人才更倾向于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工作,而人力资本也持续地流向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这使得经济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人才吸引现象变得更加明显。《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2》中数据显示,北京对人才的吸引力指数为100,天津是38.4,石家庄是26.8,人才向北京集聚的趋势明显,主要原因是大城市相比于中小城市就业机会多,收入水平高,且由于津冀两地大多数企业的数字化水平不高,上下游之间的物流、信息流、业务流、资金流等无法快速融通,形成了明显的市场差距。

都市圈中城市间的利益共享机制尚未建立。如收支两条线、属地化征收是中国财税体制的重要特征,加之自上而下的考核体制、城镇开发边界约束力不足,这导致城市间利益分配难以协调,而财税分享是城市间利益分享的核心。如在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权益划分不明确易形成北京、天津获益而河北承担主要的调整成本,形成不均等的收益局面,造成河北在都市圈的同城化过程中消极对待。

4. 公共服务分布不均,标准不统一

公共资源均等化水平较低,北京的一般公共预算人均支出是河北的2.6倍。截至2020年底,北京每万人拥有三甲医院数量0.04个,天津每万人拥有三甲医院数量0.03个,而河北每万人拥有三甲医院数量0.003个,其中张家口仅有1个三甲医院,唐山、保定各有8个,廊坊、承德各有5个。尽管京津两地拥有众多顶级的医疗机构,但是由于其服务全国各地庞大的患者群体,使得京津两地面临着一种“供应不足”的情况;而河北呈现另一种状况,即医疗质量的参差不齐难以满足巨大的人口基础及多元化的健康服务需求。就京津冀的教育状况看,优质教育资源在这三个地区间的分配极度失衡。北京和天津的教育水平在国内名列前茅,然而河北的表现相对滞后,其中重点小学和中学的数量只有北京的一半或四分之一。相比之下,北京和天津已经领先于大部分国内省份,实现了教育现代化的目标,有着大量的优秀幼儿园、中小学,而在河北这样的优质学校非常罕见。至于高等教育方面,北京和天津可以说是群英荟萃,北京拥有的顶尖大学多达36个,天津也有6个,反观河北却缺乏高品质的高等教育机构。

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及待遇标准还存在壁垒。当前京津冀医疗协同发展在医疗层面上的协作多是点对点的模式,基于医联体的支持,北京的各级医疗机构向河北的县乡级医院派遣了医护人员进行工作指导,以双向转诊的形式进行合作,效率较低,缺乏相应的人才流动机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和待遇标准也存在较大差异,目前,京津冀的就医目录暂不统一,参保人员在北京看门诊时的费用结算,按照北京医保规定的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等支付范围及有关规定执行,医保基金起付标准、支付比例、最高支付限额等执行参保地政策。

五、加快推动首都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构建首都都市圈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举措。同城化体现的是更高水平的区域发展一体化。未来,北京与环京周边地区需在现有相向而行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地缘相接走向深度融合,紧扣同城一体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利用行政、市场等多种手段,以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特别是大容量快速公共交通廊道建设为牵引,以加强公共服务配套合作和共建共享为抓手,促进产业转移承接和联系互动,深化多层次协同发展机制,增强职住协同和要素互补,共享同城化发展带来的资源整合、市场扩大、竞争力提升等红利,支持环京地区充分发挥首都发展的腹地作用,形成互促互利、共享共赢的协同发展新格局。

1. 强化设施联通,夯实同城化基础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推动同城化发展的前置条件和物质基础,现阶段环京地区通勤交通系统建设更是重中之重。按照“同城发展、适度超前”的原则,率先构建多层次、一体化交通体系,确保与城市中心城区的交通网络无缝连接,着力建设城际铁路,连接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北京城市副中心、雄安新区以及其他主要的城市交通枢纽,加强城际铁路、公交线路和定制巴士等对接,增强利用城市副中心线、京九线、京哈线、京广线等市域(郊)铁路服务长距离通勤出行能力,加快推动平谷线等毗邻地区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外拓环线铁路,优化都市圈公路网络联通结构。统筹推进水、

电、路、气、邮、信息、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统一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共同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智慧应用场景布局,形成一体规划、分工协作、贯通运营的同城化基础设施体系。

提高跨界通勤的便利性和效率,做好换乘、接驳优化工作。优化进京检查站布局,进一步加强通州、房山、大兴等地区与北三县、涿州、固安、武清等相邻地域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完善软件环境,促进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的票制票价互通、安检互信,鼓励采用同站台换乘、无缝衔接等提高换乘效率,着力打通不同部门间、运输方式间的信息壁垒,提高智慧化管理水平。探索消除行政区划藩篱。加大财税政策对公共交通通勤的支持,建议选择京津冀地区的北京和雄安新区作为试点,探索率先将两地间通勤员工交通费纳入驻地企业增值税抵扣项,或纳入通勤人员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以降低都市圈跨市通勤成本。

2. 增进服务共通,提高同城化黏性

着力推动北京与环京周边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政务服务一体化,强化共建共享,为同城化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加快北三县等外围人口聚集地区公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北京教育、医疗、文化等优质公共服务资源与其对接合作,推动学校跨界合作办学,鼓励有条件的医院建立分院或合作办院,让更多群众享受“京标服务”。京津两地要着力推动高尖端医疗资源发展,发挥高端医疗人才和先进医疗科技资源优势,促进成果转化,河北要借助京津优势,大力发展中医医疗,完善医疗体系;共建都市圈医疗认证标准,推进都市圈内病理检查结果、化验结果等互认共享。推动跨省域、跨市域进行学校合作办学,开展教育对口帮扶、专项经费补给等活动。构建教育科研资源互利、教育成果共享平台,支持学校间学分互认和教师互相流动以及课程互讲与交流;推进区域间产教融合,促进企业与职业院校对口合作,定向培养。

统筹编制公共服务项目清单,建立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和公共服务项目财政支出跨区域结转机制,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推进同城化高质量发展。深化社会保障领域合作,推行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制度,加快实现养老补贴跟着老人走,促进北京康养、孕产、母婴、养老等项目向外延伸布局。加强数字政府领域建设合作,推进政务服务系统互

通和标准互认,实现异地政务事项“一网通办”。构建首都都市圈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并联合推动社会保障信息共享平台建设,统一都市圈医保目录,有效衔接医疗报销政策。协同都市圈内养老服务政策和标准,加快实现养老同城化,让补贴跟着老人走。

3. 促进产业协同,增强同城化内生动力

加快构建一体融合的产业发展格局,持续深化产业分工合作,形成优势互补、共同繁荣的整体效应。尊重京津冀的发展基础和比较优势,明确城市产业功能定位,制定产业发展清单、转移清单,共建产业链、创新链清单等,为都市圈产业发展明确方向。北京具有服务业发展优势,天津在新型工业化发展方面是强项,河北拥有丰富的空间生态资源、低廉的土地价格和劳动力价格,理清互补优势,北京要深化帮扶,引导适宜产业向外围布局,缩小区域产业梯度差距,带动环京周边地区更好地承接科技溢出效应和产业转移。环京周边地区要充分发挥毗邻优势,沿不同方向打造多条联通北京中心城区和重点产业功能集聚区的经济发展廊道,以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为牵引,密切产业跨界协同协作,加快建立优势产业集群。通州区与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等重点区域要进一步做好产业发展的无缝对接。

加快区域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促进节点城市强链、补链。推动关键基础技术攻关,促进技术创新、标准制定、成果转化,为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打通“堵点”。聚焦区域产业合作基础较好的生物医药、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氢能、智能制造等重点产业链,深化产业链区域协作,协同培育和壮大跨区域的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形成紧密分工协作格局。加大对京津冀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支持力度,鼓励领头羊企业通过创新转型、并购重组等手段壮大实力,优先推动领头羊企业成为各个领域的冠军。持续实施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工程、民营企业对标提升行动,提升大中小企业整体配套和协同发展能力,全面提升区域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4. 深化制度创新,释放同城化活力

围绕支撑首都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构建跨行政区、弱化行政隶属关系的多层级行政主体协调

机制,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建立高度协调的发展机制。在规划管理、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生态保护、财税分享、营商环境构建和体制机制等方面推行全方位深化改革并实现系统的融合,形成一套一致性的政策框架,以此来驱动体制创新。联合创建都市圈发展基金,主要采用转移支付、直接投资、协助贷款的方式对关键领域、重要项目给予强有力的支援。利用产业基金增强申请项目的资金活动,充分运用当地政府债务政策,探索新的金融手段。创新都市圈各种因素资源交换平台建设,制定出配套的进入许可规则和评估指标,从而构筑起包括土地使用权、污染排放权、二氧化碳排放量、水源供应、能源消耗、财产所有权、技能、人力资本、资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信息的综合型管理平台,并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上设置若干个具有专门特长的子平台,以便促进各地区间的资源共同管理、调配和买卖。例如,创立科技创新资源共享和技术交流市场的单一化平台,搭建跨越不同区域的专利交易数据库,提升都市圈的技术研究能力和科学技术的转换效率;还可以成立“共享员工”“周末专家”等平台,借助灵活引进人才的方法来满足都市圈内各个公司在处理特定问题时对专

业人员的需求。

参考文献

- [1]高汝熹,杨勇.都市圈形成要素分析[J].当代经济管理,2006(4).
- [2]邹军,王学峰,陈小卉,等.都市圈规划[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 [3]高国力,邱爱军,潘昭宇,等.客观准确把握1小时通勤圈内涵特征 引领支撑我国现代化都市圈稳步发展[J].宏观经济管理,2023(1).
- [4]邢铭.沈抚同城化建设的若干思考[J].城市规划,2007(10).
- [5]王德,宋煜,沈迟,等.同城化发展战略的实施进展回顾[J].城市规划学刊,2009(4).
- [6]段德罡,刘亮.同城化空间发展模式研究[J].规划师,2012(5).
- [7]董燕菊,于书宇,胡谢利,等.首都都市圈产业协作分工研究[J].中国工程咨询,2023(1).
- [8]孙久文.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的实践要求[J].前线,2023(4).
- [9]王庆芳,周立群.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是跳出“北京思维”:《京津冀发展报告(2016):协同发展指数研究》评介[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6(8).
- [10]陆小成.高水平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J].前线,2023(6).
- [11]张京祥,邹军,吴启焰,等.论都市圈地域空间的组织[J].城市规则,2001(5).

Focusing on the Thinking of Urban Integration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 Metropolitan Area

Ou Xinquan Yu Fei

Abstract: Conforming to the law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integration is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building a modern capital metropolitan area. It is conducive to expanding Beijing's development space and promoting internal functional reorganization, improving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surrounding border areas, and enhancing the radiation and driving role of central cities. In recent year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ties between the surrounding areas around Beijing and Beijing have continued to increase, and key regional cooperation has continued to deepe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ame city has a good foundation. However, compared with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other regions with mature urban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there is still a big gap in the level of urban integration.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weak traffic commuting ability, limited industrial synergy ability, poor circulation of factors and unbalanced public services. We can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integration in the capital metropolitan area from the aspects of strengthening facilities connectivity, enhancing service sharing, promoting industrial synergy, and deepening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Key Words: Capital Metropolitan Area; Urban Integration; Commuting Circle; The Surrounding Areas around Beijing

(责任编辑:张子)

【城市经济研究】

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耦合协调时空演化分析

段琳琼 郝铭 赵修研 陈常优

摘要:在厘清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耦合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06—2020年黄河流域9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熵权法、超效率SBM模型、灰色预测模型GM等方法,并结合多项时空分析手段对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耦合协调水平及时空演化规律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均呈平稳增长态势,两者耦合协调水平处于轻度失调阶段,总体呈现中游>下游>上游的分布格局,未来十年耦合协调度指数仍将保持高速增长,均衡发展态势显著,但区域间仍存在一定差距。对此,应着力从新发展理念贯彻、土地利用管理方式的更新与相互机制入手,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耦合协调,互促共荣。

关键词:城市高质量发展;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耦合协调度;黄河流域

中图分类号:F2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4)02—0119—11 **收稿日期:**2023—10—10

作者简介:段琳琼,女,洛阳师范学院地理与旅游学院讲师(洛阳 471934)。

郝铭,男,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博士生(西安 710049)。

赵修研,男,河南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博士生(开封 475004)。

陈常优,男,河南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教授(开封 475004)。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这是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精准判断,也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逐步迈入了质量优先的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已成为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遵循与必然要求(魏敏等,2018)。城市作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基础形式,更应因势而新,向城市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毛艳,2020)。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我国城镇化率已由改革开放初期的17.9%增长到65.22%,城镇化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和转型发展的重要引擎。然而,以“土地财政”与“土地引资”为核心的发

展模式,在带来巨大的经济增长红利的同时,也使得城市发展陷入了“人地分离”的窘境,“土地城镇化”显著快于“人口城镇化”。一些地区“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模式,造成土地利用结构严重失衡,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土地供需矛盾尖锐。大量优质耕地资源流失,大批失地农民向城市涌入,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也最终影响到城市发展的整体质量与水平(彭冲等,2014)。因此,如何促进城市发展与土地利用相协调,推进城市发展与土地利用同频共振,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破题之钥。

从现有文献来看,关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高质量发展”理

念。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大批学者基于城市化质量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视角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进行了充分阐释,并开展了丰富的实证性研究。在评价体系的构建上,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城市发展的构成要素及其协调性进行搭建,如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进行划分(韩冬,2021)。而另一类则是从城市发展理念入手,注重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进行评价(赵敏,2021;张震等,2019)。测度手段主要有层次分析法(周志莹,2021)、熵权法(陈文烈等,2021)、主成分分析法(何雄浪等,2021)等。关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研究,构建指标体系,利用综合指数进行测度是早期研究的主要手段(周璞等,2011;廖进中等,2010),但随着学者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内涵理解的不断加深,以“投入—产出”为视角,以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作为投入指标,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作为产出指标,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进行测度与评价则成为目前较为流行的做法,常用的模型有DEA模型(梁流涛等,2013),Super-SBM模型(张诗嘉等,2021),SBM-Undesirable模型(聂雷等,2022)等。尽管学界对于城市高质量发展或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研究已较为翔实,但仍有不足。其一是关于两者协同关系的研究相对薄弱,或集中于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土地利用效率的单向研究,或仍停留于传统城镇化与土地利用间的相互影响,未能较好地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土地利用间的关系有效结合。其二是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已有现象的重复性描述,而缺乏对未来发展趋势的洞见。

黄河流域包含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9个省(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与经济社会发展纽带。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明确强调,要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加强协同配合,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2021年10月8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颁布,也标志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黄河流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在此背景下,选取黄河流域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城市发展与土地利用间的协同关系显得十分关键与必要。有鉴于此,本文以黄河流域为研究区,以流域内各城市为研究

单元,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全面反映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深度刻画城市发展与城市土地利用的协同关系,并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以期为黄河流域城市发展与土地利用效率提升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一、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耦合机理

城市高质量发展是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为导引的城市发展战略体系,是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高级阶段。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市土地利用间存在着显著的耦合关系,是人地关系的集中展现,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基本保障,而城市高质量发展则是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提高的重要途径与必然选择,两者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何莎莎等,2022)。

1. 新发展理念主导下的城市高质量发展是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跃升的重要引擎

一是城市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推动城市土地报酬保持递增。根据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在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不变的前提下,随着投入的增加,土地报酬也将随之增加,但当到达一定限度后,其报酬将随投入的增加而减少。若要继续保持递增,则往往需以变革技术为先导。以科技与教育为主的创新性投入,将有力推动土地利用技术的更新、土地管理方式的改进与土地管理人才的培养,为土地报酬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以此实现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跃升。二是城市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推动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的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与产业发展紧密相连,与城乡发展和对外开放同样密切相关。产业合理化与高级化通常意味着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意味着产业链的优化与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土地作为基础性要素更亦如此。而城乡协同发展与城市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在激发城市发展活力的同时,土地要素也与新发展格局相契合,土地要素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不断完善。因此,以协调与开放为导向的城市高质量发展将有力推动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三是城市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推动城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的提升。城市高质量发展以绿色与共享为导引,绿色通常意味着

环保、低碳与清洁生产,意味着土地利用方式的变革,意味着土地可持续利用与生态效益的提升。同样,共享体现了城市土地与社会的有机关系,体现了人地关系的根本性矛盾,体现着人与土地的和谐共生,意味着土地社会效益的提升。因此,以绿色与共享为基底的城市高质量发展将有力推动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跃升。

2.城市土地的高效利用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关键保障

一是城市土地的高效利用有利于满足城市发展的空间诉求。对于城市发展而言,能够有效满足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与新兴产业发展的用地需求,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城市土地的高效利用,可有效实现城市空间利用的最大化,有效降低基础设施建设成本,以此为未来城市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盈余,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基础。二是城市土地的高效利用有利于促进城市人居环境的提升。高效的土地利用水平意味着更高的土地投入水平与利用强度,意味着土地利用方式与土地利用结构的优化,意味着农田将不再遭受掠夺式征用,意味着生态环境将不再遭受无规划的侵扰,以此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有力推动城市人居环境的改善,为真正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关键保障。换言之,城市土地利用低效,即意味着城市规模无序扩张,土地资源浪费严重,有效发展空间不足,生态环境破坏,这都将严重制约城市高质量发

展。因此,应着力提升城市土地利用效率,避免土地低效利用,充分发挥城市土地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与保障性作用和城市高质量发展对于城市土地的引领性作用,以此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耦合协调(见图1)。

二、研究方法数据来源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该部分分析如何量化与测度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主要包括所需的研究方法、指标体系及数据来源等方面。

1.研究方法

耦合最初源于物理学概念,是指两个及以上的系统或运动形式通过相互之间的作用而导致彼此影响的现象(孙平军等,2012)。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耦合是指彼此间各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其大小反映了两者之间的耦合程度。但耦合度仅能反映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的大小,对其协调发展水平则难以测度,极易出现高耦合、低水平的现象(李涛等,2015)。因此,需要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从而更好地表征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U_1)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U_2)的耦合协调关系,具体模型如下:

$$C = 2 \left[\frac{U_1 \cdot U_2}{(U_1 + U_2)^2} \right]^{\frac{1}{2}} \quad (1)$$

$$D = \sqrt{CT}; T = \alpha U_1 + \beta U_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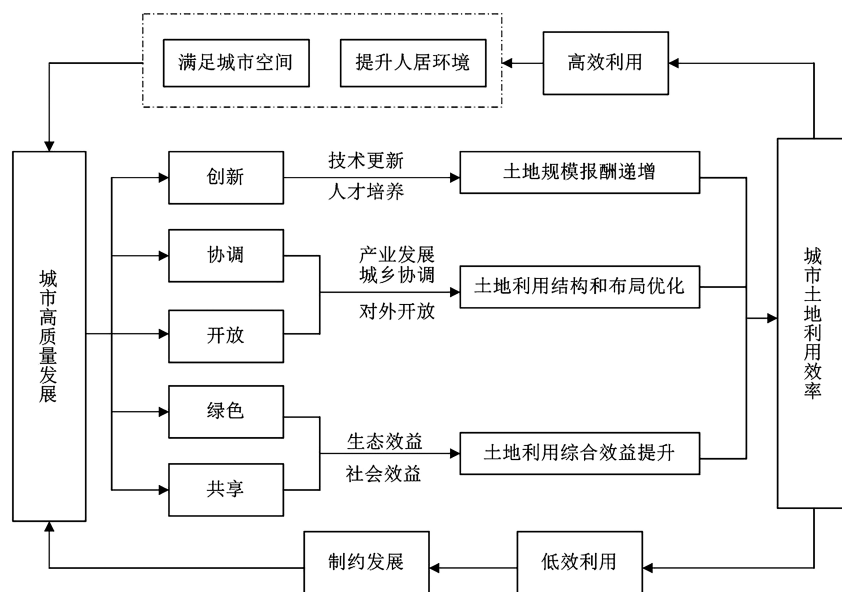


图1 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耦合机理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其中： U_1 和 U_2 分别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和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C 为两个系统的耦合度； α 、 β 为待定系数，本文参照相关研究（钟锦玲等，2021；韩磊等，2021），将 α 、 β 赋值为0.5和0.5； T 为两个系统的

综合发展指数； D 为协调度，表征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整体协调程度，并将其分为7个等级（见表1）。

其中对于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U_1)，本文选取

表1 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协调程度分级表

0—0.3	0.3—0.4	0.4—0.5	0.5—0.6	0.6—0.7	0.7—0.8	0.8—1
严重失调	重度失调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良好协调	优质协调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熵权法进行测度。具体公式可参见相关文献（杨文等，2015）。对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U_2)，本文则选取超效率SBM模型进行测度。具体公式请参阅相关文献（West, et al., 2020）。此外，为进一步探究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耦合协调度的未来趋势，本文利用灰色预测模型GM(1,1)进行预测。常用的灰色预测模型有传统灰色模型、新陈代谢灰色模型与新信息灰色模型，三者各具特点，又各具优势。因此，为确保预测精准，本文综合比较以上三种灰色模型预测结果，选取最优值作为耦合协调度预测的最终结果。但因耦合协调度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综合所得，为确保数据精准，本文分别预测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最后再经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得出，具体公式请参照相关文献（Hao, et al., 2022）。

2. 指标体系

参照以往研究，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主要选取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个维度25项指标对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王菡等，2023；马海涛等，2020；吴志军等，2020）。其中产业合理化水平与产业高级化指数参照干春晖等（2011）与付凌晖（2010）方法进行测算。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则基于“投入—产出”角度，选取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固定资产投资额与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人数为投入指标。选取第二、三产业增加值、人口密度与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为产出指标，用以表征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杨清可等，2014；张荣天等，2015；杨奎等，2018）。具体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

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与可获取性，本文以2006—2020年为时段，以黄河流域9个省（区）99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并参照相关研究的做法，将流域划分为上游、中游和下游3段（任保平等，2022），具体如表3所示。行政区划界限来源于全国地理信

表2 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	创新	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	
		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	
		万人国际互联网用户数	户/万人	
		万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人	
		城市创新创业指数	—	
	协调	金融机构存贷款之比	%	
		产业合理化水平	—	
		产业高级化指数	—	
		农村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	%	
	绿色	农村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之比	%	
		污水处理率	%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m ²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万元工业总产值二氧化硫排放量	t	
	开放	PM2.5年平均质量密度	μg/m ³	
		人均公路客运量	人	
		接待入境旅游者人数	万人	
		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之比	%	
		实际利用外资占GDP之比	%	
	共享	旅游外汇收入占GDP之比	%	
		职工平均工资	元	
		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	册	
		每千人拥有医院、卫生院床位数	张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投入	每百人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拥有专任教师数	人
			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量	辆
固定资产投资额			万元	
产出		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人数	万人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km ²	
		第二、三产业增加值	万元	
		人口密度	人/km ²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息资源目录服务系统(<https://www.webmap.cn/>)。经济社会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PM2.5数据来自Dalhousie University大气成分分析组公布的历年中国空气质量数据。城市创新创业指数来源于北京大学开放研究数据平台,对于部分年份指标数据的缺失,利用插值法进行补齐。

表3 研究区域

区域	地级市
上游	西宁、成都、自贡、攀枝花、泸州、德阳、绵阳、广元、遂宁、内江、乐山、南充、宜宾、广安、达州、资阳、眉山、巴中、雅安、兰州、嘉峪关、金昌、白银、天水、酒泉、张掖、武威、定西、陇南、平凉、庆阳、银川、石嘴山、吴忠、中卫、固原(36个)
中游	呼伦贝尔、通辽、乌兰察布、鄂尔多斯、巴彦淖尔、呼和浩特、包头、乌海、赤峰、太原、大同、阳泉、长治、晋城、朔州、忻州、晋中、吕梁、临汾、运城、西安、铜川、宝鸡、咸阳、渭南、汉中、安康、商洛、延安、榆林(30个)
下游	郑州、开封、洛阳、平顶山、安阳、濮阳、新乡、焦作、鹤壁、许昌、漯河、三门峡、南阳、商丘、信阳、周口、驻马店、济南、青岛、淄博、枣庄、烟台、潍坊、济宁、临沂、泰安、聊城、菏泽、德州、滨州、东营、威海、日照(33个)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三、结果分析

基于上述理论与方法的分析与整合,该部分对实证结果进行具体分析,主要包括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黄河流域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以及其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格局与未来趋势。

1.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

从总体上看,2006—2020年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呈稳步上升趋势,年均指数值为0.112(见图2)。2006—2007年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小幅抬升明显,后续时段逐步放缓,2009—2019年其指数迎来快速增长期,年均增长比率达11.71%,2020年出现小幅下滑。城市高质量发展以新发展理念为架构,但其底色仍建立在雄厚的物质基础之上,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政策引导及外部环境等因素紧密相关。研究初期,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城市发展也迎来增长高峰。但随之而来的

全球金融风暴,在给经济带来更大下行压力的同时,也给城市发展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的影响,城市发展活力也略有放缓。2009年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势头的回升向好,“十二五”纲要强调遵循城市客观规律及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我国城市化进程再次迎来新的发展契机。2014年后,随着我国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2014年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正式颁布,以人为核心与以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成为城市发展的新模式,再次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而2020年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出现小幅下滑,或与新冠疫情影响有关。分区域来看,2006—2020年黄河流域上游、中游及下游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走势与总体趋势基本持平,其指数分布明显呈下游>中游>上游的基本格局,年均高质量发展指数分别为0.124、0.116与0.097。

2.黄河流域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由上述指标,经超效率SBM模型计算可得,如图3所示。从总体上看,2006—2020年黄河流域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大致呈先下降再增长的U形趋势,但各年效率值起伏较小,整体变动趋势较为平稳,年均效率值为0.686。2006—2009年黄河流域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值维系在0.7之上,后续时段略有下滑,但均保持在0.6—0.7之间,2014—2016年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略有下降,2016—2020年再次回归增长走势。在城市发展初期,土地城镇化往往成为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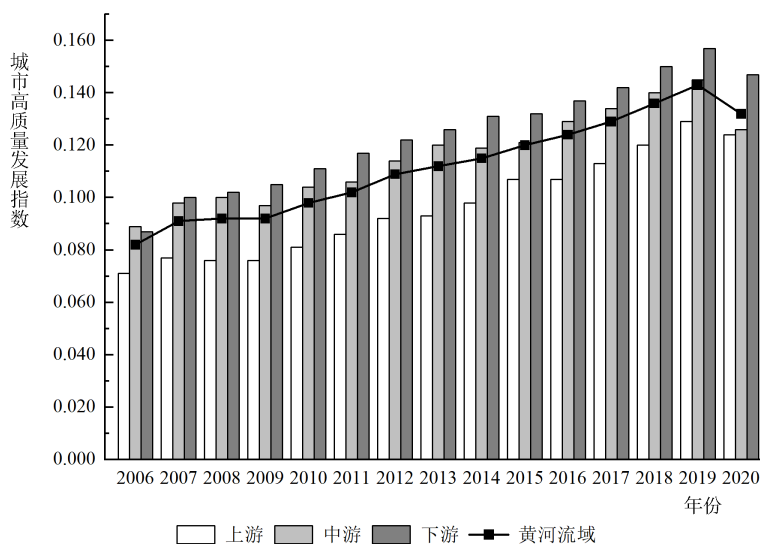


图2 2006—2020年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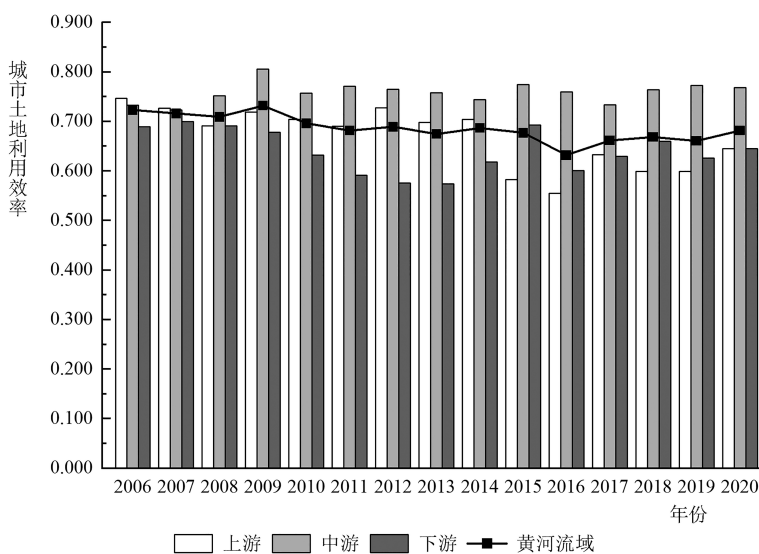


图3 2006—2020年黄河流域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市谋求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城市盲目扩张,粗放式土地利用等导致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下降,但伴随着城市经济逐步迈入以质量为主导的常态化阶段,城市发展进入新型城镇化阶段,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也逐渐回升。但因土地要素相对稳定的特性,使得整体变动相对较小。分区域来看,2006—2007年三大流域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差异不大,上游与中游地区走势紧密,效率值略高于下游地区。2008年后各区域分异显著,中游持续处于高位,上游与下游地区位次互有交替。上游、中游、下游地区年均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值分别为0.668、0.759与0.640,中游地区明显高于上游与下游地区,总体呈现出中游>上游>下游的基本格局。

3.耦合协调的时空分异格局

第一,静态特征。经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可得到2006—2020年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耦合协调度(见表4)。从总体上看,2006—2020年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呈稳步上升态势,年均耦合协调度为0.471,属轻度失调型。2006—2014年耦合协调度增幅明显,增幅比率达18.11%,后续时段逐步放缓,2016—2019年耦合协调度再次迎来快速增长期,增长比率达7.18%,2020年略有下滑。分区域来看,2006—2020年黄河流域上游、中游及下游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年均耦合协调度分别为0.438、0.492与0.487。中游地区与下游地区互有波动,耦合协调度基本呈中游>

下游>上游的分布格局,中游与下游地区与黄河流域总体走势关联紧密,而上游地区则与总体曲线分异明显,与总体曲线的最高差值为0.048。

第二,动态特征。为进一步分析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耦合协调度的时序演进趋势,本文利用核密度曲线进行表征(见图4)。就黄河流域整体而言,从形状上看,2006—2020年核密度曲线逐步由多峰向单峰的演变,表明耦合协调度极化现象日益减弱,呈现出均衡发展的态势。从峰度上看,各曲线峰度按年份呈稳步上升趋势,2011—2016年峰度提升明显,2016—2020年峰度再次快速提高,表明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取得较高增长。

从位置上看,2006—2020年密度曲线波峰中心向中部偏移明显,全域耦合协调度水平得到整体提升,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得到持续优化。就各流域而言,上游与中游地区核密度曲线均呈现由多峰向单峰不断推进的态势,且波峰中心向中部偏移明显,表明中上游耦合协调度得到整体提升,区域间差异不断缩小。而下游地区波峰中心中部偏移明显,表明下游地区耦合协调度同样得到快速提升,但与上游与中游地区相比,

表4 2006—2020年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耦合协调度

年份	黄河流域	上游	中游	下游
2006	0.409	0.391	0.412	0.425
2007	0.432	0.406	0.438	0.455
2008	0.437	0.396	0.454	0.465
2009	0.447	0.409	0.469	0.468
2010	0.450	0.415	0.472	0.469
2011	0.455	0.425	0.478	0.466
2012	0.469	0.448	0.497	0.466
2013	0.473	0.447	0.504	0.472
2014	0.483	0.456	0.503	0.494
2015	0.486	0.438	0.512	0.514
2016	0.481	0.436	0.517	0.499
2017	0.499	0.466	0.518	0.518
2018	0.509	0.466	0.530	0.536
2019	0.516	0.479	0.542	0.531
2020	0.515	0.493	0.528	0.527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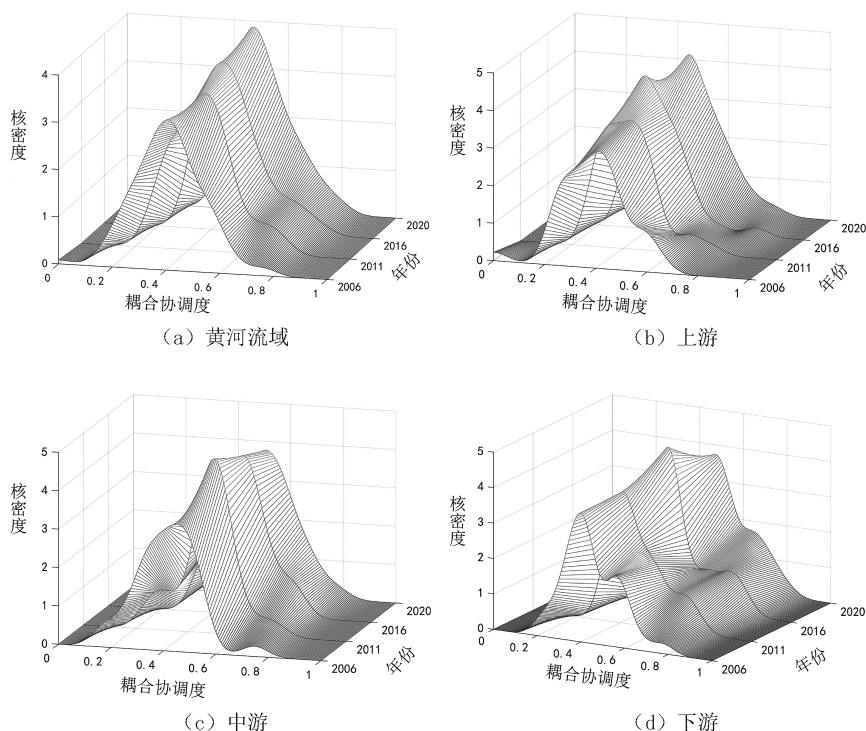


图4 2006—2020年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耦合协调度核密度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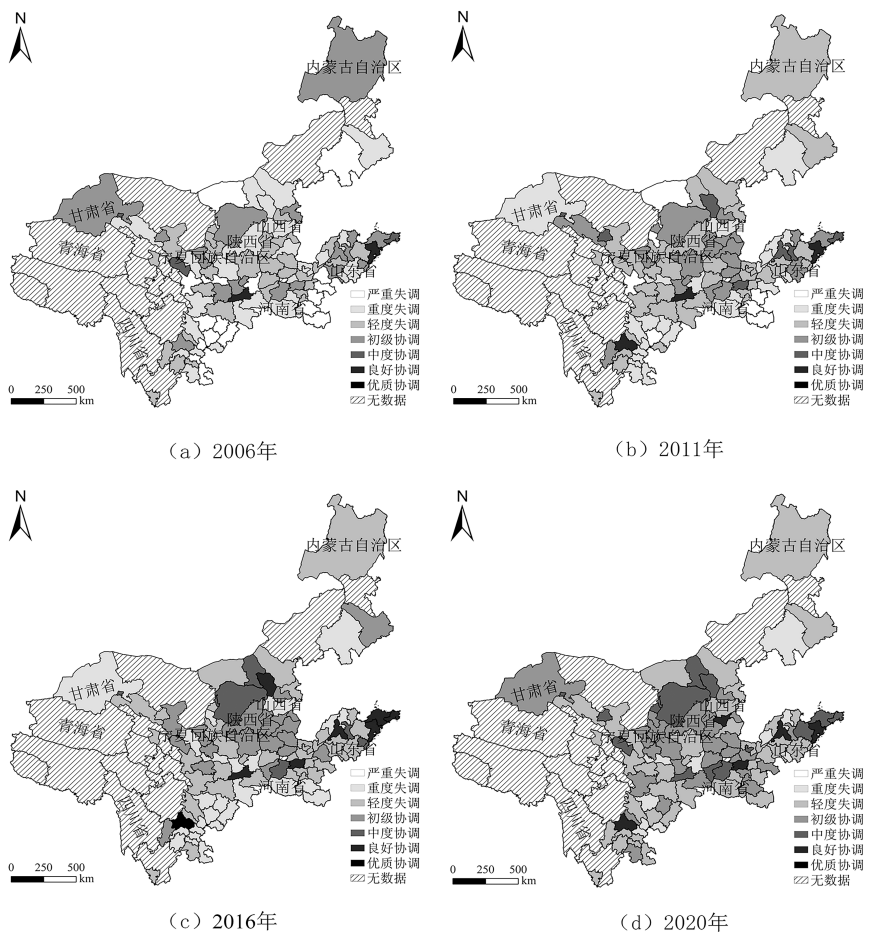


图5 2006年、2011年、2016年和2020年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区域间差异较大,多峰趋势依旧存在。

4.耦合协调的空间格局

第一,静态特征。为充分展示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格局,选取2006年、2011年、2016年与2020年4期截面数据(见图5)。2006年,全域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偏低,中度协调与良好协调区域零散分布于山东东部地区、陕西与甘肃中部地区。初级协调区也仅分布于山东中东部地区、河南中部地区、甘肃北部地区、内蒙古中部地区与北部地区等地,其余大部分地区为轻度失调区与重度失调区,严重失调区主要分布于内蒙古东部地区、陕西中部地区、甘肃南部地区、河南与四川东部地区等地。2011年,全域耦合协调水平提升显著,严重失调区范围大面积缩减,仅在内蒙古中部地区、甘肃南部地区、陕西、河南与四川东部地区等地有少数分布,重度失调区范围也不断锐减,中度协调区与良好协调区增多,初级协调区范围扩张明显。2016年,全域耦合协调水平继续提升,严重失调区已无分布,重度失调区也仅在甘肃北部地区、四川东部地区、陕西中部地区与南部地区、河南南部地区、山东北部地区等地少数分布,轻度失调以上更优等级耦合协调度类型的地区分布数量继续增多,优质协调区首次出现,仅在四川中部地区分布。2020年,全域耦合协调水平再次提升,严重失调区与2016年一致,已无分布,重度失调区也仅在内蒙古东部地区、陕西东部地区与四川中部地区

等地零星可见,轻度失调与初级协调成为全域主流,中度协调区与良好协调区数量也有明显增加,在山东东部地区有集中连片分布。

第二,动态特征。为进一步反映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演进格局,本文利用ArcGIS10.8中的标准差椭圆工具进行表征。2006年、2011年、2016年、2020年的重心坐标分别为(110.54°E,35.76°N)、(110.59°E,35.72°N)、(110.68°E,35.77°N)与(110.44°E,35.70°N),移动距离分别为6.29km、10.74km与25.05km,移动速度分别为1.26km/年、2.15km/年、6.26km/年。由此可知,2006—2020年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耦合协调度重心经历了由“东南—东北—西南”的演进过程,重心基本位于山西和陕西交界处,东西拉扯移动明显,表明随着黄河中上游地区实力的不断增强,地区间的差异不断缩小,整体呈现出日益均衡的发展态势。

5.未来趋势预测分析

在最优预测模型的基础上,将上述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预测结果代入耦合协调度模型中,经计算,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从总体上看,2021—2030年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耦合协调度呈稳步上升态势,年均耦合协调度为0.537,属初级协调型。分区域来看,各流域耦合协调度均保持较快增长,上游与下游地区增长势头强劲,到2025年,全域全面进入初级协调阶段,区域均衡发展态势显著,但地区间仍存在一定差距,总体还呈现中游>下游>上游的基本格局。

表5 2021—2030年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耦合协调度

年份	黄河流域	上游	中游	下游
2021	0.513	0.483	0.536	0.522
2022	0.518	0.488	0.541	0.530
2023	0.524	0.494	0.547	0.537
2024	0.529	0.499	0.552	0.545
2025	0.534	0.504	0.558	0.552
2026	0.539	0.509	0.564	0.558
2027	0.545	0.514	0.569	0.563
2028	0.550	0.519	0.575	0.567
2029	0.555	0.524	0.580	0.572
2030	0.560	0.529	0.586	0.580
平均值	0.537	0.506	0.561	0.553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四、存在的问题

基于上述结果分析,该部分将重点对其模型计算结果进行梳理,以探查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及两者时空耦合协调存在的一些问题。

1.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不高,区域发展差异显著

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流域整体趋势与上中下游趋势基本持平,但年均指数仅为0.112,高质量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且区域发展差异性显著,呈现出下游(0.124)最优、中游(0.116)次之、上游(0.097)最差的格局,上游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尤为不足。高质量发展是综合性的战略发展理念,不仅要关注其增长的速度与规模,还要注重其发展的质量、效益与可持续性。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不高,区域异质性明显,由此也进一步揭露出片面追求城市经济高速增长或高城镇化率的传统发展模式弊病依然严峻,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意识与能力还相对薄弱,后续改革仍然任重而道远,急需先进发展理念的正确引导。

2.黄河流域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增长趋势较弱,增长力度一般

黄河流域年均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为0.686,整体水平尚可,但增长势头相对较弱,增长能力相对不足,发展趋势趋于平缓,且区域发展差异性依旧显著,呈现出中游地区(0.759)最优、上游地区(0.668)次之、下游地区(0.640)最差的基本格局。中游地区土地利用效率一骑绝尘,上游与下游地区相对较差,尤其是下游表现最为明显,与高质量发展水平完全相异。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体现了城市在土地资源管理和城市规划过程中的综合性水平。黄河流域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增长势头不足,表明其土地管理的能力还需进一步提升,土地管理的方式与手段需进一步改进。此外,黄河流域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区域差异性明显,中游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较优,但仍不可放松警惕,还需加以引导,使其保持高效的土地利用水平。对于上游与下游地区,尤其是下游地区要完善规章制度,提升土地利用效率。

3.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协调程度不佳,属轻度失调阶段

2006—2020年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年均耦合协调度为0.471,处于轻度失调阶段,上中下游耦合协调度指数分别为0.438、0.492与0.487,与城市高质量发展和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相比,区域间整体差异较小,但根据灰色预测的结果可知,未来十年,区域间仍存在一定差距。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耦合协调度不高,表明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配合度不佳,城市高质量发展未能很好地促进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反之,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助力相对不足,两者的协同机制还不够完善与健全。此外,不同区域间的发展差异性仍需进一步加以平衡。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黄河流域各市为研究区,以2006—2020年为研究时段,综合利用多种手段,对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发展情况进行测度,并对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和预测,其结论如下:

第一,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基本情况。2006—2020年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整体呈稳步上升态势,年均指数为0.112,总体呈下游>中游>上游的基本格局。2006—2020年黄河流域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整体趋势趋于平稳,年均效率值为0.686,总体呈中游>上游>下游的基本格局。第二,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时空耦合格局。从时序特征上看,2006—2020年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耦合协调度呈稳步上升态势,年均耦合协调度为0.471,属轻度失调阶段,地区间极化现象日益减弱,均衡发展态势明显。分流域来看,总体呈中游>下游>上游的分布格局。从空间特征上看,2006—2020年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耦合协调度随时间推移提升显著,全域严重失调与重度失调范围明显缩小,中度协调以上区域范围明显扩大,尤其是下游地区呈集中连片分布。耦合协调度重心经历了由“东南—东北—西南”的演进过程,中上游地区实力不断增强,

地区间差异不断缩小。第三,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耦合协调趋势。2021—2030年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耦合协调度呈持续增长态势,耦合协调关系不断优化,年均耦合协调度为0.537,为初级协调型。分流域来看,总体呈中游>下游>上游的分布格局。

未来,要从以下三个层面着力提升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耦合协调度。

1.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推进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

充分发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对城市发展的引领性作用,全面推动城市发展模式变革,消除已有发展遗留下来的弊病与顽疾,培养新动能与新机制,不断为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蓄能助力,推进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现。黄河流域上游地区位于我国西部地区,对外交流相对封闭,资金、技术与人才相对不足,且上游地区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应在协调与绿色上重点发力。重点推进上游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城乡发展一体化与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夯实经济发展基础,缩小城乡发展差异,构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局面,进而有效提升上游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对于发展相对较优的中游与下游地区,应在协调与绿色的基底上,在创新、共享与开放上苦练内功,加大教育与科研投入力度,夯实创新基础,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用好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协作,实现黄河流域协同与均衡发展。

2.以土地管理与利用方式更新为抓手,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着力从土地资源的管理方式与利用手段入手,不断更新土地管理能力与技术水平,培育核心驱动力,推进黄河流域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快速跃升。对于较优的中游地区而言,应重点加强土地动态巡查力度,规范城市土地用地秩序,减少土地违规行为与浪费现象的发生,实现城市土地资源有序配置,持续保持城市土地高效利用。对于上游地区而言,则应重点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先导,制定科学合理的城市空间发展战略体系,从源头遏制粗放式的城市土地利用发展模式,进而为城市高质量发展开好局、走好步。对于利用效率较差的下游地区而言,初期“摊大饼”式的扩张模式所引发的弊病逐渐显

露,出现高发展水平而低土地利用效率的不协调现象。因此,在做好监督与规划保障的同时,重点以土地整治为抓手,盘活城市内部低效与闲置土地,加快城市旧城区更新与改造,挖掘城市内部土地潜力。发挥好下游区域优势,充分吸纳先进技术手段,实现城市土地利用精细化与智慧化管理,进一步提升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3.以协同机制构建为支撑,探索黄河流域城市发展新路径与新机制

构建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协同机制,畅通两者的交流互动路径。一方面,充分发挥城市高质量发展对城市土地报酬递增、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优化与城市土地综合效益提升的引导作用。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城市土地高效利用对城市发展空间诉求与城市人居环境提升的基础性与保障性作用,从而真正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交互协调,真正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共荣互促。把握好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平衡协调,避免高质量而低效率等失衡现象的出现。同时,也要坚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势利导的政策落实原则,根据黄河流域各省(区)自然条件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采取差异化的政策执行策略,避免政策执行简单化、一刀切,从而真正实现黄河流域城市的健康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 [1] WEST T O, MARLAND G. A synthesis of carbon sequestration, carbon emissions, and net carbon flux in agriculture: Comparing tillage pract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J]. *Agriculture ecosystems & environment*, 2002, 91(1—3): 217—232.
- [2] HAO M, LI G, CHEN C Y, et al. A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tourism resource conversion efficiency: A case study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n China[J]. *Sustainability*, 2022, 14(21): 14007.
- [3] 彭冲, 陈乐一, 韩峰. 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时空演变及关系[J]. *地理研究*, 2014(11).
- [4] 韩冬. 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及空间格局演进研究[J]. *生态经济*, 2021(6).
- [5] 赵敏. 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系统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变及驱动力研究[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21(10).
- [6] 张震, 刘雪梦. 新时代我国15个副省级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构建与测度[J]. *经济问题探索*, 2019(6).
- [7] 周志莹. 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测度及跨区域比较: 以南京等八城市为例[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6).
- [8] 陈文烈, 李小琴, 李生芳. 兰西城市群助推青海农牧区高质量发展研究: 基于青海涉藏六州的经验数据[J].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4).
- [9] 何雄浪, 史世姣. 人口流动、环境规制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J]. *财经科学*, 2021(12).
- [10] 周璞, 张文新, 庄力, 等. 北京城乡结合部土地利用效率及其影响机理研究: 以丰台区为例[J]. *安徽农业科学*, 2011(5).
- [11] 廖进中, 韩峰, 张文静, 等. 长株潭地区城镇化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2).
- [12] 梁流涛, 赵庆良, 陈聪. 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空间分异特征及优化路径分析: 基于28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实证研究[J]. *中国土地科学*, 2013(7).
- [13] 张诗嘉, 刘晓英, 杜书云. 中原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1(10).
- [14] 聂雷, 王圆圆, 邵子南, 等.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测度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十大城市群的实证分析[J]. *经济问题探索*, 2022(2).
- [15] 何莎莎, 方斌, 李欣, 等.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与高质量发展时空演变及交互响应: 以江苏省为例[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22(5).
- [16] 孙平军, 丁四保, 修春亮. 北京市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耦合协调性分析[J]. *城市规划*, 2012(5).
- [17] 李涛, 廖和平, 杨伟, 等. 重庆市“土地、人口、产业”城镇化质量的时空分异及耦合协调性[J]. *经济地理*, 2015(5).
- [18] 钟锦玲, 周兴, 李文辉. 广西高质量发展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耦合协调性[J]. *水土保持通报*, 2021(3).
- [19] 韩磊, 何佟佟, 杨勇. 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与土地利用效率耦合协调度评价: 基于黄河流域七大城市群的实证分析[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1).
- [20] 杨文, 刘永功. 中国城市发展质量评价[J]. *城市问题*, 2015(2).
- [21] 魏敏, 李书昊. 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8(11).
- [22] 毛艳. 中国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J]. *统计与决策*, 2020(3).
- [23] 王茜, 吕本富, 徐晓辰. 数字经济、产业结构与城市高质量发展: 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分析[J]. *城市问题*, 2023(7).
- [24] 马海涛, 徐植枋. 黄河流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评估与空间格局分异[J]. *经济地理*, 2020(4).
- [25] 吴志军, 梁晴.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比较与战略路径[J]. *当代财经*, 2020(4).
- [26] 干春晖, 郑若谷, 余典范.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

- 和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5).
- [27]付凌晖.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2010(8).
- [28]杨清可,段学军,叶磊,等.基于SBM-Undesirable模型的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评价:以长三角地区16城市为例[J].
资源科学,2014(4).
- [29]张荣天,焦华富.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格局演
变及驱动机制研究[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5(3).
- [30]杨奎,文琦,钟太洋.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评
价[J].资源科学,2018(10).
- [31]任保平,巩羽浩.黄河流域城镇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
研究[J].经济问题,2022(3).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alysi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Urba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Urban Land Use Efficiency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Duan Linqiong Hao Ming Zhao Xiuyan Chen Changyou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coupling mechanism between urba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urban land use efficiency,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99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rom 2006 to 2020, we comprehensively applie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 model, entropy weight method, super-efficiency SBM model, and grey prediction model GM (1,1), and combined with a number of spatio-temporal analytical tools to conduct an in-depth analysis o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 and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law of urba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urban land use efficiency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 and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law were analyzed in depth.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level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iti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the efficiency of urban land use have shown a steady growth trend, and the level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two is in the stage of mild dysfunction, generally showing a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midstream>downstream>upstream, and the index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in the next ten years will still maintain a high rate of growth, and the situation of balanced development is remarkable, but there is still a certain gap between the regions. In this regard, we should focu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the renewal of land use management and mutual mechanisms to realize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of urba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urban land use efficiency, and to promote mutual co-prosperity.

Key Words: Urba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Urban Land Use Efficiency;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Yellow River Basin

(责任编辑:张子)

【区域开放与合作】

中国各地区内外贸模式及其融入新发展格局研究

段庆林

摘要:中国各省(区、市)如何融入新发展格局,需要深刻认识各省(区、市)对内对外贸易特征。综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果,中国各省(区、市)的内外贸模式可以划分为双循环经济、外向型经济、自洽型经济、均衡型经济、内贸型经济、沿边型经济、输入型经济等七种类型。随着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形势的不断分化,外向型经济地区的外贸依存度大幅下降,多数地区基础设施投资能力降低,中国经济发展格局面临重塑。各地区要融入新发展格局,一是要提升国际大循环的质量和水平,二是要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动力,三是要增强经济双循环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关键词:内外贸模式;新发展格局;外向型经济

中图分类号:F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4)02—0130—08 收稿日期:2023—09—24

作者简介:段庆林,男,宁夏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二级研究员(银川 750004)。

2020年4月,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各地区如何融入新发展格局,需要深刻认识各省区对内对外贸易特征,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中国区域经济分析主要是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分法,体现了地理等因素的影响,经过改革开放后沿海、沿边、内陆地区的陆续开放,东部地区依然是中国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区域。近年来,受中国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中美贸易脱钩等影响,中国各地区对外贸易依存度大幅度下降,外向型经济对国内经济带动作用降低,中国各地区内外贸模式面临深刻变革。目前,由于缺乏数据资料,学界对融入双循环研究更多地是以定性研究为主,基于此,本文利用中国地区投入产出表数据,定量分析国内经济循环问题,采用出口、进口、国内省外流出、国内省外流入、对外贸易依存度、内贸依存度等指标,对各省(区、市)内外贸模式进行

了聚类分析,形成七大经济循环模式,将国内经济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分析相结合,深入研究各地经济循环关系,并提出了构建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对策建议,对于中国各地区深度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各地区内外贸模式的总体特征

利用《中国地区投入产出表—2017》,选取全国各省(区、市)总产出、GDP、出口额、进口额、国内省外流出额、国内省外流入额、内外贸比、外贸依存度、内贸依存度、流出率、流入率等指标,经过聚类分析,并采取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方法,可以将中国各省(区、市)内贸外贸模式划分为以下若干类型:双循环经济、外向型经济、自洽型经济、均衡型经济、内贸型经济、沿边型经济、输入型经济等。其中双循环经济、外向型经济属于外向型经济的两种形态,其他类型均为不同类型的内向型经济为主的经济形态(见表1)。

表1 中国各地区内外贸模式及特征

类型	地区	特征
双循环经济	北京、上海、重庆	具有高外贸依存度和高内贸依存度,高流出率和高流入率,重庆内贸依存度高
外向型经济	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新疆	具有较高的外贸依存度和一定的内贸依存度,新疆内贸依存度较高
自洽性经济	四川、山东、湖北、湖南	本省人口及产业配套高,本省形成资本积累和居民消费、流出率和流入率较低
均衡型经济	河北、河南、安徽、山西	以内陆地区为主,靠近沿海地区,具有中等的外贸和内贸依存度
内贸型经济	陕西、宁夏、吉林、江西、贵州、海南	以内陆地区为主,以参与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内贸依存度高
沿边型经济	黑龙江、辽宁、内蒙古、云南、广西	边疆地区,边贸经济相对活跃,但内贸依存度依然较高
输入型经济	西藏、青海、甘肃	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自然条件较差,商品流入率远高于流出率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从投入产出资料分析(见表2),中国参与国内国际经济大循环具有以下特征:一是中国国内贸易额是比进出口额更大的市场。2017年,中国各省(区、市)国内省外流出流入额合计为150.9万亿元,是全国进出口额31.6万亿元的4.78倍。二是外向型经济、双循环经济、自洽型经济三个地区是我国的经济中心。2017年,中国GDP中,双循环经济地区占9.22%,外向型经济地区占34.11%,自洽型经济地区占21.13%,三个地区合计占全国GDP的64.46%,是我国主要的经济中心。三是外向型经济地区和双循环经济地区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地区。外向型经济地区出口额、进口额分别占全国出

口额的62.43%、进口额的46.74%,双循环经济地区出口额、进口额分别占全国出口额的14.53%、进口额的32.38%,两个地区合计占全国出口额的76.96%,占全国进口额的79.12%,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地区。四是外向型地区和双循环经济地区是中国国内贸易的主要地区。外向型经济地区国内省外流出额占全国比重为25.91%,国内省外流入额占全国比重为27.88%,双循环经济地区国内省外流出额占全国比重为29.42%,国内省外流入额占全国比重为23.56%,两个地区合计占国内省外流出额的55.33%,占国内省外流入额的51.44%,也是中国国内贸易的主要地区。

表2 中国各经济循环类型基本情况(2017年)

单位:亿元,%

	全国		双循环经济		外向型经济		自洽型经济		内贸型经济		均衡性经济		沿边型经济		输入型经济	
	数值	数值	比重	数值	比重	数值	比重	数值	比重	数值	比重	数值	比重	数值	比重	
总产出	2463092.5	234208.1	9.51	847918.6	34.42	537415.2	21.82	211936.1	8.60	385015.6	15.63	219218.1	8.90	27380.8	1.11	
GDP	847140.14	78072.64	9.22	288956.61	34.11	178995.5	21.13	78296.54	9.24	121115.52	14.30	90307.68	10.66	11395.65	1.35	
出口	162560.4	23627.1	14.53	101482.4	62.43	16352.7	10.06	6268.5	3.86	8723.8	5.37	5968.7	3.67	137.2	0.08	
国内省外流出	720300.9	211884.5	29.42	186607.1	25.91	35762.3	4.96	110236.4	15.30	100507.2	13.95	70271.6	9.76	5031.8	0.70	
进口	153113.5	49571.6	32.38	71562	46.74	11836.6	7.73	7073.7	4.62	5310.4	3.47	7544.4	4.93	214.8	0.14	
国内省外流入	789028.5	185871.8	23.56	219980.9	27.88	52789	6.69	123069.7	15.60	112995.4	14.32	86007.3	10.90	8314.4	1.05	
内外贸易比	4.78	5.43		2.35	3.14			17.49		15.21		11.56		37.92		
外贸依存度	37.26	93.76		59.89	15.75			17.04		11.59		14.96		3.09		
内贸依存度	178.17	509.47		140.71	49.47			297.98		176.28		173.05		117.12		
流出率	104.22	301.66		99.70	29.12			148.80		90.19		84.42		45.36		
流入率	111.21	301.57		100.90	36.10			166.22		97.68		103.59		74.85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地区投入产出表—2017》中数据计算得到。

二、中国各地区内外贸模式的区域特征

根据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地理区位和板块特征,可以从四大板块、沿海沿边、流域经济等不同维度对各地区的贸易模式进行具体分析。

1. 四大板块分析

按照四大板块分析(见表3),东部地区是中国主要经济中心和对外贸易中心,2017年,东部地区GDP占全国比重为52.9%,出口额占比为81.9%,进口额占比为81.6%,东部地区外贸依存度为57.63%。东部地区也是国内贸易的重要地区,东部地区国内省

外流出额占全国比重为49.1%,国内省外流入额占比为46.6%。另一个国内贸易的重要地区是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国内省外流出额占全国比重为24.8%,

国内省外流入额占比为27.0%,西部地区内贸依存度是232.5%。东北地区外贸依存度和内贸依存度都比较高。中部地区流出率和流入率均相对较低。

表3 中国四大板块内外贸模式分析

单位:亿元,%

	全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西北地区		东北地区	
	数值	比重	数值	比重	数值	比重	数值	比重	数值	比重	数值	比重
总产出	2463092.5	100.0	1371249.6	55.7	522119.9	21.2	427124.1	17.3	114200.7	4.6	142598.9	5.8
GDP	847140.14	100.0	447835.61	52.9	176486.6	20.8	168561.48	19.9	46309.1	5.5	54256.45	6.4
出口	162560.4	100.0	133170.4	81.9	12671.6	7.8	13131.3	8.1	3769.5	2.3	3587.1	2.2
国内省外流出	720300.9	100.0	353567.7	49.1	114240.7	15.9	178786.6	24.8	46912.5	6.5	73705.9	10.2
进口	153113.5	100.0	124895.1	81.6	6760.5	4.4	12906.3	8.4	5401.3	3.5	8551.6	55.6
国内省外流入	789028.5	100.0	367340	46.6	132381.3	16.8	213118.5	27.0	60856.9	7.7	76188.7	9.7
内外贸易比	4.78		2.79		12.69		158.05		11.75		12.35	
外贸依存度	37.26		57.63		11.01		15.45		19.80		22.37	
内贸依存度	178.17		160.98		139.74		232.50		232.72		276.27	
流出率	104.22		108.69		71.91		113.86		109.44		142.46	
流入率	111.21		109.91		78.84		134.09		143.08		156.18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地区投入产出表—2017》中数据计算得到。

2.沿海、内陆、沿边地区分析

按照区位分析(见表4),2017年,沿海地区出口额占全国比重为79.75%,进口额占比为70.5%,外贸依存度高达53.56%。沿海地区也是中国重要的内贸地区,分别占全国国内省外流出额的41.1%,国内省外流入额的41.0%。内陆地区是中国最重要的内贸地区,其GDP总量占全国比重为36.6%,

国内省外流出额占全国比重为45.8%,国内省外流入额占比为44.3%。内陆地区外贸依存度和内贸依存度分别为20.14%和219.40%。沿边地区出口额和进口额占全国比重分别仅为2.8%和7.4%,边贸是沿边地区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形式,但边贸额占比并不高。沿边地区的内贸依存度和商品流入率均较高,对内地制造业产品的输入依赖较大。

表4 中国沿海、内陆、沿边地区分析

单位:亿元,%

	全国	沿海地区		内陆地区		沿边地区	
	数值	数值	比重	数值	比重	数值	比重
总产出	2463092.5	1348092.3	54.7	881240.1	35.8	233760.1	9.3
GDP	847140.1	443229.9	52.3	309874.3	36.6	94035.9	11.1
出口	162560.4	129482.5	79.75	28488.1	17.5	4589.8	2.8
国内省外流出	720300.9	296070.5	41.1	329997.1	45.8	94233.3	13.1
进口	153113.5	107891.7	70.5	33913.6	22.1	11308.2	7.4
国内省外流入	789028.5	323880.4	41.0	349858.1	44.3	115290.0	14.6
内外贸易比	4.78	2.61		10.89		13.18	
外贸依存度	37.26	53.56		20.14		16.91	
内贸依存度	178.17	139.87		219.40		222.81	
流出率	104.22	96.01		115.69		105.09	
流入率	111.21	97.41		123.85		134.63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地区投入产出表—2017》中数据计算得到。

注:甘肃依据其绝大多数市县区位实际列入内陆地区。

3.黄河流域与长江经济带分析

黄河流域中,山东和四川属于自洽型经济,省内人口较多,居民消费、资本积累和中间消耗比例

高,其产品流出率和流入率较低,以省内产业配套为主。陕西和宁夏属于内贸型经济,内贸依存度高,主要为沿海地区等提供能源、化工原材料和装

备制造业等产品。青海和甘肃等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属于输入型经济,由于自然条件较差,输出产品优先,大量外地产品输入。河南和山西属于均衡型经济,作为内陆地区,一方面较多地承接了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内贸经济依然占据较大比重,各方面都属于中等水平。内蒙古属于边贸

型经济,但内贸额是外贸额的31.5倍。黄河流域中内贸型地区较多,具有明显的内向型经济特征。2017年,黄河流域九省区国内省外流出额为11.9万亿元,国内省外流入额为15.3万亿元,出口额为1.97万亿元,进口额为1.45万亿元,外贸依存度为15.6%,内贸依存度为123.8%(见表5)。

表5 黄河流域内外贸经济循环状况

单位:亿元,%

	黄河流域	青海	四川	甘肃	宁夏	内蒙古	山西	陕西	河南	山东
总产出	671539.5	6493.2	98995.5	17877.1	8863	35668.6	37700.6	54144.7	149932.8	261864
GDP	221218.9	2624.8	36980.2	7459.9	3443.56	16096.2	15528.4	21898.81	44552.8	72634.2
出口	19742	28.8	2107.4	90.5	289.5	326	690.1	2089.9	3714.6	10405.2
国内省外流出	119398.2	535	9455	4004.2	2688.8	13907.9	7189.6	30776.5	44702	6139.2
进口	14548.4	15.7	1264.6	196.6	119.1	608.3	472.5	1130.1	2059.3	8682.2
国内省外流入	153256.6	1822.7	10618.6	5004	6319.7	15484.8	7789.8	34488.8	55981.8	15746.4
内外贸易比	7.95	52.98	5.95	31.38	22.05	31.46	12.88	20.27	17.44	1.15
外贸依存度	15.6	1.7	9.1	3.8	11.9	5.8	7.5	14.7	13.0	26.3
内贸依存度	123.8	89.8	54.3	120.8	261.6	182.6	96.5	298.0	226.0	30.1
流出率	62.9	21.5	31.3	54.9	86.5	88.4	50.7	150.1	108.7	22.8
流入率	75.9	70.0	32.1	69.7	187.0	100.0	53.2	162.7	130.3	33.6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地区投入产出表—2017》中数据计算得到。

长江经济带中,上海和重庆属于双循环经济,江苏和浙江属于外向型经济,上海、江苏和浙江是中国外向型经济的龙头地区,其外贸依存度分别为129.1%、44.3%、56.0%,重庆市外贸依存度为31.3%,内贸依存度更是高达805.7%,是以内贸为主、外贸为辅的开放高地。四川、湖北、湖南属于自洽型经济,江西和贵州属于内贸型经济,安徽属于均衡型经济,云南属于边贸型经济。长江经济带是以上海、江苏、浙江为龙头,交通顺畅、经济协同性高的经济带,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2017年,长江经济带国内省外流出额为31.7万亿元,国内省外流

入额为34.9万亿元,出口额为7.4万亿元,进口额为5.8万亿元,分别是黄河流域九省区的2.7倍、2.3倍、3.8倍、4倍。长江经济带外贸依存度为35.6%,内贸依存度为179.5%。在全国经济中,黄河流域九省区占全国比重为26.11%,长江经济带占比为43.8%;黄河流域九省区国内省外流出额占全国的16.6%,长江经济带占比为44%;黄河流域九省区国内省外流入额占全国的19.4%,长江经济带占比为44.3%;出口额中,黄河流域和长江经济带分别占12.1%、45.7%;进口额中,黄河流域和长江经济带分别占9.5%和37.7%(见表6)。

表6 长江经济带内外贸经济循环状况

单位:亿元,%

	长江经济带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重庆	四川	云南	贵州
总产出	1066446.9	94053.3	259205.3	152428.6	98306.7	59624.1	94458	82097.7	55914.6	98995.5	38771.2	32591.9
GDP	370998.5	30633	85869.8	51768.3	27018	20006.3	35478.1	33903	19424.7	36980.2	16376.3	13540.8
出口	74309.6	13493.4	23677.8	21467.6	2177	2249.8	2328.3	1511.8	3488.4	2107.4	731.4	1076.7
国内省外流出	316602.2	56570.3	50655.5	41879.8	24136.4	18044.6	5078.8	15089.3	77282.8	9455	5430	12982.7
进口	57717	26063.1	14375.8	7506.9	1548.7	790.2	1069.3	820.5	2597.9	1264.6	761.5	918.5
国内省外流入	349353.6	43111.7	55780.5	60533.2	22709.8	19485.9	8885	17539	79220.5	10618.6	15016.5	16462.9
内外贸易比	5.04	2.52	2.80	3.53	12.57	12.34	4.11	13.99	25.71	5.95	13.70	14.76
外贸依存度	35.6	129.1	44.3	56.0	13.8	15.2	9.6	6.9	31.3	9.1	9.1	14.7
内贸依存度	179.5	325.4	124.0	197.8	173.4	187.5	39.4	96.2	805.7	54.3	124.9	217.5
流出率	105.4	228.7	86.6	122.4	97.4	101.4	20.9	49.0	415.8	31.3	37.6	103.8
流入率	109.7	225.8	81.7	131.4	89.8	101.3	28.1	54.2	421.2	32.1	96.3	128.4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地区投入产出表—2017》中数据计算得到。

三、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各地区经济形势变化的具体表现

2007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受到欧美经济危机、中美贸易摩擦、国内经济新常态、新冠疫情等诸多内外部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发展格局产生深刻变革。中国各地区经济形势在此过程中呈现出新的发展特征。

1. 外向型经济地区外贸依存度大幅下降

近年来,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面临挑战,对国内经济大循环形成较大冲击。2007—2023年,全国外贸依存度从60%下降到33.1%,其中双循环经济地区外贸依存度从143.2%下降到70.8%,外向型经济地区外贸依存度从107.4%下降到49.4%。2023年,中国进出口大省(市)依然是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北京、山东、福建等,但增长率并不高。增长率较高的是西藏、新疆、内蒙古、海南、黑龙江等沿边地区,降幅较大的是云南、陕西、甘肃、湖南、重庆等地,以内陆地区为主。可能的原因主要是外向型经济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外流对出口影响较大,也影响了国内配套的内贸型经济发展;并且高能耗地区在原材料进口、化工原材料等加工品出口方面受贸易摩擦等的影响较为深远。

2. 外向型经济地区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趋弱

2019—2022年,中国GDP增长率从6%下降到3%,新冠疫情对各地经济影响较大。2023年全国GDP增速为5.2%,经济增长有所恢复,工业增加值增长较快的是海南、宁夏等经济小省,而福建、广东、陕西等工业经济增长缓慢。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积极主动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东部沿海地区长期承担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职能,如今外向型经济增长拉动能力趋弱,将对国内经济大循环产生重要影响。外向型经济地区在对外开放、创新驱动、引领内陆发展等方面具有关键的作用,一方面外向型地区产业链转型升级需要内贸型地区重新配套;另一方面,近年来外向型经济地区的钢材、水泥、布匹、化工产品,甚至电冰箱、电视机等耐用消费品产能也大幅度减少,传统产业急需向欠发达地区转移。

3. 多数地区基础设施投资能力下降

近些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呈现低速增长态

势。2023年固定资产投资仅增长2.8%,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5.9%,东北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下降,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缓慢。中国土地财政模式弱化、地方财政困难是基础设施投资能力下降的重要原因。2016—2022年,全国土地成交价款仅增长0.4%,其中北京、上海、浙江三省(市)分别增长81.6%、1.24倍、77.1%,安徽、湖北、青海、宁夏、新疆等地区土地收入增加,其他地区均有不同程度减少。

房地产是影响全国经济的重要因素之一。2023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9.6%,下降幅度较大的是沿边地区、东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等。随着全国房地产市场形势的变化,上海、北京、广东等少数发达地区的中心城市房地产可能还有一定的上涨空间。

4. 部分沿海、沿边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减少

一是中国消费市场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及中西部人口大省。2023年全国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71495亿元,增长7.2%,市场虽有所恢复,但低于预期。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比重中,外向型经济地区占比33.2%,自洽型经济地区占比22.4%,双循环经济地区占比10%,合计65.6%,比2007年降低1个百分点。2007—2019年,中国共有16个省(区、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下降,主要是沿海地区的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广东、山东等省市,辽宁、吉林、黑龙江等东北地区,内蒙古、新疆、广西等沿边地区,河北、山西、甘肃、青海等北方地区,这些可以统称为受经济新常态影响地区,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合计占全国比重从2007年的68%下降到2019年的54.7%。

二是部分地区受新冠疫情影响市场水平依然没有恢复。2019—2022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7.77%,11个省(区、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绝对减少。其中天津市、北京市分别减少15.3%、8.4%;东北地区受经济衰退影响,吉林减少9.6%,黑龙江减少7%,辽宁减少1.5%;西北地区市场依然没有恢复到新冠疫情之前的水平,其中青海减少11.2%、新疆减少10.4%、宁夏减少4.4%,内蒙古、湖北、西藏等地也出现零售额减少状况。总体上,沿边型经济地区和输入型经济地区的市场有所萎缩,北方地区市场比重下降,南方地区和内陆地区比重提高。

三是社会商品零售市场网络化水平越来越高。2016—2022年,中国网上零售额增长1.67倍,电商率从15.5%提高到31.3%。2022年,外向型经济地区网上零售额占全国总零售额的比重达到51.6%,电商率高达48.7%。网上零售额较大的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北京5个省市合计占全国比重为61%。电商类超过50%的有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天津5省市,超过20%的还有福建、河北、江苏、海南、辽宁、山东、江西等7省。双循环经济地区和外向型经济地区比重在逐步降低,而自治型、内贸型、均衡型、沿边型经济地区比重均有所提高。

四、中国各地区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对策建议

中国各地区要基于自身内外贸模式的鲜明特征,在经济双循环格局中,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例如,沿海地区要继续发挥开放和创新的带动作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努力促进创新驱动的动力转换,提高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从而带动国内经济大循环。如今,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复杂多变,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尤其是要重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努力提高国际大循环的质量和水平,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

1. 努力提升国际大循环的质量和水平

一是积极扩大制度型开放,坚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瑞士信贷分析师佐尔坦·波尔兹萨尔认为,前些年全球化的供应链是低通胀高增长世界的基石,这个体系有三个支柱,其中中国制造的便宜商品提高了美欧实际工资的购买力,廉价的俄罗斯能源为德国乃至更广泛的欧洲工业体系提供了能源和竞争力,全球化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盛行,随着中美经济脱钩和俄乌冲突,原来的全球化陷入信任危机,在欧亚大陆上正在形成一个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家组成的“被制裁者联盟”(TRICKs)(佐尔坦·波尔兹萨尔,2022)。正如孙立平教授所提出的观点,在全球化时代,通行的是比较优势逻辑和资本逐利逻辑,而在后全球化的大拆解时代,安全逻辑和价值逻辑将会取而代之

(孙立平,2020)。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供给大于需求,经济过冷及投资过剩等问题,长远问题是美西方与中国科技脱钩,中美是否各自发展自己的科技体系,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充满风险和挑战的新阶段。中国应该积极寻找降低中美冲突的平衡点,从深层次上化解中美根本矛盾,把稳定中美关系作为关键和重点。应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积极维护世界贸易组织(WTO)、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争取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加强国际经济联系。继续扩大同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经济合作,继续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

二是提升“一带一路”建设质量,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一带一路”改变了西方主导的海洋经济格局,在欧亚大陆上促进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复兴,是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加快与亚洲、欧洲、非洲等地区合作发展的新方案。应该继续提升“一带一路”发展质量,优化中欧班列运行,加快开拓亚欧大陆、非洲、南亚东南亚、中东地区等新市场。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具有运输时间短的优势,中欧班列货物当前依然以东部沿海地区产品为主,要充分发挥陕西西安、河南郑州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起点的作用,强化亚欧经济论坛、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等平台作用,在西北地区适当建设面向中亚等地市场的生产基地,继续重视天津港、青岛港、连云港等沿海口岸作用。

三是加快服务业扩大开放。2022年,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为52.8%,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41.8%,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8891亿美元,连续第九年位居全球第二位。服务业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点领域。未来,应继续推进世界贸易组织(WTO)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谈判成果在国内的生效实施,放宽服务业外资准入,实施更高水平的数字贸易开放措施,增强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深化“一带一路”国家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合作。对外开放从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服务,促进中国经济动能转换。

2. 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

随着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日益凸显,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对于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意义重大。一是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中国出现过剩经济,既有国际因素,也有国内因素,并非都是落后产能。应对过剩经济,需求端扩大市场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型升级不可偏废。要严格落实“六保”“六稳”政策,把保市场主体、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作为重要内容。努力增强投资对扩大内需市场、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加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积极弥补中西部地区“铁公机”等传统基础设施短板,扩大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投资,发挥中流砥柱作用。要积极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努力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把就业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努力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二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积极培养内生原始创新驱动力。创新是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关键。构建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必须警惕中美经济脱钩影响,积极应对美西方对中国技术封锁的冲击,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长期艰巨任务。2023年,中国进出口额虽然只增长了0.6%,但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电池“新三样”出口增长近30%,特别是新能源汽车增长77.6%,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北京、山东、福建七个外贸大省(市)作出主要贡献,以东部沿海地区为龙头的新质生产力逐步形成。各地区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如山东提出“壮大十强产业,建设先进制造业强省”;河南强调坚持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主攻方向,建设制造业强省;宁夏提出聚焦“六新六特六优”产业,打造现代产业基地。内贸型地区主要为国内外产业提供能源原材料等配套,要积极抓住数字经济、储能产业发展机遇,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黄河流域青海、甘肃、宁夏、山东等储能产业发展迅速,宁夏锂电池等储能装机规模位居全国第二位,宁夏、内蒙古、甘肃等要大力发展“东数西算”产业,积极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构建绿色制造体系,

努力实现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要推动东北地区全面振兴,加快构建具有东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逐步提高东北地区开放和发展水平。

三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生产要素使用效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改革的边际效应越来越小,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提高生产要素使用效率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例如,近年来,宁夏深入开展用水权、土地权、排污权、山林权、用能权、碳排放权等“六权”改革,努力激发市场活力,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良性循环机制。具体来看,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的经济,要在深化城乡关系改革上下功夫,稳妥推进农村宅基地改革;在教育、医疗、养老保障等改革上下功夫,提高城乡居民社会福利水平。要继续优化区域开放布局,积极关注沿海外向型经济地区和经济大省的稳定发展,中国经济是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没有外向型经济地区的经济增长,国内配套生产就没有市场,西北地区的电力、煤炭、原材料等也就缺乏外部需求。目前,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经济功能在逐步疏解,未来将重点在科技创新、现代服务业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必须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等引领作用,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内陆地区中心城市要推进产业集聚集群、产城融合发展,带动黄河流域和长江经济带等广大腹地发展。自治型经济地区要进一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3. 增强经济双循环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中国目前劳动力价格上升,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流向南亚、东南亚等地区,由于美西方的封锁和制裁,高技术产业也面临着脱钩风险,部分西方投资企业也陆续退出中国,如何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经济安全性保障的主要问题。

一是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从开放引领型经济向创新驱动型经济模式转换过程中,要积极推动劳动密集型等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也要避免形成经济空心化。实体经济和中西部地区要为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升级争取时间和空间,通过机器人应用来降低劳动力成本。同

时,要关注电商平台的垄断化和集中化,防止网络化对边远地区、实体商店和菜农的挤压。

二是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性水平。中西部地区具有资源优势,要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与此同时,中部地区对部分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较高,对国内外核心技术和高端设备的需求也较大,必须提高战略性资源保障能力,防止关键技术“卡脖子”和断链“风险”。

三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越是大国经济,越具有国内市场为主的特征。中国经济高外贸依存度是一种非常态状况。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下,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越来越表现出巨大市场的影响力。随着外部环境不断发生深刻改变,努力克服内需严重不足,是化解过剩经济的重要措施之一。要加快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积极扩大内需。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市场化配置。各地区在全国的分工各不相同,要重点在推进市场规则制度共通、供应链区域合作共促等方面加强合作。

四是要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统筹好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和稳定发展,进一步落实一揽子化债方案。要高度重视沿边地区发展与安全的统筹协调。沿边地区承担着国防安全任务,青藏高原等输入型经济地区也承担着“中华水塔”等重大生态使命,不能只算经济账,要统筹考虑,积极加强政府在人口布局、基础设施、经济安全、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等方面的作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求是,2022(21).
- [2]新华社.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EB/OL]. (2023-07-24) [2023-07-25].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7/content_6893950.htm?device=app.
- [3]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中国地区投入产出表—2017[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
- [4]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23[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3.

Research on Foreign Trade Pattern and Integration into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Various Regions of China

Duan Qinglin

Abstract: How does Chinese provinces and regions integrate into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requires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nal and foreign trad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province and region. Based on the qualitative analysis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results, the domestic foreign trade patterns of China's provinces and reg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seven types: double circular economy, export-oriented economy, self-consistent economy, balanced economy, domestic trade economy, border economy and import economy. With the continuous differenti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various regions in China, the dependence on foreign trade of export-oriented economic regions has declin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capacity of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n most regions has decreased, and the pattern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facing reshaping. All regions should integrate into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by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the international great cycle, enhancing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domestic great cycle, and enhancing the secur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economic double cycle.

Key Words: Domestic and Foreign Trade Mod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Export-Oriented Economy

(责任编辑:文 锐)

【区域开放与合作】

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产业链供应链 韧性态势评估*

王罗汉 王晓莉

摘要:基于相关贸易数据和理论,通过定量测度“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地区和国家对中国主要产品进出口的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评估和预判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安全态势。评估结果显示,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安全形势在沿线地区并不乐观。未来,中国应加快建设“一带一路”高端智库机构,在战略层面“一国一策”构建国际区域科技研发共同体,强化技术支撑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加强战略对接,引导沿线产业链实现生态体系区域化重构,通过高质量技术升级与供给,为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供有效保障。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

中图分类号:F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4)02—0138—06 收稿日期:2023—08—28

*基金项目: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交办重点课题“推动欠发达地区依靠科技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ZXZK202311)、“新时期区域科技创新战略研究”(ZXZK202310)。

作者简介:王罗汉,男,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北京 100038)。

王晓莉,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乌鲁木齐 830011)。

一、问题的提出

“一带一路”作为联系沟通中国经济、科技内外双循环的重要纽带,是支撑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商务部数据显示,2013—2021年,“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中国海外市场中的地位显著提高。中国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年度贸易额从1.04万亿美元扩大到1.8万亿美元,增长了73%,进出口贸易总值从占中国外贸总值比重的25%提升到29.7%。“一带一路”沿线已经成为中国建立外循环不可或缺的重要阵地,对于确保中国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整体安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加强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同各国发展战略和地区合作倡议的对接,保障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然而,中美贸易战等多种不可控因素,给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外循环带来前所未有的困境。因此,当前极有必要对中国外循环产业链供应链整体安全态势进行摸底,并及时加以政策调整(刘娅等,2023)。这既是对“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快调整区域合作伙伴、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实现位置攀升的重要一环(吴建平等,2017),如何在确保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安全可控的前提下,依托“一带一路”这一重大国际公共平台实现更高水平的国际开放合作(Helen S, et al., 2002),成为当下“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需要谋划的重大战略问题(王罗汉、许竹青,2022)。

产业链供应链二者侧重点有所不同,产业链侧

重于从生产或服务的不同阶段来认识不同产业间的协同网络,而供应链则注重从微观企业层面加以认识循环流转体系,价值链则是从产品所包含的价值创造和蕴含在商品中的价值转移来看待产业链供应链(张其仔,2022),其本质上是同一个东西,所以通常统称为产业链供应链(郭朝先等,2023)。Martin(2016)提出经济学范式的韧性主要指“四性”,即产业链受冲击后的抵抗性、在应对冲击后的恢复性、在环境重新循环之后对新环境的适应性、在面对新市场环境下的创新性。目前学术界多采用反事实法、指标体系构建法和熵值法等多种方法来对经济韧性与安全进行测度。但对于如何测算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未能形成统一共识,借鉴郭朝先等(2023)的做法,一国产业竞争力的高低关乎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的核心与基础,本文通过比较产业竞争力的时空变化,对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产业链供应链竞争态势以及韧性和安全状况进行评估分析。

二、评估思路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覆盖地区较多,综合来看,可以分为两个维度,一是以中国周边的东南亚、中亚、南亚地区为代表,整体呈现各区域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可能带来的竞争态势。二是把重要发达国家、节点国家单列出来,着重考察其与中国贸易紧密度和关联度的变化态势。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2016—2022年间联合国UN Comtrade数据库提供的SITC(国际贸易商品标准分类)产业代码进行测算。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中国对外进出口商品主要集中在制成品(SITC 5至8减667及68),高技能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高科技制造:电子和电气,高科技制造:机械和运输设备,中等技能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低技能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等7大类制造业。除考察中国对外贸易主要的7大类产业及产品外,本文以2022年数据为基准,对共建国家(或地区)对华出口价值量较大产品进行分析,以便更加全面科学地研判共建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能带来的不利因素。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安全虽属于经济韧性的一部分,但它更聚焦于产业链抵御风险与恢复的能

力,是反映产业竞争力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行的做法是考察产业链的“健康程度”,即产业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纵向上比,如果一国出口的某类产品,其技术附加值不断提升,那么该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就会增强。横向上比,同类型产品,如果一国的产品技术附加值相比别国在国际市场上更高,价格也越优,该国该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应越强。故而,该国的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更高。测度产业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指标很多,本文采用最常用的贸易竞争力指数(TC)来测度纵向比,采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来测度横向比。

其中,传统的贸易竞争力指数 $TC=(出口额-进口额)/(出口额+进口额)$ 。为更加精准测算,本文将沿线国家对华的贸易竞争力指数,修订为 $TC^*=(i行业对华出口额-i行业对华进口额)/(i行业对华出口额+i行业对华进口额)$ 。取值范围与表1一致,即 $[-1,1]$ 。取值在0附近,表示该地区*i*行业对华贸易竞争力一般,越接近-1,表示该行业对华越没有竞争力;相反,数值越接近1,说明该行业对华贸易存在竞争力。同理,传统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RCA=(本国j产业出口额/全球j产业出口总额)/(本国出口总额/全球出口总额)$,沿线国家对华的该指标,修订为 $RCA^*=(本国i产业对华出口额/全球i产业对华出口总额)/(本国i产业对外出口额/全球i产业出口总额)$ 。数值越接近0,表示越没有国际市场竞争力,取值在 $[0.8,1.25]$ 表示竞争力一般。

三、中国主要产业对外竞争力测度分析

由表1可知,中国各行业产品竞争力提升领域非常不均衡,不同技术等级产业竞争力提升存在“马太效应”。在高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阴极阀和阴极管、化学产品(SITC 5)等个别领域,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提升幅度较大,但整体上高技术密集型产业对外贸易竞争力没有质的提升。传统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密集型和部分中等技术密集型,虽然对外贸易竞争力没有太大变化,但TC指数长期高于全部产品竞争力,说明中国具备较强出口竞争力的产业依然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和中低等级技术密集型产业。

如果说TC指数是纵向上“自己跟自己比”,那

表1 中国按技术等级划分的主要产业对外贸易竞争力指数(TC)

产业类别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全部产品	0.14	0.10	0.08	0.09	0.11	0.11	0.14
制成品(SITC 5至8减667及68)	0.32	0.30	0.28	0.31	0.31	0.34	0.40
高技能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	0.08	0.07	0.06	0.07	0.07	0.09	0.04
高科技制造:电子和电气	0.20	0.20	0.19	0.20	0.18	0.18	0.24
高技术:阴极阀和阴极管	-0.48	-0.49	-0.48	-0.40	-0.41	-0.38	0.35
机械和运输设备(SITC 7)	0.20	0.19	0.18	0.21	0.21	0.23	0.30
中等技能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	0.32	0.31	0.30	0.35	0.38	0.44	0.52
化学产品(SITC 5)	-0.15	-0.15	-0.14	-0.15	-0.11	0.00	0.09
燃料(SITC 3)	-0.74	-0.75	-0.76	-0.76	-0.79	-0.81	-0.79
低技能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	0.67	0.65	0.66	0.65	0.58	0.65	0.69
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	0.81	0.79	0.78	0.78	0.79	0.78	0.82
初级商品	-0.62	-0.68	-0.73	-0.74	-0.73	-0.76	-0.78
初级商品、宝石和非货币黄金(SITC 0+1+2+3+4+68+667+971)	-0.62	-0.65	-0.67	-0.67	-0.69	-0.72	-0.70

数据来源:根据UN Comtrade数据库提供,作者自行计算。

注:根据联合国UN Comtrade数据库的划分,本文将机械和运输设备(SITC 7)划入高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化学产品(SITC 5)、燃料(SITC 3)划入中等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劳动密集型划入低等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下表类同。

么RCA指数就是横向上“自己跟世界比”,总体结论仍不乐观(见表2)。横向对比看,中国在制成品(SITC 5至8减667及68)领域RCA数值呈现摇摆态

势。细分领域,中国也仅在电子和电气、机械和运输设备(SITC 7)等部分领域竞争力较强,但整体高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并不明显。

表2 中国按技术等级划分的主要产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

产业类别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制成品(SITC 5至8减667及68)	1.33	1.35	1.37	1.35	1.32	1.37	1.45
高技能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	1.24	1.27	1.30	1.25	1.19	1.22	1.05
高科技制造:电子和电气	2.04	2.07	2.11	2.06	1.88	1.91	1.99
高技术:阴极阀和阴极管	1.07	1.01	1.09	1.26	1.13	1.17	0.71
机械和运输设备(SITC 7)	1.28	1.32	1.37	1.34	1.32	1.40	1.46
中等技能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	1.01	1.05	1.08	1.10	1.15	1.26	1.38
化学产品(SITC 5)	0.52	0.56	0.59	0.56	0.52	0.63	0.71
燃料(SITC 3)	0.13	0.14	0.15	0.16	0.14	0.11	0.11
低技能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	1.50	1.48	1.52	1.52	1.46	1.54	1.64
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	2.33	2.33	2.28	2.23	2.16	2.05	2.16
初级商品	0.24	0.21	0.19	0.20	0.20	0.16	0.15
初级商品、宝石和非货币黄金(SITC 0+1+2+3+4+68+667+971)	0.23	0.23	0.23	0.23	0.21	0.19	0.19

数据来源:根据UN Comtrade数据库数据计算得到。

注:RCA数值大于1.25,为具有比较优势。

四、“一带一路”主要区域对华TC、RCA指数分析

根据上文TC、RCA指数计算情况,“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主要区域经济体对中国的贸易竞争力指数、比较优势测度呈现出不同特征。

(一)贸易竞争力指数分析

贸易竞争力指数结果主要从东南亚、中亚、南亚、中东欧5国几个层面进行分析,囿于篇幅,相关数据结果并不一一展示。

1.东南亚地区对外贸易深度依赖中国市场

东南亚地区除新加坡外全部为发展中国家。东南亚除初级产品对华长期保持贸易顺差外,在制

成品方面仅有机械和运输设备(SITC 7)对华保持长期贸易顺差。本文认为,东南亚之所以在该领域长期保持顺差,应与中国在该领域供应链配套紧密有关,该地区(不包括新加坡)已然成为中国机械和运输设备主要零配件供应基地,产业链供应链高度依赖中国。在高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2020年前后,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也已逐步赶上新加坡。

2. 中亚地区及俄罗斯在能源和初级产品具备优势,对华贸易空间较大

中亚地区全部为发展中国家。其主导产业主要是农业、采矿业和能源工业,工业制造能力薄弱,各技术等级的制造品均需大量进口。数据测算结果表明,中亚五国对中国出口领域只在资源类矿产品和初级产品有优势。俄罗斯也仅在初级产品与燃料(SITC 3)方面对华处于贸易顺差。

3. 南亚地区对外开放不够,对华贸易不占主导

南亚地区全部为发展中国家。从产品结构上看,对华贸易有竞争力产品主要是初级商品、宝石和非货币黄金(SITC 0+1+2+3+4+68+667+971)以及初级产品等资源输出类商品。与中亚地区不同的是,南亚地区对华贸易长期保持稳定,制成品方面对华依赖程度较小,且变化不大。

4. 中东欧五国尚未将中国作为主要贸易对象,以色列在高等级技术方面对华仍有优势

根据《中国—中东欧国家科技创新记分卡》多项监测指标,中东欧的捷克、希腊、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不论在科技产品规模还是技术质量方面远高于该区域其他国家,较好地反映了中东欧与中国的贸易间竞争力水平。以色列虽地处西亚,但其是该地区唯一的发达国家,且科技创新能力雄厚,人均收入、社会发达程度也与中东欧接近,且同属沿线重要节点国家,因此选取以上国家作为分析对象。数据测算结果显示,中东欧及以色列在对华贸易竞争力方面差异较大,以色列在高技术等级产品上对华构成竞争态势。匈牙利在部分中等技术产品方面对华具备一定的优势。希腊与罗马尼亚则主要在燃料和化学品方面对华保持较弱优势,捷克与波兰优势产业对华出口规模偏小不具备优势。

(二) 比较优势测度分析

比较优势测度结果同样从东南亚、中亚、南亚、中东欧五国几个层面进行分析,囿于篇幅,相关数据结果并不一一展示。

1. 东南亚地区日益成为多国装备基地,新加坡的中等技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受欢迎

东南亚地区在国际市场竞争力增长较快,多项产业的RCA值多年来高于1.25。但具体到机械和运输设备(SITC 7)及电子和电气领域,相比中国则不具备优势。这表明,一是东南亚地区与中国在中低端技术等级贸易出口上的竞争态势将日益凸显。二是东南亚地区生产产品的主要目的地未必都在中国。东南亚的出口导向经济模式十分明显。从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角度看,东南亚不仅是中国的主要代工产品和零配件生产基地,也日益成为其他国家的产业链配套供应基地。这势必对中国在该区域产品供应的定价话语权带来一定程度的削弱。三是在部分中等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方面,新加坡依然是中国的强劲对手,从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角度看,新加坡基于地缘优势,在该地区的产业链恢复会快于中国。

2. 中亚地区高技术产品出口种类偏少,俄罗斯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对中国缺乏竞争优势

俄罗斯在低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对中国同等产品构成较强竞争。而中亚在一些高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上,相较于中国也具有一定优势,但在机械和运输设备(SITC 7)和电子和电气领域则不具备优势。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上看,中亚与东南亚地区在承接中国和其他国家中低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具有相似性。但不同在于,中亚地区在上述领域比东南亚地区分值更高,竞争优势更明显。从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上看,该地区对华暂不构成威胁,也尚未像东南亚地区那样成为万国投资的代工基地,产业链条较为单一稳定。

3. 南亚地区长期作为国际市场初级产品来源地的地位没有改变

南亚地区与中国相比没有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的产业门类。在低等技术密集型领域,南亚国家出口的部分产品相比中国有一定优势,RCA从0.5(2016年)上升到1.01(2022年)。而劳动密集型产品却从1(2016年)下滑到0.52(2022年)。南亚国家相比中国,其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也不构成竞争。从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安全上看,南亚地区暂未对华构成威胁,在供应端方面也尚未形成较大规模。

4. 中东欧五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高,但对华贸易占比不足,以色列对华技术优势仍十分明显

中东欧五国与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没有构成竞

争态势。对比发现,中东欧五国产品的出口规模并不小。以捷克为例,2022年捷克对外出口总额约为240.21亿美元,以色列仅为73.68亿美元,捷克出口总额是以色列的3.26倍,但对华出口方面,捷克对华出口额只占其出口总额的1.12%,而以色列对华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12.13%。这表明,中国市场尚未成为中东欧主要出口目的地,中东欧主要国家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并未充分对接中国。以色列除高技术密集型产业外,低技术密集型产业对华也具备较强竞争力,其RCA数值远超1.25,从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上看,具有一定“卡脖子”风险。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上看,相比于中国的同类产品,以色列具备较高科技优势,对中国同类产品的可替代性较强,且不仅限于高技术密集型产业,在中低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对中国也构成一定的竞争态势。

五、结论与建议

综合来看,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存在较大隐忧,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一是中国自身产业整体竞争力依然不强,中国出口产品的主要竞争力依然集中在中低端,没有质的改变,这既有碍于中国实施产业链价值链攀升战略,也不利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二是部分沿线区域,在中国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安全方面,存在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例如,虽然绝大多数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国家出口产品的技术等级不如中国,但已出现不断蚕食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低等级技术产品国际市场份额的迹象,且随着世界各国各等级产业链纷纷外迁到东南亚等地,未来东南亚的主要出口市场必将更趋多元化,这势必造成中国在该区域市场影响力的下降。三是以色列的部分高等级技术产品、新加坡的部分中等级技术产品,都对我国相应等级技术产品构成较大竞争态势,“卡脖子”风险不只在美日欧。四是中东欧主要大国,即便实施了开通中欧班列等多项互惠措施,中国庞大单一消费市场对其吸引力仍显不足,多年来未将中国作为重要出口消费市场。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必须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未来,要从加强顶层决策、强化科技支撑、注重战略对接

等多个层面着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

1.加快构建“一带一路”高端智库机构,更好支撑顶层决策

要构建“一带一路”高端智库机构,提升顶层决策的科学性与时效性。一方面,要强化顶层谋划统筹,科学筛选确立涉及国家安全、产业链安全领域的战略任务,通过锻造重大任务来凝聚战略科技力量与战略科技人才。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科学方法,总结评估实践经验,动员相关领域智库、高校、科研机构、媒体等,与合作国家加强创新发展规划对接。通过两年一次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科学指导重大项目的国际区域布局。在“一带一路”平台内,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环境、产业链相关性、创新合作潜力等多角度,进行全面综合研判,围绕关键小国定期发布有针对性的国别研究和投资需求报告,为“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小组提供全面科学的精准支撑。另一方面,要大力推进制度创新,建立适配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任务的激励约束机制与政策保障机制。在机构评估、职位晋升、岗位聘用、评奖评优等方面,加大对参与价值链提升的相关部门、机构与人才的倾斜力度;在海外人才引进、科研经费使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国有资产管理等方面率先试点科研友好型与创新友好型政策。

2.“一国一策”打造国际区域科技研发共同体,强化科技支撑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为更加精准高效化解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隐患,中国应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更加有针对性地出台“一国一策”。重塑“一带一路”利益共同体创新生态。针对沿线科技创新发达国家如以色列、新加坡等,增强政治互信和制度兼容,降低在小试、中试等研发创新环节的不确定性风险,提升双方企业创新研发的合作深度与层次,加快构建国际区域科技研发共同体。强化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中国制造在国际区域市场中的核心竞争力和话语权。与东南亚、中亚等地区实现产业链不同等级技术错位发展态势,逐步将周边国家纳入国内主要区域产业链内循环体系中来,实现内外双循环。针对中国优势产业,率先制定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企业进入门槛,加快与共建国家在“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下游环节无缝对接。产业链要在国际跨区域分布上实现闭环,供应链要在国际区域内实现

产供销一体化,价值链要在区域内不同国家形成梯次配置。国内行业龙头企业要在东南亚、中亚和中东欧部分区域加快设立和布局大区域总代理、研发分支机构、产品技术标准实验中心和技术示范高地等。弱化跨国间可能存在的供应链“断供”风险。加大对民营经济政策扶持力度,推动更多国内民营企业凭借资金、人才、技术等优势,利用“深交会”“广交会”、中国—东盟博览会等现有合作平台,通过对接洽谈、交流研讨、成果分享和实地走访等形式,着力开展与以色列、新加坡、东盟等沿线国家在科技成果转化和创新领域的深度合作。

3.强化各区域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引导沿线实现产业生态体系区域化重构

针对尚未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深度对接发展的部分中东欧国家和其他地区,事实上,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了“战略对接”思想(刘友金等,2022)。当前,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的除中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外,还有韩国、欧洲、印度、中亚等的诸多战略也正开展对接。战略对接已经成为中国下一步与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化双边互动、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抓手。一方面,国内已经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应积极考虑与共建“一带一路”的项目对接,将更多境外区域纳入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外循环中来。另一方面,要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生态体系区域化,建设以中国国内大市场为中心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新生态。推进集产业技术研发、资本运作、科研成果转化服务、产品上市于一

体的新型集成式产业园区,构建从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到独角兽企业“一条龙”式成长培育机制,支持一批国内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在沿线国家设立离岸技术创新中心、离岸人才合作中心、离岸产业融通发展中心,实现供应链来源渠道多元、产业链抗风险能力增强、创新链产品技术赋能提速的战略目的。通过项目合作、机构合办、人才双向培养等多种形式,最终在沿线多个节点形成战略联盟,实现“示范应用—研发评价—技术创新—辐射推广”全链条区域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 [1] HELEN S, CHRIS S. Working across boundaries: in public services[M]. New York:Palgrave,2002.
- [2] MARTIN R, SUNLEY P, GARDINER B. How regions react to recessions: resilience and the role of economic structure[J]. Regional studies,2016,50(4):561-585.
- [3] 吴建平,周江黎.“一带一路战略”中科技合作的风险及其防范[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1).
- [4] 王罗汉,许竹青.“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内核、挑战及启示[J].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22(9).
- [5] 张其仔.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新进展、新挑战、新路径[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
- [6] 郭朝先,许婷婷.中国医药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研究[J].经济与管理,2023(3).
- [7] 刘娅,梁明,徐斯,等.中国制造业外迁现状与应对策略:基于产业链供应链关联性的分析[J].国际贸易,2023(5).
- [8] 刘友金,李玮瑾.俄乌冲突、全球产业链重塑与“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应对[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

Resilience Assessment of Industrial Chain and Supply Chain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Wang Luohan Wang Xiaoli

Abstract: Based on relevant trade data and relevant theories, by quantitatively measuring the changes in the import and export of our main products in key areas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he resilience security of industrial chain supply chain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s evaluated and predicted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evalu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silience and security situation of China's industrial chain and supply chain is not optimistic in the areas along the route. Based on this kinds of situation, China should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level think-tank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at the strategic level, build some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mmunities with “one country, one policy”, and strengthen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security about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supply chain, make the strategic docking, and guide the industrial chains along the line to realize regional re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system, and provide escort for China's security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supply chain through high-quality technology upgrading and supply.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dustrial Chain;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and Security

(责任编辑:文 锐)

【区域开放与合作】

RCEP全面实施对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多维影响 效应研究*

王建国 盛见 易雪琴

摘要:RCEP全面实施,将直接推动中国开放内容形式、经济社会结构、区域空间格局等方面加快演变和重构,对中国高质量发展产生重大影响。RCEP实施产生的多维影响效应是多元主体、多方力量、多重关系相互博弈的结果。RCEP的全面实施,在维护经济安全、产业转型升级、激活消费潜力、优化经济格局四个方面产生积极影响效应,但同时也可能引发内源结构性风险与不确定性增加、区域合作产生的引致摩擦力增强、部分企业转型升级阵痛加剧、全面深化改革面临外部压力增大等诸多负面影响效应。未来,应从加速重构区域价值链、布局跨区域产业链合作、强化平台示范引领作用、优化营商环境、加强培训指导等方面着力,努力放大RCEP全面实施带来的正面影响效应、缩小负面影响效应,推动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RCEP;高质量发展;区域合作;影响效应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4)02—0144—13 **收稿日期:**2024—01—10

***基金项目:**202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内在机理、实现机制及综合对策研究”(21BGL250)。

作者简介:王建国,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郑州 451464)。

盛见,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生态文明研究所副研究员(郑州 451464)。

易雪琴,女,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生态文明研究所副研究员(郑州 451464)。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特别是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多方寻求“脱钩断链”,和平与发展遭受巨大威胁。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但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内需体系培育构建、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等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如何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成为当前我国发展的关键议题和面临的重要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并推动其全面实施,成为有效应对国际发展环境复杂

变化的重要战略选择,也成为更好畅通国际国内双循环进而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2022年1月1日,RCEP正式生效,中国是首批生效国之一。2023年6月2日,RCEP在菲律宾正式生效,至此15个成员均完成生效程序,进入全面实施新阶段。RCEP是迄今全球人口最多、贸易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协定,涉及领域多,成员国差异大,关系错综复杂。RCEP的实施面临多元主体、多重目标、多方力量的互动博弈,其产生的影响效应必然是多维复杂的。深化RCEP全面实施产生的共识性影响效应研究,对于中国科学实施RCEP、助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

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从当前RCEP影响效应研究现状来看,现有文献多是从自由贸易一般理论出发,以经济福利增长效应、贸易效应、产业协同效应为重点,开展国别研究、领域研究或省域研究,RCEP影响效应的宏观综合分析和多维集成研究还较为薄弱。(1)探讨RCEP实施对区域内外各国经济水平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多数研究(Plummer, 2020; Ahmed, et al., 2020; 彭水军等, 2022)表明,RCEP实施将会提高区域成员国经济福利水平,但可能会对非成员国的经济利益造成不利影响。(2)探讨RCEP实施对中国和区域内其他成员国贸易发展的影响。多项研究(秦若冰等, 2022; 周洁, 2023)表明,RCEP全面实施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将显著降低区域内贸易成本和商品价格,促进区域内贸易增长,而在贸易转移效应作用下区域外贸易规模将会有所下降。(3)探讨RCEP实施对中国和区域内其他成员国产业发展的影响。主要从制造业(郑远芳等, 2021; 屠年松等, 2023)、农业(陈雨生等, 2022; 钱静斐等, 2022)、产业链(王娟娟, 2022; 许明, 2023)以及价值链(张志明, 2022; 陈慧, 2022)等不同视角研究RCEP实施产生的产业影响,认为RCEP将会促进中国和区域成员国产业的互补发展,并推动中国及区域产业链联动与价值链重塑。

相较而言,从区域协同、消费赋能维度开展RCEP影响效应研究,目前尚不多见。在区域协同维度方面,一些研究(刘江涛等, 2022; 于国斌, 2023)是从省域角度展开RCEP影响效应分析,也有研究(任桐瑜等, 2023)是从国内区域协同发展角度展开分析,研究表明,依托RCEP实施能够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够缩小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福利水平的差距,增强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在消费赋能维度方面,仅是从消费者角度出发,探讨RCEP实施对中国居民消费福利的影响(Balistreri, et al., 2020; 张洁等, 2022),认为RCEP实施能够提高成员国消费者贸易利益,但对异质性消费者会产生差异化影响。

显然,当前围绕RCEP实施的影响效应研究,多聚焦于经济福利增长效应、贸易效应、产业协同效应等方面,而区域协同、消费赋能等维度研究较为

薄弱,也没有全面审视RCEP正反两方面的多维影响效应,与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的研究要求还存在差距。为此,本文试图从战略安全、产业发展、居民消费、空间协同等方面进行“多维一体”的系统研究,以期对科学实施RCEP有所裨益。

二、RCEP实施影响效应“多维一体”的内在逻辑

RCEP实施产生的多维影响效应是多元主体、多方力量、多重关系相互博弈的结果。对RCEP实施的多维影响效应,无论如何分析评价,均绕不开政府、产业、社会这三类主体的行为逻辑及其交叉互动关系,存在明确的主体指向性。本文运用加里·S·贝克尔(Gary Stanley Becker)的人类行为经济学和社会系统动力学的分析方法,尝试从政府、产业、社会这三类主体的行为逻辑及其交叉互动关系出发,分析阐释RCEP实施影响效应“多维一体”的内在逻辑。

在RCEP的实施过程中,充斥着政府、产业与社会主体之间行为逻辑和力量的互动与角逐,并对中国高质量发展产生多维度影响效应。在这一过程中,权力逻辑或治理逻辑是政府的行为逻辑,市场逻辑或资本逻辑是产业主体的行为逻辑,权利争取是社会民众的行为逻辑。多维度影响效应可理解为三方行为力量互动角逐的阶段性产物。单向维度影响效应可以理解为在凸显单一主体的行为逻辑同时,通过互动关系吸纳或平衡其他主体行为逻辑的结果表现(见图1)。

(一)战略维度的支撑效应:RCEP实施中政府与产业、社会的互动逻辑结果

政府的权力行为在RCEP的实施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其与产业主体之间存在合作与监督关系,与社会主体之间存在监督与回应关系,政府通过权力逻辑来平衡与产业和社会主体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战略意图。政府一方面通过降低关税与区域合作引致性摩擦力、深化改革等举措,创造条件鼓励产业主体积极参与RCEP的实施进程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高中国经济体量和经济质量;另一方面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内源结构性风险和外部不确定性风险因素,增强产业链与供应链稳定性,提高经济发展韧性,助力增强国家经济安全;再一方面基于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回应产业工人和消费者的利益诉求,限制产业资本无序转移,稳定就业和消费,增强内需主动力。显然,政府权力行为逻辑,主要是全面对接RCEP经贸规程,强化顶层设计和宏观调控,加快完善政策法规体系,系统谋划、因地制宜推进适应性改革,塑造良好实施空间,以此不断降低RCEP实施过程中的负面影响效应和不确定风险,增强释放正面影响效应的确定性。

(二)产业维度的集成效应:RCEP实施中产业与政府、社会的互动逻辑结果

产业的市场行为在RCEP的实施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其与政府主体之间存在合作与监督关系,与社会主体之间存在嵌入与互渗关系,产业主体通过市场逻辑来平衡与政府和社会主体的关系,以最大限度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目标。产业主体的区域市场行为逻辑体现为遵从国际贸易规律,积极扩大市场空间,追求市场利润最大化。RCEP通过降低关税、原产地区域累积规则、提高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水平、扩大市场准入承诺等渠道,将极大激活产业主体的市场拓展动力,推动产业扩大贸易、增加投资、实现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进而形成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产业转型发展集成效应。产业转型升级动机与政府实现高质量发展意图高度一致,从而形成产业积极开拓区域市场、政府大力支持的合作关系。产业主体与参与产业发展的社会主体之间是一种嵌入与互渗关系,主要体现为“利益一体化”,与非参与产业发展的社会主体之间可能会产生社会差异,但尚不足以影响产业转型升级的集成效应。

(三)消费维度的倍增效应:RCEP实施中社会与政府、产业的互动逻辑结果

社会主体的权利争取行为在RCEP的实施过程中居于从属地位,其与政府主体之间存在监督与回应关系,与产业主体之间存在嵌入与互渗关系,社会主体通过权利争取行为来平衡与政府和产业的主体关系,以最大限度实现福利最大化。RCEP实施不仅对国家战略实施、区域发展和产业发展产生影响效应,而且对中国居民消费潜力增长产生巨大影响。RCEP开宗明义地将“提高生活水平,改善各国人民的普遍福利”,作为实施的主要目标之一。社会主体的权利争取行为主要体现为对消费潜力提升的追求。在RCEP实施中,通过产业主体的市

场拓展行为,以及政府主体对产业主体行为的监督和社会主体诉求的回应,将直接或间接提高社会主体的生活福利水平,提升社会主体的消费潜力,进而形成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消费潜力倍增效应。

(四)空间维度的赋能效应:RCEP实施中政府、产业与社会主体行为的空间生产逻辑结果

根据列斐伏尔(Lefebvre H)空间生产理论,空间生产是权力、资本和利益等要素和力量对地域空间的重新塑造,并将地域物理空间作为底板、介质或产物,形成地域物理空间与经济社会关系相互演进的过程。政府、产业和社会主体,分别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发挥作用,并互动协同。产业主体的市场行为,通过自由竞争改变资本流向,在不同地域空间进行生产,不断改变地域物理空间形态和经济布局;社会主体权利争取行为也通过人员流动、生产居住活动对地域空间进行社会性塑造;政府以权力行为逻辑规范产业主体的市场行为和社会主体的权利争取行为。RCEP实施过程中政府、产业与社会主体的行为逻辑,将推动国内、区域内乃至全球范围内经济格局加速优化,空间经济效率明显提高,形成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空间维度赋能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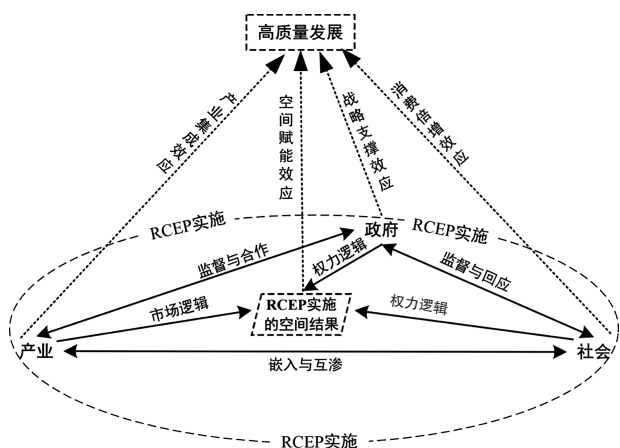


图1 RCEP实施影响效应“多维一体”的内在逻辑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三、RCEP实施对高质量发展的正向效应分析

RCEP的全面实施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重大机遇,提供有利条件,在战略、产业、消费、空间等维度产生积极的影响效应。

(一)战略维度:对增强经济韧性的支撑效应

面对当前日益严峻的国际和地区政经形势,全面实施RCEP为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复苏和维护全

球经济一体化注入强心剂,对增强我国经济安全和韧性起到有力支撑作用。

1.提升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

RCEP成员国之间产业结构互补性明显,外部依赖较弱,内源拉动性较强。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拥有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高端要素,贸易以高技术产品为主;东盟有丰富的原材料、劳动力要素,贸易以原料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新西兰则以高品质的农产品和皮毛制品为主;中国近年来产业升级较快,高中低各类产品均有分布。RCEP通过实施更优惠的关税政策、进一步放宽贸易投资领域的市场准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以及实施原产地价值累积规则,逐步确立了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一体化制度基础(杨继军等,2023)。依托RCEP建立的自由贸易平台,成员国企业可按照资源最优配置的原则,在区内灵活采购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在中国、东盟等国家统筹安排生产分工,制成品再免税出口到区域内的大市场,从而将成员国的域外贸易转为域内贸易,进而强化成员国之间的产业链互嵌效应(彭水军等,2022),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稳定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伙伴关系,缓解中国全产业链国产化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增强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

2.形成更加稳定开放的制度环境

制度型开放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RCEP最大限度地整合了区域内各成员的27个贸易安排和44个投资协定,在贸易投资、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和贸易便利化、中小企业、经济技术合作、政府采购、自然人临时流动、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等领域达成一系列制度共识。通过严格履行701项RCEP约束性义务,并将170项鼓励性义务作为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的改革方向,能够加快中国实施制度型开放战略的步伐,为成员国企业提供更加稳定开放的制度环境。比如,RCEP关于投资促进、投资准入、投资便利化以及服务业开放的相关规定,将倒逼国内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打破行业准入壁垒,形成更加公平和国际化的竞争环境,将推动跨境投资更加便利、广泛和安全;RCEP进一步规范了诸如服务贸易、电子商务、贸易救济等新议题,推动改善中国金融政策环境,增加政策制度的确定性,减少制度或标准不统一对企业发展产生的消极影响,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可持续性(王雅莉等,2021)。

3.冲抵国际经贸摩擦的消极影响

当前,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奉行“中国威胁论”,试图通过全方位的围堵、打压、遏制,特别是在经贸方面进行脱钩、断链、“去中国化”来维持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霸主地位。全面实施RCEP不仅是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应对国际贸易摩擦、保障经济安全的重要法宝(张少军等,2023)。首先,在RCEP规则下,成员国之间通过关税减让、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等举措扩大经贸规模和质量,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及社会福利的显著增加。其次,RCEP的深入实施能够推动在区域内形成更加高效且合理的生产分工体系,加速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实现生产、消费、流通等各环节的区域化转型,构建介于国内与全球之间的区域价值链,减少中国对于现行全球价值链的过度依赖,在一定程度上破解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双链”安全造成的威胁。最后,RCEP规则对多个行业领域尤其是农业、食品业、纺织业和林业等领域发挥更加明显的作用,以RCEP成员国作为第三国开展国际贸易,一定程度上能够迂回实现中美之间增进贸易联系或引进先进技术,从而降低中美脱钩的风险(杨继军等,2023)。

4.改善中国与周边地缘政治关系

在国际关系中,国家间的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密不可分、相互影响。一般情况下,健康稳定的经贸合作关系,是双边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能够促进双边的政治互信互利,从而改善双边政治关系;反之亦然。在美国联合盟友推行保护主义和贸易投资政治化的大背景下,RCEP自贸区的建立将进一步改善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关系,进一步扩宽政经合作渠道,有效增强区域一体化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推动实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反过来,中国加入RCEP,将释放自身巨大的市场潜力和经济发展红利,强化与成员国的经贸联系,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仅有利于区域成员国各自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升,而且促进成员国交通互联、文化互通、安全互助、政治互信,结成紧密的区域命运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反过来也为国内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加稳定的外部环境(邹海霞等,2023)。

(二)产业维度:对产业转型升级的集成效应

RCEP的全面实施,能够将促进产业链供应链

协同、扩大贸易市场规模、降低供给成本等作用集聚到产业发展上,进而转化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集成动力。

1. 优化产业链分工布局

RCEP将极大地促进成员国间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这就意味着企业在安排产业链、供应链时,视野可以不局限于现在的或传统上的某一国家,而是在整个区域内进行部署,从而使产业链供应链布局更具灵活性和多样性。从地域分工来看,包括东盟、日韩在内的RCEP成员国一直以来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目的地。在RCEP框架下,中国可以与日韩澳新等占据区域产业链高端的国家加强科技合作,并借助这些国家较强的消费能力获取更多的投资机会,形成以技术及中间品供应为重点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还可以发挥比较优势,在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东盟新兴国家布局制造业、农业等产业合作项目,推动形成以生产加工为重点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从规则效率来看,RCEP实现了较一致的市场准入,并对投资保护、投资促进以及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措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设置了“棘轮”承诺、统一且低门槛的原产地规则,使得区域内企业可在相对稳定的预期下安排投资和生产,让企业在优化产业布局上增加更多灵活性和可选择性。从产业转移来看,RCEP实施后日韩等国家对部分石化产品的关税税率显著下降甚至免税,将有利于促进中国的石化等行业企业“走出去”,进而化解行业过剩产能;RCEP中关于服务贸易的开放标准明显高于各自的双边协定,涵盖了金融、电信、教育等多个重要的服务业领域,并将在生效后6年内全面实施负面清单制度,对电子商务、跨境物流、经济技术合作、知识产权保护、竞争政策等新议题作出系列规范,将有效消减政策不确定性,促进新兴产业发展。

2. 提升技术创新支撑引领能力

RCEP的实施进一步解除了成员国之间在货物、服务、技术等方面的流动限制,使企业处于更具竞争性的环境中。首先,为了摆脱对劳动力、土地等要素资源红利的依赖,企业不得不加快技术创新,以获取质量红利,从而打造出更具竞争力的本土品牌,并赢得更为广阔的区域市场,进而推动实现整体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齐笑等,2022)。其次,成员国相互承诺最惠国待遇、降低市场准入,不

仅有利于我国企业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进口,还将倒逼传统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发展高端制造业和其他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带来积极影响。最后,RCEP规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间接推动突破欧美技术封锁。比如,中国集成电路等电子信息产业自给率较低,欧美国家利用出口管制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实行技术封锁,严重阻碍了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RCEP投资章节降低了准入条件,有利于RCEP成员国电子信息企业之间相互扩大投资,形成合力共同应对相关国家的出口管制。

3. 推动经贸合作扩量提质

RCEP规则下的关税减让、非关税壁垒降低、贸易便利化等一系列措施陆续实施,能够使成员国之间组建起更具有协同效应的经贸网络,进而提高区域内多边双向贸易规模和效率,进而加速中国产业的对外扩张和转型升级。比如,2022年中国与RCEP其他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总额占中国外贸总额的30.8%,实际利用RCEP其他成员国投资额同比增长23.1%(刘萌,2023),为中国稳外贸稳外资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研究,到2025年,RCEP的实施为成员国带来的出口增长将超过10%;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有关测算则显示,到2030年,RCEP成员国年出口总额预计净增长5190亿美元(冯其予,2021)。中国作为产业链供应链区域中心,特别是作为服务RCEP区域内部市场的半成品、零部件等中间产品的地区生产中心的地位有望进一步巩固。

4. 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

RCEP明确了成员国之间关于关税减免以及贸易出口补贴的限制与取消政策,各成员国承诺在协议生效后立即或在10年内实现90%以上货物零关税。同时,RCEP协定采用区域原产地累积规则,即在确定出口产品原产资格时,来自RCEP成员国的价值成分都可能被认定为原产,其原产地价值成分可以累积计算,使企业可以更容易享受到优惠关税。这使得企业在RCEP区域内,原材料选择更多,价值增值标准也更容易满足,生产成本相应更低。比如,根据RCEP规定,中国对其他成员国农产品零关税比重为86.6%—92.8%,老挝、缅甸、日本、韩国承诺对中国农产品零关税比重为57.8%—65.0%,其他成员国对中国农产品零关税比重为81.0%—

100%。这将推动中国优势农产品从外资负面清单和使用本国原料限制中释放出来,也使企业在不变或更低的成本下,能够采用不同国家原料进行农产品加工,为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三)消费维度:对激活消费潜力的倍增效应

RCEP的全面实施有利于缓解消费供需不匹配的矛盾,进一步激活消费潜力,提高中国作为区域消费市场的地位,推动消费从生存型传统消费向发展型、享受型高品质消费升级,更好地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作用。

1.推动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

RCEP协议的核心内容是成员国之间关税减免、通关便利化以及原产地优惠累积规则。比如,国外果蔬和肉、蛋、奶制品等生鲜产品通关时间缩短至六个小时以内;东盟对出口中国的木薯、大米、橡胶等产品,以及日韩对出口中国的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电磁炉等产品将逐步免征关税。根据RCEP原产地区域累积规则,2022年中国企业享受到进口国的关税减让15.8亿元,享受进口产品税款减免15.5亿元。随着RCEP的深入实施,未来将有更多的成员国商品享受到更大幅度的关税减免。这将直接降低进出口商品的成本,扩大消费品供给的让利空间,同时进一步刺激成员国之间的商品贸易往来,推动更多的消费精品通过更加高效便利的渠道进入中国市场,形成更高品质的消费内容和更加丰富的产品结构,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元的选择和更具性价比的商品,提高整体消费品质。

2.推动消费能力进一步提升

RCEP实施将让更多的国内产品可以零关税在成员国之间流通,从而获得更大的区域市场空间,推动外贸型经济快速发展,由此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一方面,伴随资源配置范围的扩大,将促进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融合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显著提高,更多国外企业进入中国进行投资,外资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也会增加国内居民就业机会,进而增加居民收入。另一方面,RCEP的实施能够推动各成员国产业加速优化升级,叠加人员的跨境流动更加便利等因素,中国劳动力出国就业的门槛会进一步降低,跨国就业的现象会更加频繁,进而也会增加居民收入。根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测算,2030年RCEP将带动成员国国

民收入净增加1860亿美元(冯其予,2021)。有研究分析,仅RCEP成员间短期关税减让就可能推动中国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分别增长0.08%和0.07%(刘璇等,2021)。就业机会的改善带来居民收入的增加,进而增强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

3.推动消费环境进一步改善

贸易市场的不断扩大为国内外消费平台升级创造条件,催生了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面向RCEP区域的高能级消费品展销品台,推动更好地服务消费者。比如,2023年,在第20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中国的智能化设备、绿色家电、绿色家居建材、照明科技产品以及东盟国家的有机食品、热带水果、康养产品成为热销产品,特别是文莱签约超20亿美元、30架中国大飞机的采购订单,是东博会史上最大贸易订单(王军利,2023)。另一方面,在人员流动方面,对于RCEP各成员国各类符合条件的商业人员及其随行人员给予入境许可、居留期限、签证等方面的更多便利,以便于其开展各类投资贸易活动,这将有效刺激居民出入境旅游消费。

(四)空间维度:对优化经济格局的赋能效应

RCEP的全面实施将加速国内外原材料、产品、技术、人才、资本、信息等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促进形成更大范围更加繁荣的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为重塑优化经济格局提供了重要路径。

1.作为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格局的重要路径

RCEP的全面实施,将推动RCEP区域成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提升亚太经济板块在全球经济增长进程中的作用,使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一是促进亚太区域经济开放融合。RCEP区域的总人口、经济规模、贸易规模占全球的总量均达到30%左右,是当前全球经济规模最大、覆盖人口最多、成员构成最多元的经贸协定。这将有效缓解东亚地区多个双边自贸协定交织产生的“面条碗”效应(韩立群,2013),推动亚太区域开放从“小区域融合”向“大区域融合”转变,有效避免碎片化贸易安排导致的效率损失(沈铭辉等,2020),同时打破《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在亚太地区一枝独秀的局面,缓解长期以来亚太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对欧美出口市场的依赖性和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锁

定的困境,改善亚太地区经贸生态。二是释放更多的区域发展潜力。RCEP框架填补了中日尚未签署双边自贸协定的空白,同时与区域内现有双边自贸协定形成叠加效应,能够更好地发挥中国市场对区域一体化市场的促进作用,提高区域整体自由化水平,释放区域发展更多潜力。有研究表明,到2035年,RCEP将使中国经济福利累计增加996亿美元,带动RCEP区域整体实际GDP、出口和进口增量较基准情景分别累计增长0.86%、18.30%和9.63%,区域投资累计增长1.47%(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课题组,2021)。此外,中国加入RCEP释放的积极信号将有力提升区域整体投资贸易吸引力,吸引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度加快融入RCEP的进程,也为中日韩自贸协定的顺利缔结及中国—东盟自贸区3.0的建设创造良好条件。三是推动重塑全球经贸合作格局。有研究预测,2022—2028年,RCEP区域的GDP增长额将达到13.3万亿美元,这个增量将比美国和欧盟的GDP增量总和高出17%(IMF,2023);到2035年,RCEP将推动全球实际GDP及外贸总量较基准情景分别累计增长0.12%和2.91%(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课题组,2021)。这将改变长期以来全球经济以欧洲和北美为中心的格局,推动亚太尤其是东亚地区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增长中心和世界经贸秩序变革的重要力量,促进北美、欧洲、东亚太平洋三大经济圈的均衡化。

2. 作为加速优化国内经济格局的关键举措

RCEP对中国各个区域尤其是具有区位、通道等优势地区带来难得的开放机遇和规则红利。从南部地区来看,云南、广西、广东、海南等省(区)处于面向东盟的最前沿及RCEP中心地,将进一步发挥与东盟地缘人文优势、背靠内地市场的腹地优势、最高水平开放政策制度优势,顺势而为扩大对外开放进而实现经济增长。比如,广西作为中国唯一与东盟陆海相连的省(区),在RCEP规则红利加持下,叠加已有“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北部湾经济区等重大区域战略机遇,以及东博会、中国—东盟自贸区等平台优势,将有效拓展与RCEP国家开放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加强与RCEP成员国尤其是东盟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和产业对接,实现跨越式发展。从东部地区来看,辽宁、山东、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市)是东盟国家对外贸易的主要伙伴,同时与日韩隔海相望,具

有海上通道优势和产业优势,可以借此进一步加强与RCEP成员国尤其是日韩等国的经贸合作,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比如,山东作为农产品出口大省,依靠优越的地理区位优势及产业优势,在巩固提升东盟经贸合作基础上,以日韩为突破口,打造与日韩开展经贸合作的大通道,推动本省泡菜、水果、蔬菜等优势农产品及加工品“走出去”,从而进一步提升外贸规模,推动产业结构加速优化。从中西部地区来看,河南、湖北、山西、四川、重庆等省(市)尽管没有沿边沿海的区位优势,但近年来随着航空、铁路、水运等枢纽网络的不断完善,通道优势不断显现,能够利用RCEP项下的贸易享惠规则、便利化规则、市场准入规则,加强与RCEP成员国之间的投资贸易合作,形成内陆地区对接RCEP的高地。比如,河南的航空货运网络较为成熟,“米+井+人”综合运输通道布局初步建成,功能性口岸数量在内陆省份中位居前列,且是东盟进口水果在中国最大的终端市场和集散地,通过这些优势与RCEP规则机遇相结合,打造RCEP其他成员国面向国内的要素资源集疏中转中心,有效释放多层次枢纽通道平台的集成效应,从而进一步提升河南的开放型经济层次、规模和质量。

四、RCEP实施对高质量发展的消极影响分析

RCEP的全面实施是一把“双刃剑”,并非只是产生了正向反馈,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风险,产生一些消极影响。

(一) 增加内源结构性风险与不确定性

中国与RCEP成员国之间产业结构既存在互补性,又存在竞争性。RCEP的实施,日韩澳新(新加坡)等成员国资本和科创优势、东南亚国家劳动力等要素方面的价格优势将更加突出,相关产品替代效应也将明显增强。在东南亚劳动力、土地等要素领域的竞争下,部分国内产业或者产业链上游资源端、下游简单组装类资源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国外转移的阻力不断变小,转移趋势将愈发明显,产业在国内区域间梯度转移的阻断风险加大。由于资本、市场等原因向外转移,在技术创新无法在短期内实现、中高端产业难以快速发展的条件下,部分传统产业和高科技代工订单向国外流失的现象可能进一步加剧。同时,低端制造业从中国转向成

本更加低廉的东南亚国家,原本作为主要转移承载地的中国市场吸引力也会逐渐下降。在高端产业进不来的情况下,低端甚至中端产业由于东南亚的低价格资源要素因素而大规模外流,可能导致国内产业结构出现部分“空心化”的风险有所增加。

(二)区域深度合作或产生引致摩擦力

RCEP成员国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异性(王雅莉等,2021),缺乏足够的共同意识和身份认同。同时,作为美国盟友,东盟、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容易受到来自美国的干扰。一方面,随着RCEP的深入实施,中国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力将会进一步攀升。美国势必将这一趋势视为对其全球霸权地位和经济利益的威胁,必然设法说服并联合其盟友,通过国家安全、关税、贸易制裁、绿色壁垒、垄断调查等方式,限制中国的进出口。在国际资本避险情绪影响下,部分领域贸易转移和产业转移趋势将更加明显。2023年美国联合澳大利亚、文莱、印度、日本、新加坡等国加快《印太经济框架》(IPEF)的谈判就是很好的例证。另一方面,CPTPP与RCEP在贸易区域、成员国、条款内容等方面存在较多重合,其对区域乃至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力不亚于RCEP。比如,CPTPP已经实施完全累积规则,而RCEP还有所保留;CPTPP规则更加重视金融服务领域的“边境后”规则,采取了更加精简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CPTPP成员中不仅有日、澳、新(新西兰)等RCEP成员国,还有墨西哥、加拿大、英国等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国家。美国作为CPTPP前身的倡议国,对其话语权一直存在。随着RCEP区域一体化的日趋成熟,美国难免会通过各种途径重返甚至主导CPTPP进程,以此来与RCEP抗衡,从而达到压制中国发展的目的。

(三)部分行业产生更激烈的市场竞争

在RCEP全面实施、供应链产业链区域一体化整合背景下,部分自身适应力弱、应对不足的企业,可能会面临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经营压力增大、市场竞争加剧等问题。一是部分领域产业竞争将更加激烈。随着比较优势的弱化,中国可能受到来自日韩在光电设备、机械制造、化工等中高端制造业领域,来自东盟在纺织业、橡胶与塑料业、金属制造业等中低端制造业领域,来自东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畜牧、渔业、高端果蔬等农业领域的竞争,这显然不利于中国参与区域价值链的整合重构,这也

是为什么其他成员国尤其是日韩在部分领域对中国的限制条款多于其他成员国家的根源所在。二是产业链供应链整合加速带来一定的风险。一些中国在RCEP中没有明确给予保护的国内产业,如电子信息低端产业环节,向东盟国家外移的风险加大;对于我国在RCEP中给予保护的产业,如轻工业,国外优势企业可能加大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以避开关税壁垒,使国内市场的国际化竞争或将更加激烈,导致国内企业不能在产业链供应链整合中占据优势地位,且还要在国内市场上做好应对国际竞争压力的准备。三是技术领域的竞争也可能更加激烈。具有关键核心技术的行业企业可以利用RCEP的原产地累积规则、关税减让政策,将技术集成环节保留在本国,同时冲击其他国家的行业技术创新。比如,日韩的集成电路企业可以将技术扩散工序保留在本国,而将下游组装检测等工序在中国或其他成员国完成,最终产品仍享受RCEP原产地累积优惠政策,这对中国自主研发的集成电路产品而言是不小的冲击;日本在高性能纤维材料领域具有技术垄断优势,随着RCEP规则下中国对日本纺机产品的进口关税逐步降为零,中国纺织业相关领域竞争可能加剧,急需加快实现自主创新突破。

(四)全面深化改革面临外部压力增大

RCEP对成员国相互开放市场、深化内部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在货物贸易便利化、市场准入、电子商务等多数领域已经符合RCEP的要求,在环境保护、竞争政策、劳工等领域规则与国内现行改革方向一致,但在投资、知识产权保护、少数商品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覆盖范围、政府采购、国有企业改革等不少领域规则及标准与RCEP存在较大差距,对接细化与调整改革的任务重压力大。比如,与RCEP大多数成员国相比,中国投资便利化程度较低,仍存在外资准入限制较多、投资领域“单一窗口”建设滞后、投资审核效率不高、缺乏国际化的投资纠纷解决机制等问题。在与RCEP投资规则接轨存在较大差距的情况下,就难以吸引高技术产业、高价值生产环节、高端服务业到中国布局,从而对中国参与区域产业链价值链重构产生不利影响。

五、对接RCEP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RCEP的全面实施为全球化增添信心,为区域

合作注入了新动力。未来,应从创新、产业合作、平台示范、营商环境等方面着力,持续放大RCEP实施带来的正向效应,降低其产生的消极影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以创新为引领加速重构区域价值链

以产业创新为导向,依托要素资源比较优势和产业优势,完善创新体制机制和支持政策,打造人才、技术等高端要素流入“洼地”,推动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提高区域产业竞争地位,逐步化解RCEP深入实施产生的内源结构性风险和产业转型升级阵痛。一是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重视基础研究和原始技术创新,推进“卡脖子”技术攻关,加强技术研发与先进设备引进,加快研究关键核心零部件、技术的可替代性措施,以增强自主研发能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力,推动价值链向“微笑曲线”两端迈进。二是围绕RCEP产业链布局创新链。顺应中国产业迈向中高端的趋势,选择适合RCEP区域产业合作发展前景的领域进行研发投入,力争占据有利位置,推动形成更有利于中国产业转型的创新链。依托中国在5G、大数据、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科技先发优势和产业比较优势,加快推动产业更新迭代,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中国在区域价值链重构过程中的示范引领作用。三是加强技术合作。在RCEP框架内深化与日韩等国的技术领域合作,加强联合技术攻关和产品研发,完善高新技术企业外商投资政策,开放高科技产品市场,以广阔的国内市场换取技术研发支持,不断以创新链的区域融合推动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四是完善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利用机制。主动对标RCEP关于知识产权等方面规则条款,逐步扩展知识产权客体范围及权利内容,合理设置高价值发明专利保护期限,推动RCEP区域实现科技成果共享和共同保护,同时,加强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技术转移转化合作,推动在产业创新方面实现互利共赢。

(二)主动谋划布局跨区域产业链合作

树立国际化、全局性理念,从战略层面把握RCEP带来的重大机遇,加大力度与区域内各国开展投资合作,积极谋划开展跨国产业链合作,推动产业、企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形成更加合理的产业布局。一方面,紧跟国家战略、紧扣主营业务,加强对赴RCEP成员国开展投资的可行性研究,深入开展双向投资合作,推动企业从“走出去”到“走

进去”,形成产业链整体优势。比如,汽车、发电输变电设备、工程机械、机床、食品包装机械、橡塑机械等属于中国优势产业,应引导相关企业抓住RCEP机遇进一步深度开拓东盟市场。另一方面,紧抓关税减让、原产地累积规则等方面的机遇,依托各国要素禀赋和产业基础,跟踪研究成员国政策法规、投资贸易等相关制度,寻找最适宜的原料进口来源,建设RCEP产业重组的生产要素配置基地,推进产业链国际合作“本地化”进程,挖掘“本地化”合作空间。按照“同线同标同质”要求提升内外贸商品质量标准建设,打造在国内乃至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本土品牌,以此提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创新和完善体制机制,持续引入更多高端人才、高端技术、高端产业、高端管理以及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顺势转移低端要素、低端产业等,强力推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

(三)强化对外开放平台的示范引领作用

相较于其他大多数经贸协定,RCEP的经贸规则更加开放、自由、透明,覆盖区域范围也更广。国内的自贸试验区(自贸试验港)、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综试区等开放平台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在推动规则、管理、标准等制度与国际对接以及集聚发展开放型经济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开放平台经过多年的积累,在推进区域政治、经贸、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应以这些对外开放平台为先行区、“试验田”和“缓冲站”,强化这些平台对接RCEP规则、获取RCEP红利的示范引领作用。一方面,对于自贸区类的平台,应聚焦投资、贸易、金融、知识产权、电子商务、贸易救济等重点领域率先有针对性地开展改革创新、先行先试,对标RCEP中“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进行全领域压力测试,强化优势互补,形成既有地方特色又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引导优势企业主动整合RCEP区域内优质原料、技术研发和市场渠道等优质资源,在边境地区投资,入驻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与周边国家形成更为紧密高效的区域供应链合作关系。加快研究CPTPP相关条款,率先在这些平台开展特色板块的压力测试和制度创新,为中国早日加入CPTPP提供支撑,从而降低由于RCEP深度合作产生的间接性国际摩擦风险。另一方面,对于博览会类的平台,应根据RCEP合作进程

和热点,增加会议的RCEP元素,依托会议举办与RCEP相关的全产业链展会、推介会、贸易对接会、合作论坛等投资贸易促进活动,做到更宽领域合作、更多层次交流。

(四)构建更加适应RCEP的营商环境

充分发挥RCEP的倒逼作用,对标RCEP规则持续加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不断降低RCEP实施过程中的不确定风险,提升自身在区域发展中的制度话语权。一是持续加强顶层设计。全面对接RCEP经贸规程,加快完善政策法规体系,系统谋划、因地制宜推进营商环境适应性改革,塑造良好实施空间。可以鼓励各地选择一部分可尽快探索实施的RCEP鼓励性义务作为营商环境改革方向,尽可能以硬约束标准执行。此外,在原产地规则等条款上继续深化谈判,研究启动RCEP动态升级谈判的可行性,推动加快RCEP内部双边多边自贸进程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形成以“小多边”引领“大多边”、同时以“大多边”促进“小多边”的RCEP新格局(王好心泓等,2022)。二是完善重点领域改革。对标国际先进规则,坚持高效率、低成本导向,聚焦外资准入、对外贸易、通关便利化、知识产权、跨境贸易等重点领域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再造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流程,建立完善市场监管体系,全面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不断激活市场活力。三是完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进一步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调动资源增强涉外法律服务能力,同时,开展RCEP主要成员国贸易产品安全预警监测,跟踪发布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监测报告,建设多主体协同的经贸摩擦综合服务体系,帮助企业更好地抵御国际经贸规则变化风险。

(五)加强对重点群体RCEP规则的培训指导

RCEP对所有成员国全面实施还不足一年,且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许多条款才陆续生效。对各类主体而言,熟练掌握并运用RCEP政策和规则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应围绕RCEP成员国产业发展、投资动态、市场前景、规则标准适用情景等内容,加强对重点群体的宣传、培训和业务指导,引导企业开展RCEP相关业务,获取RCEP红利。首先,鼓励各地政府结合各自优势与特色,分地区、分领域、分行业开展相关解读和宣讲,针对重点群体靶向开展相关的政策宣传推介和业务指导,普及

RCEP关税减让政策和原产地区域累积规则等重要规则知识,帮助企业吃透用好RCEP规则。其次,发挥好各地RCEP企业咨询服务站及服务专窗、专栏的功能作用,开通RCEP服务热线,在政策信息发布、宣传培训推广、贸易投资促进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全天候、一站式、专业化、定制化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在处理RCEP相关业务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最后,创新宣传培训模式,推动实现政策宣传“点线面”“普惠+专项”全贯通,不断提升企业和社会公众对RCEP的认知度以及对相关规则的理解和应用能力。

六、结论与展望

RCEP的实施是政府、产业、社会主体之间行为逻辑和力量互动角逐的过程,也是一个复杂的、漫长的、动态的过程,将持续对中国高质量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未来,无论是从实践机理、理论逻辑、实证研究,还是从规范分析而言,关于RCEP全面实施对中国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研究仍有较为广阔的拓展空间。

(一)RCEP实施将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重要平台

自由贸易区作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平台,其规则议题会随着对外开放的新趋势新要求新特征不断拓展。RCEP不仅涵盖了消除关税壁垒、放宽市场准入等自贸区协定的常规议题,也涵盖了当今国际经贸规则领域的热点议题,特别是在知识产权、电子商务、服务贸易等相关领域的规则标准都达到了中国在所有已加入的自贸协定项下的新高度。这不仅显著提升了中国自贸区网络的“含金量”,也无疑为对比研究自贸协定的影响效应提供了更丰富的素材。未来,应持续深入分析RCEP作为区域经贸规则的“整合器”的功能作用,梳理其助力中国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推进制度型开放的实践经验,从而为中国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有力支撑。

(二)RCEP实施将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关键路径

经济双循环的目标在于实现经济稳定、畅通、安全、持续的增长。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既要靠外循环充分调动牵引内循环,形成驱动内循环发展

水平和效率的内生动力;也要靠内循环重塑外循环,塑造中国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新优势。RCEP搭建起衔接内外循环的桥梁,将持续提升货物贸易便利化水平和市场开放程度、实质性改善区域内贸易环境、大幅降低域内贸易壁垒,从而加速域内生产要素流动及贸易投资活动,推动形成更加统一高效的区域大市场,也可为国内市场良性循环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与政策支持,推动国内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提质升级,为塑造更高水平的国际国内市场循环提供广阔空间。未来,应深入分析RCEP实施与经济内外循环联动之间的契合性,研究RCEP促进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的内在机理,从而为提升中国经济内外循环张力、推动塑造新发展格局探径寻路。

(三)RCEP实施将为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提供解决方案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是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在链条上任意节点出现问题都会引发“断链”风险,受到国际市场需求波动的影响。区域经贸协定最显著的一个功能就是放大成员之间的要素资源和产业的互补性,推动构建更强大的生产网络,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RCEP的实施有利于将国内长期以来形成的相对过剩的低端产能加速转移到RCEP区域内更具生产成本优势的国家进行专业化生产,本土企业则专注中高端产业创新升级,通过这种“腾笼换鸟”的方式为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升级预留足够的发展空间,同时推动区域成为扩大版的“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未来,应辩证看待RCEP带来的区域内转移和分化,深入分析RCEP的实施过程中的产业传导路径及其效果,研究区域产业链布局的时空演化特征,从而为化解中国企业“低端重复建设、高端空心失位”矛盾,推动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生态位提供可靠的解决方案。

(四)RCEP实施将为参与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区域范本

当前,经济衰退叠加各类摩擦加剧的危机与区域互惠共赢的愿景相互交织、共同推动全球治理格局的深入调整,但不可否认的是,全球治理体系仍存在西方主导和理念竞争的问题,治理变革面临动力不足和方向不明的困境。区域经贸协定的生效实施,能够发挥良好的“润滑剂”“缓冲器”的作用,

平衡好“摩擦危机”与“共赢愿景”两种驱动力,在全球治理变革过程中释放出明显的战略积极效应。RCEP的成员国既包括中国、东盟等发展中国家,也有日本、新西兰等发达国家和其他一些最不发达国家,独特的成员结构和模式、主体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都使其具有不同于其他自贸协定的区域间特征,是全球不同类型经济体深化区域合作的重要范本。RCEP的深入实施,将有力发挥出平衡单边行为、促进经济理念多元化、丰富经贸领域制度建设、设定地区经济议题、扩散规范经验等重要区域间功能(丁国政,2023)。未来,应深入分析RCEP实施过程中的各种复杂利益关系及区域间功能的演进特征,深度检视区域治理体系中经济逻辑和安全逻辑相互影响的机制,从而为解决区域乃至全球制度困境提供新的可能,也为重构全球治理秩序提供新的借鉴。

参考文献

- [1] BALISTRERI E J, TARR D G. Comparison of deep integration in the Melitz, Krugman and Armington models: The case of the Philippines in RCEP [J]. *Economic modelling*, 2020, 85:255—271.
- [2] PETRI P A, PLUMMER M G. East Asia decoupl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war, COVID-19, and East Asia's New Trade Blocs [R]. *PIIE Working paper*, No.20—9, 2020.
- [3] 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王业宇,陈琪,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 [4]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M].李春,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 [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经济展望:坎坷的复苏[EB/OL].(2023-04-01)[2023-12-25].<https://www.imf.org/zh/Publications/WEO/Issues/2023/04/11/world-economic-outlook-april-2023>.
- [6] 郑远芳,曾庆均.中国制造业与RCEP成员国产业融合研究[J].*亚太经济*,2021(4).
- [7] 陈慧.RCEP生效后中国参与区域产业链价值链重构的机遇、挑战与应对[J].*经济纵横*,2022(8).
- [8] 屠年松,李柯,柴正猛.中国双向FDI对RCEP成员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影响[J].*统计与决策*,2023,39(23).
- [9] 张志明.区域贸易协定深化与亚太价值链合作模式重塑[J].*国际贸易问题*,2022(5).
- [10] 王娟娟.RCEP与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产业链优化[J].*中国流通经济*,2022(4).

- [11]钱静斐,孙致陆,陈秧分,等.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RCEP)实施对中国农业影响的量化模拟及政策启示[J].农业技术经济,2022(9).
- [12]许明.RCEP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影响机制与优化路径研究[J].亚太经济,2023(2).
- [13]任桐瑜,谢建国,洪小羽.RCEP、全国统一大市场与中国区域福利效应[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3(11).
- [14]课题组.RCEP自贸区内中国农产品出口效应及贸易前景:基于随机模型及细分市场的实证分析[J].中国流通经济,2022(4).
- [15]周洁.RCEP的贸易和福利效应量化评估及对策研究:基于全球价值链区域化视角[J].价格月刊,2023(7).
- [16]秦若冰,马弘.RCEP的贸易和福利效应:基于结构模型的量化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9).
- [17]于国斌.RCEP协定对上海外贸型企业经营影响调查报告[J].统计科学与实践,2023(1).
- [18]刘江涛,朱耘婵.湖北高质量实施RCEP的政思考策[J].学习月刊,2022(11).
- [19]张洁,秦川,毛海涛.RCEP、全球价值链与异质性消费者贸易利益[J].经济研究,2022(3).
- [20]李旭.社会系统动力学:政策研究的原理、方法和应用[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 [21]杨继军,艾玮炜,陆春怡.RCEP原产地规则对区域供应链重构的影响[J].国际贸易,2023(7).
- [22]彭水军,吴腊梅.RCEP的贸易和福利效应: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考察[J].经济研究,2022(8).
- [23]王雅莉,王妍.RCEP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双重影响及对策分析[J].理论探讨,2021(2).
- [24]张少军,余志科,郑安然.RCEP能否抵消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兼论保障中国经济安全[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23(2).
- [25]邹海霞,袁凤柳.RCEP成员国间安全互信与中国化实践路径[J].商业经济,2023(6).
- [26]齐笑,明小晴.RCEP对中国的正向效应分析[J].科技经济市场,2022(6).
- [27]刘萌.RCEP全面生效为我国外贸发展注入新动能[N].证券日报,2023-06-21.
- [28]冯其予.RCEP对我国产业发展影响几何[J].中国外资,2021(9).
- [29]刘璇,孙明松,朱启荣.RCEP关税减让对各成员国的经济影响分析[J].南方经济,2021(7).
- [30]王军利.第20届东博会落幕[N].中国青年报,2023-09-20.
- [31]韩立群.全球经贸新格局背景下的RCEP:影响与走势[J].当代世界,2013(7).
- [32]沈铭辉,李天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进展、影响及展望[J].东北亚论坛,2020(3).
- [33]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课题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对区域经济影响评估报告[R].北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2021.
- [34]王好心,李曾.真正的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是历史大势[N].光明日报,2022-01-25.
- [35]丁国政.RCEP功能分析研究:基于区域间主义视角[J].国际公关,2023(22).

Study on Multi-Dimensional Impact of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RCEP on Chin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ang Jianguo Sheng Jian Yi Xueqin

Abstract: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RCEP will directly promote the accelerated ev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China's open content form, economic and social structure, regional spatial pattern, etc., and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in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multi-dimensional impac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RCEP is the result of the game between multiple players, multiple forces and multiple relationships. It has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four dimensions: maintaining economic security,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ctivating consumption potential, and optimizing the economic pattern. However, it may also lead to many negative effects, such as increasing internal structural risks and uncertainties, increasing the friction caused by regional cooperation, increasing the pain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some enterprises, and increasing the external pressure faced by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In the futur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accelerat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regional value chain, layout cross-regional industrial chain cooperation, strengthen the demonstration and leading role of the platform, optimiz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strengthen training guidance, so as to magnify the positive impact and narrow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RCEP,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RCEP;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Regional Collaboration; Impact

(责任编辑:平萍)

【区域经济研究综述】

区域协调发展与交通强国建设

——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第二十六届年会综述

李鲁 李剑芳

摘要:2023年10月28日,第二十六届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在湖南长沙举办。年会以“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为主题展开研讨,与会专家围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区域重大战略、区域经济发展与交通强国建设、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区域发展与经济韧性、数字经济与碳排放、区域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等进行深入交流,为中国区域经济地理的发展提供了新颖的研究视角,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地理;区域协调发展;交通强国;区域韧性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4)02—0156—05 收稿日期:2023—12—06

作者简介:李鲁,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070)。

李剑芳,女,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通信作者(南京 210095)。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发展,致力于解决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为认真学习和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于2023年10月28日在长沙理工大学召开,会议以“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为主题,采用线上线下的方式同步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兰州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北京科技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南开大学、长沙理工大学、新疆财经大学、暨南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本次年会设有主论坛和分论坛,与会专家围绕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展开讨论。分论坛设置七个主题:城市群经济地理演化的内在机制与治

理、区域协调发展的测度方法体系创新、国家区域重大战略研究、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高质量发展与地区经济增长、交通强国建设战略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协调联动、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研究。本文主要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区域重大战略、区域经济发展与交通强国建设、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区域发展与经济韧性、数字经济与碳排放、区域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六个方面对主论坛的专家报告进行分类归纳与内容综述。

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区域重大战略

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区域重大战略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旨在促进不同地区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共享,提高区域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区域重大战略则是为了解决区域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推动地区经济

发展。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具有空间差异性和复杂性,新时代的区域经济发展应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展现历史逻辑和规律性特征,实现经济、环境与空间的有机统一。兰州大学经济学院郭爱君教授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生成逻辑与实践进阶》论文中指出,区域经济发展要素的空间差异性导致很难用一种普适性的体系和框架在微观层面归纳总结模式的形成与演化。但在宏观层面,他尝试将区域经济发展复杂的内在关系凝练化,从资源禀赋、动力源与发展环境三个维度探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与变迁,凝练出中国各阶段区域经济发展最鲜明的特征和内涵,并归纳总结为五种模式:生产导向的服务革命发展模式、公平导向的均衡发展模式、梯度导向的非均衡发展模式、全局导向的协调发展模式、多元导向的“新协调”发展模式。进而提出新时代区域经济发展的四条启示:坚持“以党领政”和“以党导经”,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在渐进式区域发展模式变迁中展现出“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的规律性特征与历史逻辑;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由对立到统一,且愈加聚焦于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变迁中空间载体之间的协调由政府主导向政府市场合力引导转变。

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重视都市圈与城市群的作用,注重用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思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北京科技大学张满银教授在《中国区域重大战略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成效研究》中,首先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区域战略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的四个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区域重大战略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探索展开分析,然后运用标准差椭圆与偏离份额分析法对2000—2022年中国区域重大战略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的成效进行深刻刻画,最后提出实施中国区域重大战略的几点思考:切实形成总体区域协同发展战略体系;切实塑造起重大区域的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价值链和空间链即六链耦合协调发展的强大生产力基础;重点发挥都市圈、城市群的核心带动作用;重点健全城乡融合协调发展新机制;切实建立区域合作与利益调节新机制;切实重视对各种战略规划的评价。

二、区域经济发展与交通强国建设

区域经济发展与交通强国建设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交通基础设施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推动交通强国建设的重要手段。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金凤君教授以《新时代交通强国建设:内涵与目标》为题发表主旨演讲,深入剖析了交通强国的战略背景、建设基础、战略导向与建设目标,总结出交通强国的内涵和目标是与时俱进的,具有显著的时代特色和阶段性特征,交通建设从原先的从属功能为主转变为从属与引领功能并重。未来,中国应围绕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和维护国家安全等方面,深入探索人地关系人地系统中,交通要素与相关自然、人文、经济、技术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机制和效应,依托大数据分析和综合数据分析手段,创新系统模拟和预测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交通强国建设。

交通强国,铁肩担当。构建现代综合交通体系,可以实现便捷高效、安全舒适、绿色智能的出行愿景,为科技创新、智慧引领、经济腾飞注入活力。长沙理工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龙科军教授在《交通强国的湖南担当》中指出,交通行业是国民经济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的产业,中国交通强国建设应该以人民满意、保障有力、世界前列为发展目标。当前湖南交通强省的主要任务是湖南“三高四新”美好蓝图提供优质的交通服务和保障。之后详细分析了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以及推进交通强省战略的对策建议。着重强调了统筹规划、优化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和完善交通投资、经营政策等方面的重要性,有助于提升综合治理能力,实现交通强省的目标,推动湖南省交通发展。

数字交通赋能经济,智慧网络创造价值。通过融合创新技术,可以提升交通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助力产业升级。长沙理工大学区域交通经济研究院院长周正祥教授在《数字交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耦合关系及优化研究》论文中指出,数字经济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是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强劲新动能;数字技术与交通运输业深度融合促进交通运输业数字化转型;中国数字经济虽然起步较晚,但

已初具规模,且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该研究对数字交通系统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根据结果提出适宜性的对策建议,对中国加快交通运输业数字化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三、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是推动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可以促进沿线地区的经济联系和合作,提高区域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对于实现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浙江大学石敏俊教授与上海财经大学张学良教授分别从发展型治理与文化活化的视角切入,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

石敏俊教授在《发展型治理与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报告中指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当前面临的挑战是生态环境治理成效不稳固,老问题仍然存在,生态安全隐患逐渐暴露,新问题接连出现,产业转型对高质量发展推力不足,核心问题有待从根本上解决。提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应该从整顿型治理走向发展型治理的新思路。以市场导向和科技创新推动绿色低碳产业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促进生态产业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为推动发展型治理提供了新方案。

张学良教授以“新时期长江文化的传承、活化与创新”为主题,从文化的视角切入,首先指出中国社会在兼具“硬实力”的基础上,要彰显“软实力”,扩大长江经济带整体“软实力”的国际影响,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与传承中凝聚强大定力。其次详细剖析了两湖文化、江南文化、江淮文化、吴越文化,阐释了文化与发展的辩证关系,指出长江文化根植于对财富创造的尊重与追求,以及对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满足;江河湖海文化对商业、信誉、多样性的追求是发展的重要基因。并提出发展可能会带来文化繁荣,文化可能带来发展与增长;文化与文明也是金山银山,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文化的活化是关键;要赋予文化当代价值,推进文化产业发展。最后为长江经济带文化活化提出数字化赋能、场景化展示、产业化发展、市场化配置、路径化探索五条路径。其研究方法严谨,对地域文化演变的理解深刻,为相关领域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学术视角。

四、区域发展与经济韧性

区域经济韧性可以提升区域经济的适应性和抗风险能力,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增强区域经济的竞争优势。中国学术界关于经济韧性的研究较少,缺乏一定的理论基础,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院长贺灿飞教授与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的何雄浪教授从不同视角为经济韧性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贺灿飞教授在《中国区域经济韧性研究:理论与实践》中,首先阐释了区域经济韧性的研究背景与理论进展,指出区域经济韧性是具有空间尺度特征的经济韧性,并从均衡论视角与演化论视角深入分析,认为区域经济韧性不是凭空产生的,其形成过程具有动态性、多主体互动性与多尺度融合性三大特征,其前沿方向是结合定性与定量等方法,探讨特定冲击背景、特定空间尺度下区域经济韧性的形成及效应。接着重点研究了中国区域经济韧性问题,认为要从危机本身性质着手,在当前危机管理、风险管理、行政管理研究对危机分类的基础上探讨区域经济的形成与作用机制,把握多空间尺度上中国特有的危机应对方式,系统性展示政府、政策作用在区域经济韧性问题上的影响效力,加强对行政主体等非市场主体的关注。最后剖析了全球金融危机、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下的中国区域经济韧性,认为城市产业布局相关多样化程度不利于出口经济韧性的形成,特定产业受到的外部冲击会沿着投入产出网络、知识关联网络等向相关产业蔓延;强调地方政府治理需要从区域产业结构本身出发,通过引入注意力机制,表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可以通过增强区域创新能力、增强区域经济发展潜力、增强区域社会治理效力提升区域经济韧性水平。该观点对于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何雄浪教授在《人口数量红利、人口质量红利与城市经济韧性》中,通过理论分析、实证检验,得出研究结论:第一,从总体上看,人口质量红利能够显著增强城市经济韧性,人口数量红利的影响效应则不明显,且在处理了内生性问题以及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第二,人口数量红利的影响不存在城市异质性,且对任何一类城市的经

济韧性提升作用均不明显。而人口质量红利对城市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在胡焕庸线东南片区的城市、内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城市更明显,其余城市不显著。第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在人口质量效率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中发挥出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即有效增强了科技研发人员对城市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作用不明显,甚至有削弱人口质量红利提升城市经济韧性的趋势。第四,人口集聚在人口质量红利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中存在门槛效应,迈过门槛值以后,人口质量红利和城市经济韧性的正向影响作用将减弱。最后提出中国需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定因地制宜的人才政策。

五、数字经济与碳排放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应该关注数字经济的发展,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并将其与实体经济深入融合,这样不仅可以推动传统产业向绿色低碳化转型、减少区域碳排放,也可以促进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对于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基石”,对实现“双碳”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新疆财经大学副校长高志刚教授在《数字经济、碳排放强度与资源型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阐述了碳排放强度对资源型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通过构建资源型城市数字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方面进行阐释,认为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资源型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关注碳排放的重要性,这一观点有助于推动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地理科学学院院长仇方道教授在论文《省际边界区域现代服务业集聚效应——以淮海经济区为例》中,首先指出数字金融作为中国金融发展的新趋势,目前属于比较新的研究领域,且已有研究很少涉及省际边界区域数字金融与碳排放。接着通过空间自相关、网络分析和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研究了省际边界的数字金融空间演变及关联特征、碳排放空间格局及复杂性特征、中介传导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最后得出数字金融从要素配置、融资、投资、信息资源整合四个方

面实现碳减排的措施和东、中、西部各自实现碳减排的举措。该报告为促进“双碳”目标实现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思路。

六、区域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

与会专家针对区域经济地理领域的诸多问题,从不同角度做了主题报告。

县域作为城乡之间的重要连接点,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时代价值。它是城市发展向农村地区延伸的关键纽带,也是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核心支撑点。安徽财经大学副校长周加来教授从县域经济定位、功能、结构和作用四个方面,阐述了当前县域经济的理论问题,指出国内对县域经济的研究相对滞后,且人们对县域经济的定位存在误区。衡量县域经济质量的标准应该是其特色产业占GDP的比重,县域经济应该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不能一味地追求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结构合理而忽略其规律性。其观点对充分发挥县域作用,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预期和信心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理性预期引导企业和个人投资消费决策,信心塑造市场氛围和稳定预期,政策调控应关注预期管理,提升市场信心,以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宁波工程学院区域发展与共同富裕研究院院长、吉林大学东北亚学院教授赵儒煜教授以《预期、信心与经济增长理论深化》为题做了主旨报告。他首先从不同方面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概述,指出总需求为何减少,转折是如何形成的,如何走进或走出这种危机。然后从价格机制、市场机制、预期机制进行分析,阐述预期机制下的供给预期与市场失衡、产业生命周期与政府调控。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失衡一直都在,危机与萧条是需求升级预期无应的结果;人口增长是常数,不是增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意义不大;消费结构升级更有意义,创新是经济从萧条拐回复苏的关键。该研究从理论层面阐述了繁荣与萧条的演变过程及复苏途径,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经济周期波动及其调控策略。

人口分布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质量。优化人口布局,提升人力资源配置效率,是实现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的关键。政策应关注人口流动与空间均

衡,促进人口与产业协同发展,打造宜居宜业区域环境。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张耀军教授在《人口分布与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中,对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进行了深刻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应以人口分布为市场基础,通过构建“大分散、小聚集”的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优化国土空间结构。

区域金融服务能力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提升金融机构效率、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有助于增强区域金融服务能力,满足实体经济需求,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陈斐教授在《中国区域金融服务能力变化及其影响效应研究》中,构建了中国区域金融服务能力指标体系,并从变化特征分析与影响效应进行剖析,提出优化金融生态环境与区域金融布局、加快资源主导型向效率主导型转变的政策建议。

城际技术引进网络是推动区域创新发展的重要机制。构建高效、协同的技术转移体系,促进城际间技术资源共享,有助于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华东师范大学全球创新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承良教授在《城际技术引进网络的空间演化及创新效应》中,指出技术引进是地方政府嵌入全球创新网络的主要路径。他从研究背景、理论框架、城际技术引进网络的空间演化、城际技术引进网络的地方创新溢出效应四个方面进行分析,指出城际技术引进多样性和地方技术多样性具有空间集聚与空间分布的高度一致性;城市技术创新能力与城际技术引进具有高度的线性相关性;

城际与外部技术引进对本地创新能力的提升均具有正向溢出效应,但跨国技术引进网络存在抑制效应。这些观点对于推动不同区域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具有指导作用。

七、结语

本次会议围绕区域经济地理领域的热点问题展开讨论,具有较强的学术与实践价值,为经济地理学领域的学术交流搭建了重要平台,对推动中国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主要包括:(1)交通强国建设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不仅能够提高区域的交通便利性,还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升级。(2)数字经济和碳排放是当前区域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带来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双赢局面,而低碳发展则是全球共识,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3)区域经济韧性对于推动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区域竞争力和适应外部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加强对区域经济韧性的研究和应用,提升区域经济的适应性和抗风险能力。

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强调区域协调发展这一核心要义。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紧要关头,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成为首要任务。迫切需要关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从不同视角联系经济现实情况,用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从而为中国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智慧支持。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Transport Power: A Review of the 26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Society

Li Lu Li Jianfang

Abstract: On October 28, 2023, the 26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Society was held in Changsha, Hunan Province. The theme of the conference was “deeply implementing th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transport power”. The experts attending the conference had in-depth exchanges on regional economic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major strategie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a transport powe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resilience, digital economy and carbon emissions, and hot issues i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onference provided a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Key Words: Economic Geography;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ransport Power; Regional Resilience

(责任编辑:彦 伦)